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
（1942年5月）
为护士节题词 ……37
（1942年5月12日）
给续范亭的信 ……39
（1942年5月14日）
致张闻天电 ……40
（1942年5月14日）
致胡宗南电 ……41
（1942年5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2
（1942年5月21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43
（1942年5月27日）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44
（1942年5月28日）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话 ……53
（1942年5月30日）
复艾青信 ……54
（1942年5月）

复刘少奇电 ……55
（1942年6月1日）
给罗烽的信 ……56
（1942年6月12日）
致周恩来电 ……57
（1942年6月13日）
复周恩来电 ……58
（1942年6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59
（1942年6月19日）
复陈潭秋电 ……60
（1942年6月22日）
致周恩来电 ……61
（1942年6月23日）
复陈毅电 ……62
（1942年6月24日）
给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 ……63
（1942年6月25日）
致周恩来电 ……65
（1942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66
（1942年7月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68
（1942年7月2日）
复董必武电 ……70
（1942年7月2日）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 ……71
（1942年7月4日）
新四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 ……72
（1942年7月6日）
复董必武电 ……73
（1942年7月6日）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74
（1942年7月9日）
答晋西北士绅问 ……76
（1942年7月9日）
复盛世才电 ……78
（1942年7月13日）
致彭德怀电 ……79
（1942年7月15日）
给周恩来的信 ……80
（1942年7月17日）
复陈毅电 ……82
（1942年7月20日）
复王世英电 ……83
（1942年7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84
（1942年7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85
（1942年7月30日）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 ……87
（1942年7月31日）

毛泽东为《陇东报》题写报头 ……89
（1942年7月）
对华中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 ……90
（1942年8月4日）
致华中局电 ……91
（1942年8月9日）
给谢觉哉的信 ……92
（1942年8月15日）
给谢觉哉的信 ……93
（1942年8月17日）
复周恩来电 ……94
（1942年8月17日）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 ……95
（1942年8月19日）
复周恩来电 ……96
（1942年8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7
（1942年8月22日）
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98
（1942年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03
（1942年8月29日）
致周恩来电……104
（1942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电贺英《工人日报》复刊……105
（1942年8月31日）

和漫画家的谈话 ……106
（1942年8月）
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谨、郭卫生和周励武时的谈话…108
（1942年9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09
（1942年9月1日）
复周恩来电……118
（1942年9月3日）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19
（1942年9月7日）
关于国共合作中我之斗争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22
（1942年9月8日）
纪念体育节题词……123
（1942年9月9日）
给谢觉哉的信……125
（1942年9月15日）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凯丰的信……127
（1942年9月15日）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130
（1942年9月15日）
给周恩来的指示……131
（1942年9月15日）
报刊宣传服务于党的当前政策……133
（1942年9月15日）
致朱瑞电……135
（1942年9月15日）

复张闻天电……136
（1942年9月15日）
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137
（1942年9月15日）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138
（1942年9月20日）
致刘少奇电……140
（1942年9月21日）
给续范亭的信……141
（1942年9月22日）
在“枣园之宴”上的讲话……143
（1942年9月）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46
（1942年9月、10月）
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150
（1942年10月6日）
延安观察家评斯大林谈话* ……151
（1942年10月8日）
为《论党内斗争》起草的按语……152
（1942年10月9日）
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词……153
（1942年10月10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55
（1942年10月12日）
历史教训……160
（1942年10月14日）

评柏林声明……164
（1942年10月16日）
致彭德怀电……169
（1942年10月17日）
致王世杰电……170
（1942年10月18日）
复周恩来电……171
（1942年10月18日）
复周恩来电……172
（1942年10月21日）
致李先念等电……173
（1942年10月24日）
致周恩来电……174
（1942年10月25日）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结合的军队……175
（1942年10月25日）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177
（1942年10月25日）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178
（1942年10月28日）
复周恩来电……179
（1942年10月28日）
致彭德怀电……180
（1942年10月30日）
晋西北要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81
（1942年10月31日）

和谭政的谈话……182
（1942年10月）
给贾拓夫的复信……183
（1942年11月2日）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84
（1942年11月6日）
致林枫电……185
（1942年11月16日）
致彭德怀电……186
（1942年11月17日）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87
（1942年11月21日）
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的信……259
（1942年11月23日）
为杨松题写挽词……260
（1942年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261
（1942年11月29日）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263
（1942年11月29日）
致李先念等电……269
（1942年11月30日）
给蒋介石的信……270
（1942年12月1日）
给南汉宸的信……272
（1942年12月8日）

致周恩来、林彪电……273
（1942年12月11日）
给南汉宸的信……274
（1942年12月13日）
复周恩来、林彪电……275
（1942年12月18日）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276
（1942年12月20日）
给续范亭的复信……277
（1942年12月25日）
为柯棣华题写挽词……278
（1942年12月29日）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280
（1942年12月）
和张稼夫的谈话……440
（1942年12月）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的谈话……441
（1942年12月）
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442
（1942年）
致周恩来、林彪电……453
（1943年1月1日）
新四军工作的总方针……454
（1943年1月5日）
致彭德怀等电……456
（1943年1月6日）

给王中的信……457
（1943年1月10日）
对晋察冀分局发布新施政纲领的意见……458
（1943年1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61
（1943年1月12日）
为西北局奖励的二十二位生产英雄题词……462
（1943年1月14日）
复周恩来、林彪电……467
（1943年1月16日）
复李先念、任质斌电……468
（1943年1月16日）
给钟敬之的信……469
（1943年1月23日）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471
（1943年1月25日）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474
（1943年1月25日）
在谢觉哉、贾拓夫的报告上的批示……480
（1943年2月1日）
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481
（1943年2月7日）
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483
（1943年2月9日）
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485
（1943年2月10日）

复林彪等电……487
（1943年2月12日）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488
（1943年2月21日）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490
（1943年2月24日）
致彭德怀电……491
（1943年2月28日）
给林哲的信……492
（1943年3月15日）
复彭德怀电……493
（1943年3月15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494
（1943年3月16日）
复彭德怀电……499
（1943年3月2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500
（1943年3月30日）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501
（1943年3月）
给印度国民大会的信……503
（1943年4月5日）
复周恩来电……504
（1943年4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505
（1943年4月13日）

给凯丰的信……507
（1943年4月22日）
致英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电……508
（1943年4月23日）
对王若飞来信的批复……509
（1943年4月25日）
复周恩来等电……510
（1943年4月27日）
复周恩来电……511
（1943年4月30日）
致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电……512
（1943年4月30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

引言

（1942年5月2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

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

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

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

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

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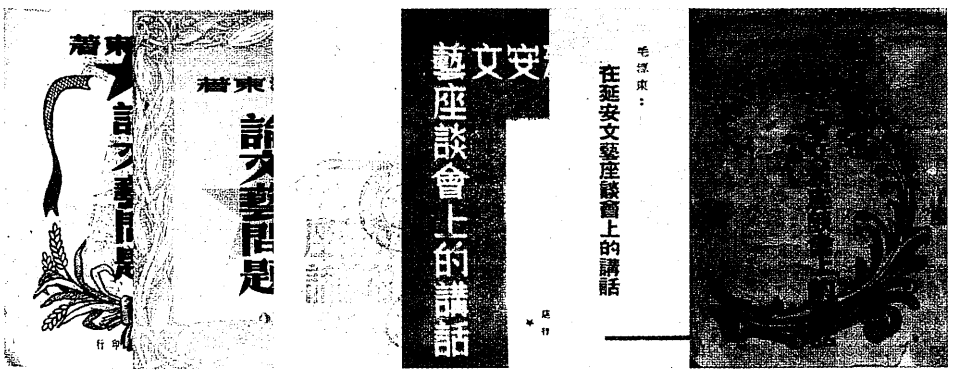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结　论

（1942年5月23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版本）。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

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

[1]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1]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

---

[1]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参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1]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

[1]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

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四]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

---

[1] 参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

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1]。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

[1]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

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1]，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2]，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

---

[1]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2]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

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1]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

[1]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

---

[1]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

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

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

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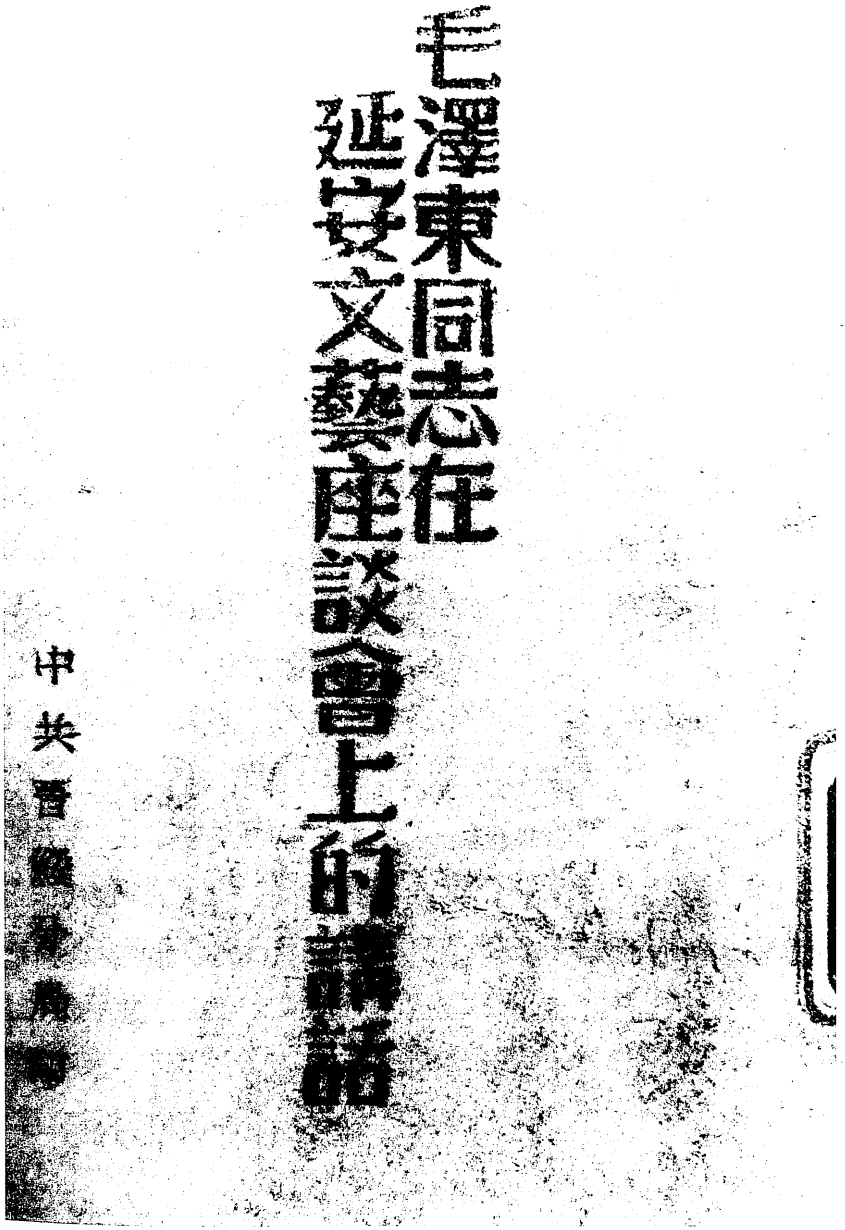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

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



中共晋绥分局刊印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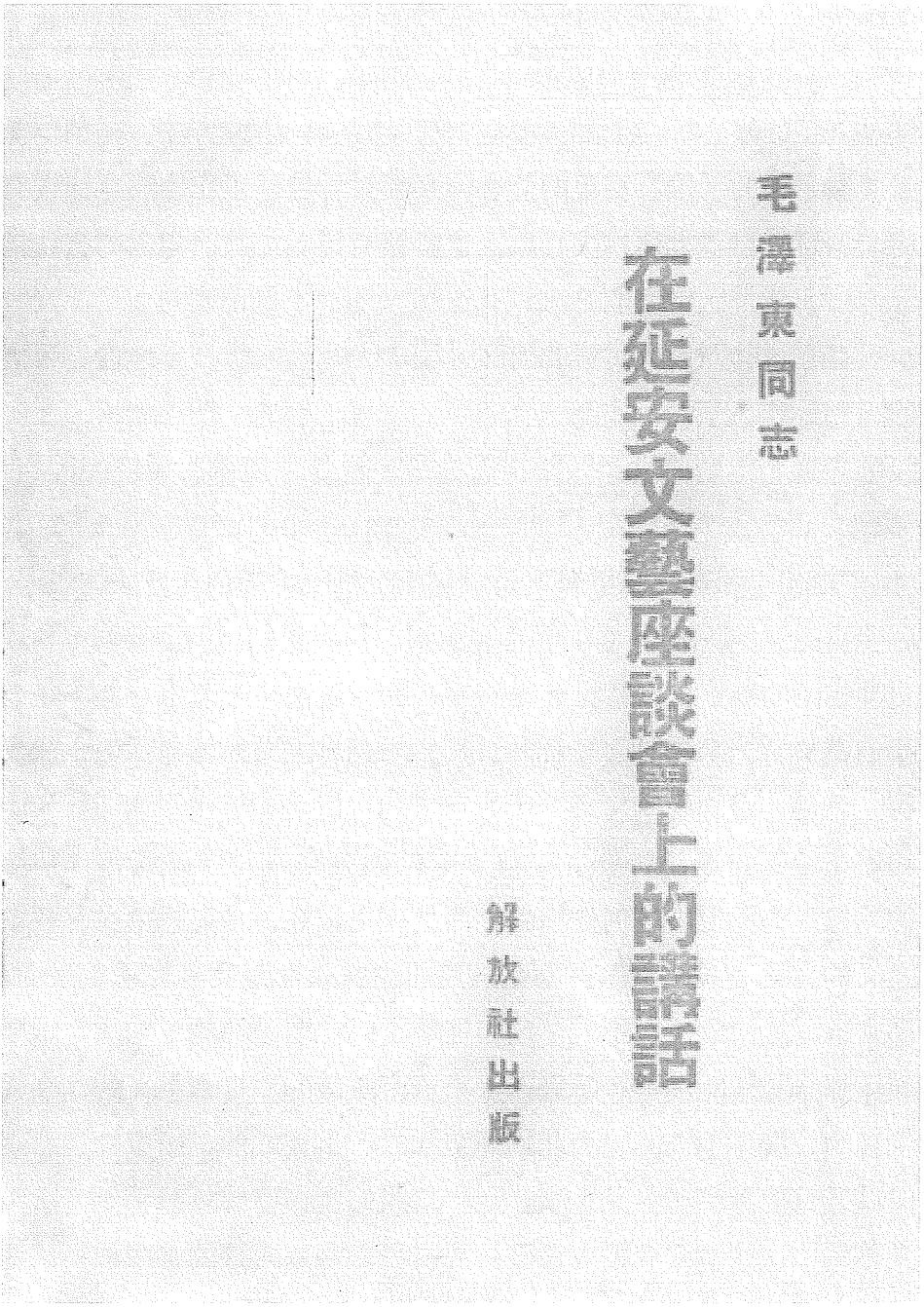
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

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1943年10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

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

[1] 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2]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土地为“大后方”。

灭》[1]，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2]，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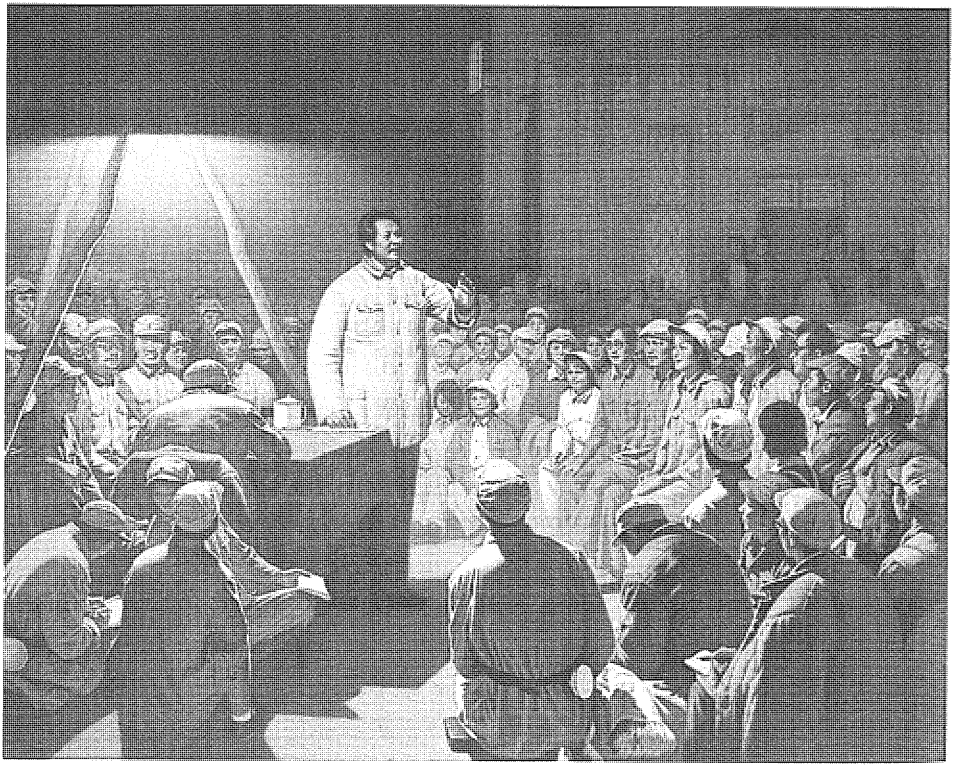
---

[1] 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著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1927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2] 参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毛泽东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的合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油画）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
民大衆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
為工農兵而創作
為工農兵所利用
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
日毛澤東在延安楊
家嶺召開的文藝
座談會上發表重要
講話
一百一拾周年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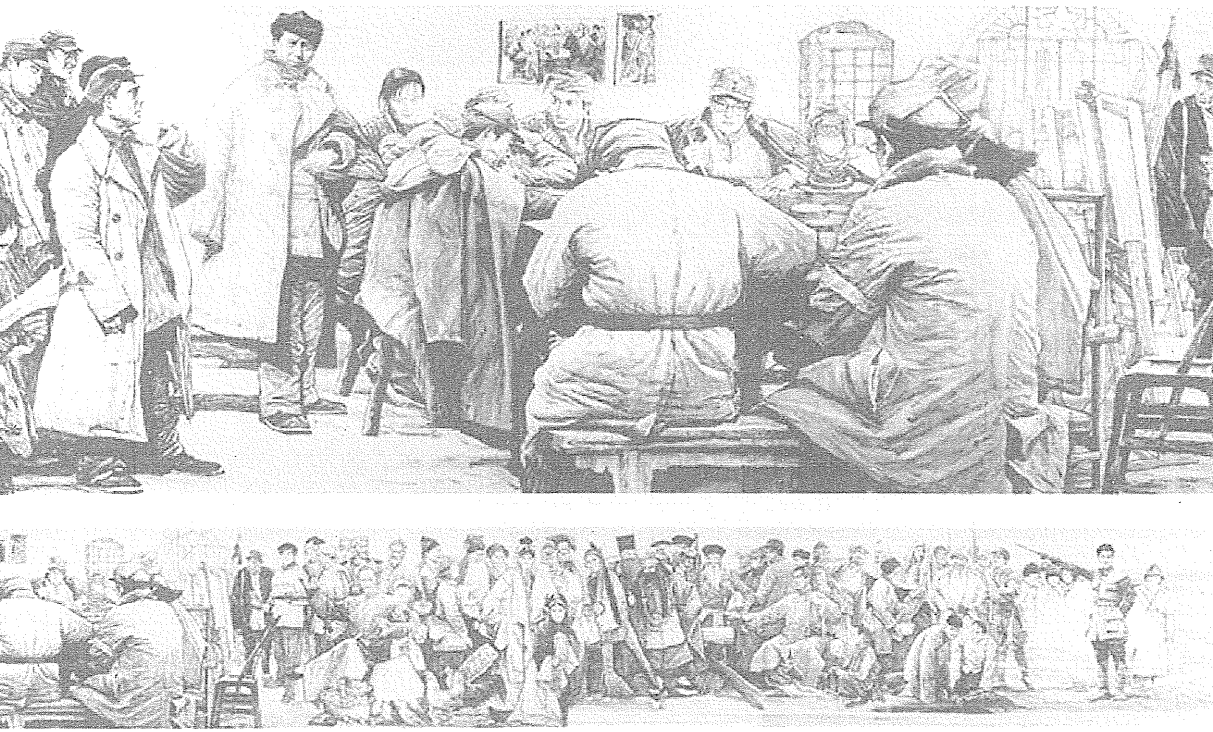
《“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国画）



《源泉》（局部）（中国画）



《源泉》(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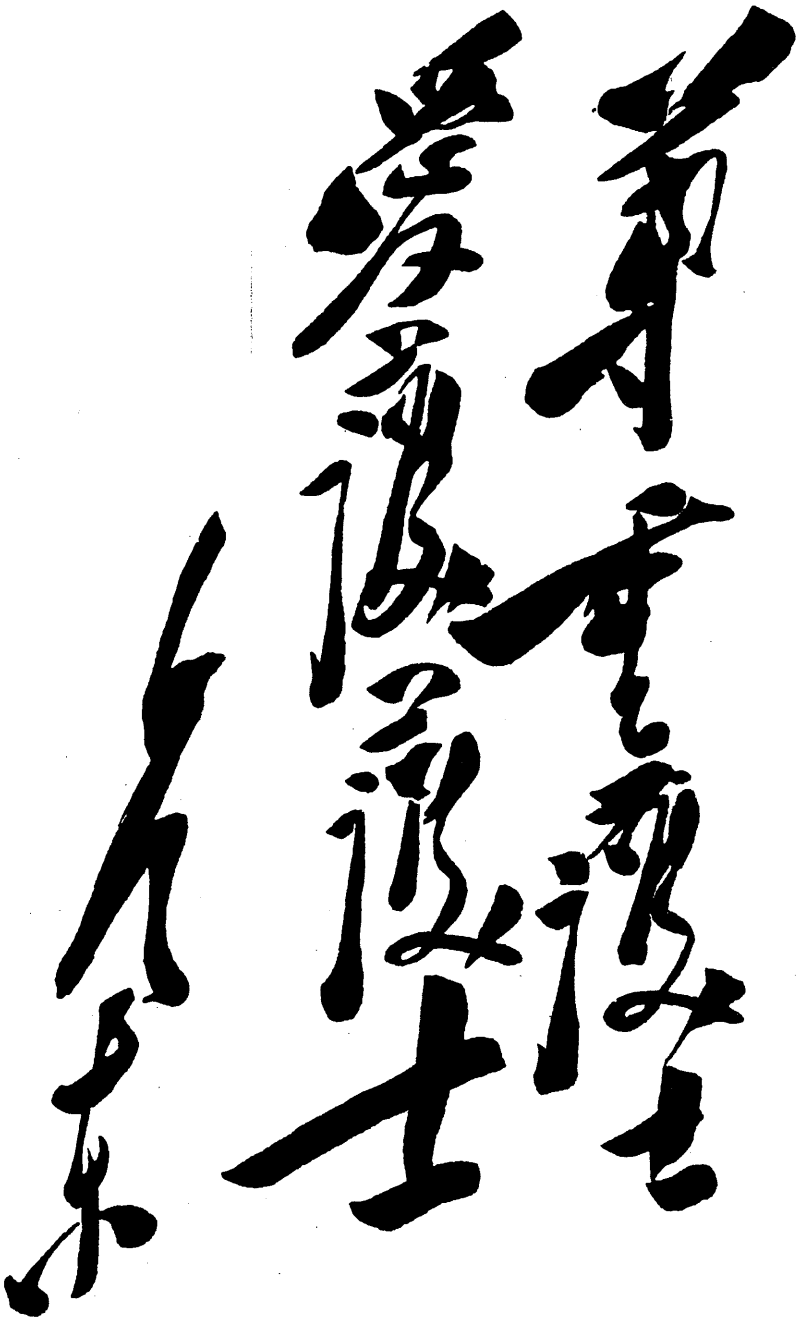


为护士节题词

（1942年5月12日）

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护士节的题词。

给续范亭的信

（1942年5月14日）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致张闻天电[1]

（1942年5月14日）

（一）贺、林[2]带来的信及五月一日的信均收到，后一信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二）现在延安展开了广大的学习运动，三个月后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

[1] 这是毛泽东致张闻天电的主要内容。当时，张闻天率调查团在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

[2] 贺、林，指贺龙、林枫。

致胡宗南电[1]

（1942年5月19日）

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2]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

[1] 这是毛泽东为朱德起草的致胡宗南电的主要内容。

[2]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5月21日）

一

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仍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

二

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2年5月27日）

感日[2]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3]，殊深哀悼。瑞卿、立三[4]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感日，即27日。

[3]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总部突围转移时，不幸中弹牺牲。

[4] 瑞卿、立三，即罗瑞卿、杨立三，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部长。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

（1942年5月28日）

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在座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同志也应该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了解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在红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文艺，比如写一写小说，搞个剧团，那是比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咏，有宣传画、漫画。这些东西同现在的比较起来那是差得多，现在我们八路军所吸收的人才，种类要丰富得多，文艺工作也普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线，这种“围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大批地到根据地里面来。所以，现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有已经成了专门家的，还有许多没有成专门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艺术工作的，这种人更多。这种现象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这个情况，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颁布之后，要更加好。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1]，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

[1] 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5月2日、16日、23日举行的三次会议。

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是要结合还是不要结合，回答是要结合；那末接下来就是如何结合法，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很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许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现在

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是一种。

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文艺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新党员当中有，老党员当中也有。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此外也还有像这样的问题，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

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我们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够不够呢？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那末，我们主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革命性怎样从低级的到高级的呢？对大地主，你跟他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

来，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坏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坏也不要破坏得太彻底，抗日他就会来的。他来就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取他们抗日这一点，不能够取到他们别的东西，只要他们抗日就好。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需要民主，但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至于人民大众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又有区别。

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完全取得政权，或者没有主要取得政权的现在，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马列主义，实行马列主义。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专门家中有这种观点的多。胡适之的书，我们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墙报、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出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那就是

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其中一部分有决心工农化的，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呢？不是的，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

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我们要使文艺工作者了解这些问题，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一两个月内了解更好，一两个月不能了解来他半年，半年不行来他一年。我们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这对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死的时候如果作祭文也是这样作就好了，当然不是专门为了作祭文。张浩[1]去世，我们就作了祭文，名为对死人，实则对活人，就是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自私自利吧！张浩革命一生，难道是为了作祭文吗？我相信不是的！所以文艺家要懂得这样的政策，其他同志也要懂得这样的政策，这是一个结合的过程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

[1] 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

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个阶级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1]

（1942年5月30日）

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1] 这是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的一部分。

复艾青信[1]

（1942年5月）

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1]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这是毛泽东复艾青信的主要内容。

复刘少奇电[1]

（1942年6月1日）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

[1] 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给罗烽[1]的信

（1942年6月12日）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1] 罗烽（1909—1991），辽宁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13日）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请下决心办理。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17日）

除布置侦察及作军事准备外，请你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内战问题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6月19日）

一

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

二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2]。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复陈潭秋电[1]

（1942年6月22日）

（一）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二）各种材料有便时当寄你们。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陈潭秋电的主要内容。陈潭秋，当时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23日）

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复陈毅电[1]

（1942年6月24日）

马[2]电悉，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

[1] 这是毛泽东复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马，即21日。

给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

（1942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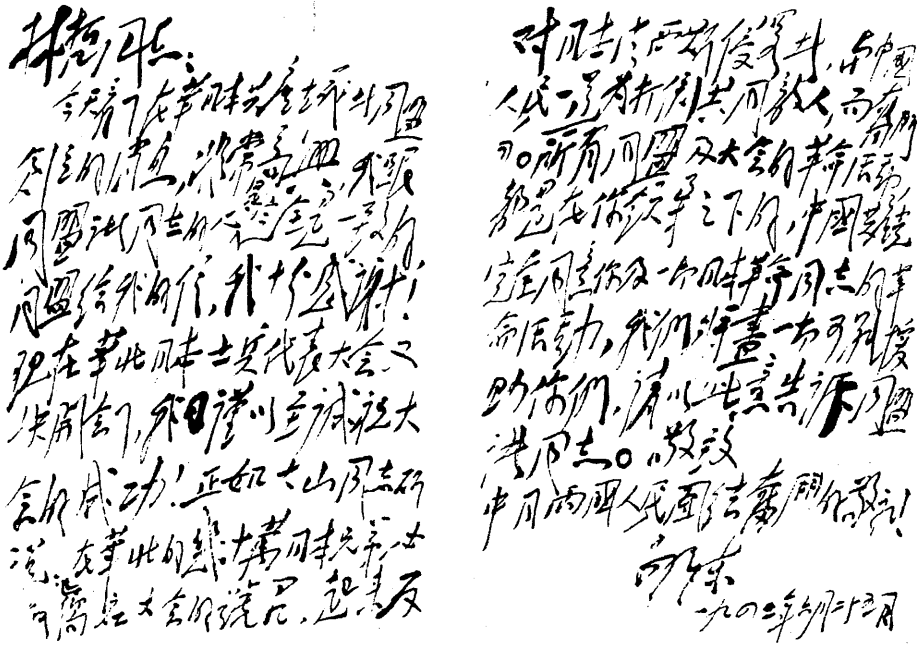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林哲信的手稿。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26日）

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一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及延安整风学习情况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1942年7月2日）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7月2日）

一

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五十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二

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1]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

[1] 何畏，曾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复董必武电[1]

（1942年7月2日）

恩来须静养[2]，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要求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询问可否释放叶挺，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942年6月下旬在重庆患病住院。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

（1942年7月4日）

荣臻同志：

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着，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毛泽东

支

新四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

（1942年7月6日）

曾、赖，并告陈、刘[1]：

篠电悉。（一）七七宣言[2]已广播，谅收到。（二）浙江战局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现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毛泽东

鱼

[1] 曾、赖，指曾山、赖传珠，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和新四军参谋长。陈、刘，指陈毅、刘少奇，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军长和政治委员。

[2] 七七宣言，指1942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表的宣言，7月6日晚已由新华社对外广播。

复董必武电[1]

（1942年7月6日）

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恩来病状如何？甚念。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1942年7月9日）

胡服[1]同志：

（一）六月九日电早已收到，书记处各同志都看了，因在考虑，故迟复。（二）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三）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四）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

[1] 胡服，即刘少奇。

可能，如蒋[1]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五）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六）日寇正积极准备攻苏，时间有在本月底说，你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七）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2]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八）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毛泽东

七月九日

---

[1] 蒋，指蒋介石。

[2] 1942年5月，日军向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扫荡”。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突围战斗中牺牲。

答晋西北士绅问[1]

（1942年7月9日）

问：抗战何时能够胜利？

答：……此次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欧洲战场，因为苏英美等国的亲密团结，今年可能打垮德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有中英美的团结，明年可望击溃日本。

问：抗战胜利后，国内团结问题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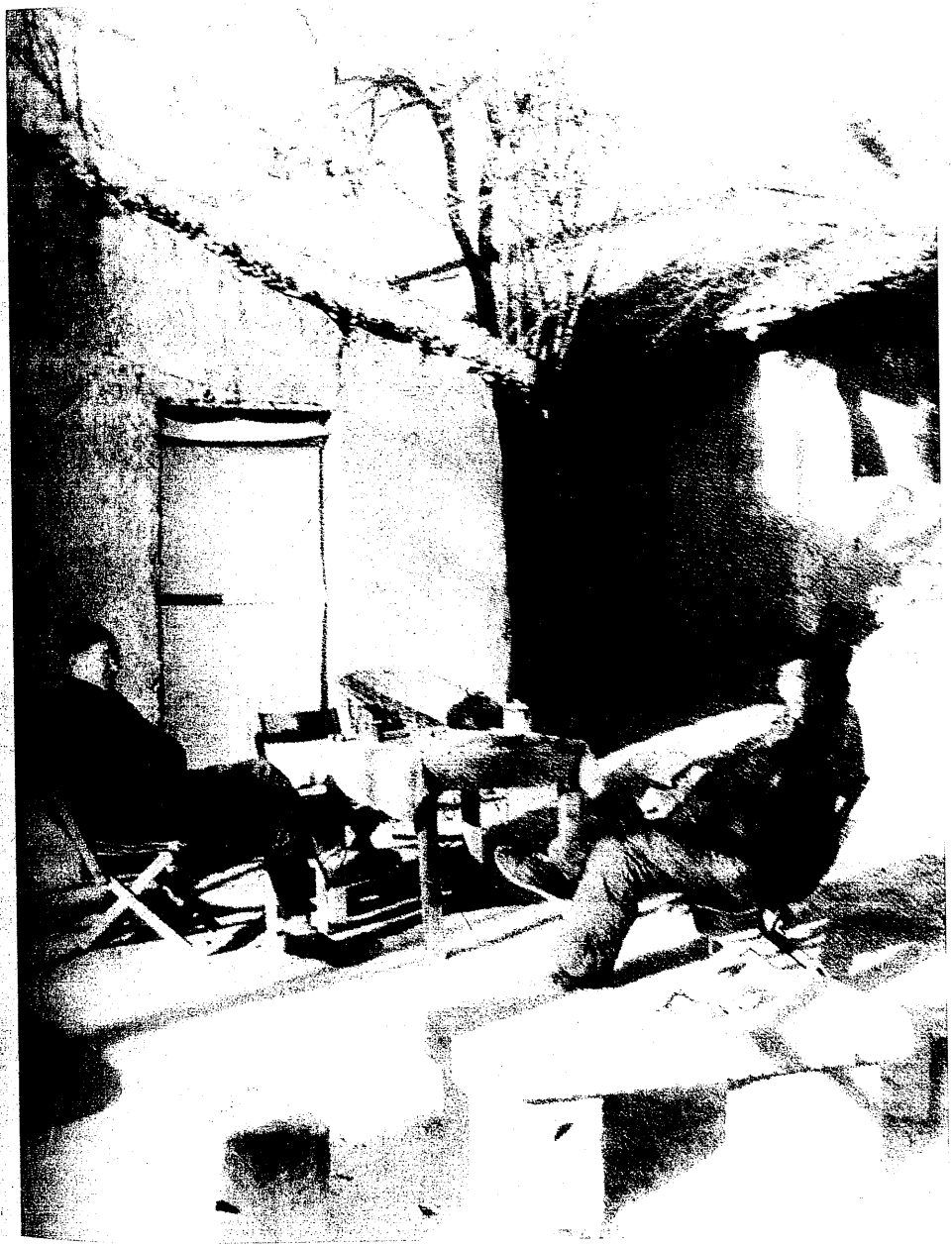
答：……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胜利之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自然更须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绝没有排挤别人的权利。

战后中国，必定是民主的中国，农工商学兵各界，都要继续团结，方能达此目的。

---

[1]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是由兴县著名士绅牛友兰先生发起的。1942年牛友兰等一行16人组成参观团到延安进行参观，7月9日毛泽东会见参观团，这是毛泽东和参观团成员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延安和一位开明绅士交谈。

复盛世才电[1]

（1942年7月13日）

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胜利在望之际，深望彼此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1] 这是毛泽东复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7月15日）

中央三日给你的电收到否，此电主张总部迁晋西北，北局机构改为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华北各分局归中央直接指导，你的意见如何，盼复。十六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主张八路军总部仍驻晋东南。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恩来的信

（1942年7月17日）

恩来同志：

十七日电悉。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毛泽东

十七日二十四时



194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一起。

复陈毅电[1]

（1942年7月20日）

军委给五师指示方针电已告，你谅收到，与来电所述意见[2]是相同的。但目前不宜公开宣传顽军罪恶，因我方正和国民党重开谈判，不宜刺激它。

[1] 这是毛泽东复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毅7月1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第五师因国民党军进攻情况紧急曾要求派部向西援助，他认为这一做法不妥，主张第五师以分散独立活动作战为主。并说衅端由国民党军方面开始，新四军军部拟公开宣传此事，以揭破顽军诡计，但等中央决定态度后再办。

复王世英电[1]

（1942年7月24日）

已令前方援助晋绥军之英勇抗战，请告阎长官。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7月25日）

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六万人，晋西北减至五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7月30日）

在关于参议会、“三三制”问题之后应加一句话：“九月份进行的参议会，要使之成为团结各阶级建设根据地支持抗战的机关。”他还在会上发言指出，敌后有两件工作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整顿三风必须从上至下地在党内有计划地认真进行。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战后法西斯国家都要依赖它，它可能支配世界。今年打败希特勒的问题还要看一看，恐怕对冬季反攻、对德国的弱点估计过大了。战后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宣传上应以争取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晋西北工作决定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转的前途为前提。争取同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而不是孤立自己。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1]

（1942年7月31日）

胡服同志：

已有电午养收到[2]，兹复于下：

（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称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待国民党好转更确定时，我再要求他通令山东华中部队，停止向我摩擦，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三）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四）我党七七宣言及整顿三风运动，在各方有很大好

[1] 这是毛泽东给胡服（刘少奇）的电报。

[2] 指6月25日电7月22日收到。

感。（五）七月六日复你一电收到否。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为《陇东报》[1]题写报头

（1942年7月）

陇东报



毛泽东为《陇东报》题写的报头。

[1] 《陇东报》是中共庆阳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37年，时名《救亡日报》，1938年改为《救亡报》，1942年7月改为《陇东报》，毛泽东题写了报头。

对华中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

（1942年8月4日）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致华中局电[1]

（1942年8月9日）

新四军恢复番号或编入八路为一军，目前尚未至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时机，你们目前尚不必提出要求。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给谢觉哉的信[1]

（1942年8月15日）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2]末带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考虑。

---

[1] 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1942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迎接第二届第二次边区参议员大会》。

给谢觉哉的信

（1942年8月17日）

谢老：

来信读悉。我对一得书[1]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觉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

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故此事值得再考虑。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1] 一得书，是1942年4月至11月延安《解放日报》陆续发表谢觉哉所写随笔的栏题，取意于“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语。这些随笔多数是针对边区工作中的问题和干部的思想状况而写的，发表时署名焕南。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8月17日）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周恩来8月14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借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同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
给谢觉哉、陈正人[1]的信

（1942年8月19日）

觉哉、正人二同志：

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能、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8月19日）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8月22日）

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2]。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工作按现状条件布置，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教育是专门学习，储备力量，扩大学校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加强，抓住中心，掌握政策。可考虑李维汉到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边区参议会停开，主要实行精兵简政，然后再开。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五整，指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

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1942年8月23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以来，在时间上说，已经是相当长久了，如果我们把各抗日根据地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程度检查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地区是在认真地执行，且已有显著的收获，事实证明了党中央这一政策是切合于各根据地的实际，能够做到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某些地区或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不能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产生这种不能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和把自己看成“例外”的原因，我们认为是一个认识问题，是由于对党中央所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意义认识不够。因此，为着彻底执行精兵简政，有重新阐明其重大意义之必要。

党中央为什么提出精兵简政呢？

第一，五年来敌后抗战的结果，使我各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域犬牙交错地存在着，敌寇依据着铁道、公路、据点，包围着我们，我则依靠广大的农村包围着敌人，形成彼此包围的相峙局面，进行着拉锯式的反复战争，抗战初期那种游击战争向敌后进军的蓬勃发展形势，已经是过去了。今后的问题，在于保持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熬过最后的艰难。谁能熬过这种严重的难关，胜利就是谁

的！在目前敌寇正进行着残酷扫荡与逐步地蚕食，根据地的缩小，人力财力的减退，是不免的。因此，我们必须紧缩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于这种情况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这种必要的紧缩，在目前是为着保持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同时也是准备将来的反攻。目前的紧缩正是为着将来的更大发展。

第二，敌后战争频繁，战线不固定，部队机关的流动性都很大，不仅庞大的机关为情况所不许，就是在军队中间如果非战斗人员多了，行动笨重也为战争环境所不容，所以必须紧缩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必须了解：我们机关和部队的组织，是为着执行一定的任务而规定的，不是为机关而机关，为部队而部队。如果在发展时一般是注意数量“搭架子”以便开展工作，那么，在紧缩时，就应该注重质量，贵精干而不贵繁多，如果情况变了，而我们仍然墨守成规，不愿有所改变，那就是地道的教条主义者！

第三，由于根据地在残酷战争中地区上的缩小，人力物力的困难增加，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人民的财富又比较有限，所以在每个根据地内脱离生产的人数，只能有一定的比例，即使超过也不能过大，否则将会发生“塘小鱼大”的矛盾。敌寇对我基本根据地所采取的“三光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摧毁我“生存条件”，是企图“竭泽而渔”的办法。紧缩正是针对着敌人这一毒辣政策而来的。

由于从对上述三个主要方面的认识出发，党中央很早以前就提出了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能超过当地居民百分之三的决定，在提出精兵简政之后，又曾具体规定主力军应停止发展，而将今后军事建设的重心放在强化地方军与发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上面。这是一贯的方针，是切合敌后需要的方针，各根据地一定要彻底执行。

对着上述精兵简政的意义与党中央对于这一政策一贯的主张，

直到今天还不是各根据地的同志们都了解了的，因此，产生了对精兵简政执行不彻底的事实，同时在少数同志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片面的了解，也有碍于精兵简政的实行，必须加以解释：

有人说：虽然我的部队或机关今天有些“头重脚轻”、上层庞大下层不充实的现象，但是你应该看到将来呀！将来它是要发展的！

这种意见，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将来是将来的事，而我们确应该着重在解决今天的问题呵！今天的困难，如果不想法去克服，渡过这个难关，也就说不上将来。只知昂头天外，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而对于现在的具体情形熟视无睹，看不见摆在自己眼前的现实，这种“远视眼”的想法，是任何现实问题也不能解决的！

有人说：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问题很对，但我这里情况还不如你们所估计的那样严重，还可以过去，照旧维持吧，环境严重时再说，何必着急呢？

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因为近两年来敌后形势发展的趋势，已明白告诉我们，严重环境是一定要到来的，而且有的地区已经到来了。今天来说敌后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一般估计问题，而早已是活生生的事实了！如果我们不警惕这种形势的变化，主动地采取适当的办法，那么事到临头，将措手不及！这种预见将来，定出对策，使自己时常处于主动，使革命力量少受损失，正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如果不加以主观地努力，听其自流，这种政治上的“近视眼”的看法，也是不对的。

有人认为：在敌我抗战中，我们应该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才好，哪能实行“精兵”呢！固然，在一定的时候兵是要多，兵多将广，才可以制服敌人，但所谓多，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无限制的多。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养活，物力财力是否足以维

持！如果不注意这一生存的起码问题，盲目地要多，那么兵少、兵不够自然不足以保卫根据地，但兵太多了，“坐吃山空”，其结果将使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濒于枯竭，难于保卫！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精兵论”，而不是“多兵论”，“多兵论”是我们要反对的！

有人认为：根据地工作纷繁，要机关大，干部多，才能把事情办好，我们现在不是处处都觉得干部不够吗？怎样好再说要“简政”呢！是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工作部门，确实是还缺少应有的干部，这是需要加强的。但另一方面，不是一般地还存在着机关林立、系统纷繁、“人浮于事”的现象吗？所以简政的中心问题，是在于调整组织，调整干部，裁并机关，缩减冗员，以提高工作效能，增进解决问题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简政论”，而不是“繁政论”，“繁政论”是我们应当反对的！

上述这些看法，都带有片面性的老病，如果只是执其一端，不作全盘考虑，何尝不可以言之成理，娓娓动听，然而如果仔细去作一番全面的考虑，则很显然地，这些说法就都不妥当了。

只有精兵简政，才是根据全面考虑得出来的一个切合于敌后今天的实际状况，而又照顾到将来发展的政策，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一切必须从现实出发去解决问题，对于任何问题片面的看法都将不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对于精兵简政政策的执行，首先，就要求我们有清楚透彻的认识，足够地了解其意义。也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彻底执行，才能真正执行得好。

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举凡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经济工作等等的进行，都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加以新的

考虑，贯彻这一政策。同时精兵简政的实行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培养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具体工作联系起来。

敌后是一种残酷的战争环境，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常常是带有突然性的，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预见到发展的趋势，“当机立断”，主动地变化我们的政策，那么，一旦恶劣的形势到来，就会发生“措手不及”，甚至遭受到意外的损失！

最后，必须再重复地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政策，是为着克服目前困难，争取将来更大发展的正确政策，是既照顾到现在又照顾到将来的政策，是积极的政策而不是消极的政策！要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是定了的，将来的发展也是定了的，在由现在到反攻这一段艰苦路程中，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整齐些，锻炼得更精干些，则胜利与发展就会更有保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8月29日）

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支钱，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中央和军委共有二万四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中央工作的原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西北局高干会十月开会，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由秦邦宪、陆定一[2]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陆定一，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8月29日）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电贺英《工人日报》复刊

（1942年8月31日）

英国工人日报：

我们热烈庆贺工人日报的启封，并坚信复刊后的工人日报将继续是团结动员英国一切力量，战胜纳粹主义的号角。工人日报的复刊，不仅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有力因素。

我们庆祝你们的成功和日益接近的反法西斯事业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和漫画家的谈话[1]

（1942年8月）

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植的树》。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2]。

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枝被啃光了，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在鲁艺内部可以画，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更尖锐些。如果要发表在边区报上，那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

---

[1] 1942年8月，毛泽东通过舒群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三人到枣园谈话。这是毛泽东和四人谈话的一部分。

[2] 这幅画画的是在延河旁荒地上，有一棵1939年植的树，树枝还被马啃光了。清凉山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意思是说不是劳动人民植的树。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谨、郭卫生和周励武时的谈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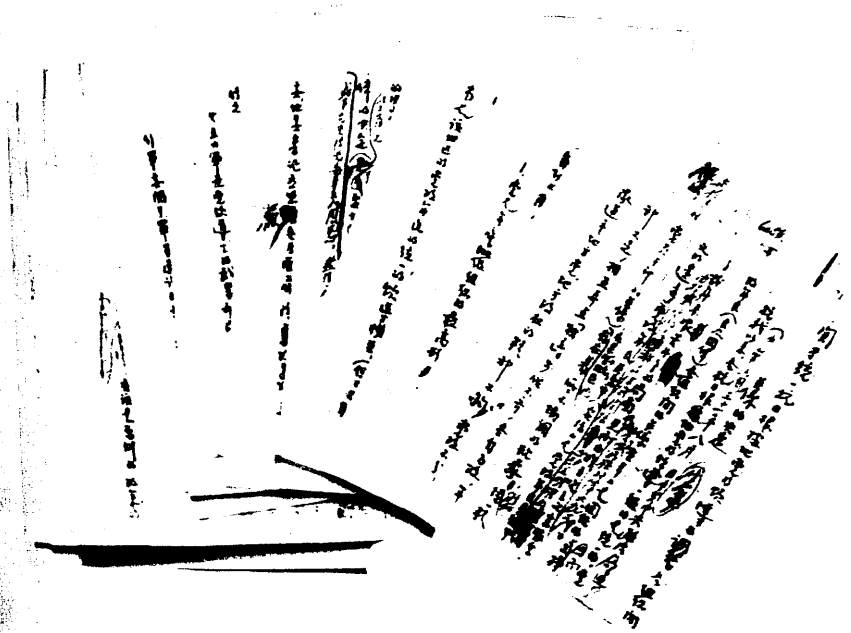
（1942年9月1日）

（一）彼方释放叶挺，我方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即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1] 这是毛泽东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谨、郭卫生和周励武时谈话的一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

（1942年9月1日）



为克服困难，坚持敌后艰苦抗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图为毛泽东起草并修改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手稿。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个决定。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军政军民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增强，上下级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的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委会、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区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

(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委、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该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之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三）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括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

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如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依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的失败。军队主要人员的任免，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四）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扩兵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

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之人员补充，粮食及物质保证，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实现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的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军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军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与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予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

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该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与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为，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的帮助政府工作。

（六）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青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

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七）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八）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质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

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

在这里，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九）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懂得全局，不陷于局部和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担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委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

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十）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应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都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物资补充、运输、优抗等等，必须依照政府的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9月3日）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1] 这是毛泽东为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

（1942年9月7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阶段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不独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为然，但是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懂得了，但是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我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我们的口号是增强团结，今后还要增强它。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

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1]。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1] 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参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59回。

关于国共合作中我之斗争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

（1942年9月8日）

十九日电昨日阅悉，又接五日电，兹复于下：

（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张文白愿来延则先欢迎他来延一叙，如此较妥。

（二）我们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人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三）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并请注意。

（四）我西安办事处已于三日接办公厅通知，四日接三十四集团军通知邀林彪前往，现正交涉飞机，准备日内动身。

毛泽东

纪念体育节题词[1]

（1942年9月9日）

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毛泽东

[1] 1942年9月1日至6日，为纪念体育节，延安举行“九一扩大运动会”，这是毛泽东为体育节所写的题词，题词时间不详，发表于1942年9月9日的《新华日报》，这里采用其发表的时间。



毛泽东为纪念体育节的题词。

给谢觉哉[1]的信

（1942年9月15日）

谢老：

六日函悉。死者[2]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3]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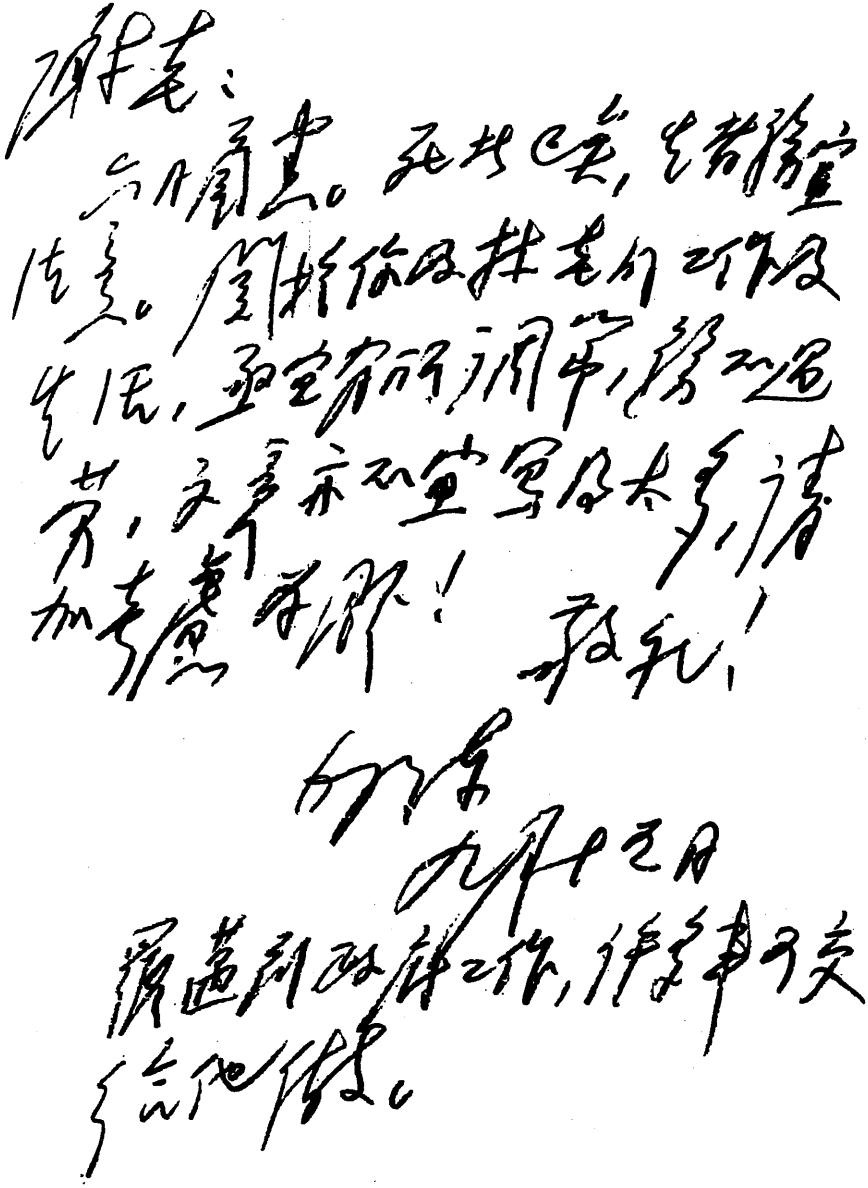
罗迈[4]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

[1] 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王凌波。他是谢觉哉的同乡和好友，生前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

[3] 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4] 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2年9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手稿。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凯丰[1]的信

（1942年9月15日）

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2]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3]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4]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

[1]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2]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3] 舒群（1913—1989），黑龙江哈尔滨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4] 亮平，即吴亮平（1908—1986），浙江奉化人。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曾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

学个唐三藏[1]及鲁迅[2]，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3]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4]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5]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6]，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

[1] 唐三藏，即玄奘（约600—664），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曾主持翻译经、论70余部，共1300多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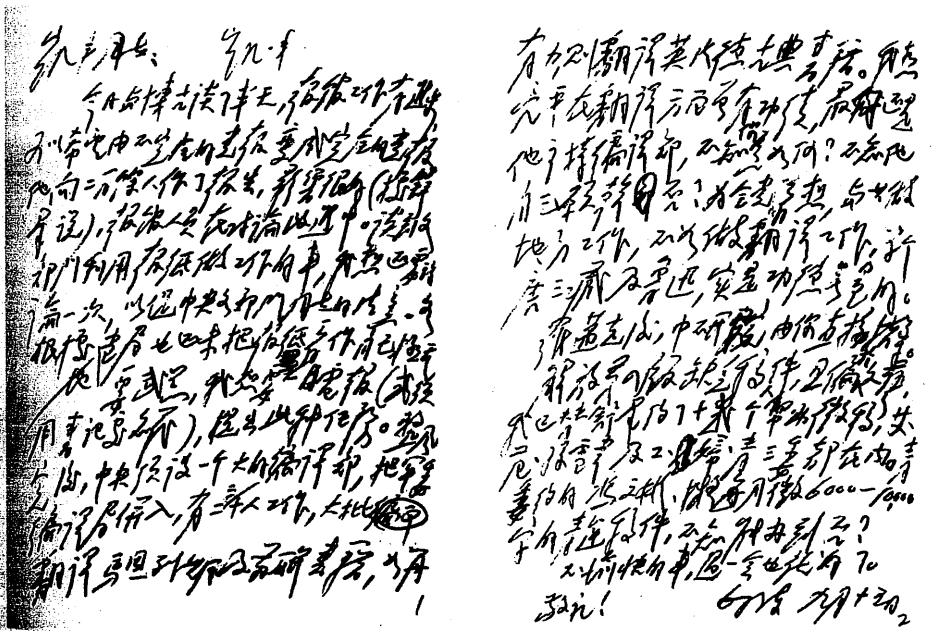
[2]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编为《鲁迅译文集》，共10卷。

[3] 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1年7月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1942年9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4] 指《解放日报》。

[5] 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范，指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孙雪苇，又名刘雪苇。1912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

[6] 冯文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毛泽东致凯丰信的手稿。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

（1942年9月15日）

先念同志：

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1]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你们在这次行动以后，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

毛泽东

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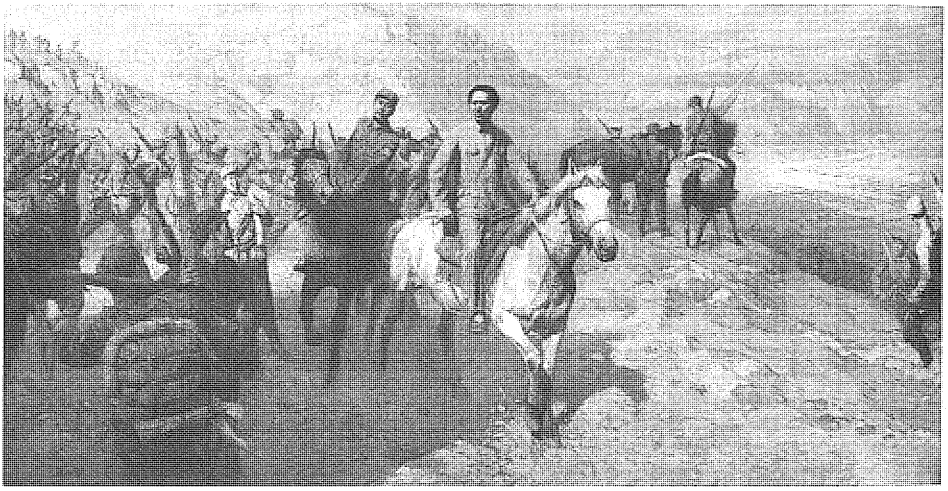
[1] 手稿如此，疑漏写“关系”二字。

给周恩来的指示[1]

（1942年9月15日）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至于今天，国共两党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我们目前任务，是促成两党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听说蒋介石已回重庆，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要求赴重庆，以期打开谈判门路。

[1] 1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是国共合作为主，地方实力与小党派为辅。但在武汉时期，太重视国共合作，甚至幻想有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这不能不是一个教训。重庆时期，在毛泽东确定的斗争三原则和革命的两面政策指导下，国内外统战工作都得到了新的发展。这是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



《抗战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油画）



《战争年代》（油画）

报刊宣传服务于党的当前政策[1]

（1942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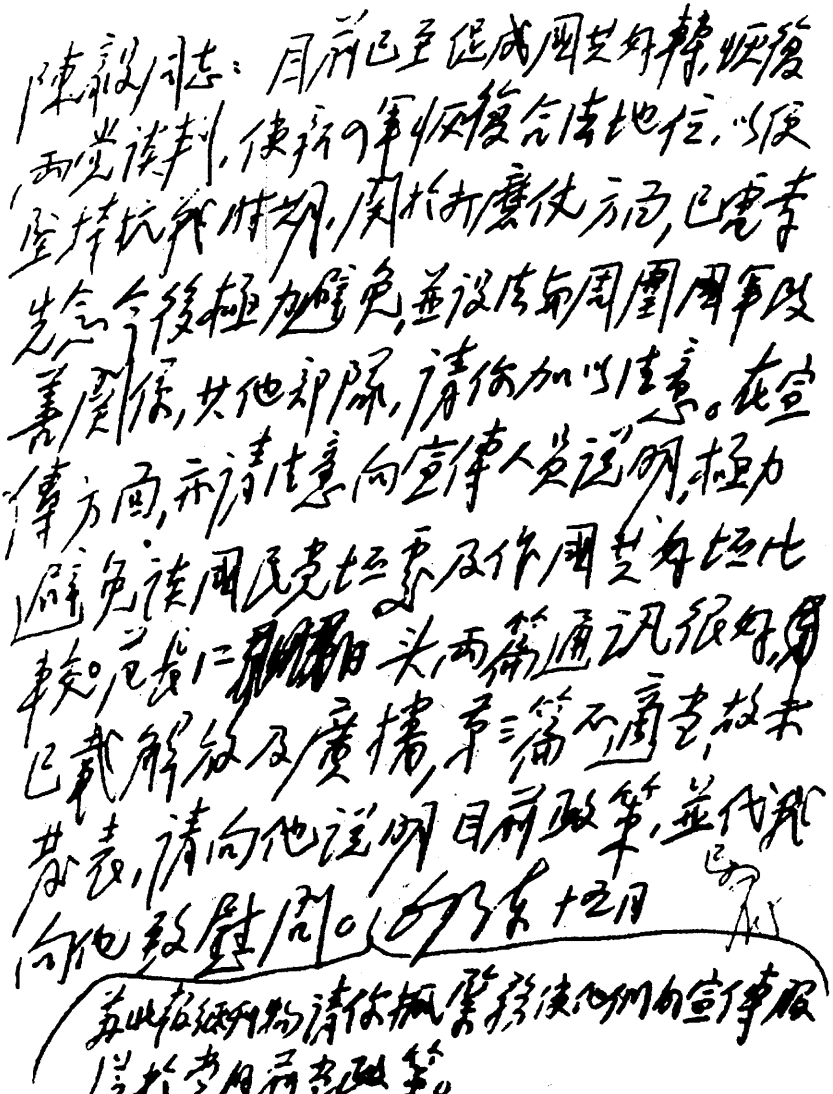
陈毅同志：

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毛泽东

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给陈毅的电报。



毛泽东致陈毅电的手稿。

致朱瑞电[1]

（1942年9月15日）

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1] 这是毛泽东致朱瑞电的主要内容。

复张闻天电[1]

（1942年9月15日）

考察敌我斗争情况时，如有可能请择敌军一个具体部分，例如一个大队，加以详细调查（编成、装备、作战及政治工作等）。如有时间还望择我军一个营加以具体调查。这样使调查不致偏于农村。关于商业不知有调查否？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复张闻天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1]

（1942年9月15日）

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在关向应患病期中代理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发布的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的主要内容。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1]

（1942年9月20日）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2]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

[1] 这个征稿办法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拟订的。

[2] 荒煤，即陈荒煤。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1]：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1] 吴老，指吴玉章。

致刘少奇电[1]

（1942年9月21日）

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给续范亭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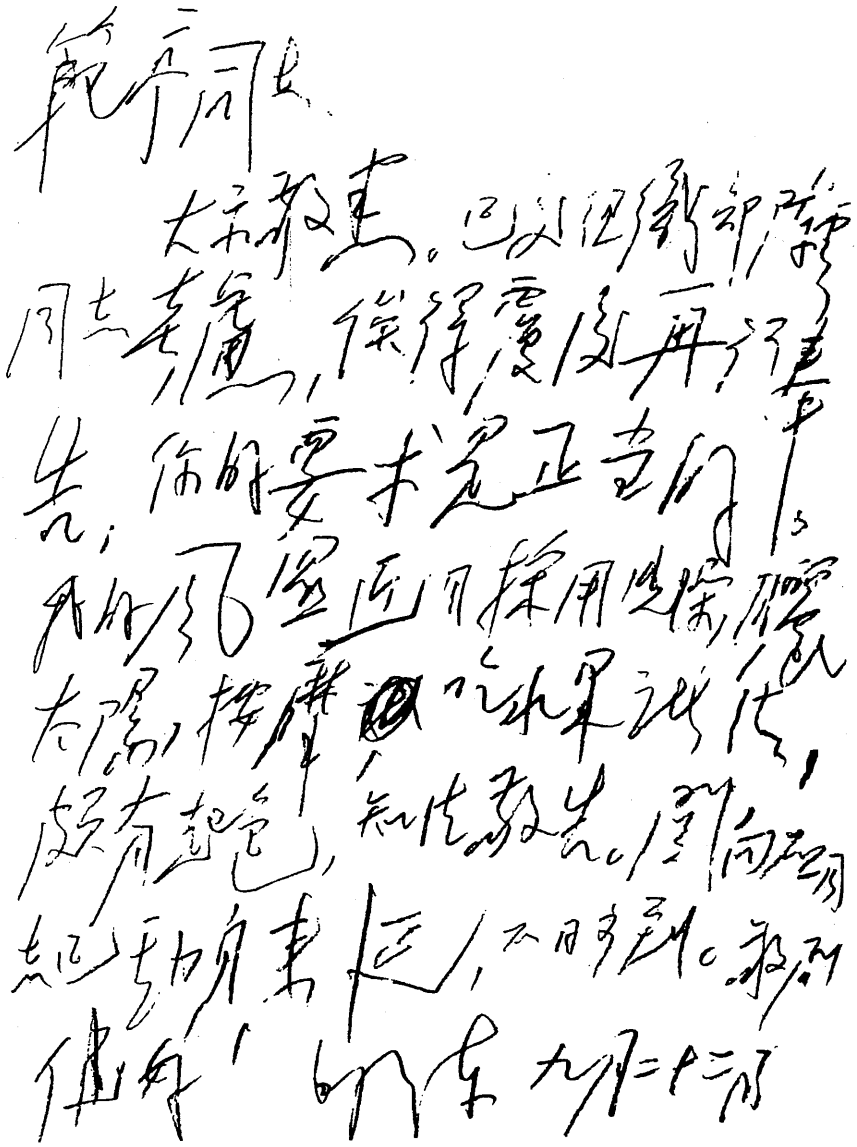
（1942年9月22日）

范亭同志：

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复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敬问健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手稿。

在“枣园之宴”上的讲话[1]

（1942年9月）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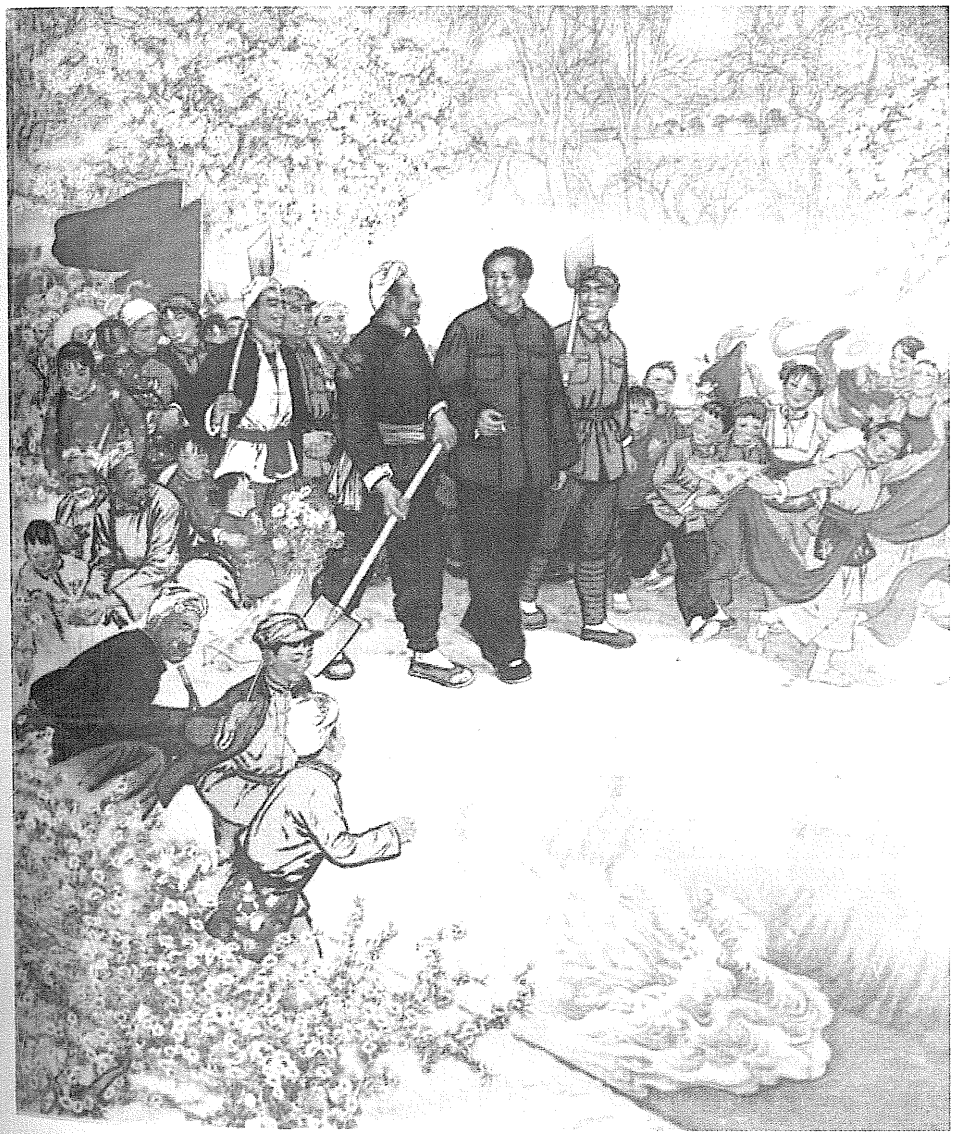
老柯[2]，你带个剧团，常年在外，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

[1] 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的副刊，于1942年9月下旬，特地邀请了范文澜、柯仲平、邓发等十多位学者，参加“枣园之宴”。这是毛泽东在宴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老柯，即柯仲平（1902—1964），原名柯维翰，云南宝宁（今南宁）人。1942年9月15日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解放日报》第四版特邀撰稿人。



《枣园里来了秧歌队》（中国画）



《幸福渠》(中国画)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

（1942年9月、10月）

一　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

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2]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九月十五日）

---

[1]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给陈毅的电报；第二部分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第三部分是毛泽东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

[2] 指延安《解放日报》。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

二　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倾向

最近一个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十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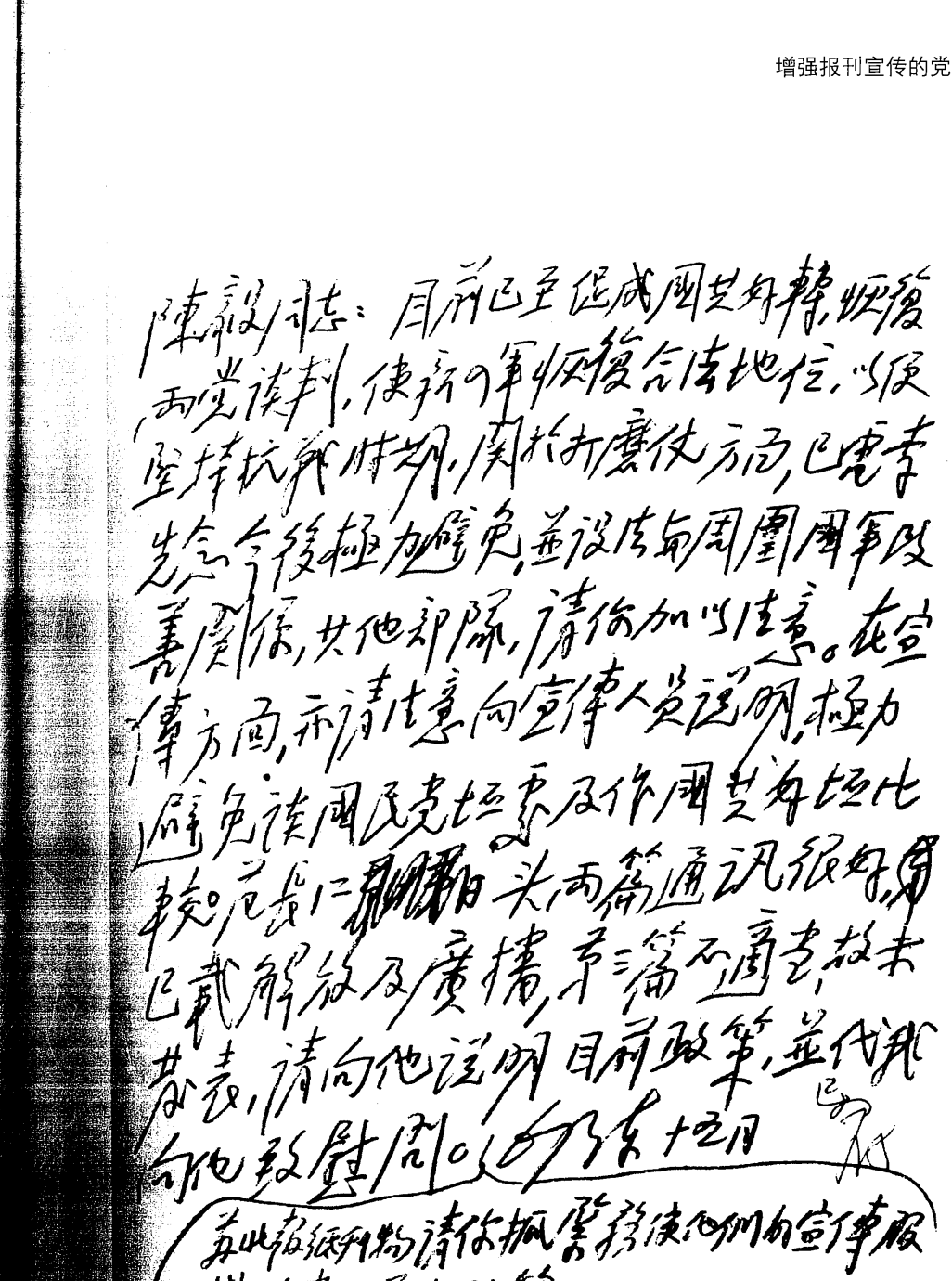
三　经常注意掌握新闻政策和社论方针

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十八日将邓宝珊[1]对新军[2]五周年纪念贺电播来延安。除令延安总社不要发表外，请你对晋西北分社及《晋西日报》加以指导。此类电报只能口传，不能发表，以免影响邓宝珊之地位。此外，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十月二十八日）

[1]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所部驻陕西榆林。

[2]　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



毛泽东致陈毅电的手稿。

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1]

（1942年10月6日）

在顽军继续进攻时应坚决打击之，以求生存，在获得胜利后应表示愿与他们恢复和平，以求好转，望本此原则实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的主要内容。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代政治委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代理书记。

延安观察家评斯大林谈话[1]*

（1942年10月8日）

一

斯大林此项谈话，其意义甚为巨大，不仅足以坚定同盟国人士胜利的信念，且对于同盟国的团结与战胜法西斯的伟大事业极有裨益。

二

开辟真正的第二条战线，就等于宣布希特勒的死刑，这是同盟国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且比起物资援苏来说是更加重要的第一等的义务。以时机而言，现在正是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最好时机，此种时机如果错过，或者将是同盟国战略上的最重大的失着。同盟国及时开辟第二战场，乃是胜利的关键。

[1] 本篇一是对斯大林4日对美国记者谈话的评价；本篇二是论及第二条战线问题时的谈话。

为《论党内斗争》起草的按语[1]

（1942年10月9日）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讲演，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1] 《论党内斗争》一文是刘少奇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发表在1942年10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编者起草的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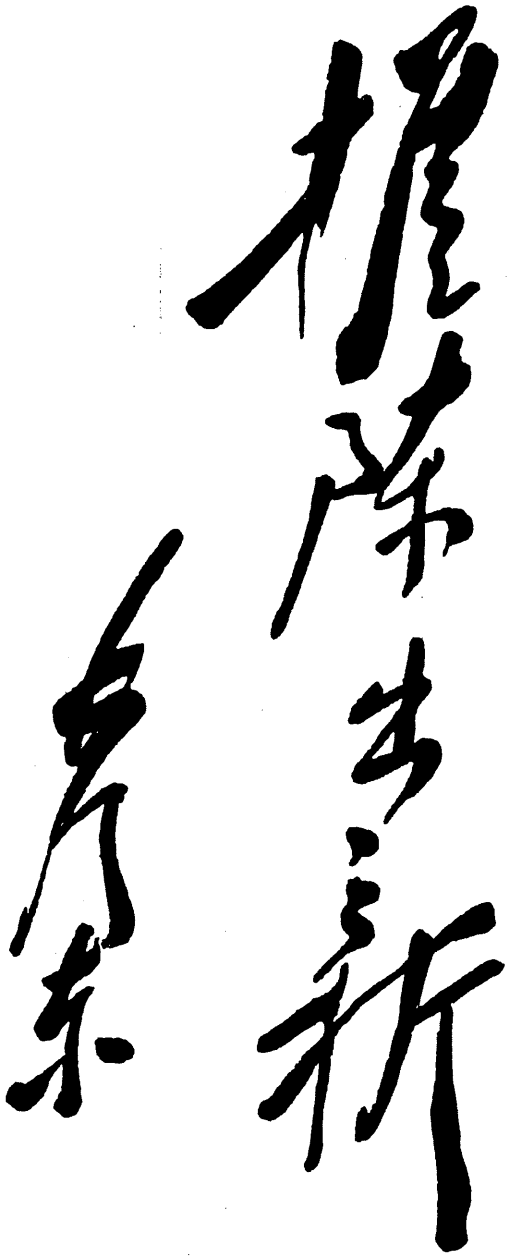
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词[1]

（1942年10月10日）

推陈出新。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10月10日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由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和一二〇师平剧社合并）所写的题词。



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

（1942年10月12日）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

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

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

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1]。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1] 1815年6月，拿破仑的军队同英普联军激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战败，被流放于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至1821年死于该岛。拿破仑一生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在1812年进攻俄国的战争中，在莫斯科遭到极大的失败，他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拿破仑受到了这次打击，从此便一蹶不振。

历史教训[1]

（1942年10月14日）

十月四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新闻记者关于“苏联所存的抵抗力量如何”的询问时称：“我认为苏联抵抗德国匪徒的能力，如果不是较大的话，也不小于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追求世界统治权的侵略国。”十月五日莫斯科《真理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的抗战，粉碎了希特勒的巨大计划。该计划原定在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即向莫斯科、巴库前进。”这些话到十月八、九两日就证明了。十月八日，德军发言人宣布：“不再使用炮兵与工兵强袭斯大林格勒。”原因之一，是如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所宣布的：“苏军业已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线，并据守新阵地。”原因之二，是如十月十日路透电所称：“昨日德军被迫转调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至西北区，因该处正遭苏联解救军的不断攻击。”所有这些，就是说，红军由城内正面与北部侧面两方的夹击，迫使希特勒绝望于该城的进攻，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一天一天把自己转入防御地位。还在一个多月前，一些人们就在匆匆忙忙地讨论高加索失守后的局势，他们对于苏、德两军的力量都是判断错了的。希特勒的“巨大计划”是有的，但这个计划正如《真理报》所说，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战所粉碎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列宁格勒、莫斯科是被认为应该避开的，他就集中力量向着南线一隅。七月间他曾拼命争夺沃罗涅日，打不开，又避开它。拼命争夺克列茨基，又打不开，又避开它。于是攻击点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了，这是无可避开的了，又是打不开，又是要避开了。但这是最后的避开，就是说，被迫放弃攻势，转入防御地位，希特勒现在就是处在这样情况中。希特勒今天还没有发出停止进攻的一般声明，他也许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目前红军就是从克列茨基到斯城北角一线向德军进攻的。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

保卫斯城的直接战斗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过顿河河曲开始，但河曲战斗对保卫斯城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整个七月份，德军由哈尔科夫打到顿河。这个期间，红军采取战略退却，德军毫无所得。七月三十日，柏林宣布德军在齐姆良斯克至罗斯托夫二百五十公里战线及顿河下游渡过顿河。不知是德军原先计划的，还是因渡河胜利冲昏了德将波克的头脑，他就从整个野战军中分出二十个师，向高加索方向猛追退却中的红军，八月中旬即达到库班河流域，但出于德军意外地遇到了红军的顽强抵抗。直到今天（十月十四日）德军只得到迈科普一个小油田。高加索北麓还有一个较大的油田叫格罗兹内的，同盟社还在八月十三日就说："通至格罗兹内的进路非常平坦，目前所关心的问题，只是德军的进攻能否给予红军以充分时间彻底破坏该处油田。"可是从说这话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希特勒对这个油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至于为着想达到巴库一

带吃这块最肥的天鹅肉，德军确曾冤枉地爬过高加索山隘。八月二十三日海通社宣称，“八月二十一日晨十时，德山岳部队在高达五千六百三十公尺的厄尔布鲁士山升起德国战旗”，表示法西斯吸血鬼们的狂喜。可是这面战旗，不知是送给红军了，还是法西斯们自己拖着溜下山去的，总之是一场空欢喜。听说波克现在被希特勒撤职了（十月九日路透电），那末，他的错误在哪里呢？或者第一条就是这个向高加索分兵吧。红军一方面坚决扼守顿河河曲，一方面却诱使波克祸水分一股流向库班河去，因此就减轻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压力。

河曲战斗是从七、八月之交打起的，红军以极其英勇的奋战，直打到八月二十三日才放弃顿河东岸刻赤一带阵地。如果没有这一战，如果德军没有河曲二十三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则斯城的直接保卫将是困难的。

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河至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斯城工业区，红军又在顿河与斯城间纵深五十至六十公里地带消磨了德军二十三天。没有这第二个二十三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

从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工业区，至十月九日红军路丁什夫部队突破该区德军阵线，二十四天中，是极端猛烈的巷战时期，红军以城内的巷战与北部的压力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从此希特勒整个地转入被动地位，他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最后地暴露出来，他将被这个矛盾所压碎。

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演说中说到红军时，他只好这样说，“那是一个不知道慈悲的敌人，他们不是人类而是野兽”，表示他似乎曾经希望过红军向他讲慈悲似的。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惨败，将做什么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崴一带去碰一碰吗？那里靠得住又是不讲慈悲的。日本的实力与它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评柏林声明[1]

（1942年10月16日）

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被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亦非谓三国公约中的任何一国业已决定或被迫将主动地位给予敌方，此不过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

这后一段话是说谎的。但这个说谎对于目前法西斯的地位极其必要，这是因为今年希特勒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和去年他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大不相同的原故。

在去年，因为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准备在今年再取一个攻势；因为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约好了不久就要爆发太平洋战争，而这就被认为是一则足以麻醉人民，二则足以牵制美国、削弱英国，而不致有第二条战线；此外还因为日本法西斯答应希特勒，在某种条件下（例如德国第二个夏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等）它可以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这三个条件，在那时都是存在的，或是可能的，所以希特勒在进攻莫斯科失败转入守势之时，他就不需要说出如像现时这类可怜的谎言，他就可以拿撤销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给他的军民人等看，说战争是由勃鲁齐区弄坏的，他自己当了

[1]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总司令就自然有办法。

果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受了很大损失，日本闹得声势煊赫，这件事立即在德国及欧洲人民中起了麻醉作用，希特勒所遭受的夏季攻势失败与冬季红军反攻两个创伤，就被这副麻醉剂把他的痛楚减轻了许多。今年希特勒实施夏季攻势时，又果然没有发生第二条战线。

在去年，希特勒一面应付红军的冬季攻势，一面还补充了旧部队的兵力，重新装备了新的兵力，又从意、罗、匈等国拉来了几十师军队，所有这些，是被希特勒及其一切法西斯伙伴们认为是自己还有前途的最主要的基础，他们感觉自己还有实力。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果然举行了今年的攻势，虽然不如去年那样煊赫，但在七、八、九三个月间也颇迷惑了一时，使得人们似乎觉得希特勒还有很大气力似的。

只有第三个条件至今没有动静。要说还有可能的话，那末，似乎只有一种时机，就是说，当英、美实行对德进攻或接近这种进攻时，法西斯们为了死里逃生起见，或者日本军阀们还会干一下。但是拿这个条件来配合希特勒今年攻势的预定计划是破产了。

在去年至今年，三个条件实现了两个，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们一年结账时他们还可以自鸣得意的一面。

但是还有另一面，就是说，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第一个，今年的攻势完全破产了。去年还有这个法宝，可以安慰自己，安慰人家，今年没有了。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已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他的人力资源与军备资源即使搜括，也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攻势了。过去所借以维系人心与借

以延续法西斯生命的基础条件——德国的进攻实力，现在转到了它的反面，这个条件是基本上破坏了。就在这种时候，法西斯们需要以完全的撒谎来维系人心，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拿实力而拿撒谎可以维系人心的。斯大林谦虚地说："苏联力量不说较大，也不小于法西斯。"在希特勒攻势破产后，红军的力量是强大于法西斯的。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内部将发生分裂的危机，过去那样的团结不可能了。法西斯与人民间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民心军心都很难维系了。德国与意、罗、匈、芬以至日本间的关系有大闹别扭的趋势，意大利甚至有倒戈的危险。欧洲几个中立国的态度也将起变化，某些国家或有加入同盟国之可能。

讲到第二个条件，今年也是去年的反面。日本的胜利促起了美国的整军，美国以一年时间不但补偿了夏威夷一役的损失，而且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和柏林宣布守势的同一天，罗斯福[1]说道："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吾人对于战略已有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之一，为吾人所共表同意者，即须要向德、日发动新攻势，以分散苏联与中国境内的一部敌人至其他战场。"日本是畏美如虎的。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情报部发言人说道："自英国威尔斯太子号沉没后，美国即追加空军预算四十万万元，将战舰改造为航空母舰或改变其设计者共十四艘，又改造商船二十艘及设计中之商船七十艘，均改为航空母舰，这说明美国多么重视航空母舰。我国不能坐视美国建舰，要在美国建舰未成前采先发制人办法击灭之。"九月二十六日，东条[2]说道："英国逐渐整备了战略路线，美国反攻企图日益明显，两国依靠其丰富资源，急速增强其战斗力，待时进行总反攻，大东亚战争

[1]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2]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的正规发展还在今后。”总之，日本在美国面前，吓得全身发抖了。德国呢？也是一样，十月十二日柏林发言人也说到：“美国业已开始大规模的军备计划。但无论其如何强大，若欲谋收复欧洲、非洲及亚洲，则非其力之所能及。”这后一句也是撒谎。实际上，法西斯们清楚地觉到，第二战场的魔影已一天一天地接近了他们的后门。八月二十八日，法西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机关报，竟至于借了红军的威风去恐吓英、美，鼓舞军心。这个报纸说：“曾在东线举行空前剧烈战争的人员与武器，将予英国以最后的清算。我们应该问一问在东线战争严格考验后调至西方应付第二条战线的德国武装人员，他们之中每一人都迫切希望向英国，或者还可说向美国这两个敌人，试验他们在东线‘无限壮大’的力量。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宣战时，他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而我们更好地知道战争是什么，而现在我们完全知道战争是什么。”这就是向英、美说，我们是红军的学生，你们敢来吗！这就是向德国士兵说，我们是和红军交过手的，不怕第二条战线吗！法西斯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战争就是失败。十月四日，戈林[1]恐吓人民说：“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则德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德国人民将被国际犹太人的毒牙咬碎并被消灭，德国将在地图上被抹掉。”总之，法西斯们现在是专靠撒谎与恐吓吃饭，而不能靠实力吃饭了。他们的进攻实力已经完结，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故日本是否还要向北或向南举行一个大的冒险，此时还不能作断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了

[1] 戈林（1893—1946），德国元帅。1939年被希特勒立为继承人。

的，日本面前摆着一个美国反攻的大危险。拿日本现存实力和这个将来危险作比较，那简直是不能设想的。日本军部对于美国飞机、军舰的生产，表示那样彻骨的惊慌，就是从这件事实发生的。日本目前是站在这样的分歧点面前：还是照德国今年攻势那样来一个一定失败的冒险进攻呢？还是以德国作殷鉴保存这点力量以期在防御战中侥幸取胜呢？假定日本法西斯采取第一条路，那在德国说来，其意义是为了援助德国防御而使用日本的进攻，就是说，为了牵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攻势而使用日本的进攻，这和今年为了援助德国的进攻而使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及希望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大不相同。假定日本采取第二条路，那对日本当然有利些，但对德国就完全不利，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要闹起别扭来。德国在今天以前利用了日本的进攻英、美，但没有能够利用日本进攻苏联。今后呢？德、日情况都有了很大不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还要等一下才能看清楚。

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10月17日）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并询问刘少奇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世杰电[1]

（1942年10月18日）

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2]，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在延安的4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18日）

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应采取今年“七七”宣言所表示的态度。

[1] 这是毛泽东为告知在延安的4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假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21日）

如彼方提周为主席团[2]，可予同意，不必以毛代，因毛不能经常出席。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国民党方面可能提周恩来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致李先念等电[1]

（1942年10月24日）

李宗仁铣[2]令该战区于明二十五日起，限期两个月彻底肃清我军（其部署另告）。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本自卫图存原则，进行武装反磨擦，但总方针仍应按六日电示（以斗争求团结）执行。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并告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的主要内容。

[2] 铣，即16日。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25日）

第一次见蒋[2]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转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于1942年10月7日到达重庆，10月13日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10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会晤张治中，林向张提出停止全国军事进攻等项要求。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结合的军队[1]

（1942年10月25日）

一

此件[2]很好。讲前即印发到会者，讲后还要印发全军干部，到营级止，当作干部教育材料。但不对外发表，要注意保存。讲时，可考虑要李鼎铭[3]等人来听。

二

对政府与人民中的缺点，即使怎样的严重，亦应该善意的提议，而不能恶意的报复与攻击，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待革命政府与革命人民的正当态度，不然就是军阀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在贺龙《整军报告提纲》上写的批语和在提纲第三部分（怎样来进行整军）上加写的三段话。

[2] 指贺龙1942年11月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整军报告提纲》。

[3]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三届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三

凡此所讲[1]，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的。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一起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



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

[1] 指贺龙《整军报告提纲》第三部分提出的怎样进行整军的十点要求。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1]

（1942年10月25日）

陈少敏同志：

酉元[2]电悉，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书记处

酉有[3]

[1] 这份电报的原抄件上注有“毛稿”（即毛泽东拟稿）二字。

[2] 指10月13日。

[3] 指10月25日。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1]

（1942年10月28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

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中央书记处

十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各分局的指示。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28日）

（一）二十七日两电收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二）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10月30日）

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免人注意。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2]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郑延卓，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

晋西北要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942年10月31日）

林枫[1]同志：

阅二十五日电，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2]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毛泽东

三十一日

[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

[2] 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参谋长和政治主任。

和谭政的谈话[1]

（1942年10月）

你在高干会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在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队本身内部关系上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1]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谭政就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了检讨。之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交谈。这是毛泽东和谭政谈话的一部分。

给贾拓夫的复信[1]

（1942年11月2日）

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2]译出的，请注意。

[1] 这是毛泽东复贾拓夫信的主要内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2] 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

（1942年11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撰写的文章。

致林枫电[1]

（1942年11月16日）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 这是毛泽东致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电的主要内容。林枫，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副政治委员。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11月17日）

德怀同志：

（一）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

（二）胡服[2]同志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毛泽东

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

[2] 胡服，即刘少奇。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1942年11月21日）

同志们：

这次高干会议开得很好，已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开了十一天会议，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恰当，很多同志都讲话了，据我听见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讲得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批评错误路线，所有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的同志，我看是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这中间有□□同志的结论，□□同志的发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在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了情况，懂得了历史。在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哪个根据地的干部比较起来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边区是曾经经过内战，经过土地革命。西北同边区是经过了这三个时期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而别的根据地的党，拿每一个根据地的全党来

说，那么他们的党龄，大多数同志的党龄要短一些；干部中间有一部分是新来的，外面来的，是新提拔的。而我们这个根据地则不同。这个根据地是经过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虽然那时还没有根据地，可是有工作；因为有工作，所以后来能创造这个根据地，比方那时学校有支部，有的城市如绥德、延安等地都有支部，乡下也许有个别知识分子在工作。就由于他们，所以后来建立了根据地。他们和群众农民结合起来了，有兵营，有国民革命军，这是好的。后来国民革命军有一小部分就变成了红军。这时我们开始有了武装部队，这是地方和军民结合起来了，因此就创造了根据地。拿同志们的表现来说，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进步很快。在这一点上，我们后来许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外来的同志，应该向本地同志学习，特别向本地同志学习。我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本地同志，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同志是经过了三个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样长期的三个时期的斗争。因此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有经验，比较更好一些，比较那些只做部分工作而没有这样地独立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没有经过长久的历史，没有这样丰富的经验，自己应该懂得，我们是差一点。这些同志应该向本地同志学习。事实证明他们是比我们强，甚至某些职位高的同志，也要向现在职位低的同志学习。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这些同志比我们强一些，更正规一些，这些同志更原则些，这些同志比我们更马列主义一些，更布尔什维克化一些。所以那些轻视本地干部，有这种观念的，当然口里不说，他口里绝不会说："我轻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但是心里有着看人家所谓"土包子"。人家没有走那样远的路，而自己走了若干路就成了洋包子。比方拿那两个根据地来说，这个是根据地，那个也是根据地，他们在这个根据地没有走一段路，是土包子；洋包子是

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来工作，所不同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和没有走那一段路。像从那个房子走到这个房子，你就洋起来了，你多走了一段路，所差就是这一段路，如果说两个根据地所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就是一段路，一个走了一段路，一个没走一段路。这一段路算不算经验？算经验。因为多走一段路，两万五千里或几千里。从上海、天津来的，但是有一个缺点，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根据地现在还在，你们那个上海、天津，现在呢？现在垮光了，全国白区十分之十，全国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光了，全国苏区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只剩下这一个，你那样高明，又是你那里垮了。是不是每个同志都要负责？都不高明？所有万里长征或走几万里来的都要负责呢？那不是这样说，但是从那里走来的同志应该懂得，自己比本地同志所差别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从那里走到这里。你那里失败的责任谁负责？上海、天津垮了谁负责？大多数同志要负责，尤其是领导同志要负这个责任，但我们在那里工作也是土包子，土包子与土包子，这里头，没有理由产生轻视人家，因为你那里领导不好，再加上客观的原因，敌人的压力很大，主观领导的错误，所以白区弄得差不多完了，各个根据地都失败了。所以我想许多新同志以及老干部，到边区工作的同志，应该诚心地向本地干部学习，这样大家绝不会嘴里讲，轻视他们土包子。口里没有哪个可能讲，讲出来那不像样子。在心里没有一个，就有十个这样，但有若干是这样想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次会议中清楚地表现这一点。有些外来的同志，甚至职位高一些的，比起本地同志来要差一些，他们不及本地干部。应该使他们懂得，本地干部更原则一些，他们的工作更有经验一些，工作更有办法一些。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这个会议中，应讲清楚

的。因为这个会里有两部分同志，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本地同志很进步，进步很快，掌握政策很好，那么就没有缺点了吗？不要向外来同志学习？他们就不能当我们的先生？那可不然，无论任何同志与同志间大家相互都是先生，就是中央和地方，和边区同志，相互间都是先生。中央不向你们学习，中央从哪里做起？中央不拿你们作先生，事情是办不了的。比方这次解决历史问题，没有这十一天的会议，没有你们贡献的材料，暴露了这样的事实，要中央同志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参加，你们不讲，他们怎么能知道呢？所以中央同志要以你们为先生，要以他领导的同志为先生，要向他们学习。同样他们也应该这样向中央同志学习，也要向外来的干部学习，哪怕他就是一个新来的，新加入党不久的，因他总有多少长处。比方一个新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请他当教员上文化课，这不是先生吗？这些本地同志应了解，自己还有缺点，我们要提高文化，提高理论，□□同志讲："要提高我们的理论，补足我们的缺点。"这样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不是相互轻视，相互排斥，这样来解决问题就好了，问题就能好好解决。我想这次会议，不但解决历史问题，而且解决将来团结问题。将来团结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本地同志，另外还有一部分外来同志，这两部分同志必须很好地合作。很好合作必须除掉轻视的观念，尤其不应轻视本地的同志，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次会议已经过去的一个段落，我讲是这样一点意见。

今天我想讲斯大林同志这十二条，讲十二条与刚才讲的全党路线搞清楚，全党团结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讲这十二条的。

斯大林同志说："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

能的。”

现在我们同志互相敬礼时，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致“布礼”的敬礼。就是好像大家都说，你也是布尔什维克，我也是布尔什维克，他写信给我，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我写信给你，也是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但我们是不是空的？这个布尔什维克敬礼是不是空谈呢？我说要看是否空谈，就要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具备了条件没有。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就不是空谈；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如果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具备不完全，那么我们就不是叫布化，只是向着布化。“化”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讲十二条，布尔什维克有二三个条件，还有些条件不合，那么你还能算布化吗？不能够。是向着布化，但是没有“化”。

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我想应当是这样看，我们还是向着布化。要讲布化我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从它的工作说起来，从这个党的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关系说起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就是彻底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在我们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化，我看我们还差，还是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我们来看这些条件，像斯大林所讲的。

第一条：“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翻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这一条对我们党怎么样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条在我们党许多地方、许多部门没有实行，或者没有能够完全实行。这个里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是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斯大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问题。因为我们的国会党团——我们重庆参政会有党团，边区参政会有党团，这个党团没有像斯大林所讲的脱离党，把党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作为主体——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那一种现象我们没有。我们许多同志说：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要？我们许多同志读了这一条说：这一条和我们不适合，我们没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讲到别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党是一切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最高”是领导一切形式的组织。一般组织形式，在这里所谓职工会、国会党团，这个问题是有别的例子。现在的事实来说，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领导什么东西呢？现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说，党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民众团体。除了这三个工作以外，我们还领导什么东西呢？我们不领导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组织。那么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为了整理党务工作而整理党务工作是不是可以呢？我们说可以的。为什么呢？完全不为别的，就是为着要把军队搞好、政府搞好、民众团体搞好，所以我们要搞党务工作。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军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很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军队的干部，政府工作的、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民众团体工作里头，有工会、农

会、青年、妇女、合作社、文化团体。文化团体中间又有各种团体，有文学会、哲学会、戏剧会。戏剧里面又有新戏旧戏，有木刻等等，这一套都是民众团体，这一套可多得很，你这党不管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的事，你管什么？你这个党的干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所以党务工作的目的，完全不是为别的，搞这么许多人，给你小米吃，吃得你发胀，（笑声）就要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党务工作，做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搞军队，搞政府，搞群众团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争。

但是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实实在在存在着这一观念，你这个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点，我的军队你少管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点。这种情形是想象中的呢，还是事实上就有呢？少管到不管，不管到反对。反对的是什么人呢？是张国焘，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不要我们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闹独立性，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抗战中间还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以前有这样的事，其他的军队像这样严重的事是没有的，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像张国焘是最标准的，突出的。第二个是项英，是比较次一点，是没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来。再有的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军队里有没有？军队里面也有过，合我脾气的就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没有公开讲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军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案不能执行。比如党政军民关系上，军民合作不能够执行吗？相当长期不能执行。这个不执行是不是原则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够执行，没有法

子贯彻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政府的工作，我们实际的政策，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该是很符合党的政策的，这方面我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的，步调不一，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政府与党，政府里头工作的党员与政府党领导步调不一。

群众团体，群众团体有没有这种事呢？也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过去群众团体之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青年工作，所谓闹独立性，闹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党的政策不相合，随便搞一套。文化团体中的党员对党的政策、对党的领导这个关系在过去也是有过许多毛病的。比如《解放日报》第四版，那时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独立国，什么人也不能干涉，这一版和别的版甚至变成这样的事：如像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英国差不多。在某一点上甚至有过之。实际上这一版是闹独立性。报馆的意志不能在这一版实行。现在我们无论哪一版，哪一篇文章里哪一个字假使要干涉也可以。一共有四万字，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是服从的，只有一个字不服从有什么关系呢？不提出时不是原则，不提出时不关大局，如果他一个字不准报馆编辑干涉，如此下去四万字都要闹独立性。讲出来党一个字也要管，好像说你这个党挖苦得很，一个字都要管，一个字不要管怎么样？允许他订一个条约，说：你可以闹独立性。那么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来了，他可以闹独立性，为什么我又不可以闹独立性呢？不可以的。党是管一切的，他如果要管一切都是可以的。什么叫党？现在我们在“九一”决定中已经搞清楚了。好像政府工作就不算党，西北局不算党，木刻、戏剧就不算党，只是群众团体，那么这个党还很小，只有这底下几个房子才叫党，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谓党是一切党员，党是党员组成的，……旧戏里头有党，新戏里头有党，工

会、农会、青年、妇女中都有党。比方除了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工人团体、农民团体、文化团体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党也没有了，就完了。假使这样尊重党的领导，可是我们这里不能叫党，我叫军队，我叫民众团体，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要这个党，因此就没有党了。西北局不过是几间房子住在那里，有几个人在那里。

所以关于这一条，我们现在的例子，现在要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领导一元化，要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要承认这一次大会整个关系的决议案。承认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一切无产阶级党以外的组织，通过他的党员，一定要归党领导。这种闹独立性差不多自有红军起就有了，在根据地中特别发生这些事情，在根据地以外这个问题少些。

根据这种情况看来，我们说比较布化，当我们写这个字时，我们就想想我们“化”的程度，我们布化的程度还是差一点，拿全党来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拿部分的干部，甚至相当一些同志来说，布尔什维克化还没有，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

第二条：第二讲理论，“必须使得党，特别是他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第二就是说要精通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脱离实际的，跟实际是联系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关于这一条，在我们党来说，我们党是有过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怎样呢？第一个时期，很高兴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干了一次革命，叫做第一次大革命。从有党到一九二七年，前一段是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这是在什么原则之下？这是在什么思想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这一条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因为中国的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时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传播。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有所谓马克思主义，还有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不大知道的，差不多一般说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国落后得很，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变，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这样久，无产阶级运动有了这样长的时间，现在列宁主义在俄国有一个胜利，有过几次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大知道的，有某一些人，有某一些翻译印刷，但是一般的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个时期，十月革命本身对中国是有很大宣传，十月革命本身影响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有很多东西流传到中国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有很大的事变，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产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更多起来了。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中国自己产生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首的，就产生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自觉地研究，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不然，一九二一年可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经过几年的酝酿，又产生了五四运动。没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都是难的。有十月革命，又有了五四运动，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所以能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建设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这六七年当中，我们党是个幼年的党，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大革命。像这样一种历史，在外国都不很多，只有六七年的工夫，干出这样一个大革命来。国共

合作，在这中间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那时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全党的活动，都是以马列主义做基础，同时按中国党的实际情况提出纲领进行活动。有些人似乎觉得中国党开始没有理论的，特别是靠后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些同志感觉只有自己是有理论的。我们就讲五四以前，就讲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这四年中，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普遍的宣传。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样设想呢？怎么忽然产生了一个共产党呢？这个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呢？是基督教主义呢，还是孔教主义呢？（笑声）后来有些同志觉得从前那一套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有自己才是马列主义，这个我看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些同志也觉得我们从前那一套不是马列主义，而只有新翻来的才是马列主义。哪有这个事？不是这样说的，事实就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那时李大钊他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间李大钊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又不是基督教主义，也不是孔教主义，是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证。所以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以后还有一个内战阶段，一个是抗日阶段，就是两个东西的斗争，一个是马列主义，一个是反马列主义；一个是真马列主义，一个是假马列主义。这个会开了十一天，□□同志也这样讲，当时的口号是“为马列主义而斗争”，朱理治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两万多字；这一边便叫做“右倾机会主义”，也算一个主义，不过

是个“机会主义”。（笑声）历史现在证明，这个现在不要书上找证明，书上也有证明而且有人证明，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就是叫做“右倾机会主义”的那个正确，被杀的那些人正确。杀了二百四十个，杀的是什么人呢？杀的是马列主义者，杀了二百四十个马列主义者，坚决的马列主义者，很好的马列主义者被杀掉了。再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没有杀得及，大呼一声“刀下留人”。（笑声）这个情形只有一个苏区吗？不只一个苏区有，特别严重的有三个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和这里。中央苏区，赣东北，四川苏区也有，不过没这里严重。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一闹，这个错误的路线就损害整个的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损害，这中间包括了一部分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把共产党员与马列主义者屠杀了，这是一个结果。此外，就是搞光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全国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就是这样搞掉的。第一阶段中间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革命，到了后期分裂了，陈独秀也自称是马列主义者，但是那时候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那时候的马列主义，他后期的马列主义是什么马列主义呢？是假马列主义。结果怎样呢？结果被正确的马列主义克服了。

“八七”会议把他清除了。清算了大革命的失败，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合不合乎马列主义？不合乎。是真的马列主义还是假的马列主义？是假的马列主义。什么人把假的马列主义陈独秀这部分人清除出去和他作了斗争？党里面正确的马列主义，后来也向立三路线作过斗争，向右倾机会主义作过斗争。李立三也是假借马列主义之名，所办的事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后头就是“九八”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所以我们党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有向陈独秀机会主义的

争，后来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期整个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左”的机会主义。整个内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争。这三个斗争是什么对什么？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对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向这样的几个路线作斗争，向立三路线、苏维埃后期的路线、张国焘路线，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作结论。我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的，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样一个结论要不要作呢？要的，“七六”就要作这个结论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办的事是一种什么路线呢？现在同志们都讲了，现在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合乎实际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我想这个是事实。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的。因为鉴于大革命那个时期的胜利，那个时期的失败，又鉴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又鉴于内战时期我们有很大胜利，可是我们也有失败，我们犯了立三路线，我们中间那个路线和张国焘的路线，有这一连串的历史。这两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分裂，这样的经验就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得比较正确一点。全党的觉悟在这三个阶段里也比较过去要提高一些。但是，没有缺点呢？我想还有很大的缺点。在开幕那天我曾经说过，我党内，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像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们反对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统治的路线，但是在全党有残余。这种残余合不合乎马列主义原则？不合的，对于这种不合马列主义的残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隐瞒包庇，不注意；一种是向它作斗争，肃

清这种残余。为什么要提出整顿三风？从去年七月一日起，中央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今年二月中央又提出了整顿三风。现在差不多一年工夫了。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进行了这样大的一个学习，进行了工作检查。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对不正确的残余，对这个歪风的残余，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纠正的态度。在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后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就产生了。遵义会议以前是一种“左”倾的错误，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来说，拿政治斗争，党内关系来说，是一种“左”倾的错误；遵义会议以后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是不是还存在毛病呢？毛病是有的，就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坏倾向。在这时期的主要偏向，我们党内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坏现象，而不是一种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这几年来，我们党内的主要坏现象是过火斗争呢，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火斗争有没有？还是有的。在某些地方斗争还是大的，但不是主要的坏倾向。遵义会议以来，党内主要的坏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在过去犯这种“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就容易犯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你们这次十一天的会议，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过去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抗战以来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是“左”倾为主还是自由主义？朱理治在银行工作，就闹独立性。郭洪涛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这是“左”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去“左”的转成了右的态度。

现在我们讲到第二条，我们把中国党分为三个时期，北伐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这三个时期从开始就是在马列主义之下建设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

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革命；后来产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来了一次斗争。第二个时期，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的内战——国内战争，但是偏向又产生了，李立三路线，中间这样一个路线，张国焘路线，不过这三个路线都被我党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哪个路线是正确的，哪个路线是不正确的？那几个不正确路线已把它克服了，现在是正确的路线，而拿这个正确的路线克服了不正确的路线，所以这个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是正确的路线。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如果说过去是“左”，在这个时期，党内到处表现了右的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拿了马列主义，却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以马列主义作招牌。马列主义自以为懂了，你就要去做，但是不做。我们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咬文嚼字，做也做，做的时候他就做错了，他乱搬公式。还有一种不做事，只读书。读了好多“箭”不放出去；一种是无的放矢；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贝古董。在延安近来发生的哪一种呢？是后一种。他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边币跌价都不能解释，这种读书是脱离现状的。这种偏向要不要改革呢？要改革。能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应该，特别是在宣传教育机关中，这个现象不能容忍了，再不能够发展了，所以要整顿三风。边区党员是三千，二千，是二千九百呢？总之有一部分党员，名为党员，实际上于党不利，是反党的，是党棍，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他们以党员招牌进行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吴奚如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现在向新四军打电报，证明他是被俘过，他也承认怎样当特务，怎样订条件，怎样放他的。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

格，在这里讲话，他们组织了五个人的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一共有一百几十个人，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一个反党的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苏、宗真。什么人知道呢？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哪晓得他们反党呢？读他们的文章还说很好。整顿三风时，他们就先要来整顿三风，（台下哄动）我们现在有许多党员在这个时期麻木了，不自觉了，许多党员马列主义的作风看不见，容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暴露了，这样的人他终久要说话做事，在他的说话做事的表现中间，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以为这样也算个共产党员，而不把共产党员和这些人加以区别，许多人没有嗅觉，没有警觉性，这都是麻木现象。这次会议我希望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党要来一个清理。这算什么呢？是不是自由主义呢？他们是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残余不说话、不斗争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闹独立性，以前不讲，这次会上讲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过去有些同志不报告，听了他的造谣不反映，这次会议反映了很多关于过去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谈了一点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斯大林告诉我们，把它列作第二条，要我们注意理论。我与党校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党校准备要读几十本书。中央的理论学习计划在整风以后，还要继续执行。我们党里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有经验的同志们，不久我们要读起来，以前我们读了一些，没有这样多。从前党内有这样的两千多人，高级的同志每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恐怕我们就要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明年就要开始做这个工作。三四十本读得了读不了呢？读得了。在党校有

一年半。就很好了，没有一年半也差不多。有许多书一个星期就可以读完一本，像《共产党宣言》那样薄的小本，不做别的事，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四本，十个月就四十本，读了四十本就差不多了，眼睛就打开了。在座的同志们，工作的同志们，假如有计划，三年的工夫可读四十本。从《共产党宣言》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可以选三四十本，有些可以读二十几本，有些甚至读几本，主要的读几本，最高的要读完三四十本，在座的同志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党校的同志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这样实行，这样计划，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三个历史，再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样就把我们的党大大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要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化就能化得更好。现在我们很弱，马列主义的战士很少，理论方面很弱。因为很弱，所以□□同志也讲到，为什么朱理治那一套在这里能出卖呢？居然还有人信他的。有些人不信他，又不能很好提出意见说服他。为什么许多人信他的呢？为什么许多人不能拿很好的武器和他作斗争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弱，在理论上很弱。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增强理论办得到办不到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觉得自己对于很多马、恩、列、斯的书很难清楚，很难读懂，自己没有信心。关于这个问题，这几个月的整风学习是解决了的。我看见许多以前认为自己对马列主义没有可能学到的这些人，现在有转变了。以前他们认为读马列主义大概就是些专门读马列主义的人才能读通，这件事是他们的事，至于自己虽然很想读，但是没有可能读。最近在二十二个文件学习中间，引起了他们的信心，建立了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可以学到的信心，一点点地、慢慢地学是可以学到的，大大地引起他们读书的兴趣。因此在这次高干会议以后，我们

应该有一个学习运动，看书能看进去的同志，能看懂的同志，我们要有这样的目的，一个人选择几十本书，认真地天天读，一遍一遍地读，在职的三年为限，学校的十个月为期，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讲的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如果不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不能那样讲的，不能讲我们就是布尔什维克化了。

第三条："必须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仔细分析的结果，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我们做决议案，提出口号，向全党，向下面以及向各地作出指示的时候，根据什么呢？斯大林同志讲不应该根据一些东西，而应该根据另一些东西，即不应该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历史的比拟，而应该根据什么呢？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条件，这一条拿我们前一年的历史来说很清楚，斯大林这一条我们很容易理解，首先应该根据这样的东西，有两样东西都可以根据：一样就是公式，历史的比拟；另外一样就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所发生的毛病就是根据了第一样那个东西，如果实行他这一条就没有这种错误与毛病。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犯的几次错误，恰好就是没有依照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如你们这次会议中，像朱理治、郭洪涛他们那些"指示"，他们根据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讲"优势劣势问题"，国民党加日本他们说敌人处于劣势，而我们则变成优势，那时全国红军有多少呢？在提出这种优势劣势的时候，全国红军不到十万，后来也只有十几万人，具体的条件很清楚：一个是多数少数，多数多到哪个程度，少数少到哪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口号中间还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讲过，把这三千人一个

一个地摆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线。（笑声）你只三千人怎么能打通国际路线呢？还有“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的口号，这也差之不多。（笑声）但三千人从洛川到鹿县的六十里恐怕也摆不够，三千人可以摆多长呢？一个人也只能有这样宽，再有一个胖子也不过这样宽。（笑声）况且还有小鬼。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这是根据具体条件吗？不要在稍山里边建立工会，工人根本没有，可是一定要建立工会。还有一个口号是要“打中心城市”，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决战”，朱理治的文章里就有决战这个口号，提出决战那个口号时，还要打中心城市，拒绝做会门工作，拒绝做土匪工作，他们发出的就是这样的指示。恰好另外一些同志和他相反，如□□□、□□他们制定的口号，他们制定的指示，他们要做会门工作、土匪工作，把会门工作、会门斗争的形式，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形式，把土匪工作、土匪的斗争形式变成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如和军阀联络一下，朱理治说这就是和军阀勾结，我们不是和军阀勾结，而是利用他们。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我们要打击在野的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经在野了，你还要打倒他？（笑声）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世界上哪里能找出这样的文件，这样的指示？（笑声）为什么这样？这也因为外国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引用历史上的比拟，所以也要写一下。我们也要搞一个集体农场，因为过去苏联有过。要打中心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北伐的时候打过武汉。外国——现苏联也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们也可以打中心城市。这是不是周密分析的结果呢？这种口号、这种指示是不是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呢？关于那个时候对国际、国内的革命具体条件，并没有作过分析，或者作过分析，但这个分析完全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造成许多笑话，造成大错。另外斯

大林还讲到，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他这里把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作周密的分析放在第一位，而要不要考虑国际经验呢？他讲必须要考虑，不考虑国际经验不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广大的经验，苏联是革命已经胜利了的国家，这样好的经验你不要，完全靠自己搞，完全要自己来，对不对？不对的。但应当把这一部分放在后面，把那一部分放在前面。以前有一种译本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的，现在有正确的译本，首先要照顾到国内国外的当前的具体情况，并加周密的分析。我们制定的各种口号、指示，就应该是依据这些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应是根据这种周密分析的结果来制定口号、指示，同时必须考虑到外国的经验，但对外国的经验要恰当地估计，不是硬搬。

从前在这一点上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经验是在外国当时当地，所谓它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我们中国应当考虑到人家这种经验，而且必须要考虑，但是必须要估计到两种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外国反对自由主义，外国反对德波林，我们也反对自由主义，我们也应该反对中国的“德波林”。但是，是不是一样呢？不消说，自然不能一模一样。苏联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现在也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要不要采取那个经验呢？当然要采取的，但是一模一样的搬取就不行。在外国，在苏联有过清党运动，我们现在也要把党来一个洗刷。要不要采取外国的苏联的经验？要采取外国的经验，但主要应从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分析。比如王实味确确实实是个托派，吴奚如确确实实是个特务，边区里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员是党棍，是坏人。我们对这些人，对我们党员，要一个一个具体来看，要按照具体条件来处理，同样也要考虑到外国的经验，正如上

面所讲的，制定口号这些东西都必须注意。比如我们刚才讲过的历史上有许多缺点，许多口号制定得不确当，糊里糊涂制定口号，像朱理治、郭洪涛制定的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今天有些什么口号，有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的口号制定了没有？制定了，是怎样制定的？是从当前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像国共合作，各阶级合作。又比如，从前我们有一个八小时工作的口号，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口号，但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是一个宣传口号，不是一个行动口号，而不是像过去某些人所认识的那样，在农村里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朱理治、郭洪涛就要在稍山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现在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只当作一个目标。将来全国工业发展了，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苏联现在工业发展的结果，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比八小时还减了一个小时，所以，八小时工作制度只是一个目标。另外，过去还提出了不分富农、中农的田的口号，今天我们提出了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所提出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加以很周密的分析呢？是不是根据这些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而制定的呢？是根据周密的分析，周密的研究。如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在今天是适用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是有效的。又比如三三制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当前国内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呢？是的，我们周密分析各种经验，认为要实行三三制，所以我们开参议会，我们和各党派人士合作。我们今天实行三三制是糊里糊涂制定的呢，还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呢？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度、减租减息、缴租缴息、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总口号）都是这样制定的。今天整顿三风，精兵简政这样的口号提出来了，如整顿三风这个口号，是糊里

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呢？回答说，我们现在确有需要。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只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才恰当。这是在现在这样具体条件下我们加以具体分析的结果而提出的口号，各地方要实行，就要讨论，我们边区一定要实行精兵简政。有些同志在去年参加过参议会，在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以后，并没有加以周密具体的分析，因此不能够进行彻底。精兵简政过去不止进行过一次，为什么会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没加以周密分析，没有把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人，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人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简政。究竟在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体系统，执行这个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像现在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他们所做的那些工作，是先加以具体的周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具体的规定，这个工作作风是对的，不是那样糊里糊涂地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以前简过好几次都说没有简彻底，那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几次精兵简政都没有实行好，没有彻底。糊里糊涂，没有加以周密的分析。所以斯大林讲的这一条要不要注意呢？我看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很重要。我们要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就要注意这一条。如果没有这一条行不行呢？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就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就要打通国际路线，在稍山里建立工会，搞集体农场，打大城市，再搞肃反把马列主义者肃掉，这些经过具体分析没有？没有，就是糊里糊涂乱杀一顿。斯大林讲这一条，就是讲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这一条就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思想方法，是两个看问题的方法。我们拿前一年的历史反省一

下，过去凡是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同时顾及外国经验，那工作就做得好，反之，不注意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工作就做不好，结果制定的口号、政策就不合实际。不合实际的口号、指示就一定行不通，做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这里有个第四条，后面有个第十二条，都是讲检查，但这两条的意思是不同的，这条里的"检查"指什么？主要讲检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则的路线；后面是讲检查工作作风，这个路线的实行，口号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说，要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来制定口号和指示。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单有这一部分够不够呢？不够的，因为你说是根据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所制定的口号、指示，方法论还没有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所制定的指示要在实践中间得到证明。理论从实践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第三条讲的这个从实际调查中抽出来就是讲所谓调查研究。口号、指示、决定、决议案，就像你们现在所做的讨论的东西，从实际反映，成为口号、指示，这是方法论的，第三条。还有一条，你们说正确吗？那么那时他们也讲根据实际呢？李立三也讲的，他也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的对立，国内形势有两个政权的对立等。要在实践中考验，结果是白区十分之十、苏区十分之九搞掉了，在革命烈火中检查这个口号，检查结果怎样呢？烈火中那个可谓烈矣，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可谓烈矣，检查的结果，那时的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呢？不正确的。像打中心城市、在乡下建立工会、打通国际路线、肃反这些东西，无论哪个都是不

正确的；而另外一些东西是正确的，□□、□□□倒是正确的，岂不是革命烈火斗争检查正确不正确呢？朱理治、郭洪涛不信我们试试看，使得使不得，不然就转弯。现在我们的指示，我们刚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减租减息，缴租缴息，十小时工作制，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等等。像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政策，这些口号，这些指示，究竟跟实际合不合？我们要来检查。比如我们过去党内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我们检查这个制度合不合教学的方法？我们检查结果是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那么怎样？就要改。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马列学院，党校也算火焰，教育了一两年检查一下，检查里头有教条、里头有三风。过去我们边区有两次作了精兵简政的决定，现在实行了几次，在今年春上，检查的结果，还不彻底。今年我们这个高干会，决定了许多，这次高干会以什么为准呢？开这个会是不是正确？我们承认是正确的。如果不承认正确，那我们就不要作决议，既然作了决议，就要承认是正确的，是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这样作出来的。但是是否正确？不在于嘴上讲的，究竟怎样？最后的证明要在你去做，做对了就是对。但在做的过程中，不对的还要修改，你这决定的许多东西中是不是每条完全对？如果每条完全对，那是你周密的分析很恰当；如果还有一二条不对，那就是周密的分析还差。一切中央的指示、口号、决定都是这样，不能糊里糊涂地讲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讲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我们说现在中央的都对，这是因为中央过去有这样多的经验，有这样大的胜利，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是比较慎重地解决问题，是来一个周密的分析。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以后，证明这个东西以后，才能说正确，不然是不能说的。中央不能说自己提出来的口号、指示一经

提出，不要证明，就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的。如果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的第四条提出来做什么呢？岂不是多余了吗？理论是从客观实践中抽出来的，又从客观实践得到证明，这是第四条。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一讲出，那就完全正确，这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是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是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可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宣言，我看也差不多，他隐瞒党，单把他所说的所讲的一点和过去比，有进步，但我们相信不相信呢？在他作出以后，过去他隐瞒党，以后不隐瞒党了，过去胡乱搞，今后不乱搞了，过去犯错误，以后不犯错误了，过去破坏党，以后不破坏党了……那时我们就信了。马、恩、列、斯告诉我们说：宣言、决议案这些东西，不是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是在他实行的结果。所以第四条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人做事是有计划的，他要做决议、口号，没有第四条是不行的。单有第三条，没有第四条是不行的。

第五条："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流毒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这一条讲什么东西呢？这一条就是讲工作作风，他这里的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没有革命的作风，而是一种改良的作风，所以应当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

命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步调上，新的革命的精神上。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从那种改良主义中分裂出来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它不革命。条件变化了，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呢？它是改良的作风，它没有办法领导无产阶级去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党。各国按照布尔什维克作风建立了共产党，如法国、俄国、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这样的作风，他这指示、口号、政策、作风实行以后，自然而然地使群众一天天革命化，使工人农民就不再那样想改良，不再妄想第二国际想的那一套，使他们一天天革命化，教育广大的群众，他讲的本意就是这个。这对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没有。□□□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好：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犯过许多大的错误。一个是右，我们今天讲这一条，应该讲什么呢？就应讲反对自由主义。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同时我们当然还要反对过“左”的，比如征粮工作，不调查乱派一顿，命令主义。这样实行能不能让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这是已经革命的地方，还可以使他们更革命，还需要他们更革命。比如，当兵打日本，要出公粮，就是革命工作，命令主义能不能使边区农民自然而然地出公粮、当兵呢？不能的。同时我们有自由主义，就是刚才讲的。党内有很多的坏蛋，有王实味，有吴奚如，我们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马列学院，这具体的例子，是不是一种新的作风？那里头缺乏新的革命的作风。我们鲁艺，在报纸上看到，在□□同志领导下，现在转向新的革命作风。你说过去就不革命吗？不对的，过去也是革命的。那里有很好的新的革命作风，使得群众

自然而然革命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鲁艺的学生，这都是群众。怎么样使他们自然而然革命化？我想具体的步骤就是整顿三风的办法。在这个月中间，你们看中央研究院，在范□□同志的领导下，整顿三风是在新的革命步调下实行的。这些步骤，使中央研究院的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使得鲁艺的群众，在□□同志的领导下自然而然地革命化。现在每一个机关，比如解放日报社，五湖四海，集合了许多人，要特别注意自由主义。我们边区这地方有党校，有边区师范，有财政系统，有银行，有各种机关，从各方面来的人都有，大家不熟悉，不了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倾向，我们就实行这种步骤，叫做整顿三风，实行这一种比过去更进一步的新的革命作风，使这些人自然而然革命化。比如什么笔记啊，漫谈会啊，大座谈会啊，小座谈会啊，传观笔记啊，开展批评啊，实行这样的步骤，使得这些人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全边区要实行这个步骤？你们回去也要实行这一条。我们过去的作风，有许多不健全与不正确的地方，那是改良呢，还是革命化呢？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拿每一个口号、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这样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进步，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过去，不安心工作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很多的人，天天想调动工作，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有多少呢？不止一两个，有好几百、好几千个在工作岗位上不安心，因此我们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顿三风，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心了。他们调动工作也愿意了，从前调动工作哭哭啼啼，讲价钱，现在觉悟了，已革命化了，已进步了。斯大林讲“改良与革命”对我们有没有用呢？有用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的问题，命令主义，自

由主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我想这样来解决，这样来实行这一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党内的广大干部，党内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教育广大青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和教育边区这一百四十万人民，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三四十个工厂里的工人和工作人员，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各个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军队里的干部和士兵。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我想是应该的。这第五条对我们是有用的。

第六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这里讲这一条要把原则性，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教育群众，而且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你要讲要教育他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想把革命的原则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就不能向群众学习。你只讲党的最高原则是不行的，党员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不联系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教育群众？有什么办法向群众学习呢？你不联系嘛，教育个屁。教育不了，学习不了的。你不联系就脱离，你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你怎么提高他呢？要把群众提高到党

的水平，先锋队的水平，将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逐渐地提高到了党的水平，那时共产党就不要了，全世界的阶级都废除了。阶级废除了以后，群众的文化发展了，教育发展了，群众跟党差不多了，那时候党就不要了。我们现在在革命的过程中，就要这样逐渐地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如果不联系不接触群众，那怎样去提高他们呢？而且也不可能倾听到群众的呼声，你怎样知道人家的迫切需要呢？人家的迫切需要是要打游击，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农民的事，而你在这里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人家需要的是分土地，你需要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要搞八小时工作。

这第六条是讲群众工作问题。斯大林告诉我们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上的需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要求就是最高原则。但是用什么方法去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呢？这就要依据具体的条件，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环境，要求低一些，比如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话一说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问题。比如在×县有一个庙打了，老百姓就不高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先锋队，我们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们主张破除迷信，知道没有什么神与佛，我们是不要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呢？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我们中国人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萨，开洋船就不必信了。木船不信龙王菩萨翻了不得了，洋船翻得很少，很大的风浪也不怕。乡下信观音菩萨，所谓送子观音。破除迷信是最高的原则，如果今天破除了迷信，同志，他们没有中央医院，人家生娃娃生不出来怎么办？生死了怎么办？（笑声）我们有中央医院可进，中

央医院有金大夫，有外国医生，如果生不出，他可以开刀破肚，如果生不出可以挖出来。那就是灵得很，这就不要迷信了。迷信是有原则的，是受生产条件、经济条件限制的。比如我们是反对求菩萨吃药的，但有人要求神，因为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吃了不会死人；第二比较便宜。要是请医生，还要给他吃猪肉，这就要好几元钱，还要送“色对”。医生的药有时还要吃死人的，其实如果到处有西医，如果中医进步的话，那么求菩萨也会减少。我们这破除迷信是个最高的原则，但我们现在应该迁就他们。比如婚姻自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原则，现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地鼓励了这点，而“统统是乱七八糟”（此处未听清楚）。我们说不要破除迷信吧，这就是忘记了最高原则。中国讲民主，但在重庆、西安去讲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忍耐一下。所以要把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不要忘记了最高的原则性，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场、打大城市……最高原则不要忘记，这个原则是我们建立党的最高目标，忘记了就不算共产党。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的，可能做到的，就这样来做，这样才算与群众密切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了。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他在那里自己也去敬菩萨。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一个留学生，他是一个地主，又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大王，是个共产党员，是中央委员。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是二月十九日拜观音菩萨，你也去，他们就说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说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萨呢？我看你这个人不大正派吧，菩萨不可信，我说我们就来信一下吧，你说我相信菩萨，人家看到你是大学生，又是留学生，看到你相信菩萨，人家说，你是个好同志，群众见了你就请你

坐下来，就请你吃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该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戴这样高的拿破仑的帽子，穿一双皮鞋，手里拿着司的克，这样就不行，一定要穿农民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也就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就可以懂得他们的迫切要求。我们懂得了以后就要慢慢来，把土豪打了，田地一分，菩萨就少了。在中央苏区就只有老太婆还相信菩萨，特别是有儿子在军队里当兵的老太婆，她们还相信菩萨，她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打胜仗，如果她有几个儿子在军队中，或者死了儿子的，她就更相信菩萨了。而在一般的群众中就不相信，特别是青年人不相信菩萨，因为他们是身强力壮的，靠自己，所以他们不相信菩萨。老太婆相信菩萨，她们是有各种原因的。这是一条，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则，要把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一个是最高的原则，一个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敬观音菩萨敬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敬，这样就把共产党混同于老百姓一样了，就变成了老百姓的尾巴。人家天天敬观音菩萨，如果你也天天敬观音菩萨，这样地相信观音菩萨，你就放弃了最高原则性，相信菩萨要能把握住最高原则性。苏联还有教堂，但是现在全国的教堂已经没用处了。现在只有几个老太婆还相信，在高加索有几个地方的老头子、老太婆，他们还相信，他们相信也就让他们相信，但是不要跟他们做尾巴。苏联天天反对信宗教，信宗教有信的自由，反宗教有反的自由；信宗教的宣传宗教，反对宗教的也宣传反对宗教。信宗教的，他们天天喊上帝万岁，如果取消了反对宗教，专门宣传宗教，也天天喊上帝万岁，那就变成了尾巴主义。这一条是群众工作

的原则，应该不是关门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要作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七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这就是要把革命性与机动性、灵活性这两个东西相配合，如果不然，党怎么样呢？那么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有些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条特别提出，第六条着重于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原则，讲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讲斗争的战略战术。斗争的形式，组织的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问题。这一条可以成为一大本书，斯大林每一条都可写成一大本书，第二条是理论，第三、第四条是唯物主义，每一条都可成为一本很大的书，第六条讲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斗争形式，因为我们不但有部分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别的阶级、别的集团。我们革命要按照可能性，可能与他们联合就同他们联合，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比如我们的三三制，这个三三制是最大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我们要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我们曾经打倒过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实行三三制。过去曾经没收过地主的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与缴租缴息。这个办法叫什么呢？叫灵活性、机动性，这是不是丧失了革命性呢？托派这样讲我们，也说我们投降了资产阶级，投降了国民党。过去我们同国民党作战十年，今天日本人打来了，又同他联合，这叫做灵活性、机动性。而托派说我们反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我们说相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他们说我们投降了资本家。所以“左”倾的人就拿这些话来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右倾。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讲的就是这个第七条，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那时候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的共产党中有些人提出反对打迂回，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还做什么国会工作，他们反对做国会工作，也反对利用国会做讲台，他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作了这本书，过去不大注意它，郭洪涛、朱理治过去就没有看过这本书，也不忠实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没有看进去，而这上面许多东西都讲了，第三条上面的东西大概那上面也讲了，那本书上主要讲了统一战线问题，讲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如果不讲灵活性，只讲革命性，那么有没有可能来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各种组织形式呢？没有可能的。

要只讲打仗这一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八路军、新四军要不要灵活性呢？我们去开参议会。去开国民参议会，这个要不要呢？我们还是要的。我们还是要到重庆去开国民参议会。就拿日本占领区、沦陷区来说，八路军在华北打，新四军在华中打，天津、北平、上海、冀中现在是日本占领了，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吗？人家占领了，我们打不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种办法，叫做合法斗争。伪军是合法的，人家承认的，我们可以利用伪军，在伪军中做点工作，比如像怠工，这是很大的违法，如今天推托出发，修路推迟两个钟头到工也不算大违法，这就是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过路，晋西北老百姓在沦陷用怠工的方式不去修沟，有几个区的老百姓就不去修沟，这是合的，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八路军、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口号，

但沦陷区老百姓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就会不见了，那一个区域的老百姓，李四张三跑出来说："日本人，我们打倒你。"那他的头就保不住了。要搞合法斗争，你老爷叫我修路，好吧，回去后就可以少修一点，可以不修一点。现在日本士兵开了代表大会，有很多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在各个地方都做了。那些要求是什么呢？要日本人发手巾，要日本人允许炒菜馆子存在。这是什么斗争形式呢？这是合法斗争。因为炒菜馆子是日本人承认的，因为法律上有，后来不承认了，发手巾法律上也有，现在不承认了，可是没有手巾就不能洗脸。这是合法斗争，这个如果实行了，手巾发了，炒菜馆子也能存在了，也就满足士兵群众之意了，那么这个合法斗争就胜利了。没有手巾就发动斗争，这就慢慢把觉悟程度提高了，变成为群众运动，这样的一次、二次、三次就慢慢地把群众的革命性、积极性、觉悟程度提高了，这就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布尔什维克三次革命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是最丰富的。"的确，是最丰富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五年中（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经过三次革命，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流血斗争与不流血斗争。这一方面，中国的经验也许还要丰富些，因为我们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是同时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没有苏维埃，只可以作些合作斗争。我们不然，我们过去十年内战是非法，可是在白区我们可以作些合法斗争是他们许可的，如搞合作社、黄色工会。那时□□同志搞黄色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区内可以作两种斗争：一种是利用合作社、黄色工会、学校等等作合法斗争；另外还可以搞非法斗争，白区也有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虽然法律不允许，我们还可以做。在

日本人区域也是一样，在日本人区域作非法斗争，有时还不适宜，有时还是要的。现在法国、德国立刻准备推翻希特勒的斗争是必要的。我们演过一个新木马计的戏，它所写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呢？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两种，像神秘的不能使人知道的那一部分是非法的，像可以同人家合作的，如要求加工资。章程上有的他不做，我们就要求，这是合法的斗争。新木马计描写了这两种斗争，比如《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做了新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帮助我们打宋江的那就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就是合法的，但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有一种斗争形式，只有合法斗争，没有非法斗争也不行，如社会民主党。单有非法斗争，没有合法斗争是“左”倾。列宁曾批评过“左派”幼稚病，要把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现在联合整个世界反对法西斯，这个阵线包括罗斯福、丘吉尔，还有我们中国的国民党，包括范围这样广大，苏德协定并没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还在英美，而苏德协定破裂的时候，英美苏协定便建立起来。英美苏合作不成功，因为张伯伦反对，要搞慕尼黑。张伯伦要联合希特勒打苏联，我们让他们打张伯伦，我们要和德国合作，因为他要联合德国打我们，德苏协定，德国和我们订条约。张伯伦到了胜利就变卦。实现公开化就是去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苏德战争，英美苏等国的联合，灵活得很，如果没有这样的策略，不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不行。有哪些组织形式呢？英美协约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军青年大会，有中国代表，有美国代表，这是组织形式。要灵活地运用各种组织形式

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门一条讲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的问题，要有最高的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是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变化了，我们联合国民党。人家进行反共高潮和我们斗争，我们只好斗争，等到形势能够转变的时候，我们立刻放弃斗争。阎锡山搞新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援助新军。当那时候我们能够搞好，我们便和他搞好。斗争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结，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只讲这一点，下次再讲。（鼓掌）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关于第六条、第七条还有些同志不大清楚，为什么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相混淆？为什么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相混淆？底下又说，为什么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冒险主义相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相混淆？关于这一点，这个原则性，他是说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的最高原则性，这是讲我们做群众工作，我们对基本群众，比如讲群众里面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要把落后的提到先进地位，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提到先进的党的水平，这就是最高的原则性和最高的觉悟性，但是不要离开群众，这里头不要有关门主义，所以讲不要与关门主义相混淆。如果讲原则性，比如拿党内来讲，经常有许多同志所谓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比如在中央苏区，有一个学校里头，就是关于吃辣椒的问题也开展斗争，把吃辣椒提高到原则高度，说不准吃辣椒，如果吃就没有原则，提高到原则的很高程度，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这哪里是原则性呢？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是乱用原则。这叫做原则？这个不叫原则，这叫做关门主义。这样只能搞一个不吃辣椒的党，那么吃辣椒的人都不能进来。所以有许多关门主义假借着原则性

他们的口号是原则性，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我们要善于区别，不要把原则性同关门主义相混淆。原则性是广大群众他们所适合的，广大群众今天不适合，将来也是适合的。比如前天讲破除迷信，这一点要破除，但今天广大群众信迷信立即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是不行的。我们怎样把广大群众的信迷信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这就要和广大群众接触，逐渐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工作。在这个陕北，你来破除迷信，你来提倡婚姻自由都要注意这一条。所谓原则性，我们要善于区别。有些人假借原则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是关门主义，那是实际上不要原则性。至于联系广大群众时又不要忘记了这个原则性，最高的原则性不要忘记了。如果忘记了，比如迷信的破除，今天老百姓是信迷信的，因此我们就不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一切信迷信的可进工会、农会。你讲在我们党内也有少数人信迷信，也有的，我们陕甘宁边区三万个党员，你说一个也不迷信吗？信迷信的还是有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赞成婚姻自由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能拿信不信迷信，拿赞成不赞成婚姻自由来作为检查党员的标准，要拿另外几条作为标准。我们跟群众最广泛地联系，但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不然就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叫做最广泛地联系但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最广泛地联系是一件事，做尾巴又是另一件事，因此我们讲最广泛地联系不能与做尾巴相混淆。我们讲最高原则并不是脱离群众，但我们要向着最高原则性走去。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绝不是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是一种东西，原则性是另一种东西。这是讲原则性和落后性，怎么把群众的落后性提高，但不是尾巴主义？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性绝不是关门主义。

至于第七条“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

性”，这是讲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已经讲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妥协。”列宁批评这个口号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但是当西欧的共产党提出那样的口号的时候，他们自命为“很革命”，自命为“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作任何妥协是革命性。但是他们是不是革命性呢？不是革命性，这是冒险主义，他们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觉悟是这样，他们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争，不看群众的觉悟程度，他们不作国会斗争，不利用其他的合法斗争，就是进攻，这就叫做冒险主义。这个时候要迂回，要妥协，列宁讲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时候，他说：在党的历史中曾经作过许多妥协，这一妥协要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这不是迁就行为，第二国际的行为才是迁就行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要和别的阶级、别的成分进行妥协，进行合作，甚至利用敌人。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沙皇的国会，这个国会是敌人的，不是同盟者，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这样规定：共产党员可以进去当议员，共产党可以以若干票当议员。这时候全国没有大革命，像这样的当然可以利用，如果不利用，这不是革命，实际上是冒险主义，是冒险的进攻。所以需要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比方讲这样的例子，苏联跟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是在去年六月以前的德国，曾经订过德苏协定。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在十年前就和资产阶级妥协过，在全世界上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甚至现在全世界共产党，除了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外统统同他们进行妥协的。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同地主，在我们边区是同地主。所以那样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它，至

于资产阶级那是不能的。现在我们不但同资产阶级合作，而且同地主合作，各个根据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祖国苏联都同他们进行妥协，这个妥协不同于迁就行为。这个妥协是迁就行为吗？这不叫迁就行为，这是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结合起来了。我们和他们进行妥协，是不是忘了革命，就一直妥协下去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这样想，这样希望，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妥协不忘革命，革命不忘妥协。（笑声）现在需要妥协，因为妥协有很大利益，而且要同全世界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妥协起来。比如波斯同苏联订条约，波斯的皇帝向苏联妥协了，但这不叫迁就行为，完全丧失立场。革命完全不管，比如张国焘就是这样，张国焘跑出去以后到了汉口，在《大公报》上落了宣言，发表他的意见（这个宣言现在还可以找到），他讲的妥协就是迁就行为，就是完全不要原则性，完全不要革命性，革命与妥协的关系他只要妥协不要革命；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那些冒险主义——九一八以后的冒险主义，在这里开会，你们清算了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冒险主义，他们是“左”倾机会主义，是清算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革命性？他们不是革命性是冒险主义。

这种冒险主义绝不能与革命性相混淆。革命中间的冒险主义，他们的这种冒险主义，他们自称为革命性，自称为是革命理论，自称为是革命的政策，所以有些人也觉得他也有革命理论，也有革命的政策，这是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的人，就糊里糊涂地无疑问地相信他这种宣传，以为这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

策。但是这不是你搞错了，这是冒险主义。我们讲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是和冒险主义相混淆，不可调和的革命性是一个东西，冒险主义又是一个东西，这是两个东西。斯大林讲了，在统一战线中右倾的东西可能增长，所以我们要防止那种借口最高限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变成了迁就行为。典型的是张国焘，口头上是灵活，实际上是迁就。斯大林讲了要我们注意，这是第六条、第七条的补充。

第八条："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他不怕批评，使他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第九条："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这两条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间有错误应该批评，这两条分开。在这里第十条的范围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所讲的那个似乎多少有些出入，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意思差不多。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把《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四条来看看。《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同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点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跟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第三条就是讲工人阶级统一，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应该是统一的，那些欺骗工人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是反革命政党，应该和他们斗争。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共产党，列宁式的党，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的共产党。工人阶级要清洗自己的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

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使工人阶级统一，还有就是使党统一起来。

第四条就是讲党的统一，我们就是讲党的一元化。

其次，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如果不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有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在反对党的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哈林分子反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而斯大林分析了这种东西，说应该粉碎，并且说：“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我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正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容许有缺乏信心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不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受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从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锋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洗出去。”（《联共（布）党史》四三三页第八行至第十五行）

这里讲了几种人，讲了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叛徒。比方机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那就是机会主义者。但是党除了

对机会主义者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叛徒，比如王实味、吴奚如。前天讲了吴奚如表面是共产党，实际上给国民党做事，这叫机会主义者嘛！王实味是个托派，他在这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这叫什么？这类叫叛徒。机会主义者就是在政治上，比方讲，这一次你们开了十一天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损害党，损害革命。这样的前方堡垒——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内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么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是什么呢？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堡垒中也有敌人，参谋部内也有敌人，结果捉了许多人，把□□同志、□□□同志也捉起来了，杀了二百四十个干部，几乎把领导人都杀了，把大批共产党员都杀了，□□、□□□也几乎杀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这叫三打祝家庄。一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二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三打祝家庄打进去了，为什么打了进去呢？小说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不但正面进攻打进去，而且那堡垒是从内部夺取的。新木马计告诉我们，要我们从内部夺取。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如此，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堡垒里面，我们党里，特别是我们领导机关，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危险性就是在最高领导机关，像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团、大代表团、小代表团等这样的权力机关里头有机会主义者。朱理治究竟是不是叛徒？现在要查，查出来是叛徒的话，就是以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叛徒的实质。我们同意一个同志的分析，同意张秀山同志的分析，张秀山同志讲得对，他说他的前途有三个：第一个前途，反对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二个前途，继续两面派；第三个前途，改正错误。这三种都有可能。这种分析我认为是很恰当的，这三种是讲现在，将来总有一条，要就是反党

闹事；要就是继续两面派，隐瞒党，欺骗党；要就是改正错误。至于这三种可能哪一种可能性大？现在难以分析，我看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允许他们在党内，使他们进步，这是我们的。但还有他们自己，要他们自己觉悟。如果他们自己觉悟了，可能走第三条路——改正错误，不然就是第一条或第二条。

《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讲什么呢？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到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这里讲到应该看到缺点，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不要骄傲，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要害怕，应该承认错误，不要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这些错误，要公开地承认，并且要诚恳地纠正，要公开地讲，不要关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讲一讲。既然认为是错误，就应该公开地纠正错误，公开地承认，诚恳地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就不能成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他就会是不可能战胜的。"

这里《联共（布）党史》告诉我们要在犯错误中间来教育自己，教育干部。如果隐瞒错误又怎样呢？这里讲了，第一，讲应该怎样；第二，讲如果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就会很好，这样党就是不能被战胜的，如果总隐瞒不纠正又怎么样呢？"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词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他就会必遭灭亡。"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不是路线问题，所谓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也不是什么叛徒、奸细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作中个别错误的问题。（这样的）这次这个会，过去十一天是清算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以后若干天还有讨论，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又反对闹独立性反对自由主义的错误，我们要讨论闹独立性的问题，自由主义错误的问题，我们要精兵简政，我们要整顿三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纠正自由主义的错误，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犯了独立性、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隐瞒错误的态度吗？不应该的。对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应该隐瞒这些事情吗？高干会是党的，西北局是党的一个组织，高干会是整个边区党的高级人员的会议，应该隐瞒自己的错误吗？如果隐瞒这个错误，如果隐瞒这个迫切的困难，精兵简政是不是迫切的困难？整顿三风是不是迫切的困难？如果百事大吉的虚夸来隐瞒自己的缺点，我们边区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事系统，民众团体中有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等，应该不应该用百事大吉的虚夸来隐瞒自己的缺点？不应该！应该承认错误，应该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人家对我们批评，我们自己也应该作批评。如果党开始骄傲起来，不看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纠正这些缺点，那么党就可能免于灭亡。所以这里讲的，党史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承认错误，应该看到错误，应该及时地公开地和诚恳地纠正错误。

第二，如果是这样地公开纠正错误，承认错误，那么党是不可战胜的。党史再告诉我们，我们党如果不是这样，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百事大吉，隐瞒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一味自高自

大。《联共（布）党史》讲到自高自大，在我们延安也有自高自大，不好！老子天下第一，不好！这里没有讲老子天下第一，你加上一句也差不多，这里讲自高自大要不得，把枕头枕得高高的睡觉，那就要灭亡。

我们讲，如果不纠正错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就要发展，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这个头也要亡掉，二百四十个干部的头亡掉了，□□、□□□的头几乎亡掉了，“刀下留情”恐怕党就不免灭亡。《联共（布）党史》在这里首先引了列宁下一段话：“政党对于本身错误所持的态度，就是表明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在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对于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考查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党，是不是认真办事的党，是不是在真正执行他的义务。这个党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义务，这就是讲要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这种错误是不是包括路线错误？我想也可以包括路线的错误。在一些时，以及不久以前的时候，党的领导机关犯路线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路线的错误。因路线的错误而一直走下去，像孟什维克路线、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后面没有做反革命的事，还是革命的时候，那是路线错误，但是不包括成为一种派别的继续的斗争，同党对立起来，以至于走到反革命，这是属于哪一条呢？这是属于第四条。我想这个也可以包括犯大的错误，也可以包括犯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至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个思想斗争是属于哪一条呢？是属于第五条的，《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告诉我们，要我们有这个区别，要把这第四条和第五条加以区

别。成为党内一种派别，小组织派别，继续他一贯的路线错误，这是属于第四条的。这些应该给以无情打击。在第三条里头引了列宁的话，他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极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对于第四条，要清除出去，要像割我们身上毒疮一样割掉；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至于第五条，就是一个教育态度，就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对于第三条、第四条，党外反革命的派别，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不能用的。因为小组，小派别，一贯地反党，那不能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对王实味、吴奚如也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这个不是的。他们可不可以觉悟呢？当然他们也可能觉悟。我们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写：对于反革命分子或者特务分子，我们给他回头，给他们活路。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当党员了？不能当党员。过去我们把这个东西，（现在已需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党内长期没有这个区别，没有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区别，把第四条和第五条混合起来。现在我们根据《联共（布）党史》结束语，要加以区别。假如真正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们想做好，现在我们能采取第五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之，没有希望了的，暗中采取两面派，继续第二条，第三条，继续破坏党的行为，像第四条中所列举的，像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等这样一些，没有问题？这些人后期当了敌人的侦探，而他们前期因为一贯错误路线，这些人应该用第四条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甚至还可以救药的，还有希望的，用第五条的态度。我想以后应该这样地分别第四条和第五条。我们的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分别，过去是没有这个分别的，长期在我们党内，对于

这两条是分不清的，差不多犯了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跟反革命没有区别，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

第八条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必须使党不害怕批评自我批评，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能根据自己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宽大政策，党内的宽大政策和党外的宽大政策不同，这两种宽大政策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内有宽大政策，对外也有宽大政策，但是这个宽大政策不同的，和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的宽大政策是不相同的。譬如像发展党员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员，那个上面说要大批发展共产党员，同时说不要使一个坏分子混进来，这叫做开门政策，大开门，但他同时又关了一扇门，对坏分子是关了门的。你说要宽大政策，是的，我们要大批吸收共产党员，革命的积极分子可以进来，但对于坏分子要关门，对于不是坏分子是革命的要开门。我们的施政纲领是对外的，对外要采取宽大政策。敌人分子，俘虏，特务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回心向善，不坚决做坏事，愿意改正错误的，应该采取宽大政策，这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对愿意改正错误的是宽大政策，但是没讲对任何反革命统统宽大，这样日本人也可以来开会，日本飞机可以降下来在这里添了油再飞上去，（笑声）这是不行的。中央的宽大政策——对党内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是不是像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这不行。我们的宽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宽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在各方面生长了自由主义，我们的党务工作有自由主义，

政权工作有自由主义，军队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有自由主义，锄奸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自由主义，以致我们一些部门，有相当多的人，眼睛看不清，像吴奚知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像王实味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吴奚如、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我们的党报上，我们的党报会发表不正确的文章。我们党报上的文章是不是统统都是革命的人写的？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呢？这是应该审查的。我们各部门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所谓宽大政策，麻痹了、误解了，解释不正确，而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很多问题不加解释，没有斗争，对于干部保持一团和气，有了斗争是不是原则性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呢？很多地方没有。说这是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像这样的执行，不是正确地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有些部门，有些干部没有严肃的态度，强调一方面，缺乏一方面。团结教育，强调了这方面，缺乏另一方面，批评，对错误的斗争。经常教育、斗争性这方面是缺乏的。如果缺乏这方面，这样的政策叫不叫干部政策？至少不能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错误的，是有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有了错误要斗争，要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第八条，也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

我们是不是完全执行了这第八条？我们是不是完全实现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教导的第五条？我们的干部政策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我们党内关系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拿斯大林讲

的十二条的第八条和党史的第五条来看，有许多部门，过去如中央研究院、鲁艺，从前的马列学院，那样的自由主义作风，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付马列主义，对付党。我昨天讲过这两个学校改造得很好。从前那种作风——延安许多机关学校的作风，那叫正确的关系吗？那叫正确的制度和干部政策吗？不能的。在那些严重的地方，完全是不正确的；在那些不十分严重的地方，是不十分正确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现错误，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承认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要“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办了没有？没有办。我们就有错误，我们就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

最近中央关于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有了一个解释，再过几天请博古同志印些单张，在会场上发一发，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反革命分子、奸细藏在我们党内，藏在党的环节中，我们不懂得，因此忽视了，好像不大要紧。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他们藏在共产党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些人也采取宽大政策吗？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党员是这样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王实味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开始在几个机关里审查，发现这样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座的同志都是高级领导同志，在各个机关里，领导部门里，要非常仔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分别这样的两种斗争：一个是第四条；一个是第五条。第四条是一贯反党的错误路线，后来一直走到反党的那样派别，那样的思想，要无情地打击，清刷除去；第五条

就是讲犯错误，共产党员犯错误，有大的，有小的，要自我批评，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应该区别这两种。当前整顿三风的时期，也正是有这两种：一种是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拿中央研究院来讲，一百二十多个人，反革命的只有几个人，那么他们一百一十多个着重自我批评，着重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对五人反党集团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我们现在有两种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没有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反对就查不出来，最近两个月，大家学习，整风，发现了这两种斗争，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个是少数，一个是多数，少数是领导人，多数是群众，多数人要和少数人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们整顿三风也只有少数的领导和多数的群众相配合，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两个斗争要少数和多数的配合，一定要有少数人的领导，但只有少数人是不行的。

怎样使我们党完全统一，达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们的心成为一条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你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怎样像法？人有男的女的，不一样，老头子和十七八岁的娃娃不一样，高的矮的不一样，我们是讲我们的心一样，不是讲别的一样。我们要一条心，但我们党内有一种人只有半条心，（笑声）完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是一条心，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它，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半条心，他要革命，但有许多东西是妨碍革命的。再有一种人是两条心，就是王实味、吴奚如。朱理治到底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这是路线的不同，郭洪涛和朱理治他们是两条心，□□、□□□他们是一条心，这两种人是两条路线的

不同。那么吴奚如、王实味他们也是两条心，他们不但是两条路线的不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在革命队伍中有路线的不同，这是两条心；革命与反革命也是两条心，路线不同实际上是反革命，但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犯错误，假如朱理治不是反革命故意混进党内，那么是共产党员犯了错误。现在我们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路线不对就是要把路线的错误克服。是反革命，革命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要把半条心用教育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过来。陕甘宁边区没有半条心？闹独立性是一条心还是半条心？闹得轻的就是半条心，闹得重的就是两条心，张国焘他闹得重了，就是两条心，在边区大体上说还是半条心。现在党、政、军、民、学，有闹独立性的不是一条心，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步伐整齐。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下关于批评错误的提法。这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有没有这样的同志呢？有。这样的同志不止一二个，有相当的一部分，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抹杀成绩，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本来有成绩，为什么要抹杀呢？但是问题要看怎样的提法。王实味他有一个提法，我们又有一个提法。王实味他是不讲成绩的，抹杀成绩，只暴露黑暗，他是反革命的，他要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自我批评，现在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作证明，我在党校二月一号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我们全党成绩的问题，这个报告一共有一万多字，二月八号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有一万多言，两个文章合起来有两万多字，但是讲成绩的只有一百多字。那么，是不是我把成绩抹杀了呢？我没有抹杀，这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我们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和人民一道，在领导人民，向民族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成绩，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我在这里讲的只有一百多个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百零一个少一个，（笑声）那就对不起。（此段是按照《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排印，字数比原稿略有减少）

关于我们全党的成绩，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二十一年全党的成绩，我只讲了这一百个字，全文有多少字呢？全文共有二万多字。但是讲成绩我只讲到这一百个字。那么是不是可以讲我抹杀成绩了呢？我不能这样讲，我这里并没有抹杀。我们的成绩只有一百个字，其他都是讲缺点和我们的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假如还要多讲的话，还可以讲一点，扯它一长篇，要这样做是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是我们现在是做的什么呢？我们做的是自我批评，不是吹成绩，我们只有这样一句话：“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谁敢驳我们说，现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完全是占统治地位呢？我讲不是占统治地位，这个是上了书的。（笑声）关于理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高了些”。再下面讲的就是我们的理论还是不够。你说我统统都讲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吗？和过去一样吗？我没有这样讲，我讲的是比较过去高了些。如果再要多讲的话，也还可以扯它一长篇，但是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呢？我们是要把缺点指出，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就差不多了。（笑声）

关于知识分子，我们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骄傲自大，脱离实际。关于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唉呀！那么我们革命知识分子

就了不起！再下面都是讲知识分子的缺点。关于中央“九一”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怎样估计我们党的成绩呢？我们的统一，我们的团结，估计了没有呢？我们估计了，就是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团结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这有什么证据呢？这是有证据的。假如没有统一、团结，乱七八糟的话，那么抗战怎么能打了这么久呢？所以关于自我批评的提法，据我所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懂得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怕抹杀他的成绩，在会议上非要摆成绩不可，那么我们可以雇上一个人，吃饱了饭，一天到晚地说：成绩，成绩，成绩！成绩！……（笑声）这样地讲上一个钟头。如果还不嫌少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讲，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开的是什么会？如果是驳王实味，那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否认成绩，我们就摆一大堆成绩给他看，他否认成绩，我们就是要成绩。我们有一百个字和这七十个字是讲好的，我们不否认成绩。我们的目的就是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成绩，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还有毛病，闹独立性，还有自由主义，这有其他一些具体的毛病，因此，有那三两句话来讲成绩就差不多了。再下面就是分析缺点和错误。列宁曾经说过：要我们“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产生错误的条件，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东西，他们不愿意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意分析错误的原因，不愿意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条件，他们过去不愿意这样，也不会这样搞的。

现在讲第九条：第九条讲什么呢？“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

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

这一条斯大林已作为布尔什维克一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才能是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条就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条讲什么事情呢？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意思呢？这条很值得我们注意，而且过去我们对这条很有收获。但在许多地方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完全不懂得这条，这一条的重要性他们完全不懂。这里形成领导核心的问题，有中央领导核心，有地方领导核心。中央的领导核心是经过大会选举出来的。斯大林告诉我们，在我们中央领导机关建立的时候要注意地方领导核心，机关、学校、团体的领导核心要不要呢？也要的。没有领导核心，事情办不好。现在我们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团体中不注意，完全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很不够。这就是讲如果没有领导核心，真正要办好那里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学校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团体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比如说文化团体，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把文化工作搞好，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青年工作亦是一样。边区应该有一个领导核心。过去在边区工作的同志，相当多的人不懂这一条，似乎不要领导核心可以，似乎我自己就是一个领导核心。（笑）

他觉得，他是一个领导核心，他亦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我也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这样就是三个领导核心了。（大笑）因为各人都以自己为核心，那么就是有了好多核心了，但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领导的一元化，还是两元化，三元化？什么叫闹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多元论，个人自以为是领导核心，（笑）你要附属于我，我是核心，（笑）你们都是我的附属品我便舒服了，这不是实事求是。“九

一”决定便讲这个问题。“九一”决定这里有两种领导核心。边区已经开始实行了，以西北局为领导核心，所有党、政、军、民、学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西北局，但是要集中在西北局，不能各人搞一样，在一个床上睡觉，做的梦各不相同，在关中、三边、直属县，陇东、绥德，要建立五个领导核心。别的根据地也是一样，建立两种领导核心。关中党、政、军、民、学没有一个集中领导机关，怎样进行斗争呢？怎样搞经济，怎样搞财政，怎样搞干部教育，怎样和特务作斗争呢？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只有统一才好进行斗争，才便于和敌人斗争。在机关学校中，还有好多同志，不运用这一条。现在中央研究院很好了，过去那种状态好不好？不好！过去那种状态，一百二十个人，像一百二十块砖头，在这里没有分别，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那时，王实味他们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即五人反党集团。我们共产党没有形成这样的领导核心。王实味利用整风，墙报一出来，那时便是王实味的天下了，许多人被拉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有讨论，他们有汇报，他们有研究。你文章不会做，我王实味写一篇，用你的名字。他们用多种策略、汇报制度、研究政策研究如何斗争，你写的文章我怎样驳都研究一下。他们有领导核心，但我们没有，所以在前一时期，我们打了败仗。尔后，我们便集合部队，批评我们的缺点，好多已经跑到王实味那边去了的人，由于我们的部队开会检讨了一番，又一个一个地回来了，反过来打王实味了。（笑）中央研究院最近大半年是很可以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现在形成了领导核心，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随便搞三四五六块砖，便成为领导核心呢？在一百二十块砖中，随便找几块出来，便是机械的凑合，不是有机的配合，这样是不行的。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出群众的领导分子，积极的活动的最先进的分子。

现在中央研究院不同了，不仅一百二十人觉悟了，特别有几个人，他们会鉴别王实味、李实味，他们有办法，他们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干部，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干部。但是现在有的机关、学校，没有注意这一条。平均主义，大家都是干部，不是在同志中，在干部中，依照干部的实际来分析。天天讲分析，自己不作分析。假如分析，总是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只要上了一百个人，便有这样的情况。这次分析边区三万党员，有多少积极的，多少中间的不是很坏的，多少很坏的？我们作了任务。讲党内政策，对于积极分子要团结，在积极分子里，要由一少部分人组成为领导核心。另外还有许多积极分子，仍可吸收他们中有威信有办法的。通过他们去教育很多人，教育不很积极又不很坏的，教育他们联系群众，你也联系一个群众，他也联系一个群众，（笑）这就联系了广大群众，于是乎，大家进步，对少数落后分子进行教育。领导核心自己要教育自己，要进步。很多人进步了，少数落后分子也落后不起来，也不大像样子了。你们联系群众我看就不大像样子。反革命王实味，现在住在窑洞里怕得很，过去王实味谁也去看他，你的《野百合花》写得好呀！（笑）现在是臭狗屎了。我们的鲁艺、延大、党校、解放日报社、军事学院，哪一个部门，哪一个机关，哪一个地方，都要依照这个办法。这是斯大林同志讲的第九条，搞个领导核心。

这个领导核心，究竟有什么条件呢？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家讲是十分忠诚，不是九分，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这里讲的主要是全国全党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学

校，每一个机关要十分忠诚。人家说要十分忠诚，你只有九分忠诚，那这个领导核心就建立不起来，就不合斯大林的条件？那也不是的。那也要按照你的情形，要把一百二十个人中间，最积极、最原则的分子团结起来。

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什么叫做忠诚？斯大林同志讲：所谓十分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十分有经验，是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简单地讲就是这样。原文是这样："这些优秀分子是十分忠实的，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并且他们是十分有经验的，足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领袖，善于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领袖。"他的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的经验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领导阶级斗争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所以他底下讲，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阶级的代表，不是说个人的代表，小集团的代表；来一个宗派主义好不好？来一个派别代表、个人代表、个人野心家好不好？那可不行。斯大林说，这可不行，而是要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阶级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所办的事，是不是真正的"代表"？"真正的"三个字不要，"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那几个字也不要，他是朱理治、郭洪涛的代表，是一部分人的小集团的野心家，或者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个人的代表，代表他自己。闹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到底代表谁呢？代表无产阶级吧！但无产阶级已经讲好啦！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斯大林，（笑声）他在第一条中就讲好了，我们是不要独立性的。而他们呢？又要闹独立性，你们就不能代表，没有资格，资格取消了。这样，领导核心的人，第一条是忠诚，第二条是有经验；忠诚足以成为阶级的代表，不是小集团、个人野心家，闹独立性。在今天，他们足以对付

王实味，足以教育同志。比方在一个学校里，善于拿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善于拿革命去克服反革命。在各县的同志又善于做别的一些事，要善于财政经济，善于征收救国公粮，还善于一些别的事，要做这样的领导核心。

第十条："必须使得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致性。"

这一条，上面已经讲过了。他指示要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怎样叫做改善？比方说我们边区有三万党员，要洗刷一部分，现在听说有三千个党棍、极坏的分子。其他的要教育，那么现在在边区三万党员中，清洗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党棍是不是叫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叫做。在延安也清洗了一部分。比方讲，如果把王实味这一套包括在内，要洗刷的还有与王实味不同的，没有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的，就是那些很坏的，完全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他们。要经常清洗，要经常吸收。现在边区就有许多在党外的比在党内的还好，党员比他们差。要把那些好的吸收进来，要把那些差的清洗出去，这样叫做经常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我想这一条在边区党可以做，在延安完全可以实行。

第十一条："必须使得党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要制定这样一种纪律。这样一条，不但在别的条件上区别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这一条上也区别于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要这种纪律，不要这种铁的纪律。消极的自由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在边区存在着，在延安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是破坏党的纪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没有纪律，闹独立性，小广播，讲价钱，调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议案，讲了不做，见了坏分子不批评，见了不好的思想不作斗

争。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那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就不能创立起来了。斯大林是要我们创立铁的纪律，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能不能使这种铁的纪律创立起来呢？是不能的。底下讲到，这样的纪律，建立这样铁的纪律，要有什么条件，斯大林严正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之目的之明确性。"要整顿三风，要开高干会，是基于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的之明确性。运动目标是要明确，我们边区的党还有不明确的，"要打出去"。但现在我们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团结抗战，一部分人想打出去，就跟这个运动的目标相反。整顿三风也算是一个目标，整顿三风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个是要克服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目标要搞明确，如果不搞明确，如在整顿三风开始时有些同志不明确，认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整一部分人，而我是不在内的，是整某一部分人，不是整所有的人。后来把这个目标讲清楚了，整顿三风是整顿全党，拿边区来说，拿延安来说，我们党主要是干部，所以我们干部要参加这个整顿三风的运动。不认识字的要听讲，认识字的要学文件；这时整顿三风的目标明确了，因而现在有了大的发展，在延安有中央研究院、鲁艺、延大、自然科学院以及各部门，各机关，中央各部门，军委各系统，那些部门都统统要进行整顿三风，同时学习检查工作，每人有份，整顿每个人，那时目标就明确了，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纪律来。有些人躲风，我有病了！哎呀！肚子痛！要门诊部给我看病，出去门诊，却不看病，而到山上去打扑克，（笑声）这样就躲了风，没有整了，这样有没有纪律？这样就没有纪律。现在有不少人躲风，现在整风一来，他的歪风就躲了，于是就找门诊部，哎呀！肚子痛！各种办法都来了，这时要实行纪律。运动目标明确了，少数人的纪律就好执行。如果运

动目标大家都不明确，那就没有法子整风。

精兵简政也算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要明确它是实行在困难时期，我们的政府、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太多，要精简。我们的干部有很多缺点，如官僚主义等。有这样情形，所以我们定了几项，要精兵简政，官僚主义要打倒，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要简政，要精兵简政，人要减少，因此一定要统一思想，不要闹独立性，要使每个机关、每个工作人员能发挥很大效能，不要马马虎虎，要节约，现在是困难，要反对官僚主义。这样一来，把精兵简政这个目标就明确了，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明确了。全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唯一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法西斯阵线。这问题，在前年参议会上讲过，这样的目标我们经常提出。参议会为了什么？是什么目标？没有别的，专门为了打倒日本，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任何别的目标。现在我们当前的运动，这样明确的目标，可是虽然这样讲，又发了“七七”宣言，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志，他们还不懂得，所以我们还要研究，这次会议还要讲的，要使运动的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思想统一，运动的目标统一明确，实际行动要统一，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什么地方看出思想统一与运动目标明确呢？要看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统一，就证明你的思想统一。

运动的目标要看清楚，还有党内广大群众，对党的任务要自觉。这个担子我不愿担，勉勉强强地担负起，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纪律就建立不起来。许多党员对于党所提出的任务，他还不懂得，完全是被动的，你要我担我就不担，没有自觉性。要使党内广大群众懂得党所提出的任务。党的任务是抗日的任务，团结的任

务，我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任务，要精兵简政，要整顿三风，大的小的这些任务，每个任务要党员去做的时候，要使党员清楚，要他有自觉性，要使他真正了解。现在我们边区有三万多党员，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党员，对他们的任务还不明确。比如讲征收救国公粮，过去曾经发生过许多毛病。由于党员对于这个任务不自觉，党员对于征收救国公粮的这个任务不自觉。有那么一些党员，在征收救国公粮时发生了毛病，就不能执行纪律。

斯大林讲，纪律的基础是基于什么？斯大林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的目的之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及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之自觉态度而成长起来的。"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纪律。纪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搞纪律我们就搞纪律，不是这样的。因此这样纪律就搞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样的教条是不是可以建立？也不可以！马、恩、列、斯指导我们一个方向，纪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好办了，纪律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现成的东西，我们有工作做，纪律就有了，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要有自觉的态度。现在我们自觉的态度与作风很多党员是不够的，那么我们铁的纪律怎样？不够！那么布尔什维克化，化得怎样？化得不够。不要以为我们党一化就化得很好，如果化得很好，还有什么事做？没有化得好。我来讲这十二条，我向同志们说明。就是要同志们懂得，我们现在的毛病很多，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的党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党要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化得彻底，现在还没有那样地好。拿纪律一条来讲，好容易一个纪律，思想统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党内广大

党员群众对于任务要有自觉性，做到了这些，就有铁的纪律，就是像钢，做不到这些，某些地方像豆腐，某些地方像水一样，离铁就很远，那么铁的纪律就没有。

第十二条："必须使得党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之执行，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党的信任。"

要检查决议案的执行，看怎样行的，一个是决，一个是行。决而不行就要检查，决而行，决而不行，决而行了一半，那有什么办法知道？就是检查，如果不然，那么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对党的信任。

搞了一个决议案又不执行，搞了一个土地政策，我们就要执行，我们决定了要行，要在陕甘宁边区行，陕甘宁边区要按照具体情形，还要决一下，中央决一下，他们还要决一下，所以现在边区还要搞一个土地政策、减租减息缴租缴息决定，这很多决定，还是一个决，还是不行，什么时候行？就要在乡下行，现在有多少村多少乡？要在乡下村子里办到减租减息，缴租缴息，那叫做行。怎么晓得行？要检查！这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话。

所以这十二条，斯大林讲："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化便是空想。"

如果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化，化得了化不了？化不了！那就困难，斯大林把检查工作放在最后一条，就是告诉我们要经常检查工作。

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大会也算一次检查，首先是作了历史的检查，再还要讨论许多的问题，你们下去实

行去，做了将来还要检查。

这是十二条，比较明显扼要！这一共大概一千多字，在所有的文件里头，恐怕是最短的一个文件，有一千四五百字。只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们整个党一切重要的原则问题都提到了。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经验的总结，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年了。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些文件，不但总结了中国二十一年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经验。这个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九二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对于我们中国党是完全适合的。将来，有党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斯大林写的文章又不是马克思写的文章，怎么叫一百年？没有一百年的经验，斯大林是写不出来？马克思就写不了这样具体。在马克思那时候，不能写得这样具体？能不能写出这十二条呢？很难？没有这些经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三、四、五条，没有后来的经验，就很难写，就是第二条，他写得那样具体，那样明确，不但可以而且一定要以新的结论，这种思想，马克思早已有了。马克思他自己讲他的东西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总结这一百年的经验，才能写出。那些个结论原则是被新的结论原则代替了，列宁的那一条去代替了马克思的那一条，以前能不能写？没有经验怎么能写出！这是告诉了我们以后怎样做，写得这样具体了！

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革命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一条。我们有“九一”决定，我们有党的统一领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讲：“不要闹独立性。”这一次高干会，又整顿各组织间关系，叫作

整顿关系，这是我们对于第一条这样的实行。

第二条：我们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要联系实际，不脱离实际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相当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二条。第二条就讲得很详细，在这里他只讲一两句话。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在这里，讲到教育政策时，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他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条式的，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我们也讲过这个东西，六中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至于其他的就不讲了。这是如何精通马列主义的问题。

第三条：就是我们的口号、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再照顾国际的经验。这我们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根据公式，那种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比来制定口号、政策。而要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地调查分析，来制定口号、政策。

关于第三条、第四条是讲方法的问题，制定口号、指示的方法论如何指示，如何检查。第三条制定，第四条就是证明。证明这个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要在实际中间，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证明。这是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关于要有新的革命作风，使群众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革命化。我们有“宣传指南”，就不要搞教条式的，采取革命的步骤使得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跟“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们说反对党八股，我们还有一个“四三”决定，在“四三”决定上有许多步骤，“四三”决定上讲的，在各机关、学校已经实行了，在中央研究院实行的有很大成

绩；在开始，有的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场，而现在这些同志逐渐转过来了，站在我们这方面了；后来使反革命分子统统孤立，使过去不觉悟的分子也没受到损失；这一次搞好了，有很好的经验，在前两个星期，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央研究院总结六、七月的学习，那个东西很可以看，那个东西不是党八股，那是按照实际的过程写出来的。

第六条：讲群众工作，讲群众工作中的原则性同群众的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们要讲原则，就是这个原则性跟广大群众不要脱离，即不要关门主义，讲原则不是关门主义，讲接近（联系）群众不是尾巴主义。这个中央以前有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六条，即是最后一条，专门讲党与群众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边区，比如像在绥德、陇东那些区，怎样使我们又能坚持原则性，高度的原则性，但是又不要变成关门主义。要跟群众密切地接近，又不是跟着落后群众的尾巴走，而且把他提高一步。怎样实行？我们有经验。

第七条：不要冒险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是讲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讲统一战线中的问题。这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有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文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摩擦中，在反“反共”高潮中，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有许多斗争经验。我们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关系，对于土地关系的处理，对于劳资关系的处理，我们的锄奸政策等等各种政策，我们的施政纲领，这些东西，都是跟斯大林讲的这一条，是一类的性质。不要冒险主义，但也不要迁就行为。冒险主义不等于高度的革命性，不可调和的革命性。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绝不是尾巴主义。而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

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的时期，关于国共合作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中期，抗战的初期，关于最近二三年，关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锄奸政策审查一下，在有些同志他所想象的宽大政策，在这个会中间，小组讨论中间，有许多同志不满意，我们应该杀的不杀，应该捉的不捉，土匪闹到那样程度，还要宽大政策，斯大林的十二条中是没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窑堡、延安附近，还要讲宽大政策?！他那种宽大政策是从哪里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在到处叫，你还在说施政纲领的宽大政策?！施政施纲的宽大政策那么好！这样一来，日本的飞机也来加油，你还要宽大，你说可以吗？就讲这样的政策？就是检查这样的问题。

第八条：要讲自我批评，要改正错误。就有列宁、斯大林论自我批评。二十个文件中有的，这里引列宁论自我批评，有《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有“四三”决定，“四三”决定中告诉我们怎么作自我批评，有这样一些问题，有《反对自由主义》，有《反对党内几种不良倾向》。这样一些文件，都是关于第八条的。我们所办的，我们所实行的这些文件，过去的不讲，讲现在的，我们的整顿三风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的所谓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要搞清楚，糊里糊涂的团结，缺乏原则性的团结，团结得了团结不了呢？团结不了的。这样党内的宽大政策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宽大政策？缺乏批评性的，缺乏斗争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第九条：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中有四个干部标准，这四个标准也可以说是干部的四个条件（无限忠诚、联系群众、有

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第一条要忠诚。刚才讲的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九条中讲的二条：一个是忠诚，一个是经验。这两条在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中有，斯大林时是第一条，季米特洛夫的也是第一条，这个忠诚要经过考验，你自己讲那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证明了的。第二条要跟群众联系，密切地联系，要有证据，你说你跟群众联系了，我说我跟群众联系了，那个不行，要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要群众觉得你行。他不觉得你是他的领袖，那就不行，那不是季米特洛夫讲的要使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现在有那么一部分人，跟群众没有联系，而自称为领袖，站在领袖的职位上，自称为群众的领袖，而实际上，群众并不承认他是领袖。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陕北，自以为也是领袖，而群众不承认他们是领袖。……群众、老百姓不证明、不了解你，他决不承认你是他的领袖的。所谓联系群众，什么标准呢？就是群众赞成你。所以有些同志出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和他讲，开头不要夸夸其谈大讲一顿，你不跟群众、干部联系，就没有办法知道群众与干部的情形。你讲的话一定会错，不是二定会错，(笑)这是一定的，你没有联系，没有工作，干部就不认识你，你怎么工作呢？如果在这里不夸夸其谈，只有跟干部联系，眼睛多看一些，耳多听一些，然后再讲，那么，夸夸其谈一定会少了，人家就信任，不然人家戴上耳套、戴上眼镜来听、来看，你讲的不大切合实际，人家相信不相信呢？有原则一条——不相信你，你讲得不像，吃了小米饭来听你那个“不像”。因此，这样的同志，站在领导地位就要很好地注意。

季米特洛夫讲的干部四个标准的第三条，是讲独立工作能力，斯大林的两个标准讲了。他讲的两个标准：一条是忠诚，是足以成

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一条就是要有经验，足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季米特洛夫讲的第三个标准就是讲的这个，要我们鉴别干部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问题。第四条就是联系群众。

所以这个第九条，要形成领导核心，我们党要有领导核心，不要是平均主义，中央、地方、西北局以及各个警备区、我们的学校、机关，我们现在把这些发展起来，扩大起来，都要做领导的骨干，领导的核心，这些骨干分子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有两个条件，因为他在这样短的文章内，不能把所有的条件列举出来，我们照季米特洛夫讲的有四个条件：领导骨干要十分忠诚，经过考验；同群众联系，使群众承认你同他们有联系；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要守纪律。所以关于第九条，我们可以参照季米特洛夫给干部的四个标准。这里，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对干部、党员平均主义的一种看法，没有分析，没有积极分子同坏分子的区别，这也是不对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对，搞领导骨干就要进行教育，对不好的倾向，就要进行斗争。

第十条：就是讲“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这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这个结束语的第四条与第十条相关，虽然内容不同，但大体相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巩固党必须要清洗坏分子，经常地改善党的组织，那么党的组织应该是什么人呢？应该有个标准，怎么样做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中央有巩固党的决定，《联共（布）党史》第四条讲了这个问题。对坏人要怎么样同他斗争，要把他清洗出去。

第十一条：就是讲纪律，要建立纪律，革命的党没有纪律不

成。斯大林讲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统一性，党员的自觉性，这样就生长起来了纪律。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我们选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二十二个文件之内。

第十二条：最后一条是讲检查。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马克思那时候讲是没有可能的。在马克思那个时候没有可能讲民主与检查那样的文章。比如，什么是检查？在这次边区高干会议以及你们回去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的人。……现在延安各机关也要检查，延安有的机关现在已经检查了，整顿三风有部分的检查，跟着有大的检查，要哪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者去检查，在“四三”决定上面讲了这个问题。

所以，关于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我想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因为它的字很少，只有一千五百字。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这就是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我们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条都能使用。可是有些情况，像社会民主党，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条，使用这一条。如果我们这样做下去，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说我们会比现在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呢？要向那个方向去化他一步一步？我们在今年这一年，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在边区高干会是要化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化”，我们是要自觉的，我们要很清楚，我来讲这个十二条，斯大林也讲了，而且是在多年前讲的，在一九二五年就是这样讲的。而这十二条，对我们恰好是适用的，我们要自觉地去做这工作。

我们对马列主义要学习，前天我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干部要

有计划地读书，读三四十本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读则已，一读就读通了，就可以读进去。（笑）“马列主义呀！我们是土包子，我们怎能读得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读马列主义呢？你们是讥笑我吧！”而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读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读通。像外面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读了，也只是书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读通，一读就容易读懂。这次整顿三风的文件，就是一部经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一共二十五个文件，全部只有十二万九千字，不到十三万字，我们读八个月，这样读下去。在这里，分两种人，一种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一种是知识分子。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就容易读懂，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就要钻牛角尖。比如：为什么叫“四三”决定？为什么不叫“四二”决定？（笑）又，什么是精神实质？又是精神又是实质，你讲给我听听。他们钻得不得了，搞不清楚。这些同志，要他们先读，然后再让他们到工作中去，然后过了一二年，再叫他读，那就有味道了。所以读马列主义，精通这本书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一读就有效力。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没有工作经验，他们过去大概读过几本书，他到这里就大摇大摆地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笑）写了文章也是一二万字。他的列宁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他的列宁主义一定不是苏联的。哪个列宁主义这次会证明了的，他的列宁是哪国的列宁呢？是他的列宁。这就等于没有读书，如真读几本书，也就没有那个。我们有工作经验的同志，读了，是不是像他们那样呢？一定不会的。我们读几本马、恩、列、斯的书，就够了。我们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会这样的。我们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得更加好。因为马、恩、列、斯都是很好

的人，他们不是像朱理治那样的人，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也没有看见过，认识是在照片上看见过。那个是不相同的，样子也不相同，那个真是革命的圣人，他们是精通得很，他们的态度也是好得很，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我们很接近，不是和我们离得很远，他们很好，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愈要同群众接近，如果不接近群众，那就是与群众离得很远，那就是愈读得多，就越是没有读进去。列宁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根本搞错了，那是反对了列宁，反对了马、恩、列、斯。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党一定会搞得好，要布尔什维克化，一定会化的，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整顿三风，高干会，精兵简政……这些同志们做下去，要有信心搞下去，一定会搞好，一定会更进一步地布尔什维克化。要我们全党，我们实际工作的同志能够这样去做，慢慢地来，一年搞一本，搞三四十年就可以搞三四十本。有些人是走马观花，一走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要仔仔细细地看。（笑）今天是要下马看花，要慢慢地看，我们读他三四十本书，一年读一本要三四十年，今年已经六七十岁了，还能读几本书？我们要读三四十本书，有的一星期可以读他一二本，甚至几本，比如像党校，我们规定党校，计划八个月读三四十本书，我们有一个大概，把三四十本书看一下，将来做工作，一二年以后再翻一翻。如果说早把字典所有的字完全读了，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把字典所有的字都读了，这样的人，在全天下都难找。连马克思在内，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地来。我们的工农干部、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完全可以这样，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讲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鼓掌）



《毛泽东在抗日年代》（中国画）

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1]的信

（1942年11月23日）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2]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

[1] 欧阳山尊（1914—2009），湖南浏阳人。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朱丹（1913—1978），后改名朱丹西，北京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成荫（1917—1984），上海松江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2] 指成荫等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1942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过这些剧。

为杨松题写挽词[1]

（1942年11月25日）

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1] 1942年11月23日，曾任《解放时报》总编辑的杨松在延安逝世，年仅35岁。杨松去世后，毛泽东亲笔为其题写挽词。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

（1942年11月29日）

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具同感。如宣言称："最后胜利达成以前，必须经过最艰苦最猛烈之大决战，方能消灭敌寇，永绝祸根，守定自力更生之要义，作最艰苦之打算"，"吾人今日尤应尽忠尽勇急起直追，集中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全力于战斗"。"对外必须互助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并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这些都是很对的，由此足证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十中全会这一表示，实足庆幸。抗战以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即始终站在祖国战争的最前线，虽孤悬敌后，饷械弹药，异常缺乏，饥寒交迫，困难百分，犹始终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坚持阵地，未尝后退一步。蒋委员长曾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共产党员及敌后人民，本此训示，组成游击队，与主力军配合一致，抗拒敌军，用能坚持五年有半，至今尤屹若长城，抗击敌军十五个师团，占在华敌军之半数，其所以能够如此，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其在各抗日根据地之设施，悉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蒋委员长之抗战纲领，暨国民政府之各种基本法令，参照地方实际，定出许多具体办法，致使民情悦服，协助抗战，达成长期支

持之目的。本党曾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其中列举如下四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凡此所陈，五年以来，吾人未敢稍有逾越，并且不但在抗战期间吾人是竭力遵行的，而且准备在抗战完结之后继续遵行。凡此均所以求得与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达到精诚团结，完成抗战建国之时代使命。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中所列各项，与中共上述宣言所列四端，其基本精神，亦并无歧异之处。至对待共产党之态度，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在标举各项要求之后，宣称：“政府当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此种表示，实为吾人多年以来之竭诚要求，今获此种明确之宣告，庆幸尤深。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深望中国国民党人士谅解吾人此种为国为民之诚意，达到进一步之合作，则敌寇虽强，终当被我驱除出境，一个强盛独立之中华民国，是不久就可以建设成功的。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1942年11月29日）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1]，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

[1] 共赴国难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1937年7月4日。7月15日，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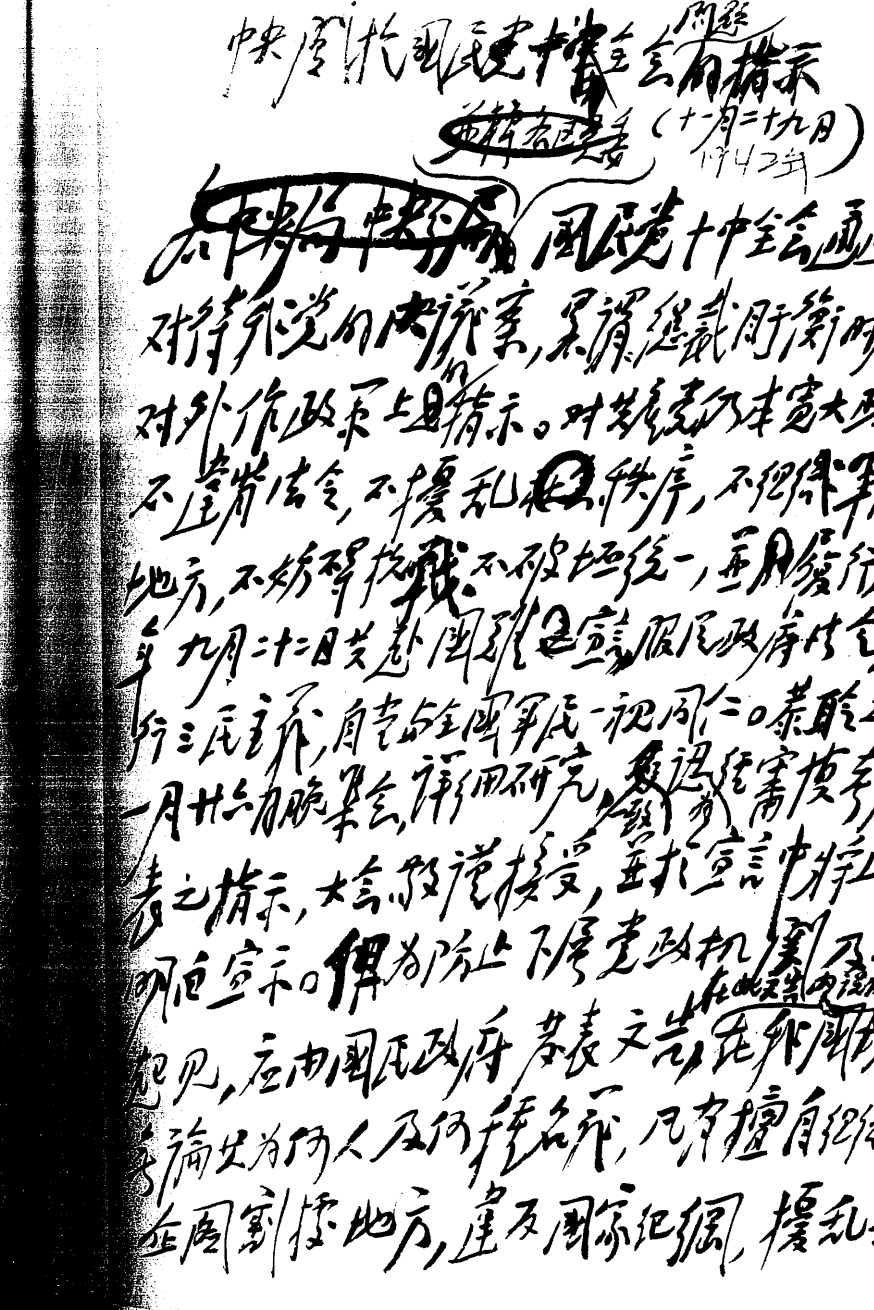
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〇年一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解放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二十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一九三七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三十一个师，我党担负了十五个师）。再则，自从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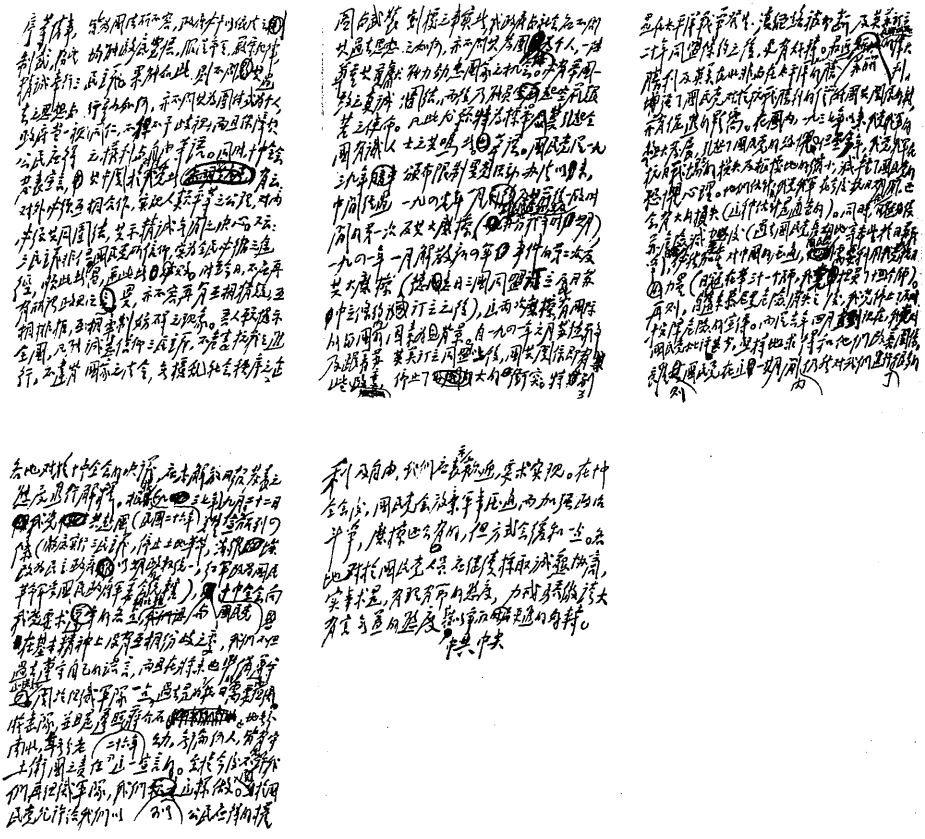
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四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六百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一九四〇年与一九四一年两次反共大磨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

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四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纷〈分〉歧之处，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致李先念等电[1]

（1942年11月30日）

你们干部缺乏，因交通阻绝，无法派来。抗战趋势，全军将大幅减小，你处亦应准备在明年秋冬及后年春夏缩小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时量小质精，干部就够用了。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李先念并告陈毅、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给蒋介石的信

（1942年1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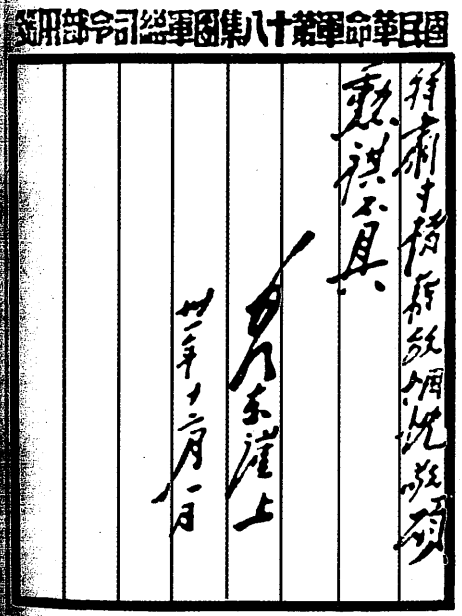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电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请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未及兴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敬颂

勋祺不具

毛泽东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致蒋介石信的手稿。

给南汉宸的信[1]

（1942年12月8日）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 这是毛泽东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致南汉宸信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林彪电[1]

（1942年12月11日）

徐海东同志卧病皖东三年未愈，现敌“扫荡”形势恶劣，不便休养，拟经大别山送大后方调治。请与蒋交涉，可否速告。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给南汉宸[1]的信

（1942年12月13日）

汉宸同志：

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2]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3]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夜

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

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

[1]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2] 指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3] 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复周恩来、林彪电[1]

（1942年12月18日）

（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

（1942年12月20日）

汉宸同志：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夜

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1]

---

[1] 指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中，采用了南汉宸此前写的报告中关于被服问题的内容。

给续范亭的复信[1]

（1942年12月25日）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

[1] 这是毛泽东复续范亭信的主要内容。

为柯棣华题写挽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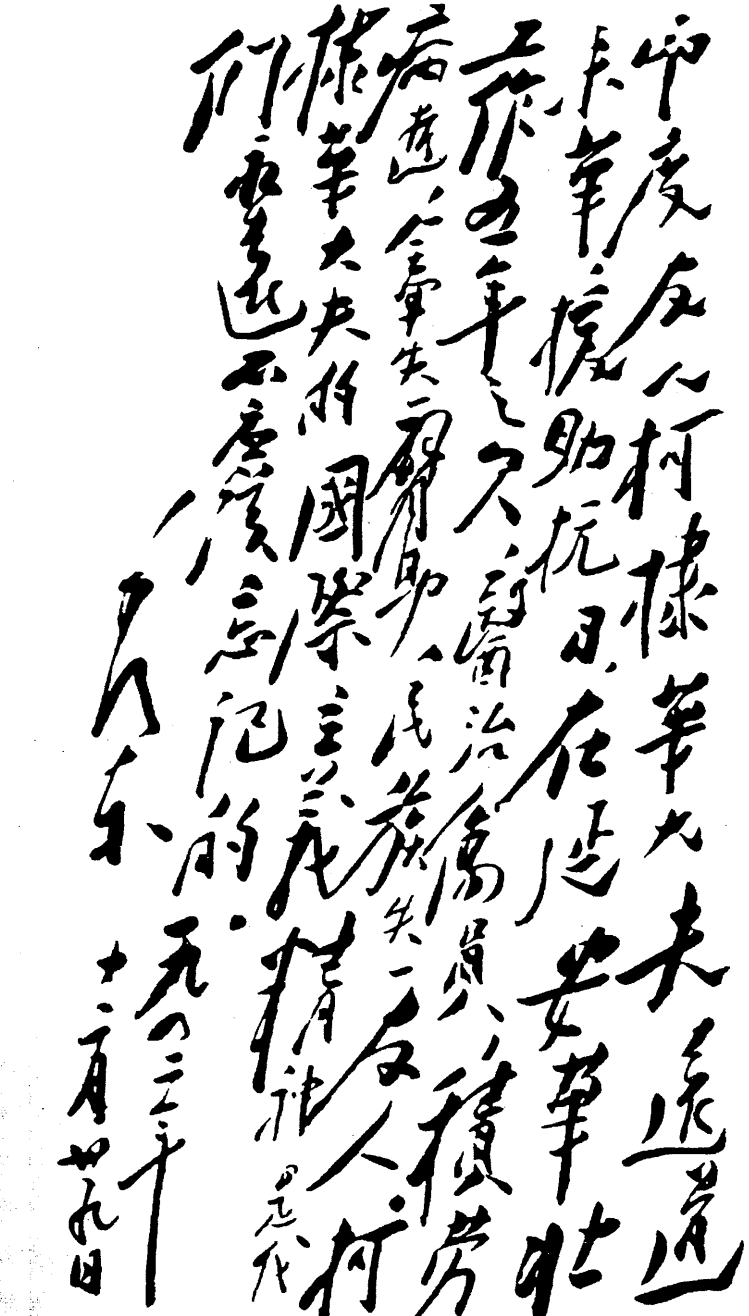
（1942年12月29日）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1] 这是毛泽东为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大夫柯棣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题写的挽词。



毛泽东为柯棣华题写的挽词。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

（1942年12月）

一　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以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里，毛泽东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

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

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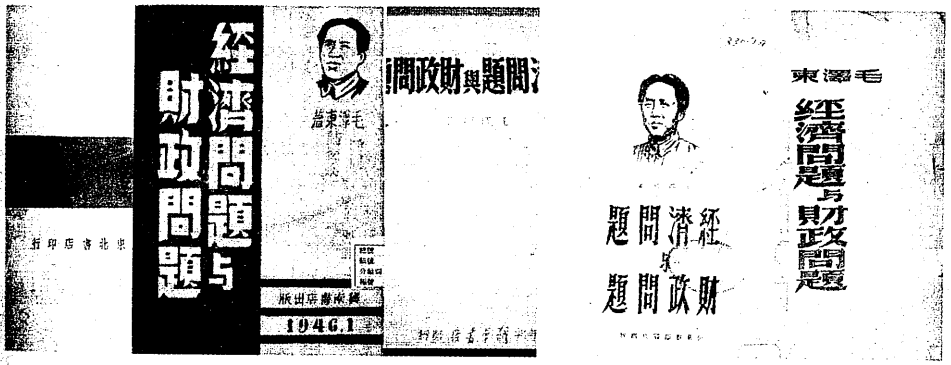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

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

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下面，我们就来分述经济与财政的各项工作，具体地总结过去各项工作的经验，并提出一九四三年应该实施的工作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部分版本）。

二　关于发展农业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是边区经济与财政的总方针，那么，在经济方面过去是如何做的，有些什么成绩，有些什么缺点，今后应取什么方针，就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了。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

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是单靠人民交纳租税，还是不能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特别是在边区地广人稀的条件下，人民的租税与政府的支出之间，长期地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所以，我们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这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与我们的一切机关学校在自己肩上担负着的一个极大的任务。数年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四三年我们还要造出更大的成绩，以便直接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公营经济愈发展，则人民负担就可愈减少，这又是培养民力的一个方法。而联合与通融民营与公营经济这两方面的工具，则是金融。

民营经济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与商业。这里先说农业。

边区的农业，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下降的。那时的延安、安塞、保安、甘泉、华池以及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地方有个长约二百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保安的乌鸦寺、张家岔，在同治年间已无人烟。甘泉的傅村川、延安的金盆湾及马市川一大半，皆成荒地。边区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牲口破坏更大：羊子只剩四五十万头，牛、驴只剩十余万头。纺织、驮盐等副业，亦同样被破坏了，尤其纺织几乎完全停顿了。食盐的输出，到一九三八年才有七万驮。由此可见，边区的农业在那个时期是衰落的时期。只在中央红军来到边区，内战停止；土匪肃清，使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左”的经济政策被纠正；休养生息的税收政策被提出；以及党政号召发展农业的影响，使农民的生产情绪大大

地提高，才使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下面是近四年来开荒、植棉与牲畜发展的统计：

年　别	开荒亩数	植棉亩数	牲　畜		
			牛	驴	羊
一九三九	1002774	3767	150892	124935	1171366
一九四〇	698989	15177	193238	135054	1723037
一九四一	390087	39087	202914	137001	1724203
一九四二	281413	94405			
合　计	2373263				

（说明：1. 牲口的统计，葭、米二县未计入；一九三九年的牲口数，清涧等七县是将一九四〇年的数目加在里面的。2. 开荒是逐年所开数目。植棉与牲口是逐年统计之全边区所有数。）

这个统计指明：边区的耕地是逐年扩大，植棉亩数是逐年加多，牲畜是逐年发展，并且实际有的数目比统计表上的数目还要多些。因此，从前许多荒地，现在变成了熟地。如二家川现有一百余户居民，全川荒地都变成了熟地。乌鸦寺、张家岔现在也住满了。延安县过去十一个区均有荒地，现在只有金盆、柳林两个区，中区半个区，姚店区一个乡有荒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还只有耕地三十万亩左右，一九四二年就有耕地六十九万九千五百三十六亩。安塞、安定、延川、延长等县过去均有许多荒地，现在很少了。一九四〇年以前，边区还从洛川及河东买粮。现在则不但不要从外边买粮，且有部分余粮向榆林一带输出。一部分人口从外地移来，牲畜也增加了，并不感到粮缺。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边区粮食已能自给，是无疑问的了。

植棉不但恢复了革命前的最盛时期，而且发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胜、禹居等区，从前是不种棉的，现在均种起来了。延安从前不种棉，现在也种起来了。因为种棉比种粮利大，一亩地的棉花，平均收成可值七百元以上，如种粮食则只值二百余元，是三与一之比。一九三九年种棉面积还仅三千七百余亩，至一九四二年就有九万四千余亩，产量已达一百四十万斤，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但全边区需要量是三百万斤，这就是今后的任务。

牲畜的发展也很快。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八千多，现有六万以上。华池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七万左右，现有十二万多。延川东阳区三乡张家河，在土地革命前只有羊五群（那里没有牧场，每群只能有三五十头），现有十三群。牛驴的发展比内战时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二。因此，一九四〇及一九四一两年能输出食盐五十万驮。假如没有牛驴的增加，这项食盐是很难运出的。

但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较普遍、成绩较多的要算直属各县及陇东，特别是延安、安塞、甘泉、华池、曲子和东三县。因为这里土地多，人口少，气候也不错。以运盐为副业也是这些县份多。同时，公家消费最多的也在这一带。没有发展的要算警备区，因为那里人口多、土地少，扩大耕地不可能。那里多少有些成绩的，是逐渐恢复了家庭纺织业；并向延安一带有些移民，相当地调剂了人口与土地的配备。

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发展是快些，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有很大发展。例如：开荒在这两年有一百七十万亩。一九四〇年，羊增加近六十万，牛驴增加[illegible]万多。但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开荒，只有六十余万亩，[illegible]及前两年的三分之一强。一九四一年的羊比一九四〇年还减少了[illegible]

牛驴只增加一万余头（实际是减少了）。但在这两年，棉花和纺织又往前发展了。

以上是边区农业发展的概况。下面讲一讲边区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在国内和平未建立前，农业是衰落的，以后是发展的。这样发展是怎样得来的呢？除了中央红军到达，土匪肃清，和平实现，农民能安居乐业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是纠正了经济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因经济政策的“左”，怕发展生产。另方面，因为农业经过革命前后的破坏，基础很弱，妨碍发展。中央实行纠正“左”的政策，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倾向，农民愿意增加耕具，富农敢于安伙子，雇长工。休养生息政策恢复了元气，便利了农民的再生产；同时粮价高，副业利大，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忱，使农业迅速发展，并打下了一九四一年征收公粮三十万担与公草二千六百万斤的基础。

第二是发展生产的号召。例如：一九三九年中央召开的干部生产动员大会，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第一次参议会，第一次农展会，均有发展生产的号召，这些号召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首先推动了干部，经过干部深入了群众，动员了男、女、老、幼以及骡子均参加生产，增加了劳动力，最后地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心理。因此一九三九年的开荒数达到一百万亩以上，真正向外边进牲口来，也是那一年为最多。

第三是移民政策。最近四年中耕地扩大二百三十五万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土地多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增加了人口。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人口三万四千，现有人口七万左右

（延市在内）。因此该县的耕地，由三十万亩左右，增至七十万亩左右。安塞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人口二万左右，现有人口四万以上。甘泉原只有八千余人，现有一万四千余人。延长在一九三九年只有人口二万五千，现有三万二千余。延川荒地最少，但从一九三八年到现在，也增加人口一万余。华池在一九三八年只有三万五千人，现有四万余人。其他如保安、安定、靖边、陇东、关中各县的人口均有增加。这些增来的人口，以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为多，其次是警备区，均是自动移来的，不是由政府组织来的。他们之所以自愿来，是因为有土地，有优待；各县又组织老户在粮食、工具、窑洞上的帮助等；同时又有富农接纳安伙子，也便利了移民。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积扩大了，也发展了牲畜，繁荣了商业。所以移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

第四是奖励政策。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并减少其他义务负担。棉农中有种棉利益不及种粮利益的，由政府赔偿。从边区外面买进来的牲口，第一年减少一定数量的公粮。还有两次农展会对于劳动英雄的奖励，也发生了很大效果。例如：延安的吴满有、卯克呼，甘泉的杜发福，都是经过第一次农展会奖励过的，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交公粮均在五担以上（边区一担三百斤），并在农村中推动了其他农户发展生产。所有这些，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与棉花的发展。

第五是减少劳动力的浪费与调剂劳动力。内战时，因忙于战争，无暇生产，土地荒芜。和平实现后，又有自卫军经常的训练与放哨，还有各种会议，故每个壮丁一个月至少要耽误三个工。后来将这种误工减少了。同时，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公粮收的少，义务运输公粮也不多，误工较少。最近几年中农村中的札工（有工头，

集体为人家做临时工）、变工（群众互助性质，也是集体做工）发展了，调剂了劳动力。又动员了二流子参加生产，妇女参加生产的也多了。所有这些，就帮助了边区农业的发展。

第六是农贷政策。以前没有农贷，但有休养生息政策的帮助。现在公粮加重了，特别是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要交公粮，一部分（大致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和食粮的农户，必须有贷款的帮助。并且为了在某种必须发展的农业（如植棉）、农村副业（如纺织）与某些必须更多发展的地区，给以农贷尤为必要。一九四二年农贷虽然只放出四百余万，其中耕牛贷款只有一百五十余万，但在此项贷款帮助下，买了耕牛二千六百余头，又买了近五千个农具，又发展了植棉，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帮助。但因财力有限，只能按照政府的财力来贷款，还不能按照农户的需要来贷款，但少有比没有总要好些，总有些调剂的作用。

上面讲的是农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下面再讲到我们工作中的几个主要教训。

第一，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例如警备区没有荒地（除清涧有少数），耕地不能扩大；羊子为牧地限制，发展有限；运盐又缺乏驮牲；减租政策又未彻底；因此，那里的粮食没有增产，副业除纺织外亦未发展。但是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改良作法）办法，虽在那里早已实行，也还应该根据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尽可能地增产。但是这种办法，若拿在土地多、人口少、作法粗的区域去用，便少实效；因为这些办法都要增加劳动力。在后一种地区的农民看来，深耕不如多种地，多施肥不如多开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区域，多种地更较强的。所以改良农作法的口号，现时在后一种区域一般是少实

效的。在这些区域，目前真正增加产量，最主要的还是靠开荒。如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六年间，增加的耕地约有三百万亩，则一九四二年的收获量比一九三六年至少增加了粗粮五十万担，合细粮二十五万担（每担三百斤）。如果一九四二年边区的粮食产量估计为一百五十万担细粮，则六年来因耕地增加而增产的粮食，就占了总数的六分之一。此项增加的耕地，部分属于移民的开荒，部分属于老户扩大的耕地。由此可知，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例如一乡之中，某几村荒地多，就应鼓励开荒，某几村荒地少或无荒地，就应鼓励深耕。在时间上，尚有荒地时，该乡就应鼓励开荒，荒地开完，该乡就应鼓励深耕。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虽然一方面是有成绩的，在另一方面，却又有许多工作是空洞的，一般化的。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知道周密研究客观情况，根据不同地方与不同时间，提出确定的要求，解决增产的条件。过去曾一般地提出深耕、开荒、修水利及增产四十万担或二十万担的口号，实际则包含着许多的主观主义，许多农民对于这些口号是没有兴趣与影响的。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

第二，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重租重息，减租减息的政策没有彻底执行。农民一面要向地主负担租息，一面要向政府负担公粮公款，自己所得太少，提不起生产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增加生产量。从此得出结论：我们要认真执行减租减息的法令。

第三，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例如：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两年农民所出公粮公草公盐甚大，而两年农民所扩大的耕地就只有六十余万亩，仅占一九三九年的十分之六。牲口在一九四一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羊子反而减少了（当然瘟疫有关系）。移民也减少了，一九四二年移民只有四千八百四十三户，并有三千五百二十七户老户发生迁徙，原因主要是怕负担。还有一个原因：在公粮征收方法上，是按实物收获而不是按地亩多寡累进，这种办法，在平均负担上来说是合理的，但对促进农业投资是有妨碍的。因为同样的土地，收成多，要多出，收成少，可少出，甚至不出，这样就会降低农民在土地上投资的积极性。如按地亩征收，这点便可纠正，中、富农的积极性更会提高，对于贫农也无妨害。从此得出结论：公粮公草要有限度，同时要改善征税标准，方能促进农业生产。

第四，政策应贯彻执行。例如：移民与植棉，规定三年免收公粮，但实际又向移民“欢迎”公粮，棉地也征收公粮一半；从外地买进的牲口，原规定第一年减少一定数目的公粮，也未实行；还有奖励生产条例也未完全实行。所有这些，不但影响政府威信，而且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凡属政府颁布的法令，必须坚决实行。

第五，调剂劳动力及其他许多帮助农民的办法，如变工、札工等关系增进农业甚大，但是除一部分地方如延安等县外，我们还没有去加以组织和发扬。各县干部，固然有许多同志是在那里积极主动地替人民打主意，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的好办法，造成了许多的模范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缺乏实事求是与积极努力的精神，他们缺乏创造性，他们觉得农业上没有

什么工作可做，或者不知从何着手，于是只提出“春耕”“秋收”等空洞口号，自己采取消极态度，让农民自流地去干，政府只是事后登记一下。但实际上要做的事很多，很多好办法都可以想出来。例如：延安县在一九四二年春耕时，一部分农民情绪很低，发生了移走或者分家、卖牲口准备缩小生产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缺乏积极精神与缺乏创造性的同志看来，是没有办法的，只好听天由命，让其坏下去。但延安县的同志们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消极态度，也没有官僚主义。他们能够抓住问题的要点，采取积极的办法，克服了困难。当时党与政府做了在宣传上、在粮食调剂上、在窑洞和农具调剂上的许多工作。后来，不但生产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八万余亩耕地。这一实例证明：我们的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在农业上有很多的工作可做与应做，而且只要扼要、得法，一做就会生效。从此得出结论：干部要有克服困难的积极精神，要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根据群众的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决不可有消极态度与官僚主义。

为了使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困难的极重要问题获得一个明确的观点，特将延安县同志关于他们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的报告，揭载于此，以供众览。

下面就是报告的原文：

延安县一九四二年八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

（一）依靠移来难民的劳动力来开荒。

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的难民有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八人，

个人一个劳动力，有五千零八十六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一年开十亩荒，计五万零八百六十亩（开十亩是三年来难民开荒的平均数。一九四二年每个劳动力开的比这还多）。

（二）依靠老户的劳动力、畜力来开荒，计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九亩。

老户的劳动力有一万零六百一十六个，平均一个劳动力开不上三分地就可以完成。

（三）但组织劳动力是一件大工作。本年采取集体工方式进行集体劳动，如札工、变工。又组织妇女、二流子参加生产。

共组织札工四百八十七个。另外吸收四千九百三十九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变工），几占总劳动力三分之一（今春统计全县劳动力一万五千七百零二个），即三个人中有一人参加集体劳动。

札工就是由农村中好劳动力八至十个一组，设工头一人，开荒时给人家或自己开荒，锄地时给人家或自己锄地。工头有时参加劳动，就拿两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劳动，拿一个劳动日的工资。参加札工的有全为本村人，也有外来人或外村人与本村农民共同组织的。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农民十分高兴，可以鼓励农民劳动热忱提高。

妇女参加生产，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难民妇女，开荒有她锄草的更多。柳林区本年有三十九人。川口区三乡难民妇女没锨头，跑到山里等别人累了休息的时候，拿了锨头开荒，人家休息了把锨头还回，又等着。

（四）依靠于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一九四二年本县着重每一农户生产计划的制订，由本人家中商量好，本人同意订出的。政府印发一的表格，里面包括开荒锄草等。计划订好，贴在每户的窑

里，以后政府检查每户的生产计划时，即按此表进行。农户计划的制订，应按：（1）去年生产情形；（2）今年可能扩大生产的条件；（3）劳动力（人力牛力）多少；（4）得本人同意；（5）要有经常的检查督促工作。

（五）农贷的结果，特别是对难民十万元的农具贷款。难民来时什么没有，开荒却先要用“梢锹”刨去“梢”，才能用锹头开荒。农具贷款发给后解决了农具，难民开荒的热忱很高，六天可以开一垧。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注意：勿违农时）。

（六）春耕时，动员工作应尽量减少，让农民有时间去开荒，去生产。

（七）政府对开荒工作抓得紧。开荒时间仅三个月，以一百天计，一天要开八百亩，需要一千六百个劳动力，占去全县劳动力十分之一。在四月十九日前还只开了一万五千亩，距完成任务尚短得多，而时间已去了三分之二，所以下雨后从四月二十日起突击开荒二十天，在二十天中完成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三月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前：开荒一万五千亩，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十八点七；突击二十天：开荒四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亩，占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八。

在突击中最好的为下列各区：

柳林区，突击时与十九日前开荒数之比，为一千二百九十四点四比一百。

姚店区，突击时与十九日前开荒数之比，为一千一百八十四点四比一百。

川口区，突击时与十九日前开荒数之比，为四百三十二点一比一百。

县府对于开荒工作，前后开区长会二次检查，发了三次指示信，县府干部下区乡达三次之多。

区对乡工作的检查有的达七八次，至少有三次。乡对村的检查次数也不少。

领导上的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如何解决难民参加生产问题

（一）历年来延安难民增加统计表（数目字是每年增加的，延安市不在内）：

年份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共计
户数	249	533	1137	5040	1050	8009
人口	1200	1976	6090	14207	6231	29704

与一九三七年人口比较：

	户　数	人　口
一九三七年	7703	32705
五年增	8009	29704
百分比	103.9%	90.8%

换句话说，户数增一倍以上，人数将增一倍。

移来难民主要住在川口区、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这些地方荒地很多。

（二）难民来后，政府替他们解决生产困难的统计：

年　份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共　计
调剂土地（亩）	10220	3451	6335	20006
粮食（担）	669.9	495	458.48	1623.38
籽种（担）	40.18	8.2	47.37	95.75
农具（件）	424	2133	427	2984
耕牛（头）	979	82	212	1273

（注：1. 一九四二年还给难民调剂洋芋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五斤，调剂牛工二百七十三个。2. 农具是铧、镢、锄三种。）

（三）解决难民生产困难的办法：

第一，土地是很多的，我们提出公荒谁开归谁，私荒本人不开，让难民开。三年不出租子，以资鼓励。

第二，住窑的问题：开始是住旧窑破窑。以后再有人来，因为多是找亲戚朋友、社会关系来的，来时住在亲友窑中，住下就打窑。还有是头一年先来一人，把窑打下，第二年搬家眷来住。

第三，吃粮在农民中进行调剂。今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鼓励老户借粮，政府保证归还。另一办法是：发动老户与难民调分子、安庄稼、揽工，条件由双方自愿定，让老户主家剥削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难民初来什么也没有，虽然被剥削，但不会使他们饿肚子。

本年统计：

调分子　　三百五十九户

安庄稼　　四百六十六户

揽　工　　一百八十四户

共　计　　一千零九户

这些户的吃粮，依靠主家解决。但调分子只能解决自己吃粮。安庄稼的、揽工的，则除自己外，还可解决家人吃粮，这样的有六百五十户，一户以三人计，共一千九百五十人。加上调分子三百五十九人，共二千三百零九人，都是依靠主家解决吃粮的。假如要政府救济的话，一人一年五斗，需粮一千五百四十点五担，是多大的数目！所以安庄稼、调分子、揽工，条件由主伙双方自由决定，可以解决多大的问题。不但吃粮问题解决，扩大生产增加了粮食，每户以一个劳动力计，共有一千零九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打二担粮，可以增粮二千零一十八担之巨，除消费外，尚可余八百六十三点五担，到第二年，这些人就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了。

第四，籽种、土地，都是发动农民给难民调剂。籽种秋后归还，土地出租子，政府保证。

第五，举办难民农具贷款，解决开荒工具，收效很大。假使各方面问题（吃粮、农具等）配合不好，会耽误开荒。所以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

第六，对难民的负担问题，坚决执行边府优待难民的决定，三年中没有负担，相反地，政府还给解决各种困难。今年县、区、乡政府干部节省粮十担，用以拨给难民。中区三乡解决难民吃粮，各种动员工作尽可能少负担。

（四）难民为什么要来延安？

1. 我们真正解决了难民的困难。特别是一九四〇年解决难民的吃粮，把影响扩大了。单是川口一区，就给难民调剂了三百担粮，这样难民在一九四一年就来得多了。

2. 政府的号召力固然大，但是难民自己将所得实惠告诉自己亲

友及其他社会关系，来得更大。我们在来的难民中找拿有绥德分区所发难民证的很少，原因是怕在那里拿了安家钱、证明书，下来不自由，或变成公家人，宁愿自己找关系找钱来。

（五）对今后移来难民的意见：

1. 发动难民利用社会关系去找人来。

2. 县、区政府认真替他们解决困难。

3. 边区政府拨一部分粮款帮助他们，秋后归还。

4. 坚决执行优待难民决定。

如何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

（一）统计表：

年　份	原有二流子数	参加生产人数	未参加生产人数
一九三七	1629	299	1330
一九三八	1243	578	665
一九三九	543	120	423
一九四〇	359	175	184
一九四一	184	126	58
一九四二	145	40	105

说明：

1. 盘龙区某巫神，将三山刀打成镢头，向群众说：再不骗人，从此努力下苦。

2. 川口区三乡李家渠惠三、高武二人，今春每人分配开荒六亩，完成，而且超过二亩。四乡田家圪塄杨应成，分配开荒六亩，

完成九亩。

3. 柳林区今年纠正七人参加生产。乌羊区查出十二人，斗争后，有九人参加生产。丰富区八人。姚店区甘谷驿八人组成两个组，到张家沟开荒。

4. 丰富区三乡南义沟白粉玉，一九三六年前是神官，一九四一年有一头牛，雇一人，有羊二百只，当村长，出公粮十点二担，公盐二百斤，公草五百斤。今年增加一头牛，一个调分子，扩大生产，现在光景好了。

5. 盘龙区二流子，因政府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他们说：今年事情不对，公家将咱这批人抓得太紧了。如四乡李家砭李德金，过去吃洋烟，今年开荒六亩，烟也丢掉。全区有二十七个二流子，写保条好好生产，结果有二十个很好。

6. 牡丹区刘家坪某（忘记名字），政府动员他参加生产后，光景过好了。以后遇见工作人员去，他就好好招待，说：政府叫咱好好生产是对的。该区曹玉成，过去是个二流子，不种地，也不砍柴。不管冬夏，披着个捉襟见肘的烂棉袄，卷缩在冷炕上，每天吃上二钱洋烟，婆姨娃在饥寒交迫中啼哭着。革命后，在政府的教育下，现在他是四乡的生产主任，人人称赞他工作有办法，劳动英雄，并且他对二流子抓得很紧，逼着他们做生产计划，五天上山检查一次。刘拐、阎凤和在他督促下，今年每人种了八垧多地。

（注：一九四二年二流子增加的原因，是一九四一年金盆湾从固临县划归本县管理，该区统计有四十三个二流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

（二）我们动员的办法：

第一，是宣传教育说服，叫他们好好生产，粮食打下，光景好。

第二，由政府给以一定的生产任务，如开荒（上面的例子），按时检查，并在农村中指定专人监督他们生产。

第三，发动群众向他们作斗争，迫得他们参加生产。今年盘龙三乡金盆河与云山寺两庄，发动生产竞赛。在这个情形下，金盆河庄的二流子常德功，被全庄人斗争得上山开荒，开了三亩荒地，正准备种地十五亩。

第四，组织在集体劳动中。将二流子集中区上，组成开荒组，烟戒掉了回去。开的荒、种的地，谁的归谁。

第五，政府给二流子解决了生产方面的一些困难。

（三）结果：

群众是非常欢迎政府叫二流子生产。因为二流子成天不劳动，不出公粮，每逢有动员工作还说怪话，群众死反对。在二流子本身来说，在生产有实际成效后，他们知道政府是为了他们好的，上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个别顽固不改的，也有政府动员时跑走了，又回来的，仍然参加一些轻便的生产。本县没有二流子变成土匪的。

我们引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们的这个报告，不是偶然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订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

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地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以上是过去边区农业的总结，以下来说一九四三年的任务。

农业方面的主要要求是增产粮食和棉花（副业另说）。按照目前粮食与棉花的需要，并为争取部分粮食棉花出口，还要求我们动员农民群众增产二十万担细粮及增产一百六十万斤棉花。这个要求究竟有无希望呢？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六年之间，估计约开荒三百万亩，增产粗粮五十万担，那么，可否在今后数年内，再从开荒及其他方法上增产粗粮四十万担或细粮二十万担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之间，棉地已达九万余亩，棉花已达一百四十万斤，那么，可否于今后数年内增加棉地十余万亩，增产棉花一百六十万斤呢？

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农民如能增产细粮二十万担，那么，即使如一九四一年那样交出二十万担公粮，农民还是只以增产部分交给公家，自己可保有相等于原来的全部收获量。至于棉花，即使将来要酌量收税，农民也

可保有绝大部分的收获量，解决边区的纱布问题。

应该实行一些什么切实有效而不是空洞夸张的政策才可达到上述要求呢？根据过去经验，下列八项政策是必须执行的：（一）减租减息；（二）增开荒地；（三）推广植棉；（四）不违农时；（五）调剂劳动力；（六）增加农贷；（七）提高技术；（八）实行累进税。下面我们就来逐项加以申述。

我们的第一项农业政策就是减租减息。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分过土地的，其余一半则未分过，如绥米警备区、陇东、鄜县及三边的许多地方都是。在这些地区，应依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这是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极其重要的方针。在减租减息后，农民对地主负担减轻，自己的保有量增加，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生产量也可增加了。关于这一项，西北局与边府已有具体决定，这里就不多说。

我们的第二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开荒地。根据荒地多的地方农民认为深耕不如开荒的要求，我们应在一切有荒地的县、区、乡组织农民多开荒地，以期增产粮食。开荒除老户抛熟垦新所开者外，主要靠招集移民来开，移民条件现在是有的，各县应做很大的组织工作。各县应根据可能条件分别新户老户，规定具体任务。照延安县的办法，订立每家耕种计划。这种计划，应将开荒地、种熟地一概包括在内。一九四三年全边区增产粮食数目拟定为细粮八万担，从人民与军队、开荒与改良农作法各方面来完成它。

我们的第三项农业政策就是推广植棉。全边区需棉三百万斤，如果平均每亩能收净花二十斤，只需棉地十五万亩。如果每亩只能收净花十五斤，或者还要少，便需棉地二十万亩。我们可照后一种估计准备棉地。但因新棉户缺乏经验与信心，纵然扩大植棉面积，

收成必不见佳，故不宜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完成全部需棉数目，而以一九四三年增辟棉地五万六千亩，连前九万四千亩，共计十五万亩，以期产花二百二十五万斤为适宜。种植此项面积的棉籽、棉地均无问题，但轧花设备很不够。以每架轧花机平均每日轧花六十斤计，需轧花机三百架，方能在半年内将三百万斤花轧出来。一九四三年有二百二十五万斤花要轧，需机二百余架。但现在只有破旧轧花机约一百架，每日能用的还不过五十架。如以五十架轧二百万斤，需要两个整年。故解决轧花问题，是推广植棉政策中包含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再则，目前边区农民尚不会榨棉油。二百万斤棉花便有四百万斤棉籽，每百斤可榨油十二斤。如榨油能解决，则棉农收益增加，植棉积极性亦可增加了。根据如上要求，一九四三年政府关于推广植棉应做的工作有如下列：（一）实地分配有棉地的农户种足十五万亩棉地，并帮助棉户准备棉种、肥料及种棉经验，有耕牛农具困难的给予贷款。（二）制造轧花机及轧花机零件，供给棉农，并帮助棉农修理旧机。同时组织棉农向外地购买轧花机，政府酌予贷款帮助。用这些办法解决轧花问题。（三）研究棉油榨法，使棉农能将四百万斤棉籽榨出四十八万斤油来（每斤十五元，值一千零八十万元）。（四）组织公私合办的棉业合作社，经营轧花、打包、销售及榨油等事业。（五）奖励优秀棉农，介绍种棉、轧花等优良经验，借以增进棉农的积极性，提高棉产的数量与质量。

我们的第四项农业政策就是不违农时，即在农忙时允许农民停止一切无关农业的开会与动员。在陕甘宁边区环境内，农忙时期应该停止农民群众除农业以外的任何开会与动员，借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全部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必要的开会与动员，应当利用农隙。过去那种开会太多与动员太多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我们的第五项农业政策是调剂劳动力。这里有奖励移民、劳动互助、动员妇女、动员二流子、着重优抗、生产给假、军队帮助等项办法，都是有助于劳动力的调剂的。

关于奖励移民，要靠政府和人民配合来做。其办法是：（一）由绥米警备区党政负责组织五千个劳动力的移民向直属各县开荒；但须在自愿原则下，并进行各方面的宣传组织工作。（二）政府准备部分粮食借给必须帮助的移民，另外酌予农具贷款，并切实实行免征三年公粮的优待办法。（三）发动老户帮助新户，如借粮、让熟地、借窑洞等；但此项借助应允许出借人享受利息，利率由双方自由决定。（四）组织基础好的农户吸收最穷苦的移民伙种。租率亦不应过于低抑，使老户乐于接纳。（五）对外地移民，应经过和外地有关系的老户去号召。边境各县应有专人负责接待，替他们介绍至有荒地的地区去安插。例如近日有河南灾民六百至陇东，即应好生接待他们。

关于劳动互助。这就是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

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边区有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变工，就是这种办法。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社，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此外还有一种札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各地对外来札工应予以帮助，例如帮助找工作等。

关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边区妇女虽多小脚，但仍然是仅次于男子的广大的劳动力，她们可以参加各种辅助的农业劳动，如种菜、播种、锄草、喂牲、送饭、挑水、收割等，有些还能做主要劳动。她们过去已经相当普遍地参加了，今后还应广为宣传、劝告，发动她们的劳动热忱，借以增加农产。边区党的与群众的妇女组织领导机关的同志们，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感觉无事可做。其实她们的第一个任务就应是研究与帮助边区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一同解决增加生产的大问题。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应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放脚。今后无论何人，不许再为幼女包脚。

关于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此事在过去数年已有显著成绩，各县在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后，二流子人数大大减少了。但是一切尚有二流子的地方，必须在一九四三年用说服与强制两种方法全部动员他们加入生产战线。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

关于着重优抗。过去事实上是优工第一，优抗第二，这是很不正确的现象。现应倒过来，优抗变为第一，把人民的代耕制，首先认真地替那些缺乏劳动力的抗日军人家属（不分我友）耕种土地，其次才是替那些真正缺乏劳动力的党政工作人员的家属耕种土地。在劳动互助社（变工）组织成功的地方，可以委托互助社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生产放假。这就是说，当农忙时，边区某些家境困难的党政工作人员，应每年允许他们回家二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的小学、中学，农忙时必须停课，让学生及本地教员回家帮助生产，这也是调剂劳动力之一法。

关于军队帮助。当农忙时，边区军队一律就驻地附近替农民耕种若干天，锄草若干天，收割若干天，而不收受任何的报酬（吃自己饭），一则可以调剂劳动力，二则可以借此密切军民关系。军队的政治工作部门，应当计划这一工作。

所有上述七项调剂劳动力的办法，如果实行得好，对边区的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特别是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

我们的第六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加农贷。一九四二年政府放了耕牛、植棉、水利等几种贷款，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困难。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使农业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一九四二年由边区银行主持在延安、甘泉、鄜县、安塞、子长、固临、志丹等七县共计八千零二十五户农家中，放了一百五十八万元关于耕牛与农具的贷款，加上农民自己集合的资金一百零

三万余元，共买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头，农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开荒地十万余亩，估计可增产粗粮二万六千余担。另外在延长、延川、固临三县，放了植棉及棉花青苗贷款一百五十三万元，扩大了植棉面积五万一千余亩，估计可增产棉花八十七万斤。根据一九四二年农贷的成绩，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万元应继续贷与农民外，一九四三年还应增加一千七百万元，连前共计二千零十一万元。其中以一千四百万元办理农具耕牛贷款，以三百万元办理植棉贷款。根据一九四二年放款的经验，一九四三年的农贷实施，应注意下列各项：（一）贷款应放给荒地多的区域内有劳动力而缺乏耕牛农具或缺乏粮食接济的新旧移民及老户贫农以及土地种的多而无钱雇人锄草的农家。（二）经过物资局试办从外地买部分耕牛及适用的镢、铧，或帮助农民自己去买，举行实物借款。这样才是真正增加了边区的耕牛农具；否则，农民拿了边钞只能从边区富农地主手中购买耕牛农具，还只是从边区内部起了调剂耕牛农具的作用，没有起增加耕牛农具的作用。（三）明年农贷既已增加，应相当地改变今年集中延安周围数县放款的方针，而以适当部分发到绥米、陇东、三边、关中各地去。但亦不应取平均主义，而要有计划地放在荒地多、需款迫切而又能生产获利的那些县区与农家。（四）放款的组织要改善，即应经过当地区乡政府及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合作社去放款。因此，要使区乡干部认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不要将农贷看作赈灾救济，不可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及不负责任的态度。（五）放款的手续要简单，要用当地农民已经习惯的借贷办法，不用“借款申请书”等手续。（六）在农贷的总数二千零十一万元中，划出三百万元，专作棉花与麦子的青苗贷款，借户在棉麦收获后以实物还款。这种贷款虽指定为棉麦青苗贷款，但农民可自由使用。这

种贷款公私两利，政府可以收回实物，农民可以减少高利贷的剥削。（七）放款要不违农时。财厅及银行应即速筹划，以便在今年阴历年底以前发放贷款总数之半，即一千万元。

我们的第七项农业政策就是提高农业技术。这里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经验，对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热情是不对的。但夸大改良可能性，以为边区可以实行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技术，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做的呢？我们认为下列各项是应该做的：（一）兴修有效的水利。举靖边为例。靖边只长城区杨桥畔一地即有二万五千亩地可以修成水地，他们已修五千亩，一九四三年还要再修。据靖边同志说：旱地一亩只能收一斗细粮。但水地一亩年种庄稼三次：先种春麦，收八斗，合细粮四斗；次种黑豆，收四斗，合细粮二斗；次种萝卜，收二千斤，每斤价三毛，值六百元，按每斗细粮价一百五十元计，合细粮四斗。三项共合细粮一担，正当旱地收获的十倍。故靖边农民常常自豪地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林里带萝卜。"修水地的重要问题是地权分配问题、动员民力问题、组织领导问题与壕坝工程问题，四者有一不当，即不能成功。一九四二年靖边同志领导农民在把兔湾、杨桥畔等地方打了六个坝，依坝作壕，引水灌地。他们事先替地主与农民按三七分地、四六分地或对半分地解决了地权问题，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据靖边同志说："只要解决地权问题，农民是容易号召的。如我们修十处水地，除原有农民二百余户外，新号召来的有百余户，其中有从友区来的三十多户。"又说："修水地，政府贷款固然重要，但主

要地要靠组织民力，吸收游资。靖边一九四二年兴修五千亩水地，共用工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个，平均每亩地用工五点七个；共用款八十五万八千元，其中公家贷款二十一万元，吸收游资六十四万八千元。当然这个游资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以工代款的。”关于组织领导，靖边同志说：“我们对兴修水地的领导，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种是就地物色好的农民三人至五人组织水利委员会，负责调剂劳动力与调剂劳动工具等。但其中常因地权问题、水利使用问题等难解决，障碍水利工程之进行，故尚须有第二种办法，即政府派干部协助领导，解决群众中的争执问题。县府除水利局外，另外派了三个干部分管十处工程的领导。”靖边同志们还决定于一九四三年继续在杨桥畔修四千亩水地。但因该地原来只有居民六十户，一九四二年移来四十余户，共计百余户，劳动力还成大问题。故决定于一九四三年招来移民一百户，现已开始打窑洞，准备住的地方。“对于处理这一百户移民是一个大工作，因为他们多是从横山来的，多是难民，故还需相当的代价，才可完成。若移民到达，加上当地人力，一九四三年再修四千亩是不成问题的。”此外，靖边同志还修了一种水漫地。所谓水漫地，“就是处在三面高山一面天沟之间的大块平地，有的二三千亩，有的二三百亩。此种土地，土质很好，但上面堆着砂砾，妨碍禾苗，并使土质变坏”。修这种水漫地的办法，“就是沿天沟一面畔上打起很坚固的坝，栽上沙柳与宁条子（冬天可供羊吃），使常年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不叫从天沟流去，全漫在地上，泥质既厚，肥料又多，又富水分，极宜庄稼；并使地面年年扩大，把山沟都漫成平滩，生产面积也扩大了”。这种水漫地比旱地收成多到一倍以上，“如旱地一垧（边区延安一带每垧三亩，靖边一带每垧五亩）打粗粮一担，水漫地就可打二担或三担”。这种水漫地的修筑，

是靖边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春耕动员时才发现的，故还只在两处地方试修，修了一千亩。他们准备于一九四三年在好几处地方同时修筑，共计面积一万三千余亩。据说“全县共可修筑水漫地五万至六万亩”。我们详举靖边这一实例，证明兴修水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在有些地方是有修水利的条件的，特别是靖边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各县水利情况虽不会与靖边相同，但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的努力，在真正有利的条件下，也可开发若干水利事业。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应拨出二百万元，在靖边之杨桥畔、鄜县之葫芦河等处进行水利贷款。（二）推广优良品种。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例如光华农场已经试验成功了的狼尾谷，产量高，不怕虫蚀、鸟啄，随地可种，他们的洋芋产量也较普通为高，应向农民提倡种植。先在每县各择一二个区令一部分农民试种，如觉土壤、气候适宜，即可普遍推广，以期增产。（三）鼓励从事秋开荒、秋翻地。因为秋开荒、秋翻地，可以减少虫害，可以促使土壤风化，又可保持水分，增加来年的收成。（四）在劳动互助社组织推广之后，鼓励农民多锄一二次草。锄草的作用不但在于去草助苗，而且在于蓄水耐旱。如多锄一二次，即使施肥不多，亦可增加收获量。（五）由建厅及五个专署筹划，在一九四三年夏冬两季，五区分别举行五个展览会。根据边区两次农展经验，改善农展布置，介绍与奖励农民模范成绩，推广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各区农展，要有军队及机关学校农业生产成绩的参加，借以鼓励军队及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并达军民联合之目的。（六）《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在五个区域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七）边区的

小学及中学应设农业常识课，并应编制包含边区实际农业常识的冬学课本，以达改良农业增加农产的目的。（八）建厅应召集专家，着手研究从梢山流出的柳根水，加以科学的处理，以免人民吃了成“拐子”。这个问题如能解决，则靠近梢山的许多沃野可以诱人耕种，变成大量的良田。

我们的第八项农业政策是实行农业累进税。过去的农业税是采取救国公粮的形式，虽然也是按累进原则征收的，但是每年征收总数多少不一，每年每家征粮数自然也就多少不一。一九四一年发生摊派现象。一九四二年虽改取评议制较为公平，但不公平的现象还是有的。主要缺点是税率不确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议政府于一九四三年进行人民土地的调查与登记，依此制定一种简明的农业累进税则，依一定土地量按质分等计算税率，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与质计算交税数目。农民有了这个计算，就可计算他全年全家收支的比例，就可放手进行生产，而增加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的增产；政府征税时也就不发生不公平的问题了。一九四三年这个准备工作完成后，一九四四年就可实行征收累进税。有些准备工作完成得早的县，可于一九四三年先行试办。

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与准备实行累进税——这八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可以做、必须做并会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除累进税一项一九四三年是做准备工作或只在几县试办外，其余七项，应即全部实施。其中有许多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就要动手做，否则时间误过，就会变成空话。

上面这些，就是我们对于过去民营农业工作的总结与一九四三

年的农业工作方针。下面再说与农业密切联系着的农村副业，如畜牧业、手工业等。

三　关于发展畜牧业

畜牧、运盐、纺织是边区农民的三宗主要副业。而牛与驴的繁殖，对农业与运盐业有决定的作用，这是大家知道的。羊的繁殖，对被服有很大关系；去年一年边区农民收入羊毛羊绒一百余万斤，加上羊的出口，估计约值二千余万元，就是明证。牲畜的最大敌人是病多与草缺，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发展是不可能的。首先，疾病的破坏力很大。例如一九四一年春靖边因羊瘟而死的羊就有二万余头，一九四二年定边羊瘟死羊一万六千余头；一九四一年夏，延安牛瘟死牛五百余头；一九四二年志丹夏秋牛瘟死牛五百七十四头；可见疾病是边区牲畜的大敌。再则，牧草不足，又极大地阻碍牲畜的繁殖。一九四一年春靖边死大羊二万余头，羔羊三万头也大部死去，除上述羊瘟关系外，缺草是一个重要原因：靖边同时还饿死牛马二千余头。因盐运道上缺乏积草，大大妨碍盐运，这又是近年极感困难的事。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牲畜与增殖牲畜。而要达此目的，就须实行如下各项办法：

（一）防疫。这里主要是由县区政府召集本地兽医及老农，研究防止兽瘟与医治兽瘟的简单办法，向牲畜较多的农家劝导实行，这是普遍易行的。其次，建厅应令农场增加兽医设备，研究边区兽瘟，制造大量的血清与疫苗，倡导并实行有效的防瘟与治疗办法。

（二）推广牧草种植。边区牲畜大多数是放牧，牧草不佳，容易

生病，因此应该普遍推广苜蓿的种植。特别在盐运路上及其附近多种，不但便利盐运，且可发展牲畜。一九四二年政府原计划推广苜蓿种植三万亩，结果只得二万三千余亩，因为种子不足。一九四三年各县政府应从关中多运种子，发给计划种植区域的农民，并鼓励农民自购。此外应动员农民，秋季大量割野草，储备冬用，不但可免牲畜因吃冷草生病，而且可免农民因无冬草卖掉牲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看靖边的经验。靖边同志鉴于一九四一年春季牲口大批死亡，在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是用种苜蓿、修草园、割秋草、栽柳树、挖草根五种办法号召农民解决牧草的。第一，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叫农民种了二千多亩苜蓿，大部分种子由政府发给，农民情绪很高。一九四三年，他们准备再办一部分种子贷给农民，特别号召农民自备种子，对成绩优良的给以奖励，激励他们大量种苜蓿。第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修了四千余亩草园。这种草园里的草都是芦苇，在靠蒙古边界沙漠中的海子与大草滩上长得很茂盛，每亩能割五百余斤。革命前原有草园，后来破坏了，牛羊随便践踏。现在发动群众修复，不费多少人工，秋后割草，以备冬用。第三，靖边山地有芦苇、白草、兵草、沙竹、沙蓬等野草很多，秋季收割，大有助于牲畜。一九四一年发动群众割了五百万斤，一九四二年又动员每人割一百斤，现还未作总结。第四，是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宁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第五，靖边的白草、兵草，牲口不但吃其草叶，而且吃其草根。靖边春耕时，壮年上午耕地，下午挖草根，晚上喂牲口，女子儿童则整天去挖，每人可挖百余斤，对畜草起很大作用。但因挖的人多，发生地权争执，灾民难民无地者更加不利，故政府须予以调

剂。据靖边同志说：“我们在这几种办法下给人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固然因为雨水多，草长得好，但也因上述五种解决牧草的办法，使畜牧发展了。如一九四二年全县下的六万余羔羊都活了，死的很少。大羊与牛驴马等，除个别地方病死一部分外，一般的死亡率减少很大。全靖边牲口除羊外，每年要用三千万斤草，而用上述五种办法，至少可补助一千万斤草。”牧草是牲畜的生死问题，我们希望各县同志都做出一个一九四三年的牧草计划来。

（三）禁杀母牲，并禁母牲出口。牛则一律禁杀，老牛可杀者须经检验。

（四）改良畜种。研究已有“输种站”的经验，选择好的驴种、羊种，劝令民间推行。先从甘泉、延安二县做起，再及他县。此外应由政府从盐池买一批“滩羊”，发给羊多农家配种，每一头公滩羊可配二十只母羊。这种羊毛很细软，且能每羊年产二斤。

我们如能认真实行以上各项办法，边区的牲畜会有更大的发展，希望建设厅及各县同志加以注意。

四　关于发展手工业

手工业在边区是作为大量家庭副业与一部分独立手工业而存在的，其中以妇女的纺土纱织土布为大宗。但是多年以来，这种土纱土布的大部分已被洋纱洋布打败了，最近几年由于我们的提倡，才又有些恢复。但是边区农民还是要拿了自己的剩余农产品、皮毛及运盐业去外边交换大量的洋纱洋布进来，自己的纺织业还远不够供

给自己的需要。这里论述的民间手工业，也就以纺织业为主，兼及蚕丝与棉油，其他暂不论及。

甲　纺织业

老百姓及军队与公务人员，年需布二十五万匹（每匹宽二尺四寸长十丈的大布），其中军队及公务人员占五万匹，老百姓约占二十万匹。现在的供给量呢？七个公营纺织厂年产布约一万一千余匹，大小七个民间纺织合作社，年产布约一万八千匹，民间妇女织土布无统计，估计约有三万匹，公私合计年产量已有十万匹，距需要量尚差十五万匹。即是说，我们已可供给百分之四十，这是很大成绩。但尚差百分之六十，这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很大的，须要几年才能解决；但是依靠现有的公营纺织与民间纺织，加以改良与推广，是有解决的可能的。我们有了棉花，可以有计划地发动民间妇女纺纱，与民间纺织，加以改良与推广，是有解决的可能的。我们有了棉花，可以有计划地发动民间妇女纺纱，织半土半洋布，逐渐减少洋纱的进口，并逐渐做到完全用自己的纱织布，就可解决这个问题。织布的任务：第一，依靠公营工业。一九四二年公营布厂已能产布一万一千匹，差不多可以供给军队及公务人员需要之半数；再过几年，就可完全自给。第二，提倡民间妇女织布。绥德一带妇女已能年产三万余匹，只是尺寸不一，人民不乐购用，仍然欢迎外布，如能加以改良，增加布产是有希望的。第三，民间合作社已能年产一万八千匹，还可发展。全边区的布，必须依靠这三方面协力，才能解决。但首先与最大的问题是纱。二十五万匹大布如全用土纱织，以每匹十二斤纱计，需三百万斤纱。如用土纱洋

纱各半合织，则需一百五十万斤土纱，十五万捆洋纱；目前公营布厂及民间合作社织的就是这种半土半洋布。但土纱还是不够，还需大量推广民间纺纱，并改良纱质。因此，逐步发展民间手工纺织业，扩大其数量，改善其质量，就是边区的极重要任务。

如何逐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过去经验，我们提出下列办法：

（一）首先是整理与发展绥德警备区各县的民间纺织。办法是：由警区专署主持，联合物资局及三五九旅大光纱厂协助，发棉花给妇女，令其多纺土纱，供给公营布厂的纱的需要。这个办法一九四二年行之有效，一九四三年应继续，并扩大之。警区民间土纱除供给公营布厂之外，还可自己织布，由物资局规定布的尺寸与质量，并保障其销路，即由物资局收买，或自己用，或转卖民间。其次，为增产土纱计，应由政府投资一百万元，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组织妇纺八百家的经验，贷与延安、安塞两县三千家，一九四三年在两县扩大纺纱机三千架。再在庆阳、曲子一带组织一千家妇纺，扩大纺纱机一千架。这种贷款由物资局经办，发给棉花与纺机，而收买其土纱，借以供给公营布厂的需要。其次，为增加布产，应由政府再出一百万元，取借贷或合股方式，投入现有的民间织布合作社，推广民间织布事业。

这里应举出延安县的计划。据延安同志在其《一九四三年生产建设计划》中说："一九四三年发展会纺织妇女四千名，一人一年估计纺纱十八斤（一月一斤半），可纺七万二千斤；加上一九四二年度已有会纺妇女一千斤，可纺二万斤；两共可纺九万二千斤纱，可织八千三百六十三点六匹布。但距需要尚短四千八百八十六点四匹布，准备在二三年内解决，达到完全自给。本县人口六万四千（延

安市不在内），大人约四万二千名，一人年需四分之一匹大布（单衣一套一点一丈，棉衣半套一点四丈，共二点五丈，每匹大布计十丈），共需大布一万零五百匹。小人二万二千名，用布约为大人之半，八人一匹布，计二千七百五十匹。全县年需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匹。一九四三年纺成的九万二千斤纱，织成八千三百六十三点六匹大布，需要五十六架织布机（一架年织大布一百五十匹）；一九四二年本县农村及工厂已有织布机十二架，一九四三年应在农村中以合作方式发展四十四架。其办法如下：第一，妇纺推广奖励费五万元；棉花资本以五千斤周转计，每斤一百元，五十万元；纺织工具费，纺车一千架，每架一百元，十万元；织布机四十四架，每架一千元，四万四千元。四项共需资本六十九万四千元。第二，农村织布机，由农民自己集股建立，政府帮助解决其困难，如训练技术工人等，或作部分投资，如机子投资等。第三，发花二斤，收纱一斤。农村织的布，农民自己用。高岚纺纱厂应起推动妇纺、训练工人的领导作用。”延安同志这一计划是很可注意的，如果素少纺织经验的延安人民，能由党政推动于二三年内全部解决纱布自给问题，则其他无经验各县当然也可在相同时间或较多时间内解决，我们希望各县同志都有一个计划。至于有经验各县如警区一带，当更易解决。根据延安同志的推算方法，大人占三分之二，小人占三分之一，大人四人一匹布，小人八人一匹布，则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年需布不是二十万匹，而是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匹。即使这样大的数目，根据延安同志的意见，也可在二三年内解决。总之，依靠人民动手与党政领导，是什么困难也可克服的。

（二）由建设厅研究民间纺纱经验，改良土纱质量，准备使边区布产全用土纱，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停止洋纱的入口。如纱质不能改

良，洋纱是无法杜绝的。

（三）改良公营工厂的毛织物，用毛织物代替一部分军用棉织被服，借以减少棉布的消费。

（四）一九四三年公务人员以身作则，一律着土布。同时劝告人民多用土布，少用洋布。由物资局根据土布发展情况，逐渐限制外布入口。

用了上面这些办法，就可帮助我们逐步解决纱布自给的大问题。虽则这只能是逐步去做，但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坚决实行各项解决纱布自给的办法。

乙　棉油业

因为植棉各县的农民，一九四二年已能收棉籽约三百万斤，可榨油约三十六万斤；明年扩大植棉，可得棉籽五六百万斤，又可增加榨油量，我们不应让其抛置。棉油是可供食用的，但边区农民还无此习惯，如无政府提倡，他们不会榨油。因此应由边区政府投资三十万元，经过植棉各县政府劝告农民试办棉籽榨油业。试验成功后，再行推广。油归政府收买，这不仅可以解决吃油问题，而且按照现在油价（每斤三十元），如能产油三十六万斤，农民则可收入一千零八十万元。

丙　蚕丝业

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固临等县，很多农民养蚕，是一项相当大的副业。如安定一县一九四二年养蚕的就有三千五百

八十五户，得茧二万三千六百六十二斤，值洋六十万元。

我们的缝纫工业需要丝线，我们的毛毯工业需要丝边，我们还可用丝作纬织布借以减少洋纱入口，故应发展边区丝产。其办法是由政府支出三十万元，贷给农家，发动养蚕，特别贷给那些养蚕成绩好的农民。并由物资局，经过当地合作社，收买农民的丝及向农民定制丝织品，促进丝业的发展。

上述纺织业、棉油业、蚕丝业三项，共计投资二百六十万元（纺纱一百万，织布一百万，榨油三十万，蚕丝三十万），款虽不多，却可推动人民发展一步，解决当前的迫切需要。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更有经验之后，应该考虑增加资金。特别是纺织业，非有民间动手，公家帮助，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

我们只在这里提到纺织、棉油、蚕丝三项，其他均未提到。各县可按具体情况，将有关人民经济又须党政推动的手工业，加以研究，做出自己的计划。

五　关于发展合作社

边区在内战时期，就有合作社。抗战以来，边区政府继续提倡，又经过五年半的磨炼，逐渐发展了边区合作社。

就消费合作社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年中，由一百三十社增到一百五十五社；社员由五万七千八百四十七人增到十四万零二百一十八人；股金由五万五千五百二十五元增到六十九万三千零七十一元；销贷额由二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十九元增到六百万八千余元；红利由四千八百元增到一百零二万余元；公积金由三千五百余元增到十七万三千余元。

一九四二年十月底止，十九个县市的统计，与一九四一年比较，社员由九万七千二百九十七人增至十一万五千八百九十九人，股金则由七十一万二千九百余元突增至六百余万元，红利亦由八十五万八千余元增至三百三十九万八千余元。

消费合作社社员的股金，最高的达到一万元，最少的每人四元、五元不等。

消费合作社的分布：到一九四一年底，计延安二十八个，安塞十二个，延长八个，固临八个，定边八个，庆阳、华池、曲子、延川各七个，安定、鄜县、吴起各六个，甘泉、靖边、合水各五个，延市、米脂各四个，绥德二个，其余各县尚无统计。

就生产合作社说，一九三九年起，经过政府的提倡与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的帮助，建立了十个生产合作社。继而有一些资本较大的消费合作社也兼营生产合作社业务。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止，由十个生产合作社增至五十个；从事生产的员工，由一百九十九人增至五百六十三人；股金由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元增至二百四十九万一千六百元；每月生产总值，由六万元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元。

生产合作社的分布：据今年统计，绥德十六个，延安七个，固临五个，延长五个，延川五个，甘泉三个，安塞三个，靖边二个，庆阳一个，葭县一个，米脂一个，安定一个。

五十个生产合作社中，有纺织合作社大小二十七个。计绥德十三个，延安四个，固临二个，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葭县、米脂各一个，共员工四百九十七人，股金一百七十万元。其中有二十五个员工以上的有六个，其余十余人、三五人不等。此二十七社，如果全部开工，年可产布三万匹（十丈一匹），现只产二万二千匹左右，织线毯六千条，织毛巾四千一百五十二打，

织袜八千四百打。

染色社五个：计延川二个、绥德二个、延长一个，员工共十三人，股金十二万八千元，年可染布七千余匹。榨棉花籽油的生产合作社五个：计固临二个、靖边二个、延长一个，员工共十九人，股金二十四万五千元，年可榨棉油一万斤。粉房九个：计安塞、甘泉、延长、延川各二个，固临一个，员工共二十四人，股金二十六万二千元。制毯合作社四个：计延安二个、庆阳一个、绥德一个，员工共四十二名，股金十五万二千元，年可制毯七千六百条。瓷窑社：延安县一个，员工七人，股金三千元，年出瓷器六窑。

从上面的统计来看，消费和生产两种合作社，不论社员、股金、红利与事业各方面，在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发展，五年来经过了三个阶段；而质的发展，则直到一九四二年才迅速前进。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各地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为基础，再加上向群众摊派而得的股金，这时候是带着公营性质的，多成为县、区政府的公营商店。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地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决经费，一切问题由政府解决。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三九年后，提出了“合作社群众化”的口号；但各地仍多用旧方式在群众中去扩大摊派的股金，来推行其所谓“群众化”。因此，合作社仍被群众认为是摊派负担，而不被认为是群众自己的。合作社的人员，仍然是和公务人员一样，要群众优工代耕，群众看不到合作社对自己有多大利益，反而增加了群众的劳力负担。由于一九四〇年以后各地政府生产自给任务的增加，于是有许多合作社的大股社员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机关；合作社对群众利益自然更加无法多去照顾了。这是第二阶段。只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建设厅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

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各地合作社才从实现这一方针中，取消了摊派入股的方式，摸索地创造着和群众密切联系，和群众利害相关的经验。这样，仅仅在十个月中，股金即突增五百余万，事业也发展了。在组织人民的经济力量、减免中间剥削与发展人民经济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第三阶段。只有到了这个阶段，边区合作社事业才一般地开始走上了正轨。

以上是说一般合作社的发展道路，但中间也有例外，例如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就是较早走上正轨的。南区合作社在几年的锻炼中，成了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一九四二年，在绥德、安定、安塞、甘泉、延长、吴起等县的个别合作社，也正在学习这个模范合作社而前进。

南区合作社究竟有哪些特点呢？它有下列各项优良特点。

第一，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六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它不斤斤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尽量将赢利分给社员；它不限制股份的红利，不论社员股金多少，一律照股分红；它不限制社员对股金处理的权利，每个社员都有随时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加入（因为延安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区域，各阶级入股并不妨碍共产党对合作社的领导），机关社团也可加入。也不一定要用现金入股，当它还未在群众中有完全信仰时，它允许人民用公债券、储蓄票入股，以扩大股金。当它在群众中已有信仰，而群众要求入股无钱时，它号召群众可用一切有

价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等。因此，一切人民称便。

第二，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它逐渐被群众所爱戴。如每年春耕时，事先从韩城等地运铧，以比市价要贱的价格卖给农民。组织各种生产事业，不仅吸收了失业工人，招收了学徒，安置了工作人员的家属，而且扩大了事业的赢利，保障当地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比如南区合作社组织八百多妇女纺纱，每月可纺一千四百斤，每月增加收入七万元。它的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方针完全为保障老百姓的必需品，不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东西还要便宜。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经过合作社，一方面贯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方面又调剂人民的负担使其更加合理化，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比如一九四一年政府动员驮公盐时，南区合作社要南区人民交纳代金给合作社，而由合作社的运输队代替人民驮盐交政府。比如在政府收公粮以前，合作社动员老百姓先交照上年应交的公粮给合作社，合作社不仅保障替社员代交本年应出的公粮，而且承认所交公粮的数目即作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因此，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向政府交涉，替政府保管公粮一方，在政府未支用以前，合作社可以将公粮周转赢利；一方面，老百姓不仅交了公粮，而且入了股。所以有些老百姓家有余粮的，甚至愿交二年的公粮给合作社，不管下年增加公粮多少，由合作社负责代交，南区有四十余户农民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就固定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提高了。比如县、区政府要人民出教育经费与

自卫军放哨费，亦由合作社从红利中替人民支付，既可免政府收费之烦，又可减人民支付之苦。比如政府奖励移民、救济难民的政策，合作社亦可实行（它可以给难民、移民以贷款等等）。如此种种，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开社员全体大会，而由社员按村举代表到会。不采取摊派入股的方式，而是团结社员的积极分子去劝导人民入股。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而照股分红，但在解决合作社的一切问题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员都有平等权利。

以上就是南区合作社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消费合作社方面，并未违背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基本精神，而且正是根据边区人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而产生的。在生产合作社方面，虽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雇佣企业；但在手工业不发展、手工业工人不多的边区，为着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现在的生产合作社方式，也就成为适合现地现时条件的产物了。

南区合作社，从一九三六年起，经过六七年的摸索与艰苦奋斗，到现在，已由一百六十个社员发展到包括南区户数百分之九十以上，自愿入股的一千一百一十二个社员，股本由一百五十九元发展到二百万元，由一个社发展到十六个社，净利由数十元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十个月统计的一百六十二万元。它发展了南区人民的农工商业，照顾了南区人民经济利益的各方面，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

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

起纽带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因此，一九四三年，党与政府在全边区合作事业上，应该进行下列工作：

（一）由建厅负责调查研究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写成小册子，作为各县政府第四科及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教材；并利用在延安开会的机会，引导边区各地工作干部去参观南区合作社。

（二）物资局所属各地的企业，对于消费与生产合作社之有成绩者，必须帮助其供销：对消费合作社批发货物，对生产合作社供给其原料与保障其生产品的销售。政府应于一九四三年拨出三百万元交物资局，以为调剂合作社供销之用。

（三）政府为着奖励合作事业，必须明文规定与认真执行减免合作社租税负担。

（四）边区政府及各县政府，应征求高小以上程度的学生，训练会计人材与经理人材，帮助各地合作社解决会计与经理的困难。

（五）合作社工作人员，必须实行群众化，实行薪水制，取消对合作社人员的代耕制；改良合作社的组织，实行精简，使之企业化，克服机关化；减少工作人员，减少开支。

为了使同志们明了南区合作社的发展史，我们特请该社主任刘建章同志写了一个报告，今载于下：

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历史

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号开始对人民宣传入股，当时苏维埃票每

股三毛，二十天就有社员一百六十名，收了五百三十三股，合苏票一百五十九元九毛。

当时推选王天金为主任，刘建章为会计，李生章为采买。

三个月为一期分红利，第一期长毛利一百九十九元四毛四分。

开支：工作人员三个津贴九元，伙食四十五元，纸笔墨费三元五毛，慰劳前方毛袜、手套十三元，优待抗属十五元，优待小学校八元，公益金十元。除费用外，每股红利一毛八分，共分洋九十五元九毛四分。

此次分红，召开了社员大会，所有社员全数到会。在大会上报告了合作社做过的事业，分了红利，又请社员吃了饭。这次会后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当时社员自己提出：合作社替他们优待了抗属，帮助了小学校，优待了前方军人毛袜、手套等，大家应当多入股。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王生明任保管员。我计划扩大股金。王主任提出不满意，说扩大股金就要应付地做。我要向县政府讨论，以后就到了县府国民经济部长刘世昌那里，刘部长允许扩大股金。那时王天金和大家弄得意见不投，因此县府就将王天金调换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推选刘建章为主任，王生明为会计，李生章仍为采买，又成了三人。我们一方面营业，一方面扩大股金。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初二日为第二期分红日期，结算新增二千六百九十七股，新旧股共三千二百三十股，合洋九百六十九元，仍是三毛一股，三个月营业过流水三千六百五十七元，长毛利二百七十六元。又帮助小学校六元，优待抗属十二元，募捐帮助前方军人二十元，公益金十元，三个月伙食五十三元，津贴十三元五毛，办公三元五

毛。除费用外，每股分红利五分，共洋一百六十一元五毛。分红时，照前召集社员大会，到会社员三分之二，报告了合作社所做的事情，那时替军队买三十担粮，又凡西北军委招待处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买。这笔生意，那时收的完全是苏票，老百姓不同意，要合作社要求以货物为凭代购，一方面给些货物，一方面可收苏票。在这一个时期，社内干部非常吃苦耐心地接洽人民和军队，从此就建立了军民两方面的关系。如果老百姓有的苏票到别处买不到东西，合作社可以买到。发表了这些情形，社员更对合作社有了认识，自己提出说：合作社是能替他们做事的。

第三期

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开始，又计划增加干部，新提拔来孙生花担任采买。他工作了一个月，每天给军队代买东西，使得孙生花嫌麻烦，提出不工作，再三说服教育，死也不愿做合作社的事，因此就出去了。又来了李生彩担任采买。计划在沟门上开一处柴草店，合作社出资二百元，作为一个单位，李生章担负店内的主任，他的老婆任伙夫，李生彩当槽店，三个月长毛利四百元。

营业部和店过流水七千一百七十五元六毛，长毛利五百三十八元七毛。苏票买货三元折白票一元，苏票变成白票，合算赔洋一百七十五元。社员入股，苏票一元顶白票一元。捐前方军人二十五元，帮助小学校十元，区妇女主任被土匪抢了，补充被褥四元五毛，公益金十二元，假票亏损洋八元五毛，津贴费四十五元，伙食九十元，办公七元五毛。新增加二千一百三十股，新旧共股数五千三百六十股，共洋一千五百九十六元，每股分红利二分，共分洋一百六十一元二毛。

这一期内，有安塞、保安和本区的长脚户组织运盐合作社，佃

本合伙，成立一运输队，共有驴马骡十二头，连同私的牲口一百余头，经常不断地到盐池运盐，由合作社代卖。尤其拉扯外县的脚户向店内加入股金三百二十元。在这一期过程中，所集股的苏票完全变成白票了。

九月间社员大会作了报告。大家发表意见说，三毛洋的苏票成了一元白票，更提高社员的信心，提出计划扩大股金，统计人口，了解人民的经济状况。全区三个乡，共住四百三十二户，人口一千七百三十三名，有牛具二百二十二具；牛三百二十三头，驴一百二十五头，羊二百七十头，全区人民经济总共合计二十二万元，牲畜土地房产一切在内。人民平均每人每年衣服、农具、食盐、洋火等合计费用四十元，共计六万九千三百二十元，食粮在外。我们向大会提出：每人加到二十元股金，就可解决人民的日常需用品。社员同意发展股金，将三个月一期延长为六个月一期。

第四期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为第四期。将原有三毛一股提成五毛一股，共股数五千三百六十股，合洋二千六百八十元，过流水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五元，长毛利一千七百三十二元三毛。去公积金一百一十元，公益金六十八元，慰劳前方毛袜、手套二百四十五元，优待抗属十八元，优待小学校十二元，社内工作人员及雇工共津贴三百一十元零五毛，伙食九十元，招待费三十八元五毛，办公费六十一元五毛，奖励工作人员六十元，去修理费二百八十五元。除开支外，每股分红利八分，共分红利四百二十八元八毛。但虽是上期社员大会计划每人入股二十元，因人民经济困难，未曾实现，只是完成了一部分。此次社员大会又计划成立信用社，扩大股金一千元，如人民有婚姻葬埋之事，可来合作社临时借用，不出利

息。这一口号一出，社员即提出保证全数完成入股任务，内容是调剂的性质，并计划在柳林开一处饭馆。

第五期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八月。首先增加了干部王耀明、茆克业、李生海、黄保中等数人，三个月内将信用股金完成一千零六十元。除信用股外，又扩大了股金一百一十元。新旧股金洋三千八百九十元。六个月营业四万二千五百元，长毛利三千六百三十三元。慰劳前方军人毛袜洋一百八十五元，救济募捐洋二十二元，奖励金八十元，修理费二百三十元，开会费招待费八十五元六毛，办公费一百八十九元，津贴工资费（二十四人）八百六十四元，又加伙食九百元。除支使外，每股分红利一毛，共分洋七百七十八元。在分红时，召集社员组长大会，计划集股买铧五百元，每叶铧二毛五分，买二千叶犁铧；扩大油房一处，粉房一处，为了在延安市建立商人关系成立公益心一处：当时社员组长无不同意的。

第六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将五毛一股转变成为一元一股，又扩大了股金四千五百一十元，新旧共股金八千二百元。六个月营业四万九千八百六十元，长毛利四千一百一十八元。优待抗属三十四元，公积金六百五十四元，公益金一百元，奖励一百三十一元，招待费一百八十元，杂费一百一十六元，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费（三十人）八百六十七元，伙食洋一千一百一十六元。在这个时期，将原先计划完全实现了。到韩城买了二千叶铧，每叶铧价洋五毛，市价卖九毛，卖社员每叶铧六毛，节省三毛，共节省六百元。油粉房完全完成了。这期分红利仍以半年为一期。总共有社员八百五十名。

第七期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八月。开始计划与私人合伙做生意。当地有些人要做生意，恐怕政府多要负担，将洋入到合作社，半公半私地做，人作分股（以人身入股）。首先到三十里铺，与私人合伙成立了一处营业部带店挂面部饭馆，合作社入本二百元，人民入洋八百元，共一千元。在这个合伙生意中，给人民解决了许多困难。定出章程，股本入社或出社自由。做到年底，政府为了把握合作社原则，指出合作社发展了私人经济，不允许私人发展，就将这个生意打折了。

同年扩大股金八百六十元，新旧股金九千零一十六元。社员九百六十名。

总共营业五万七千六百元，长毛利四千七百七十八元六毛。

除公积公益及其他支费，净利每股分一毛，共分洋九百零一元六毛。

在这次分红利中间，产生了许多的困难。一方面发展股金慢，各货高涨，使合作社无法经营；一方面看到人民的意见为没有个人发展的利益，不愿多入股。再三宣传说服，他们总是不多加的。我个人估计，不与私人合伙，合作社无法开展。未经过政府同意，就与私人合伙做生意。在理事会上提出和大家商讨，理事会的人同意合伙。

第八期

一九三九年九月，又在三十里铺与私人合伙成立兴华分社，沟门上成立民合社，柳林开民生公店药铺，南庄河立和合社，都以半公半私的名目发展了私人入股十万余元，在分社内工作的人打股份资本，写了合同，仍是自由入退，合作社不限制的。嗣后县政府知

道了，要看合同，看了合同以后，他同意我们合伙做。将原有的合作社作为区总社，各乡建立分社。除分社外，总社又扩大股金二千六百二十九元，新旧共合股洋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五元。总分社共营业过流水十五万八千三百五十元，长毛利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元，费用八千八百九十五元一毛三分，净利九千三百五十四元七分。每股分红利一毛，分社在内。有了分社合作，总社就有了力量成立生产事业。一九四〇年与光华商店合伙买骡子，成立运输队，利用私人合作。运输队原有资本五千元，到年底发展到一百六十头骡子，经常运盐运货。又成立一处纺纱织布工厂，皮房，西区合作社，杜甫川新民社，七里铺集成过载栈一处，毡房两处。从前入股以个人为单位，比如一个家里的人有几个社员。后来嫌麻烦，合并了，以户为单位，一家只有一个社员，共有社员八百五十三名。

这个时期社员合并后，每户人有入三五百元至一千元的。同时有外县的小商人脚户也加到各分社，股金一万元。特别是洛川、鄜县、安塞、保安、三边等处的脚户，来往最多，向合作社入股。到了九个月分红利时，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报告了合作社的开展原因。经过检讨，又提出以后工作方针：一、扩股三万元，要代表保证完成。二、收土产品，代替人民出售；供给人民一切需用品，由合作社负责向外购买货品。三、全区人民食盐、洋火、犁铧，不向外买，完全由合作社供给。计算全区人民七千一百三十五名，每人每天食盐二钱，全年食四斤半，共合盐三万二千一百零七斤半，每斤盐比市价低一元，共节省洋三万二千一百余元。洋火每年每户用五包，共用八千六百七十五包，每包比市价低五元，共节省洋四万三千三百七十五元。全区用犁铧一千五百叶，每叶比市价低十五元，节省洋二万二千五百元。三宗共节省洋九万八千零五元，全区

人民一年穿衣用老布七千匹，每匹棉花二斤半，共棉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五斤，值价三百五十万元，给人民纺成纱，赚一半，计一百七十五万元。在这个大会上给社员报告了工作计划，经过社员同意，就发展了农村妇女纺纱织布机子。

第九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进行扩大股金，以救国公债入股。政府动员人民买救国公债票，将人民所出的公债数加成股金，股金所分之红利付于公债三万三千元。由这种人民困难情形之下，帮助人民解决了负担，使人民更相信合作社是能解决困难的。

新增股三万三千零七十元。新旧股金四万四千七百一十五元，是总社的。各分社股金十二万。运输队八万元。总共股金二十四万四千七百一十五元，社员一千零一十八名。总分社营业流水一百一十六万一千八百四十元七毛。长毛利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七元四毛。开支费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九元三毛，净利十四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元，每股一元分红利七毛。在分红利时提出：红利七毛作为一元入股，提高社员的信心，将分到的红利大数的加成股金。人民余外入股，以土产物品草料粮食作钱，比市价高，如每一斤草比市价高二毛。凡人民入股给物品，总比市价高，又提高人民的信心。

第十期

一九四二年成立织袜工厂一处，开始宣传入股，二十元为一股，送社员袜子一双。此后棉花高涨，乃增至四十元一股，共入股洋三万元，开办了织袜工厂，现有袜机六架。延安市开运合过载栈一处，集股四十二万元。松树林成立分社一处，扩股三十四万元。运输队所长的盈余，扩大成本为七十五万元。总分社扩股一百二十三万二千元。新旧股本二百五十二万元，社员一千一百一十二名

(每名代表一户)，其中最多入股金五千元。在本区境内合作社共有十九个单位（生产、运输、消费均在内），除合作社外再没有私人商业。南区面积长六十里，阔四十里，内有住户一千五百四十四户，七千一百二十八人，共有牛一千四百六十九头，驴六百三十五头，马六十匹，骡子二十二头，羊四千四百四十五只。种地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六垧，收麦子八百七十二担五斗，收获粗粮九千零八十四点一六担，折细粮五千六百六十二担四斗三升，副业进益折细粮三万三千四百二十五担（十八桶斗），共合米六千八百六十九担一斗八升。一九四二年出公粮二千四百八十担，除出下剩米四千三百八十九担一斗八升，每人平均占六斗米，牲口料一千五百担。

今春政府动员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三万四千元。高峁湾生产股金八千元，银行储蓄券三万元，共六万二千元，分三次来的。每次每户开会收集，要误工一个，三次误工三个，共计误工一千五百个，每个民工三十元，工资合计要误十三万五千元，又加上六万二千元，总共负担十九万七千元。所以合作社替人民交纳了六万二千元，节省了人民的误工十三万五千元。尤其在农忙时间，帮助了人民的生产。又替人民代交公盐一千零五十驮，每驮二百四十元，共交二十五万二千元。减少人民的误工，影响了人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又发展了股金四十二万元。计划代交下年的公盐。

组织农村妇纺六百个，每人每天纺纱二两，每天共纺七十五斤棉花，人民应赚一半。每斤纱以一百五十元计算，一天得利五千二百五十元，全年进利一百八十九万元。今年纺了五千斤棉花，前半年棉花价小，前后合起每斤以七十元计，人民赚花二千五百斤，合洋十七万五千元。合作社做车子垫办二万元，除二万元外，人民实赚到十五万五千元。现正在发展妇纺中。过去南区没有妇纺，现在

大批地增加妇纺，就是原料资本困难。其次，今年代人民代卖木炭二十万斤，每斤二元，人民得洋四十万元。

以上事实是合作社做过的。今年的红利未分，原因是遭水灾，合作社损失房子五十八间，值洋四十万元，器具三十万元，货物四十万元，复成栈店一处值洋二十万元，共计损失一百三十万元。以后政府帮助借贷洋五十万元，去定边买货三次，长利三十万元。现在又修理费洋二十四万元，正在发展股金中。

合作社的组织，农村每村选代表一人至二人。合作社务有理事会十一人参加，每月六号召开理事会一次。一切营业及干部问题，在理事会上解决与布置。

附注：

（一）合作社现有房子二百三十五间，石窑五十五孔，按现在折价值洋二百八十九万元；流动金一百五十万；器具牲畜值洋一百零二万；共计洋五百五十万元。（房产、器具、牲口、流动现金一切在内。）

（二）合作社的经验教训，在延安经济建设材料关于南区合作社一页内说明。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因上文第八期至第九期时间相距两年之久，似有脱漏，托人询问。据复如下：

关于南区合作社划分时期的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开始创办，三个月后开第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以后每隔三个月召集一次全体大会，如此，共召集了三次。以

后六个月召集一次，也共召集了三次。第六次大会以后过了八个月，就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三九年底）；以后一九四〇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一年八月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今年七月打算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遭水灾，不易结账，故而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开会的期间距离短，并且是开全体会，因为范围小，社员少；以后一年才召集一次，而且是代表大会，因为社员太多，事业扩大，结账不易。

上次报告材料，将一九四〇年七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写漏，故而第八期长至两年。

原报告材料，手头无底稿，此一材料如还有问题，请示知，以便再报告。

王丕年　刘建章

十二月十五日

以下是延安县委同志关于南区合作社的报告，并列于此，以供研究。

柳林区（即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

从柳林区合作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合作社的业务，不仅限于消费，同时将生产、信用、运输联系在一起，成为合作社业务的一个整体。本社及分社共有十六社。

属于生产的，有纺织工厂一，皮房一，毡房一，油房一，粉

房一。

属于运输的，有运输队百余头牲口，合作社投资达五十万元。

因为柳林合作社将几种经济事业合在一起经营，所以营业范围大，资金多，活动大，发展快，给人民解决日常必需品也多。本县其他合作社只限于消费的，比兼营生产、运输的合作社资金少，活动范围小，发展迟缓。

第二，合作社民办政策，是采取柳林的经验而提出的。该社股金扩大，吸收小商人资本，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举凡合作社的工作，都由社员来讨论，来决定。人民对合作社是非常关心，并不认为是官办的，而认为是自己的。

第三，给群众解决日常必需品，并比市价低，如布匹、食盐、火柴、铧等。单就火柴、食盐二项，每年就给人民节省下八万余元，人民当然是愿意在合作社买东西。该社在布匹、食盐、火柴、铧四样必需品方面，可以供给柳林区人民的全部需要。

第四，给群众解决紧急的困难。例如有婚丧大事，可以暂时在合作社借款，或拉欠布匹，或抵押东西，约好期限归还，即是带着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这样就给人民解决偌大的困难。因为急事一时钱不凑手，东告西借，无法解决，而合作社给以解决，所以更给人民以信仰，认为合作社真正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第五，扩大股金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

（一）现金入股。

（二）实物入股：一只鸡，一双鞋，几张羊皮，几根麻绳头，都可以折价入股。

（三）吸收小商人资本。

（四）给群众解决负担，即当入股。政府的负担下来后，合作社

即号召入股，负担由合作社出。

例如一九四二年该区人民应缴与政府的公盐代金二十五万元，由人民作为股金交与合作社，而由合作社运缴公盐给政府，借以周转营利，人民还可分红。用这种方式，如公债、教育经费、哨站经费等，都由合作社一收一缴，这样政府的负担出了，合作社的股金扩大了，营业扩大了，人民得了利，少麻烦，又能以社员资格分红。

（五）利用人民当时的要求，适时地提出扩大股金的口号。例如要发展纺织，就提出发展纺织股金的口号。该社一九四一年试办代人民出公粮，每担先一年由人民折钱入股，合作社得钱扩大营业，到第二年公粮分配给人民时，由合作社以营利所得代缴。代办四十来户，这四十来户出了公粮差不多等于未出，他们变成合作社的股东，年年可以分红，他们高兴得很，生产热忱大大提高，粮食打得更多了。

（六）入股时发给红利。如入股四十元发给袜子一双，值二十元，这样来鼓励人民入股。

第六，合作社地点的条件很好。因为该社在柳林区，一个靠近延安新市场大商业的地方。柳林区森林多，人民卖木料木炭的多，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因而在农村中的流动资金多，可以吸收入股。同时靠近市场，资金的周转也迅速。这是客观条件。

第七，合作社的活动范围大。该社在边区银行、光华商店以及延安各机关，都建立了关系，资金有时可以拉借，可以代各机关做许多工作，互相帮助，合作社也得了发展。

第八，干部的少调动与注意调查研究。该社刘主任从任合作社主任以来，从未调动工作，能专心一意去想工作，研究工作，

想办法。同时，他对于客观情况的调查，也很注意，如每个人一年的布匹、食盐、火柴等要消耗多少，经常研究，以便解决人民生活困难。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证明该社和人民的关系。柳林区驴风坡农民白大，一九四一年须交救国公粮六十元，先行交给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届时向政府代交。以后此六十元分的红利又加在股本六十元内，变成了二百元。他在合作社买铧四叶，每叶代他节省十五元（比市价低十五元），共节省六十元。买火柴五包，每包节省五元，共节省二十五元。一九四一年腊月底，他在合作社买货一千元，当时只付五百元，还有五百元未付，而这些货物按后来市价，涨了五百五十元。连前面买铧、买火柴两项，共替他节省六百三十五元。本来是交公粮六十元，现在变成股金二百元，又加买货节省六百三十五元，正做到了合作社是人民的，便利人民交换，为人民谋利益的地步。

这样的例子很多。

全县合作社情形

第一，社数（一九四二年七月）：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分社	18	30
区社	8	8
合计	26	38

第二，股金：

	一九四一年（元）	一九四二年（元）	（半年的材料）
区社	264207.56	312207.56	
分社	193340.00	978507.14	
合计	457547.56	1290714.70	

半年中股金扩大833167.14元。

股金发展快的是分社。分社是直接由人民组织的，在区合作社协助下成立起来，所以人民入股很踊跃。

一百二十九万元股金，平均全县每人二十元，不能做什么事，所以合作社的作用在全县来说还小。

主要的经验

第一，坚决执行民办政策，政府不干涉。本年七月检查合作社一次，号召扩大股金，要雄厚的资金掌握在合作社手中。

第二，对合作社干部不轻易调动，使能安于其位，专心工作，生活上给以保障，在合作社采取打身分办法，按合作社人员的能力职务，每人当作若干元入股，例如某人当作五千元入股（打身），即按五千元的红利率结账时按股分得红利，作为他的薪水，此不支薪水。

第三，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扩大，不应只限于消费，应该同时做生产、运输、信用等，这是今后合作社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是，要办综合性合作社。

第四，抓紧办好一二个合作社，取得经验，逐渐扩大到其他地方，例如我们准备将金盆区松树林合作社办成第二柳林区合作社。

这些也就是今后工作的意见。

六　关于发展盐业

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了一个重要地位，运销逐年增多。一九三八年，我们出口的盐还只有七万驮（每驮一百五十斤，每斤二十四两）；一九三九年，突增至十九万驮；一九四〇年，二十三万驮；一九四一年，又来一个突增，达到二十九万九千零六十八驮；一九四二年，至九月止，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驮，估计最后三个月还可销七八万驮，共约二十三四万驮。这个统计，表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外面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努力。有些同志看不见外边的需要是由抗战决定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盐是有销路的，因而主张听其自然，党政无须加以干涉。另外有些同志，则把盐的逐年增销仅仅归因于外面的需要，而不知道党政的领导干涉是增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之注意盐业，是从一九四〇年秋季开始的。一九四一年之所以由一九四〇年的二十三万驮突增至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除了因为一九四〇年外边盐荒、存盐抛空，故一九四一年盐销特别旺盛这一个客观因素外，还有我们在这一年实行了督运政策这一个主观的因素包

含在内。一九四二年，忽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降至二十三四万驮，除了外边的需要不如一九四一年那样紧急外，也还有我们自己放弃了督运政策（把组织起来了的许多民间运盐计划停止）这一原因在内。我们如不从此得出教训，则对今后工作又将重复过去的错误。固然，一九四一年的盐业工作是有毛病的。原拟运销六十万驮的计划是太大了，边区在这一年还不可能解决这样大的运输力；产盐有七十万驮的成绩是好的，但盐质又太坏；督运是正确的，但不应普遍动员到一切地区的一切人；动员的组织与方式也有许多不合实际情况的弊病。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一年我们工作的缺点或错误。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盐业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一点的忽视，不了解，甚至妨碍，是完全不对的。

一九四三年应该怎样呢？首先要确定积极发展的方针。边区目前情况，对于作为一个极大的因素借以解决财政困难（公营盐业及盐税）的盐与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借以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与物价的盐，决不能采取消极态度。因此，必须扩大已经设立的盐业公司，作为联结公私盐业、扩大公私产运销的主力军；提高盐产质量，以利广销；恢复督运工作，组织民间一切可能的运输力，扩大运盐；吸收外来脚户多运多销；修筑道路，配置店栈草料，以利盐运；由盐业公司逐渐统制外销，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就是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内关于积极发展盐业的总方针。

其次，我们的具体布置应如下：

（一）扩大盐业公司，增加其资本，在物资局的指导下，吸收各机关部队及私人入股，发展盐的运输，扩大盐的销路，调节盐的价格。保障在一九四三年内自己运盐四万驮，即以这批盐为基础，尽可能地收买民盐，实行部分的对外统销；然后依据情况，逐渐做到

完全统销，借以抵制外边的操纵，保障公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二）一九四三年应计划产盐四十万驮，运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并争取超过。关于产盐，仍继续官督民产政策，保障盐的质量大部至全部为上盐，不许再产下盐。关于运盐，拟定盐业公司系统运四万驮，吸引外来脚户运五万驮，组织边区人力畜力运二十一万至二十六万驮，共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

（三）组织边区内部运二十一万至二十六万驮盐的人力畜力，是一个很巨大、很艰苦、很细密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应由建厅主持，各级政府负责督运，各级党委则任检查、帮助之责。运盐的动员，一面要带某些强制性，但一定要避免有害的命令主义，主要应取宣传说服的方针。运盐的组织，要采用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的方式，宣传群众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而以赶过长脚富有经验的人及必要的牲口组织成运输队；县区乡各级的党与政府应积极指导这种运输队的合理、公平与健全的组织；顺利地出发，在路上要进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员与牲口的安全；归来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保障经手人及全体社员的利益。运盐必须不违农时；必须加强劳动互助社（变工）的组织，使运输队出发后一切社员不因缺乏人力畜力而损害农业生产。绥米警备区及东三县的运盐组织（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应允许群众有更大的自由，更少带强制性。任何地方的运输合作社与运输队，必须使其建筑在为社员谋利益的基础上，党与政府的任务在于使这种利益日益增大，否则是一定要失败的。建厅、各分区及各县，应将民众运盐最有成绩的实例教导人民，广为宣传，仿照办理，务使一九四三年的运盐事业能完成计划，而又大大地直接有利于人民。

（四）物资局各地企业及各地人民合作社，要与人民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密切配合，尽可能使人民运盐牲口能驮回来货，才能使人民运盐事业获得发展，整个运盐计划才能完成。

（五）发展盐业的中心环节是运，运的重要条件是交通。一九四三年政府应拨二百万元，由建厅主持，修通延定、定庆两条大车路，整理延鄜路。并由物资局沿诸运盐大路开设骡马店、转运栈，缺水处开挖贮水窑。由建厅协同物资局在沿途广植苜蓿，并用其他办法配备草料。只要有路、有店、有草、有水，运费即可大省，运量即可大增，外来脚户、本地人民、盐业公司三项运输，都会发达起来。为改良运输工具计，另由建厅主持，按道路条件制造大车小车，增加盐运。只要路修得好，公家多用大车，民间推运小车，较之驮运是好得多的。

（六）一九四三年公盐定为十万驮，近运远代，半运半代。但公盐与发展盐业是两件事，只要确定地能运输三十至三十六万驮出口，公盐或收实盐，或收代金，随便哪样都是可以的。

一九四三年我们的植棉计划与纺织计划如能完成，我们的棉花、棉纱、棉布入口就可减少。如果我们在一九四三年能运三十至三十六万驮盐出口，按平均边币十元一斤的盐价计算（驴驮每驮一百五十斤），就有四万万五千万至五万万四千万元的收入。这样一减一增，边区的平衡出入口问题就又完全解决了。

一九四一年人民运盐经验，可看下列材料：

鲁忠才长征记

——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

谈话，王毓贤、孔照庆补充，高克林笔记，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

（一）城关区第一次应出驮盐牲口五十头，实去二十八头，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是牲口少（最多能动员四十多头），当时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区政府抓得不紧，因忙于借粮、公债。

（二）阳历七月十八日起身，八月十一日回到家，往来二十五天，由鄜县至定边共十二天，到盐池装盐一天，回来十二天。最大的站是九十里。路程、站名及各站概况如下：

1. 鄜县至张村驿五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2. 张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割草喂牲口。3. 烂泥坡至李家砭，有二十里山，四十里沟，路难走，草不好。4. 李家砭至芦家角，有三十里沟，五里山，最难走，草不好。5. 芦家角至乱石头川，在沟里走，有兵站，买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麦草四十元）。6. 乱石头川至三里庙八十里，有兵站，干草每百斤五十元。7. 三里庙至梁庄，八十里，有四十里山路，很陡，难走，水难（苦水，也没有喝的），曾看见一个盐脚户把骡跌死。8. 梁庄至定边九十里，有兵站，草每百斤五十至一百元，没水。9. 定边至盐池四十里，往返一天，沙路难走。

（三）沿途的困难：

1. 张村驿至烂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蚱蜢咬，最好晚上走，对牲口对人都好。

2. 三里庙、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水，人与牲口容易受渴。

3. 定边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

4. 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常有数千百牲口一起走，因之住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难，易走失弄

乱子。

（四）一路生活情形：

鄜县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个，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得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完全看你和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偷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问题，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五）路上所发生的问题：

好的例子：

1. 牲口没有出毛病，一乡和三乡的牲口去时瘦，回来肥了，原因脚户负责，当心喂。

2. 脚夫没有病的和出毛病的，大家身体都很好，情绪高，没有一个瘦了，就是晒黑了些。

3. 沿途没有遗东西，牲口没有吃人庄稼。主要的是鲁副区长是个老脚户，有经验，又负责又细心，人也灵活，所以成绩很好。

坏的例子：

1. 第三乡一行政村村会长杜海，卖了好驴，买条坏驴去，结果驴乏了，没有驮盐，白费了一百六十五元的路费。另外第三乡派去了一个坏驴子（腰坏了），四乡监军台村去了一个坏腿驴，都没有驮盐，都白费了一百六十五元路费。另外该村一个驴被着烂鞍子，结果压坏了脊梁。第二乡乡长有两条驴，去了一条坏驴，鞍架都不好，在路上捣麻烦。这些事事先区级政府没有详细检查，有些像已知道，也未纠正，结果二十八条驴子，只有二十五条驮盐，其余三

条空走一趟，盐价分文无着，白赔了五百到六百元路费，里外损失共在一千五百元以上，此事值得区乡干部警惕。

2. 四乡监军台村村会长不听鲁副区长指示，不给牲口带好料（玉麦、蚕豆），而将高粱等坏料充数，结果该乡牲口因没好料吃，在路上发生卧下的事。准备向该村会长作斗争，处罚他。

3. 四乡脚户杨万保，在路上“耍死狗”，装病，偷跑回来，乱造谣言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一个姓王的。路上没饭吃，驴脊梁都压烂了，店里不能寄粮……”使得城内好多人不安心。区长对这件事注意不够，以后要警惕。

4. 有几家去坏驴，结果驮得少，每驴只驮一百一十多斤。还有四乡监军台村，一家打发驴走时，把笼头都换成坏的，准备驴死，率性一切都不要了。二乡乡长的驴子，这次回来，离家只有十多里就卧下了，他也不肯派好驴去接，打烂账，以为驴一定会死，一定不会回来的，所以不接。

5. 有一二个驴子驮得太多，分给另一空驴驮了四五十斤，到孙克要检税局检查，因无票，被没收盐五十斤，口袋一条（值洋二十元）。

（六）用费和赔赚问题：

1. 每一个驴平均的用费——料二斗，共洋六十元；粮每人一斗五，一人赶两驴，每驴摊七升五，价洋三十五元；路费七十元；合共一百六十五元。外加盐本二十元。平均每驴费洋一百八十五元。

2. 平均一乡每驴驮一百三十斤，二、三、四乡每驴驮一百一十斤，按现在交通镇盐价，每百斤二百元，每驮可卖盐价二百二十元至二百六十元。

3. 就现有每驮盐价，扣去用费，最少可赚三十五至七十五元。

附注：

一、若每驴能驮一百五十斤盐，按现在的盐价每驴保证赚一百元以上。

二、说二、三、四乡每驴只驮一百一十斤，一乡驴驮一百三十斤，是脚夫说的，一定“打埋伏”，因这里一般驴子可驮一百五十斤。

三、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好驴，才能更多地赚钱，驴愈坏愈少赚，以至亏本。

四、经验教训：

经验：

1. 鄜县城关区这次驮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2. 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 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百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4. 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任（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高粱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5. 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关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1. 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

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及时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关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三个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2. 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两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的地方晚上走，水少的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克服了。

3. 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一百三十斤的可赚七十五元，若驮一百五十斤则可赚一百五十元。驴子愈坏赚钱愈少，甚至赔本。如城关区去了三条坏驴子（一条坏腰，一条坏腿，一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一驴白费路费一百六十五元，每人往返共损失一千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乡区干部细心检查，认真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至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 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头驴可省五十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5.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此文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十五日《解放日报》）

七　关于发展自给工业

前面所说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与盐业，都是人民的经济事业，党与政府就其可能与必需的范围内给以指导与帮助，使其有所发展，解决人民的需要；同时，即由人民以租税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公粮、公盐及其他税

收)；又以买卖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又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棉花、棉纱、棉布、羊毛等)；其基本性质是属于人民经营的。只有盐业一项，因有政府盐业公司经营的四万驮盐的运销及直接解决公用食盐约五千驮，故有一部分（约当全部盐业七分之一）是属于公营的。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的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设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

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

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干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巩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顿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产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地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关于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三部分公营经济的分类，仅就主管经营一点而言，不是指经济性质而言；故我们在下面讲到自给工业时，准备将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工业统一地讲在一起；而在论述军队与机关学校的自给经济时，再将个别的工业生产加以说明。但因全部公营工业中，政府经营的占着主要部分（政府纺织厂占全部公营纺织年产二万二千余匹布的百分之五十六，政府纸厂出品占全部公营纸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政府肥皂厂出品则占全部边区肥皂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故将自给工业归入政府部分来讲，也是合理的。

同一自给工业，为什么要这样地分散经营呢？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都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经营的重要原因。例如被服工业，为解决关中、陇

东、三边、绥德各地党政军人员的被服需要，自以就地产布（或买布）就地缝制为有利，决不应集中在延安一处缝制。由于这些原故，我们利用各部门为着解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无限制地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目前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例如中央管理局的团结纺织厂，后勤的交通纺织厂，已经拨交政府管理，就是一例。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分散所以利用各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建立起来，集中所以使各部门得到更好的供给。但尤其重要的，是分散经营不应该忘记集中领导，这就是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经营合理与分配恰当之必不可少的步骤，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今后必须加以调整。总起来说，我们的方针就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不但工业是这样，农业商业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对于所有的公营农工商业，都要区别两种形式：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应该集中，小的应该分散。例如由各伙食单位，或几个伙食单位联合，为着解决自己日常伙食费、被服费、办公费之不足，而进行种菜、喂猪、打柴、烧炭等农作事业，做鞋、打毛线衣、开小磨坊等手工业；与为着消费目的及为着赚点小利解决公费之目的而进行的合作社事业及小贩商业，所有这些，就都是应该奖励其分散经营的。这些都必须分散，到处进行，到处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集中，因此也就不应该集中的。这是一种形式。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例如：为着解决军队全旅全团一定数额的粮食而进行的大农业计划，即屯田计划，为着解决多数机关的粮菜需要而经营的大农场；为着解决全旅全团或多数机关的被服需要

与日用品需要而经营的大作坊、大工厂；为着解决全旅全团或多数机关的事业经费而经营的大商业，所有这些，就必须有统一的计划，集中的管理，严格的节制，不能听凭他们各自为政、毫无拘束地去干。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由这样的一个机关（现在是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办事处），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做出统一的计划，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在党政军的每一大系统里，又有统一计划与分别经营的事。所有这些，就是边区公营经济中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全貌。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过去五年的公营经济事业，有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士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

又我们所谓公营自给工业，在目前还未达到自给的全部需要量，还谈不到以其余力解决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还只能由党政予以组织推动，由人民自己动手去解决。目前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争取在二三年内完全满足自给的需要，特别是布匹的需要，不要妄想在目前条件下可以有什么了不起的发展，这样想是要害事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论述五年来我们的公营经济事业，先说自给工业。

我们之注意公营工业的建设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这一年，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工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到后来，大部分都起了很大的倡

导作用。这时，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十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本人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材，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一九三九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品的输入受到限制，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政府于是年一月举行了农业展览会之后，又于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工业展览会，激起了发展工业的热忱。政府与后勤部先后派人到西安采买机器材料，又在延安、安塞两处组织纺织合作社及榨油、瓷窑等生产合作社。从西安买来的机器材料虽不充足，但已成了数年来发展边区工业的主要物资力量之一。这一年又建立了新华化学工厂、光华制药厂，在延安十里铺开始探采厚层煤矿。

一九四〇年的工业发展是在生产上达到“半自给”的政策下进行的，确定以发展轻工业为主。一月间举行了第二次工业展览会，检阅了我们工厂的力量。银行借款一百万元扩大工厂资金，建立正规厂址，继续购买材料。二月间，中央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九月间，朱总司令提倡纺毛运动，发展了一部分毛纺织事业。许多大的机关学校部队都积极筹设工厂，派人到原有工厂学习技术，研究管理办法，奠定了一九四一年猛进发展工业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中央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银行增借三百万元，政府亦投资五十万元于各公营工厂；许多机关、部队亦均筹款设厂。三八节曾举行生产展览。十二月银行大楼落成，由银行主持又办了一次工业展览。兹列举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二年所设各厂，以见此时各单位对于发展工业之努力，虽则这些工业都是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厂及规模很小的手

工业：

1. 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开办新中国纺织厂、实验工厂、木器制造厂、木工厂、第一炭厂、第二炭厂、瓷窑、被服厂，资金总数二十余万元，人员二百二十余人；

2. 中央组织部开办胜利毛厂、胜利木工厂；

3. 中央宣传部开办七一磨房；

4. 马列学院开办团结纺织厂；

5. 中央党校开办中山纺织厂；

6. 自然科学院开办毡房、磨房、酒精厂、玻璃厂、机械厂；

7. 鲁艺、陕公、青干、女大均办有工厂；

8. 中央出版发行部办有新华木工厂、被服厂；

9. 教导大队办有延园纸厂。

上述中央直属系统即办有工厂二十七处，全部人员四百七十七人，资金总额四十余万元，大都是为着经济自给的目的而进行的。

此外，经建部、留守处、保安司令部、边区财政经济处、三五八旅、各专署，均办有若干单位的小工厂。三五九旅所办大光纺织厂产量较大。三五九旅各团，亦均自行办有棉或毛的小型纺织厂。

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发展着；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给一九四二年的巩固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整个时期的建设是带着盲目性的，在许多人员的头脑中缺乏清醒的了解，只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只知道分散经营，不知道统一领导，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这种情况，致使各工厂有的只建筑了房屋便完事，有的开工不久便告结束，有的合并于其他工厂，继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分。至一九四二年，就延安附近的纺织业来说，只有难民、交通、团结三大厂及

兴华、公益两小厂保存下来。这一段“之”字路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只能从自己走过的路上得到经验。但在有了这一段经验之后，重新从事工业建设的，就应避免再走这一类“之”字路才好。

一九四二年，建设厅确定“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政府对工业的投资达一百七十万元。农村民间手工业至本年已很发达，如绥德手拉织布机达六七百架；其他地区如制毡、硝皮、打铁等也有发展。特别是公私纺织业发展得快，其困难也特别多。为了保护纺织业的发展，减低棉花、洋纱进口税至百分之一，增加布匹进口税至百分之十五。银行在绥德组织“永昌土布产销公司”，投资二百万元，发棉花，收纱布，奖励农妇纺纱织布。由于民间家庭织布有了发展，私营的小型资本主义式的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布多无销路，土纱供给也感困难，这些纺织生产合作社遂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或化整为零，将机件分散民间，改为家庭副业。公营纺织厂因主要是供给公用，自能维持，但棉花与纱的供给亦感困难。公营造纸业振华总分两厂，本年完成了供给出版局三千令马兰纸的任务。利华第一第二厂，原定二千五百令，计划未完成，本年产量不超过五百令。其他公营纸厂，则因纸无销路，颇感困难。公营毛织厂出品如毛毡，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政府自己不用，部分输出，部分卖给部队；其精制毛线特别受人欢迎，且有厚利。自九月起，交通、兴华、团结三纺织厂，利华一二纸厂，都由中央及后勤系统移交边区政府管理。为保证一九四三年纺织原料，本年已开始向东三县收买棉花，计划收买量为七十五万斤。为保证造纸原料，向甘泉、延安、安塞、安定等县征收马兰草七十三万斤。各厂人员补充，须待精简工作实行时才能解决。

一九四二年，特别是此次高干会，是边区一切公营经济，就中也是公营工业，开始清除盲目性，清除无政府状态，而增加自觉性，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之重要时期。虽然中央还在一九四〇年二月间就已指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但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引起同志们的注意，直到此次高干会才得到全体一致的承认。五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大进一步了。高干会后，各种公营经济均将加以调整，使之达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工业也是如此。

以上，我们将边区五年工业历史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们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七类工业。其中，纺织工厂七个，资金二千六百九十万元，职工一千四百二十七人；被服及制鞋工厂八个，资金一百万一千一百元，职工四百零五人；造纸工厂十二个，资金四百一十万元，职工四百三十七人；印刷工厂三个，资金五百二十万元，职工一百七十九人；化学工厂（制药、肥皂、皮革、陶瓷、石油等）十二个，资金一千七百零三万元，职工六百七十四人；工具制造工厂九个，资金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元，职工二百三十七人；煤炭厂十二个，资金一百七十七万七千零七十元，职工四百三十二人；以上七类共计工厂六十三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二元，职工三千七百九十一人。我们的这一点工业虽然还是小小的，大部分又还是手工工场业，机器工业只占着一个小部分，但已费了整个五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起了保障供给、调节物价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是一定可以起更大作用的。

我们的最主要的自给工业是纺织工业与被服工业，这是几万军队与机关学校人员每年布匹被服赖以自给的地方，否则我们就要受冻。我们的纺织厂一九四二年已能产布二万二千余匹，但我们的需

要量是四万至五万匹，尚须作极大努力才能达到自给目的。但要发展纺织工业，必须实行如下的政策：（一）提高布匹进口税，保护土布；同时，部队及机关学校要一律采用边区出产的土布。（二）普遍倡导民间妇女纺纱或纺毛，保证工厂纱线原料的供给，同时即增加群众的收入。（三）解决供给问题。无论公营、私营或家庭副业之能否发展，主要系于供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在原料方面，目前棉花棉纱还不能自给，来源不经常；又因交通不便，分配上有困难；须要解决到使纺纱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得棉花，使布匹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得棉纱。成品方面：布匹和毛织品销路不经常，需要使生产者能在适当市价下随时推销其成品。这个问题必须集合财政机关、商业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的协同力量，才能解决。（四）关于被服供给问题，须照财政厅在一九四二年所实行的办法，既能节省经费，又能及时有衣穿。

我们的造纸工业现在已能年产五千多令马兰纸，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七千令，已够全部印刷之用。但须：（一）统一纸的生产与供给。马兰纸除供印刷外，尚不适于普遍使用，印刷部门若不要，即售不出。目下即有这种现象：印刷纸不够用，纸厂则成品堆积售不出，资金周转不灵，影响生产。一九四三年应统一收买与供给，由固定机关与纸厂发生经济关系，以解决此种供求不协调的矛盾。（二）提高纸的质量。依据现有的生产设备与技术条件，纸的质量还可提高，但要多费人工与原料。就其作用与意义上说，费用略大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应研究改进造纸工具，以提高生产效能。

我们的印刷工业是现代化的文化工具，大量书报赖其供给。一九四二年，中央、八路、西北三厂生产五千一百六十万字，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五千三百六十万字。但须添置器材，保障纸的供给。

我们的化学工业就是药品、肥皂、皮革、陶瓷、玻璃、酒精、火柴、石油等业。药品有八路军制药厂及光华制药厂，能供军用及公用中西两类药品之一部分，尚不能完全自给。一九四三年应研究边区出产之药材，并设法购买原料，以期增产必需药品。肥皂有新华、大光两厂，出品日增，质量亦好，除自用外，还可外销。新华一厂，一九四三年可产价值七百万元之肥皂四十二万条，有发展前途。制革厂规模不大，材料昂贵，不能多发展。如能采取边区出产之植物材料制造军用皮革，便有发展前途。陶瓷有三个小窑，制造日用与工业用之瓷器。玻璃已试验成功，决定设厂制造。酒精也能自造，供工业及医务之用。火柴尚未能解决磷的问题，正在研究从兽骨取磷。此外，尚有延长石油，亦能年产少许，以供军用，其中白蜡油可供日用。总之，化学工业须择其可供急需或有利可图者扩充之或兴办之，其他则不必办。

我们的工具制造业是为着制造纺纱机、织布机、弹花机、轧花机、造纸机件、大车、木工工具及农具等而设的，多属手工工具，但是十分需要，应研究改良，予以发展。

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等处，多为日用目的，规模虽小，但属必需。

边区缺铁，妨碍工具及农具之制造与改良。近在关中试验，有成功希望，如能制铁，则解决边区一大问题。

边区全部公营自给工业略如上述。不论纺织、造纸、被服、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相当的发展前途，先求完全解决军需公需，进求供给一部分民需。为此目的，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应有如下的改革计划：

（一）增加资本（数目另定），由各有关机关拟具具体计划，经

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些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二）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过去提出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因没有切实执行，致使建厅管的财厅管的军队管的机关管的各部分工业之间，缺乏计划性，生产过于分散，又缺乏工作检查，浪费人力物力。一九四三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首先要使所有公营工业，不论是属于哪一部门管理的，均须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这个统一计划上，统一地筹划原料与粮草的供给，产量的定数，销路的衔接。在原料供给上，要解决由于地区分散、原料不集中和有些原料仰给外来，而使许多工厂随时都闹原料恐慌的现象。在粮草供给上，应由财厅经过一定的核算办法，供给各厂以所需的食粮及草料，以免各厂负责人分散其管理生产的注意力。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各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在这个统一的计划上，要实行统一的检查，对各业各厂有奖励，有批评，使工作差的赶上好的。总之，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必须彻底地努力地解决之。

（三）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

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四）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

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五）充实与扩大纺织厂，增加布匹产量，争取在一九四四年公用布匹的完全自给。改善毛织品，除供军用外，扩大出口量。制定关于被服的布匹与缝制的标准，保证棉衣与被褥能用二年。

（六）整理造纸厂，改善纸质，使能完全适用于印刷与办公，做到在一九四四年印刷与办公纸张的完全自给。

（七）增加煤油出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设法造磷或买磷，使火柴厂有一部分开工。其他工业，择急需者或有利可图者继续进行，或予扩充。凡不适合保障供给原则及无利可图的企业，实行合并或关闭。

八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

政府、军队、机关三部分公营经济中，从直接解决需要的最迅速与最大量说来，究竟哪一部分是最主要的呢？依几年的经验看来，军队是最主要的。因为军队是比较更有组织性与比较具有更多劳动力的集团，他们只要没有直接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将他们除教

育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从事劳动，而在我们目前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劳动力是经济事业中的决定的条件，所以军队的生产事业，成了三部分公营经济中的最主要的部分。

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比之机关学校要早一年。一九三九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同进行了生产运动。一九四〇年，三五九旅担任河防，参加了这个生产运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样，增加了生产自给的任务，而军队担负的责任是更大的，在生产自给的总量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这几年军队的生活资料及事业经费主要地不是由他们自己解决，而要仰给政府，那是不能设想的。他们在党中央及西北局的“生产自给”的号召之下，在战斗、警戒与训练的紧张任务之中，完成了他们的生产自给任务。虽然各部分军队所处的客观条件有好有坏，担负的勤务有多有少，努力的程度有高有低，从事生产的方法有优有劣，因之所得的成绩也有大有小，但是一般地说来，都是完成了任务的。他们都以极少的资本，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些还开设了规模较大的纺织及造纸工厂。在这两年中，政府向军队的生产事业上的投资，一共不过六七百万元；但是他们在两年中，不但保障了价值三万万元以上的供给，还在他们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蓄了约八千万元的资本，开辟了几万亩的土地，提供了在整个生产建设中的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仅起了保卫边区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直接解决大数量的财政供给与帮助着发展边区经济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看某团一个连的生产自给情形。这个连在一九四一年的收入与支出如下表：

一九四一年的收入（元）		一九四一年的支出（元）	
驮石炭	698.20	杂支	1312.00
驮盐	772.45	骡二头	2850.00
锯木板	3256.40	驴一头	574.00
砍木椽	630.00	汗衣六百套	600.00
贩猪	738.02	鞋面每人两双	405.50
骡马店	2256.00	毛巾八十七条	128.00
贩玉米	998.20	草烟	179.00
出口生意	935.60	盆	90.00
杂货生意	481.25	生产工具	181.00
油（840斤）	16800.00	油	16880.00
肉（1610斤）	16100.00	肉	16100.00
菜（4690斤）	4690.00	菜	4690.00
木炭（5000斤）	500.00	木炭	500.00
柴（25550斤）	2555.00	柴	2555.00
领生产资本	750.00	伙食补助	3771.00
领办公杂支	360.00	五个月津贴	567.50
领生产补助费	2855.00	擦枪费	22.00
领伙食补助费	3771.00	缴单衣费	100.00
		发过年费	146.00
		办公	339.00
		马干	620.00

总计	59147.12	总计	52610.00
收支相抵净存：6537.12元			

上表支出数五万二千六百一十元中，除去上级所发生产资本七百五十元，办公杂支三百六十元，生产补助费二千八百五十五元，团供给处补助伙食三千七百七十一元，共七千七百三十六元，该连自己由生产解决之数达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四元，而所存资金可继续为下年生产之用者尚未计算在内。

依此计算，每团以十个连计，即自给经费四十四万零四百四十元。

尚有团部、团直属队及三个营部所经营之生产自给，如下表：

团部	197425
团直属队	27149
一营	18629
二营	12777
三营	7408
合计	263388元

上述连、营、团生产自给合计七十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元，该团全年总支出（粮食及一部分被服在外）为八十九万六千八百三十八元，尚差十九万三千零一十元，由上级补足，故该团自给数占百分之七十八，上级补足数只占百分之二十二。若加上旅部的很大数量的生产自给，则全旅自给数当超过百分之八十远甚。

下列材料是留守处对于留守兵团的五年生产总结，可以看出军队生产自给的一般情形。

留守兵团五年生产总结

甲　五年生产自给概况

留守兵团，由于抗战以来的新的困难环境，在毛主席生产号召之下，从一九三八年秋季开始进行生产运动。这时候生产还不是担任自给的任务，仅仅是补助生活必需上的不够。当时我们只能给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钱五分，粮食一斤半，以当时市价每元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清油二斤，柴火一百斤计算，如以每连一百人计，每天共只有五元菜钱，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买到油盐柴火就买不到蔬菜，猪肉更加吃不上了。在被服方面，当时很少见到一个衣裳不打补钉的战士。子弹袋破烂得不能装子弹，装在挂包里。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雪地打赤脚下操，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找不到。这些就是当时军队的物质生活情形。

这时生产运动的办法是：（一）开合作社；（二）大量种菜；（三）开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四）发动各个战士学会做鞋；（五）打毛衣、毛袜、毛鞋、手套；（六）提倡节约，防止浪费。一九三八年半年生产结果，超过了计划，战士生活大加改善。例如保证了蔬菜的自给；每周可吃两餐猪肉；部分地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补充了挂包、子弹袋、皮带、裹腿等。

由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所得到的很有意义的生产成绩，提高了部队的生产热忱和信心，故能于一九三九年提出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一九三九年规定部队在农业上，除种菜外，还要种粮食，要完成四千七百担粮食生产的任务。一九三九年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全年开垦了二万五千一百三十六亩荒地。起初

估计一亩能收二斗细粮，共可收四千九百八十六担细粮。但由于荒地初垦，农具不足，领导的经验不一致，部分地方又遭受天灾，结果只收到二千五百九十担细粮。此时部队尚无大的资金，商业还未开始。

一九四〇年，规定部队的生产任务是要各部解决一个半月的粮食，计三千四百担，是年部队开地二万零六百七十九亩七分，应得细粮四千一百三十六担。由于收成不佳，只收二千四百担。各部为完成任务计，加上打盐、挖甘草、伐树（关中），并经营商业。从这些辅助生产中，全留守兵团获利共二百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六元一角六分，加上农业的收获，仍然解决了一个半月粮食的任务，并且还解决了部分的装备补充。

一九四一年，全体部队经费预算为四百四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元四角，规定负担生产任务四十万元。但结果完全与此不同，经费需要是增多了，生产自给任务更超过远甚。是年生产，主要在朱总司令号召下抽出六个营打盐，共打了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驮，值二十三万六千四百零八元九角。农业生产：开地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亩六分，收获杂粮一千一百七十担。商业生产：合计赢利一千二百零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二元七毛二分。由于物价高涨，纸币跌落，全年所有经常费与被服费，共支出七百八十八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一团和关中部队的收支均未列入）。全年伙食费，平均以每人每天五角计，除公家发给一角外，自行解决四角，共计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元。以上经常费、被服费和伙食费三项，合计一千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较原定预算超过五百六十七万三千八百零四元三角五分。除以生产所得支给外，尚有盈余。

一九四二年，经费预算（粮食、被服在外）为五百八十三万三

千六百三十六元，担任帮助中央经费二百五十万元。本年生产计划为一千二百四十万元。到八月止（八月以后尚未统计），商业获利三千八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三十元二角，工业获利四十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三元四角，总共获利三千九百四十万一千零三元六角。

到六月止，领到经常费一百四十四万零五十八元六角，领第一套单衣补助费二十万六千八百二十五元。实际开支：经常费七百七十五万零五百九十八元八角五分，被服补助费三百零六万七千七百三十元六角，伙食补助费（公家每人每日发七角，实支三元）半年九百一十八万元。下半年冬季被服，各旅团大部分由自己解决，计有第二套单衣，半数棉衣，百分之四十的棉被及绑带、子弹袋、炸弹包、棉鞋、单鞋等八项，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四万一千二百元。其他如冬季烤火木炭，均由各单位自行解决。牲口草料，一九四一年度自己解决马干费两月，一九四二年财厅发马草平均八个月，放青两月，一般地自己割马草两月，约可节省一百二十万元，又如一九四二年马料预算是一万一千担，按财厅规定一斗细粮作二斗马料计算，不够，全年须添补二千七百五十担，按每担五百元计，须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元。

五年中从事生产的结果，除解决每年的经常费、被服费与伙食费外，现在所存的财产计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六头（耕牛在外，警一团五团亦未统计）值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二千元；工厂资本七十一万二千元；总计四千一百九十四万四千元。

（注：以上总结，未包括三五九旅及保安部队在内。）

乙　几点经验教训

（一）几年来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很大的问

题，是由于部队的庞大的劳动力和更好的组织力，以及边区内具有丰富的物力可资开发的原故。这一经验，证明了部队充分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又由于几年来部队自给问题的解决，生产信心的提高，使部队认识了生产自给为建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认识了生产自给是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最好办法。

（二）部队的生产建设，就是边区整个经济建设之一部分。过去部队虽在生产事业上努力地完成了任务，这是很好的，但在思想上没有强调与建设边区的联系，因此对于发展农工业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建家立业的精神还差，统一建设的思想也就模糊，甚至各自为政、破坏法令纪律的现象严重地发生了。这些缺点，今后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加以纠正。

（三）在生产方法落后的条件下，生产基础主要应建立在各个单位的劳动力和各个单位的经济基础上。因此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应当是保护这些单位的生产事业，在政府的统一政策之下，准其充分发展，并有利可图。因为这样，才对于生产事业的发展更有组织，更有力量，更能团结和合理，更能统一地和封锁作斗争。我们部队在生产上的重大缺点是注重了商业而忽视了农业，今后应该提高和奖励农业方面的生产。

（四）在部队生产事业中，应抓紧思想领导，建立和健全生产中的各项制度及领导机关，纠正并防止干部各自为政、贪污腐化、大吃大用、铺张扬厉、不讲节省、不求实效等等极坏的弊病。

以上就是我们的意见。

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利用了勤务较少的条

件，又利用了南泥洼适合农业、绥德警备区适合轻工业的环境，动员了广大的人力，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其次，三五九旅进行了如下各项具体的经济建设活动：（一）他们在一九四〇年经营的粮食生产是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灰心，一九四一年继续经营，就获得很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就更有基础了。他们开辟了二万五千亩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种粮食、种菜、种麻、种旱烟，解决了部队的蔬菜、灯油、打草鞋的麻，战士们吃的旱烟，又补足了粮食、菜油、马料、马草之一部分。这样，只要两年工夫，就可打下全旅所有各连队的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官兵全体进行劳作的时间，一年中不过两个月，尚有十个月时间进行部队的训练，并不妨碍操课。如果照该旅现在想出的新办法，即每连建立一个六至七人的专门的农业劳动小组，战士大众只在农忙期间突击帮助，则训练时间更多。（二）利用农场发展畜牧事业。一九四二年全旅经常养猪约二千头，可以解决部队食用的肉与油，因战士们食肉较多，又节省了粮食。另外，组织一批人去采柴、烧炭、锯木板，不但解决了自用的燃料及建筑材料，且可以其剩余出卖。（三）他们又建设了工业及手工业。一九四一年，他们从部队中抽出一批战士及勤务员建立了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供自用外，还有“大光”出品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又在绥德及南泥洼等地开创了盐井十个，炭井一个，木厂二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榨油房一所。又利用战士们操余课后的时间动员他们纺毛线，用柳条榆条编织各种用具，用桦树皮做写字板，做菜盒，做点灯器。这些战士们的劳

作，不但是为着全体的，而且也是于他们个人有利的。该旅规定：凡动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劳动，以其结果的五分之四归公，五分之一归私；凡不动用公家工具的，则以三分之二归公，三分之一归私。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公用物品的需要，一方面不啻增加了战士们的津贴。（四）他们又建立了有力的运输业。现在他们有一个拥有六百头驮骡的运输队，完全从事运盐运货。在绥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建立了十个骡马店，安置了一批老弱人员。（五）他们的商业机关是大光商店，本店外有十个分店，一九四二年九个月获利六百余万元。但这种商业在该旅总生产量六千万元（延安市价）中只占百分之十强的数目。（六）该旅实行了统一的生产计划、生产制度与供给制度。全旅的生产计划由旅部制订。有的由旅部直接经营，例如较大规模的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的由各团直至连队经营，例如农业、畜牧业、小的工商业。由旅至连，按级检查。生产制度亦由旅部规定，上述战士纺毛线的办法，即是一例。供给制度亦保持统一，农工运商各业虽由各部分分别经营，但凡属一定数目以上的开支，必须呈报上级批准，下级不得自由支用，这样就免除了因自由支用生产结果而发生的苦乐不均的现象与浪费现象，保障全旅的团结。（七）他们不但发展了大量的生产，而且厉行了节约政策。例如：规定两年发三套单衣，三年发两套棉衣，一切被服，发新的交旧的，不交不发。又发针线给战士，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这样一来，被服大为耐用，战士们更加爱惜自己的被服，大大地节省了被服费。又如前面说的令战士用桦树皮做写字板、做菜盒、做点灯器，发羊毛给战士打毛袜、手套等事，不但增加了日用品，同时即节省了关于这些物品的购买费。全旅一切房屋建筑及器具修理，均由部队中人自己动手，不向外面请工。所有这些，不但节省了大批

经费的开支，而且在全体官兵中养成一种爱惜公物、注意实效、反对浪费、不讲铺张的朴素的作风。

下列材料，是三五九旅领导同志对于该旅的三年生产总结，可以看出该旅在农工商业各方面的具体情形。

三五九旅三年以来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总结

自本旅回防边区以来，三年中所执行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建军上的新创造。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中，除向政府领食粮外，做到了其他一切经费百分之八十二的自给，由此克服了物质资材的困难，改善了部队的给养，巩固了部队，增进了军人体质的强健，巩固了军队的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现将三年以来我们在农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概述于后。

甲　农业方面

在生产运动的号召之下，本旅从一九四〇年开始了农业生产，计划耕种土地，自给两个月粮食；从夏季起，自给全部蔬菜；喂猪，解决年节的肉食。但因绥、米、吴驻地人稠地少，须要跑到百余里以外的地方（九里山、清涧）开荒种地，来往耗费工夫，虽积极苦心进行，然未曾细心调查研究，筹划不当，故收获所得，不敷购买工具和种籽资金。但在驻地附近所种的蔬菜，到夏季后，足够自给了。各个伙食单位每人每日发一毛钱伙食费，只勉强够买油盐之用。部队须到百余里路以外去背炭出卖，赚了炭烧，并获得余钱买猪来喂。从这些生产活动中，奠下了连队生产改善给养的基础。除在驻防之绥、米、葭、吴、清各城镇及河防驻地所有公共荒地（公坟地、庙宇附近，城周围碎块土地，废弛不通行的片断公路，旧

的军事防御建筑等）都被开垦外，并向当地居民租地种菜。军中指战员们这种艰苦勤劳的精神，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大同情。租佃的菜地，有的佃主（如义合镇的地主富农）谢绝我们支付租价，贫苦农民有些自愿让给暂时的租佃权，这是出于人民对军队的衷心的同情与爱护。在驻扎于农产不丰的地区，特别是在气候只宜夏秋作物的地区，农业生产不但是为解决经费困难所必需，且在维持和人民的正确关系上更有必要。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〇年春，部队伙食费不够，冬春蔬菜缺乏，出外采买人员有强买及发价不公平的严重行为。部队在进行农业生产中，除县城极少几家专靠种菜为生的人有感这个穷军队驻防无利可图而生怨言者外，在广大人民中间，我们是保有良好的政治影响的。

一九四〇年从生产中解决的问题：（1）自夏五月起，蔬菜自给了。（2）由蔬菜自给，增加了喂猪，下半年改善了伙食，每人每月能吃一斤肉。（3）各个伙食单位，自制了部分农具，每伙食单位都有大小猪十余个。（4）证明了俗话说的："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部队粮食吃得饱了。（5）种粮食是开荒地，头一年不长粮食，且离驻地过远，锄草不及时，往返费工太多，由于这种种原因，本年粮食收获计划流产了。

一九四一年部队找到可以屯田的地点，执行总司令亲身指导的屯田政策，每人平均约种六亩地。每一亩地从开荒、播种、锄草到收割，须费工七天；六亩地计费工四十二天，约得细粮小米三斗（下中收成），谷草合价亦能值细粮三斗，粮草两宗约可换棉衣一套。如能获得上中收成，则可增加四分之一。各种副作物如包谷、花麻、油麻之类，亦与种小米收获相等。在这六亩地的边沿，可种许多附带作物，如大麻子、南瓜、豆角等，收获很多。除此而外，

每人再各种菜地半亩，则可有足供一年吃用的蔬菜。调和——辣椒、大蒜、葱，以及灯油、草烟、打草鞋用的绳索等等都有了。因为有了田园产物，故饲养家畜猪、牛、羊、鸡、鸭、兔等副业，大为方便有利，其中喂猪的利益最大，这应该是主要的副业。如平均以五人养一个猪计算，每百人可养二十个猪。外加三个母猪，每一母猪年产二次，平均最少每次不少于四个小猪，在不闹猪瘟，不发生意外的正常状态下，每年共生小猪二十四个。如每月杀二个猪，则每年须杀二十四个猪，猪的繁殖率与供给肉食的屠宰率相抵。还有多余小猪，自离奶到宰杀，平均每日可长肉五两。实际则每年平均经常保持五人养一个猪。由于有了农业生产，就有许多剩余蔬菜，及因磨面、碾米而得的糠渣头子，因造豆腐而得的豆腐渣等等，可以养猪，实为废物利用，利益极大。现在本旅已完全照此做到，每一伙食单位由农产、牲畜所得财富是在增加着。这些财富均由党支部领导、全体军人监督和依据上级规定的制度，合理地享用。一九四二年尚未作总结，但一切收获，大体上不会比去年减少。

检讨过去农业生产运动，总结其优缺点如下：

优点是：

（一）部队进行了执行这个任务的政治动员，使全体人员认识了毛主席提出的生产自给口号有坚持团结抗战、渡过经济难关的重大意义；总司令回边区后亲身指导，更加鼓励了军人的积极性和刻苦耐劳的精神。

（二）在实际生活中，感到生产运动的好处，改善了生活。

（三）旅与团都订定了每年度的整个的生产计划，规定了连队的生产任务的负担，认真地督促了团对连队生产的指导与督促。

（四）连队组织生产委员会，讨论布置生产任务的执行、监督与

审查经济（连队经济完全公开）并保障供给制度的执行。

（五）现在各连队均因有农产品而享受了自给自足的富裕的农家生活。

缺点是：

（一）没有充分注意生产工具，没有组织与使用耕牛，没有选定几个战士（伙夫）专门（撑犁手）长年累月地从事耕作，经常采取全体动员，浪费了时间，妨害了部队的操课。

（二）一部分干部对农业耕作还采取消极态度，不力求增加耕地的收获量。

（三）肥料收集没有更认真。

（四）没有专门指导生产的干部。

根据过去经验，采用牛耕地和利用牛上粪与收割（牛车搬送），置备足够的农具，配备专门负责的指导干部（生产副营长和连的特务长），配备长年成日从事农作生产劳动的战士（伙夫抽出），在播种、锄耘、收割时动员全体官兵参加，规定生产日，花费一定数量的工夫，这样，每人每年种六亩地，并砍伐全年柴火，共计只不过费工两个月，不但有了粮食，所有日常菜蔬、肉食及草鞋、柴火、鞋袜概可完全自给。单这后面几项，即占全部经费三分之一，怎么可说是小问题呢？至于粮食收获，则可养活二千人。

以上就是本旅农业生产的简单总结。

下面的附表是指出一个百人的伙食单位，如不自己种菜，而去六十里以外的地点买菜所费人工及时间（还不去说金钱的耗费）：

每月蔬菜消费量（每人每日以一斤计）：三千斤。

每月采买次数（每次以采买百斤为标准）：三十次。

每次采买所耗人工（每次以二人为标准）：四工。

每次采买所耗时间（每次以往返二日计）：二天。

每月采买所耗人工：一百二十工。

每月采买所耗时间：六十天。

每年采买所耗人工：一千四百四十工。

每年采买所耗时间：七百二十天。

仅仅依据此表，就可以驳倒所谓“农业生产无利，妨碍训练”的谬论。

乙　工业方面

大光纺织厂建立与发展的经验及其他各手工业的总结：

一、动机和打算：

部队衣服年年穿，被毯每年需要补充，被服原料的购置是供给工作上的首要问题。一九三九年冬，部队回防边区后，被服原料采买困难，又无钱买。在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克服困难、建设边区的号召之下，作长久之计，办纺织厂。

二、从试办中搞起来。

一九四〇年九月间，即已想办纺织厂。这时供给部开的短期训练班中，有一个河北人会织布，于是搞了一个小木机子，买了一块洋纱，试试看，十天内纱织完，织出的布还好，一天能织十丈。成本计算比买布便宜三分之一。

因部队里有织布工人就决定建厂，进行了下列事项：（1）买木料由自己的修械所造小木机十九架，又从山西买了四架铁机；（2）纱是向当地商人赊来的；（3）从部队中抽调河北高阳等地的技术工人二十余名。

布厂便这样初步地搞起来，不仅有利、方便，且解决了采买布匹的困难。

为了做到全旅布匹自给，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决定把布厂扩大。

一九四一年初，取消全旅各级勤务员，集中了一百多青年做学徒，学习织布。

又从晋西北买了两架铁机，由自己修械所添做了十一架大木机。二三月间，又自造了十六架大木机。三月下旬，又自造了十四架大木机。这时大小木机铁机共有六十六架。同时，添做了纺车等等必要的零星工具。

原料问题：一九四一年政府发给我旅生产基金四十万元，其中二十五万元分给了各团；余十五万元中，以十万元买纱三百多块（七斤十四两一块，每块二百八九十元）及一些必须购买的用品（如织机上的钢丝，不能自制，须购外货）。

工人由供给部会计员管理，分为浆纱、织布、络线、打线四组，一组二三十人，十多个熟练工人当师傅，并负责浆纱、轮纱等技术工作，聪明的青年学织布，笨些和年小些的青年打线、络线。

织机动作起来之后，马上感到劳动力不够。于是用大光纺织厂名义在绥德一带招收青年男女学徒五十名，并从军法处调出犯错误的犯人和俘获的土匪，集中劳动。这时工人共有二百余人，由供给部军实科负责管理，分为四个排，十二个组（其中有一女工排；一排分三组，每组十余人）。

工厂初具规模了。这时有两个困难问题须要解决：第一，资金与原料的供给问题；第二，工人的管理、教育与训练问题。

1. 资金与原料的供给问题

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借边区银行二十万元，仍不能长期支持。以后只好交朋友，拉拢关系，联络富商大贾，采取赊借原料、定期付款办法。

一九四一年五月以前，洋纱多从山西买来。后因来源断绝，只得从西安、延安购置（申新和黄鹤牌），棉花也是从西安、延安购买的。

土纱的供给，由政府发动当地妇女纺纱。最初，纺一斤纱，工费三元到七元（棉花价每斤四元），分上中下三等。到七八月间，改为纺一斤纱给熟花一斤半。到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又改为纺一斤纱给熟花二斤二两或二斤。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间，因民众纺纱供应不及，且质量不良，自办纺纱厂，有弹花机四架，纺纱机四十余架。到一九四二年七月，因无熟练工人，又因弹出来的花不能完全在机子上使用（棉花不好），现在只留四架机子继续弹花，纺纱机已停。

2. 对工人的管理、教育与训练问题

工人数量增多了，但分子复杂，管理不易。特别是青年勤务员，过去自由惯了，在家时也未劳动过，所以初来时，每天打的打，骂的骂，闹个不停，张口就说："大官见过，小官也见过。"不受管理。

从农村来的妇女多是因婚姻不满出来的，经妇救会或政府介绍来工厂，相互谈到婚姻问题时，有的哭，有的笑，并常要求组织替她们解决婚姻问题。

俘虏来的土匪，让他做工，对他是件苦事情。

犯错误受处罚的人，许多是部队中的连排干部，摆老资格，不愿做工，调皮捣蛋。

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间，供给部长用了大力来整顿，立见成效。

这时期中，由那二十多名熟练工人当师傅，教织布组的青年，

先登小机（用力小，容易织），由师傅把一切手续办好，告诉他们如何登机子；断线时，如何穿线接头；如何手牵梭子，手脚相应。开始每天只织两三个钟头。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批学会了，转到大木机上去，再来一批。这样一批一批地训练，一九四一年三月轮训完毕。

打线络线工作容易学，只要细心耐烦，会接线头就行。但也需要熟练，不熟练时，打出来的“夫子”和络出来的线，织布不好使用。

开始做工，青年学徒坐在机子上，或打“夫子”络线，时间稍久，屁股痛，纱易断，脾气躁，不耐烦，浪费了许多线子，损坏了一些器具。所以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前，从产品方面计算，是没有收到成绩的。

当时的出路是：除了加强技术教育、提高技术之外，主要地是要政治鼓动，并给以革命劳动纪律的教育，使工人们自觉地认识从事生产的重要意义，安心工作，提高他们对于生产的热情和劳动纪律。

教育的方法：采取个别教育，实行军事纪律。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同志和军实科长、分支书记，每天亲身指导，说明前方打仗，在后方生产等于打仗，要服从组织，做工是光荣的，是工人阶级。提出竞赛，学徒与学徒比赛，女工和男工比赛。实行奖惩制度，建立请假制度。同时，每人每月发一些纸笔墨文具，并买了些娱乐器具。

从此工人们都感到做工是光荣的，并愿工余学习文化政治，过军事生活，生活军队化。这样，逐渐建立了兵工制度，工厂走上了正轨。早饭前早操跑步，早饭后上工，冬春季每天十小时。

这时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厂址原是租借的民房，因工作不便，自开了十几个窑洞，供工人居住，不料新窑潮湿，工人发生疥疮，数十人不能工作。遂将新窑改为储存室，工人移住民房。从六月间开始另打五眼石窑，安放织机，到十月底才落成。这期间，机子没有屋子安放，只好放在院内露天之下，搭起帐篷工作。五六月间早晨有露，且时时下雨，线打湿，不好织。到七月间，天气热，太阳大，线子晒干，也不好织。当时，只好把军毯以水浸湿，盖在机子上，地下泼水。但这办法，只能保持两三个钟头，其麻烦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六、七、八、九四个月，到十月间新窑洞落成，并盖平房二十七间，供工人住宿，才消除了这个困难。

在工人技术提高方面，从六月以后，青年学徒逐渐成了熟练工人，有的甚至超过了师傅。

在学徒期间，一般地在最初一个星期内，一天只做二三个钟头的工，织四五尺布。两三个星期以后，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工，织布一丈到四丈。四个月之后，一天可织四五丈。到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每天可织六七丈。六月以后，都成了熟练工人，最好的每天可织十二三丈，在这当中，质量上也不断提高。

可以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工厂从种种困难的克服中，建立与发展起来了。

三、确立了兵工制度。

工厂扩大，需要正规化，军实科管理诸多不便。遂在供给部之下，专设厂长政委负责领导，订定纺织厂行政草案。

在厂长政委领导下，分工务、业务、会计、总务四股，分工合作，各有专责。规定了各种制度——会议、汇报、报告、检查、生活、津贴（按技术高低，规定最高的十元）与惩罚制度，具体分配

了工作、学习、休息、娱乐的时间，订立了民主生活的范围和各种原则——工室、寝室、饭厅、请假、外出等。

到一九四一年十月间，一切走上正轨了。

十月以后，感到木机不如铁机好——铁机织出的布，质量好而且省工。计划把木机逐渐完全改成铁机。从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十月间，自造铁机四十一架。但因织铁机，须身强力壮，技术稍高，这样的工人不够，不能全部改用铁机，遂不再添造。计铁机四十五架，木机六十二架；此外，连买得龙湾工厂织毛毯毛织品的木机十三架（一九四二年春），自造木机十三架，共计织机一百三十三架，平均月出宽面大布千匹左右，毛巾约五百打，毛毯约百床。

从一九四二年五月后，把津贴制改为按件给资制，最高每月七八十元（这相当于私营工厂工资十分之一），最低的二三十元，更加提高了工人们的生产情绪。当时有些工人，午睡不睡，到下工时不下工，埋头工作。经过说服教育，才克服了这些过度积极的现象。

我们是坚持兵工制度的经营。工厂亦自种蔬菜、喂猪，供给蔬菜肉食。

一九四二年冬，因制棉衣，停工一月。

一九四一年，该厂除一切开支外，实得红利三百九十万元。一九四二年十个月，实得红利八百万元，现厂址工具及所存纱花，可值五百万元（纱花约值一百万元）。拟再投资数百万元，坚持再生产。

总结我们从事工业的经验教训，有如下列各端：

1. 各工业利润的比例，以纺织业的兵工即旅供领导的大光厂，利润最大。计该厂全体人员，一九四一年为二百五十人，一九四二年为二百二十五人；除工厂一切开支外，一九四一年获利三百九十

万元，等于该年底四千担小米价（每担三百斤）。一九四二年十个月获利八百万元，以绥德现时小米价，八百万元也是折合小米四千担，厂中每人平均纯利约十八担。

根据两年来的经验及现时的环境，大光厂二百二十五人，一九四三年，除厂址工具外，向该厂投入资本按每人二万五千元计，共计五百六十二万五千元，军服所需布，用款向该厂购买，如此，则一九四三年的生产，每人可获纯利小米二十担（因物价高涨，只好以米作标准）。

各团均有织布厂，可整理为一百人的织布生产。

其他，除制鞋、缝衣、皮革，纯为制造部队的装具服装外，本旅尚有铁匠、木匠等约二百人，根据二三年的经验及边区经济继续发展的情况，这种铁木工人平均有一千元资本，每人每年获利率约合六担小米。

尚有纸厂、榨油房，可利用部队从农业所得麻子及稻草以及兵工割马兰草，廉价收买，作为原料。此项工业约六十人，每人每年平均纯利可得六担粮。

2. 除农业外，兴办兵工制度，实为解决自给之本，它是同时解决物资与财政两方面的。商业决不如农工两业之可靠，商业不是靠己而是靠人，故不宜多做。

3. 缺点方面是：大工厂经营，成本消耗繁重，没有固定资本，影响再生产，因此今后必须竭力筹得固定资本。

4. 我们过去既没有对于边区全盘经济的打算，对于部队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也没有统一的计划，不能使农业、工业、运输业、商业四项互相统筹配合起来干，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应有统一的计划，配合地经营。

以上就是我们的总结意见。

丙　商业方面

我们的商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从合作社到大商业，经过了六个年头。

还在一九三七年，本旅改编东渡，开赴崞县一带与敌作战。时值太原失守，商人惊散，城市货物不能运往乡村，老百姓亦不敢外出贸贩，致使日用品甚为缺乏，即油盐也都一时断绝，军队乡民，多有淡食者。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老百姓的请求，我们便办了合作社，抽调牲口到宁武等地驮运食盐。供给部拿出白洋三百元，在崞县一带收买商人寄存在乡下的货品，聘请阳武商人李茂林任经理，在阳武开张营业，定名为“三五九旅军民合作社”。当时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食盐油类等的困难，并贩运一些其他必需品。那时候票子还未跌价，所以资金虽然不多，而生意着实兴旺。一九三七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四月部队东移，短短的半年得到了崞县人民很大的好感，成千的老百姓都在传颂着：假如不是合作社，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要困死的。因为当时的宗旨，不是为了赚钱谋利，所以生意虽好，没有赚到钱。四月结束时，本利共合白洋四百九十元，交给部队用掉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合作社人员随同部队转移晋察冀，到了灵丘，又是缺乏日用品，军民都苦。欲继续办合作社，没有本钱，无法可想。到八月间，合作社人员去涞源县城找商人拉关系，用交朋友的办法，赊到了三千零四十二元货物，主要是布匹、文具、纸张、香皂等，共计十一驮子，运回灵丘东河南镇，设店销售，货主也同来。五天的时间，将这批货完全销尽，除本钱外，实得利润八百元。这次现付货主二千零四十二元，送了一千元给前方接济伙食

钱。余八百元，又随货主去涞源再办货。这样贩运数次，到十二月底，才把货主的账交清。合作社营业由八月至十二月，便利了灵丘一带人民所需油盐布匹的供给，并在数次贩运中赚了二千八百元，弥补了部队的经费，还剩余一千五百元的货。

一九三九年一月，将一千五百元货移驻下关镇，主要是贩运油盐，一方供给部队的吃油，同时便利老百姓的需要。这时因部队时该和敌人作战，伤兵一千多，西药营养品等采买不易，合作社遂与各方面商人建立了友好关系，经过他们从天津北平保定等处收买西药、牛奶、藕粉等物，保证了伤兵的需用。同年九月本旅接到担负晋陕河防的命令，合作社即行结束，九个月营业实得利九千四百元。当时部队出发无钱，即以五千四百元现金开支经费，余下了四千元的货，计五个驮子，随同部队西行。十月到了绥德五里湾，即以这四千元货开张营业，因边区货价高，卖了二万元。又派人到娄烦、文水、交城等处，贩来一些文具布匹。年底总结，现金带货共值三万一千元。

一九四〇年一月，合作社移到绥德南关营业。这时部队经济陷于极端困难中，不得不靠合作社赚一部分钱补助开支，所以“军民合作社”的名字，便觉有些不合用，改名为“大光商店”，转变为以营利为宗旨。一年中又交了一些商人朋友，或以现款买货，或作暂时赊欠，购进了文具、布匹、纸张、鞋袜、毛巾等货，并在市上倒卖。一年努力，年终总结，共赚十九万一千七百元，抽调十万一千七百元补助部队开支，确定一九四一年的生产基金为九万元。

一九四一年，为解决部队的迫切需要，本旅除以农业工业运输业为主体外，决定扩大经营商业，以为辅助。除原有九万元资金外，又从财厅发给本旅的四十万生产基金中提出二十五万元，又将

各团所有的零星小商店取消，集得资金六万元，共有资金四十万元。从一九四一年一月起，设了十个分店，经营一年，实得利润二百九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七元，抽调九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七元补助部队开支，实余二百万元作为商店的资金。

一九四二年，本店及十个分店在春夏秋三季的经营中，共得利润六百七十二万零八十元，补充部队经费二百万元，尚余四百七十二万零八十元继续营业。

经验教训：

1. 便利了老百姓购买布匹、纸张、油、盐等日用品，密切了军民关系。

2. 便利了军队购买日用品，在经济困难的八路军，能够使一元津贴买到香皂、毛巾、牙刷、牙膏等东西。另一方面，战士们把钱都正当地买了日用品，可以减少部队中不正当的浪费行为。

3. 交朋友的重要性。假如我们不同涞源商人拉好关系，便无法买进货物。

4. 收入盈余，补助了部队经费的开支。

5. 推销土产，抵制外货。可是有一部分商店因为我们检查不严与领导不够，尚不能有计划地联合一致进行抵制外货推销土产的工作，只顾到狭隘的本位主义，忽视了整个的经济建设。

6. 一九四〇年以前，不知道建立商业情报网，只晓得苦干硬干。结果，因行情涨跌，吃了不少的亏。一九四一年建立了商业情报网，各地行情，随时报导，并和大商家取得了联系，货价涨跌，能及时知道。故将一九四二年与一九四一年比较，就没有吃到行情不明的亏了。

7. 与当地有经验而且能在边区外区活动的商人联络和营业，遇

有纺织原料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但也遇到了一些流氓商人，他们利用我们做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使我们的营业受到损失。

8. 商店里有的人数太多，吃闲饭，增加了商店的开支。

9. 经常与外区商人往来，彼此了解政策与态度，减少误会，成为朋友。

10. 也考验了干部的党性、思想与能力。

11. 商店中管理严密，制度健全，才能减少消耗。

12. 帮助稳定金融。大光商店在一九四〇年兑换光华票。

13. 周密筹备，正确地灵活地运用贸易政策，在非禁止品的范围内，使土产运出，兑进必需品，一面是解决军需品的困难，又可获得利润。

14. 为了赚钱起见，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将所有旅团的合作社一律改名为大光商店。商店组织是以绥德为中心，在绥、米、葭、吴、清、安定、延川、延长均设有分店。旅为大光商店，团为分店。

15. 各商店人员大多是军人，按职别发津贴，但雇请者则按能力与工作之强弱发薪资。

16. 货物来源，一九四一年大部是从晋西北一带买回来的。后因敌人“扫荡”，封锁经济（降低法币，使用伪票），物价昂贵，又因我们资金困难，拿钱买货亦不能多，因此我们就在抵制外货、推广土货的口号下，推销自己织的布匹，卖了自己制的皮鞋、毛巾、布鞋，更大量地推销了大光肥皂。在防止奸商抬高市价与推行边币的原则下，兑换光华票，抑抵高涨着的市价。例如我们自己熬的盐，市上每元一斤四两，我们则卖二斤四两，这样使老百姓每元中便宜一斤。所以说我们在某一时期中，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在平衡物价，安定民生。

17. “早知三天事，富贵几千年”。似乎做生意是瞎碰的，碰的机会好，就可赚到钱。其实不然，做生意完全靠估计正确，了解当地及各地之情况，进出口的对比，方能预计货价之涨跌，确定某个时期的注意方针。

18. 稳定币制，巩固金融，是生意发达的先决条件。三年来由于边区的币制忽涨忽跌，金融紊乱，影响了买卖货物，感到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却使投机商人贩运票币，赚了很多的钱，影响了边区的经济。

19. 各团商店，对集中领导，实际上没有彻底地执行，表现了互相竞争、各自为政的不良倾向。

20. 各团都建立了会计制度，由专人负责，登记账目。但因经手者大多是过去商人，没有用新式簿记，仍用旧式簿记。（本总结完）

三五九旅还有一个关于一九四三年该旅在农业方面的具体生产计划，切实明确，可供各部参考。原文如下：

三五九旅一九四三年的农业生产计划

驻屯边区军队的屯田制度，乃是我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任务之一。这个任务的坚决执行，使我们能够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中，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军队质量，并求得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因此，本旅根据三年来在执行上级生产号召中所得的成绩与经验，为着加强与贯彻这一政策的执行，扩大一九四三年的生产率，特拟定如下计划。

（一）怎样组织部队的农业生产？

1. 本旅各团各部队驻防区域，均有可耕土地。因此，规定每个伙食单位，按劳动力与土地情况，经营农业生产。

2. 每个伙食单位，在驻军环境中，百人上下的只需三个炊事员，故每个伙食单位能从炊事员中抽出六至七个身强力壮兼有农作经验的同志，来专门从事耕种劳作。

3. 各营生产副营长，各连特务长，旅团生产副官，负筹划监督之责，在春耕、夏耘、秋收之际，组织与指导全体人员参加。

4. 每一个战斗连队的伙食单位，规定除解决自己全部蔬菜外，应种粮地六百亩。

今按各部能担任生产任务的，规定如下表：

队　数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生产单位数	5	2	1	17	16	13	6	5	65
应种地亩	3000	1200	600	10200	9600	7800	3600	3000	39000
炊事员中应抽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人数	30	12	6	102	96	96	78	30	450

（二）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冬就要准备来春事。

1. 每一个伙食单位，种哪些土地，山地多少，川地多少，熟地多少，荒地多少，要登记清楚。并要调查研究种什么东西，下种、锄草、收割时间需多少工、多少种子等。

2. 种地需要牛、犁，还需要其他农具，如锄、镐、筐、镰等

等，冬季要完全准备好。其具体要求如下：每一个伙食生产单位，必须准备耕牛三头，耕犁三犋，其他农具（如锄、镰等）共六十件。

3. 不上粪，庄稼长不好，各单位务必收集粪。所有人粪、牲畜屎尿、柴灰、草灰都要收集，要注意厕所、猪圈、羊圈、牛马厩之管理。要求每亩地至少要上四担肥料。许多地方有水冲草根、树叶，均可搬至耕地烧灰。

以上所提应准备的东西，各部需要多少，全旅共需多少，可看下表：

队别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生产单位数	5	1	1	17	16	13	6	5	64
须备耕牛数	15	6	3	51	48	39	18	15	195
须备耕犁数	15	6	3	51	48	39	18	15	195
须备其他农具数	300	120	60	1020	960	780	360	300	3900
须备肥料担数	12000	4800	2400	40800	38400	31200	14400	12000	156000

（三）要多少钱？要多少工作日？

1. 牛、犁和其他农具都要花钱买，或者花钱去做，这就是本钱。此外还有肥料、种子，六百亩地至少得用八百元钱。总计六百

亩地得用本钱多少，全旅全部耕地得用本钱多少，请看下列二表：

表一　六百亩地需用本钱概算表：

耕牛费	耕犁费	其他农具费	肥料种子费	耕牛饲料费	合计
12000	600	6000	800	2700	22100

附注：（一）耕牛每头系按四千元计算；（二）耕犁每犋按二百元计算；（三）其他农具平均每件按一百元计算；（四）耕牛饲料费按每头牛九百元计算。

表二　全旅全部耕地需要本钱总值概算表：

项别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耕牛	60000	24000	12000	204000	192000	156000	72000	60000	780000
耕犁	3000	1200	600	10200	9600	7800	3600	3000	39000
其他农具设备	50000	1000	6000	122000	96000	78000	36000	30000	419000
肥料种子	4000	1600	800	13600	12800	10400	4800	4000	52000
耕牛饲料费	13500	5400	2700	46900	43200	35100	16200	13500	176500
合计	130500	33200	22100	396700	353600	287300	132600	110500	1466500

2. 从开荒播种，到收打完毕，种六百亩地，得用多少工作日？估计开荒播种需工五百个，制肥及施肥需工八百个，锄草三次需工一千八百个，收、打需工四百五十个，那么，总计起来，共需三千五百五十个工作日。请看下表：

耕地播种	制肥及施肥	锄草三次	收、打	合　计
500	800	1800	450	3550

附注：种六百亩地，六个炊事员专门从事生产一年，至少可以做一千个工；三千五百五十个工除去一千个经常工，还有二千五百五十个工。每个伙食生产单位，按一百人计算，那么每个人在一年中，须支付二十五个工作日，从事农业生产。

（四）耕作物的种类，各类的收获量：

1. 按土地状况，研究哪里适合种什么粮食。一般应种谷、粟、高粱、包谷、豆类、稻子等。此外还必须估计到部队本身的需要，种大小麻，可解决打草鞋、做鞋的麻及灯油、食油。但在某些部队可种棉花。

甲、七团可植棉二百亩，估计每亩收花三十斤，总计可收花六千斤。按每斤五十元折价，总可折款三十万元。

乙、特务营每个连除种六百亩粮食外，还须种八十亩棉花，估计可收花二千四百斤，折款十二万元。营部种棉二十亩，可收花六百斤，折款三万元。

2. 按每坳地（三亩）平均产细粮四斗计算，六百亩地可产细粮八十担，全旅三万九千亩地可产细粮五千二百担，每担细粮按一千二百五十元折价，则六百亩地产粮折款为十万元，全旅三万九千亩地产粮折款为六百五十万元。

3. 在六百亩地当中，估计半数（三百亩）是种谷子，每亩地产草按三百斤计算，则总可产草九万斤。每斤草按一元折价，则六百亩地产草折款为九万元，全旅耕地产草折款为五百八十五万元。请看下面两个收入概算表：

表一　六百亩地收入概算表：

可收细粮	粮价每担	粮价合计	可收谷草	草价百斤	草价合计	粮草总值
80石	1250元	100000元	90000斤	100元	90000元	190000元

表二　全旅耕地收入概算表：

项别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耕地亩数	3000	1200	600	10200	9600	7800	3600	3000	39000
可收细粮（担）	400	160	80	1560	1280	1040	480	400	5400
可收谷草（万斤）	45	18	9	153	144	117	54	45	585
产粮折款（万元）	50	20	10	170	160	130	60	50	650
产草折款（万元）	45	18	9	150	144	117	54	45	582
折款合计（万元）	95	38	19	323	304	247	114	95	1235

各团各部接此计划后，立即召开生产干部会议，讨论执行办法，将团或部的总计划及各个伙食单位的计划（根据三年自给菜蔬以及吃油、灯油、做草鞋用的麻等等材料，加在自己的计划中）做出，限十一月底呈报上来，望遵照执行为要！（本计划完）

从上列种种材料看来，即可知道我们军队的生产自给，毫无疑义地是有巨大成绩的。这种成绩是依靠了什么才达到的呢？是依靠了干部们的积极领导与战士们的劳动热忱才达到的。干部们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积极地指导生产运动的，战士们

也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参加生产劳动的。没有这两种人的自觉性，没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么，是无法完成这种艰苦的生产任务的。假如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雇佣的一分子，假如他们感觉从事生产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无关的，是与共同的革命事业无关的，那末，这种生产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以上讲过了我们军队在生产自给方面的极好的经验与极大的成绩。以下再讲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不但是军队的，也是机关学校的。这些缺点中，有些在过去时期是难于避免的，但在有了五年经验之后，就应该有所改变了。有些则已成了严重的弊病，如不改变，则将转过来妨碍党与革命的利益。

这些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缺点，就是一部分军队及一部分机关学校，为了要迅速解决迫切的自给问题，比较地或特别地重视了商业，轻视了农业与工业。他们不知道只有农业与工业是产生价值的，商业不过是流通过程，它本身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鉴于过去的教训，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任务，一切部队、一切机关学校都要将重点逐渐转到农业、工业与运输业上去；而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因为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是农产品（正粮、杂粮、蔬菜、麻、肉食、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马草、木料、柴火等）；农产品又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如果我们再从事一部分可能与必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做鞋、织毛线衣、挖炭、锯木头、榨油等）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造纸业等），则可以很大部分地解决我们

的日常需要，并可争取出卖。

第二个缺点，就是缺乏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下面多少单位各自为政，上面没有或缺少在政策原则上与工作内容上的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致使各部分不知道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明知故犯。于是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事也发生了；破坏政策原则，破坏政府法令的事也发生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也发生了；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不但没有协助，反而互相斗争，互相妨碍的事也发生了；瞒上不瞒下，瞒上又瞒下，打埋伏，说谎话的现象也发生了；极端浪费，一掷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现象也发生了；尤其严重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端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另有若干干部则起了霉，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所有这些坏事，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的。今后所有军队与机关学校的一切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着重于照顾全局，掌握政策，对所属各单位的生产活动一定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检查，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第三个缺点，就是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或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者中了董仲舒们所

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者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职业革命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

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第四个缺点，就是过去有些部队或机关在生产任务的分配上，没有上下级的分工，从旅部到连队，从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都允许经营商业，毫无限制，因而发生许多毛病。今后一般的商业、工业与运输业应集中在旅部、独立工作区域的团部及上级机关，并按正确原则去做，对外贸易还必须统一于物资局的指导之下。集中工作区域的团以下，任何部队的营以下，以及一般的下级机关，应指定他们从事农业，战士们与杂务工作人员们可做的手工业，以及消费合作性质的生意或小贩生意，其余均不许他们做。

根据五年来成绩与缺点的总结，一九四三年军队各部应执行如下各项的具体任务：

（一）除大部分粮食与一部分被服由政府供给以外，大多数部队应完成一切供给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则应完成百分之百，只有某些特殊情况的部队（如骑兵部队）才允许他们只担负较轻一点的生产任务，但也要想办法在一九四四年能够完成较大的任务。一切部队应准备于一九四四年更多地增加粮食与被服的自给额，以便减轻民负，休养民力。

（二）除三五九旅已经全部从事屯田及骑兵部队因特殊条件难于立即实行屯田外，其余各部，除负担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

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

（三）各部由上至下应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从事生产，从旅到连按级建立生产委员会，按级举行生产与供给的集体计划与集体检查，并研究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期增进生产，改善供给，纠正一切不正常的现象。

（四）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比较更强的干部去管理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现有的经济干部须加以审查，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各部一律增设生产副营长及连的生产管理员，专门管理全营全连的生产与分配事务。旅部团部设生产副官，管理本单位的生产工作。各级主官必须亲自计划与检查经济工作。

（五）各分区党部、政府与军队的一切经济与财政工作，在分区财经分会的领导下实行统筹统支。为着鼓励各部分生产人员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起见，应允许从他们的生产结果中支出相当部分去改善他们的生活。除此以外，一律应做到统筹分配，免除苦乐不均的弊病。统筹分配，有在全边区范围内统筹的，有在各分区范围内统筹的，有在各系统范围内统筹的，有在一单位内统筹的，依生产性质及经营情况来决定。

（六）厉行“军民兼顾”的原则，军队、党部、政府的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的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利益引起人民不满的事均不许做。

（七）生产与教育不可偏废，各部必须精密地计划二者的工作及其相互间的配合，恰当地分配二者的时间，使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与教育均多于与好于一九四二年的生产与教育。我们有了五年的经验，一九四三年达到这个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八）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完成及在实施这两项计划时保障自己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自己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

九　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

三部分公营经济中，军队及机关学校的生产，是直接为着自己解决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的，政府机关经营的也在内。例如边区政府各厅处的工作人员，有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经营，这是直接为着补充自己机关办公费被服费之不足及工作人员伙食费之不足的。但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则不是直接为着自己机关，而是为着党政军全体的。

延安及边区的党部机关、政府机关、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以及许多学校，他们在整个“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下，从事农工商业的经营，是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运动，解决了财政供给上的很大问题，仅仅次于军队，值得我们慎重地总结其经验，指出其成绩及缺点，并规定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针。

军队的生产运动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有了经验，一九三九年我们就将这种经验推行于一切机关学校。一九三九年二月，开了生产动员大会，组织生产委员会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按各机关学校的工作或学习的不同情形，人员劳动力的强弱，规定不同的生产任务。例如：那时规定区乡工作人员的粮食须完全自给；其他机关，从中央至县，则按劳动力多少强弱，多的强的自给粮食二分之一，

少的弱的自给三分之一；共要他们开荒十万零二百亩，冀收细粮一万三千担。此外，规定一切机关学校的蔬菜全部自给，喂猪解决肉食，种粮有草又可解决一部分马草。当时全边区机关学校共约二万人，平均每人发生产费二元六角，共四万九千余元，作为购买耕牛农具的资金。在他们找得了土地、买到了耕牛农具之后，即全体动员从事春耕。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来没有劳动过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连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及勤务员、伙夫、马夫一起，组织在生产小组中，从事开荒种地。那时延安附近一切有荒地的山头，布满了开荒的男女，他们自动地宣布劳动纪律，提出开荒竞赛，体力强的都拿起锄头开荒，体力弱的则种菜养猪，或送饭送水。

这次生产运动的收获是：（一）全边区机关学校，共计开荒十一万三千四百十四亩，收获粗粮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五担六斗三升（合细粮五千八百三十担零一斗七升）；收获菜蔬约一百二十万斤，两项照当时市价值洋三十六万八千余元（一九四二年市价则值一千零十七万九千余元），解决了二万人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马草的二分之一及一部分蔬菜与肉食。（二）使一万多个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第一次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什么是劳动，锻炼了他们。（三）边区老百姓看见或听见所有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及青年学生——从共产党中央委员至小勤务员，一律上山种地，感动了他们，大家热心开荒，成为历年开荒之冠。

另一方面，这年并没有完成粮食生产的规定任务，由于劳作缺乏经验，施肥、播种、锄草有的不及时以及有些地区遇着旱灾等原因，致使开荒虽多，收获不大，只完成原定一万三千担细粮的百分之四十五。再则这时在领导上与组织上犯了平均主义的毛病，没有考虑到各工作机关各学校的不同性质。有的是给予任务太大，例如要区乡

工作干部完全自给粮食，结果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有的是因为从事生产延误了工作和学习，反而不经济。有的是某些体弱的男女同志本来不能做重劳动的，也勉强劳动，身体吃亏。有的是原可从事工商业的，但当时没有指出，只单纯地全体一致地注意了农业。

一九四〇年，改正了这些缺点。首先将农业的生产任务减少了，除菜蔬肉食自给外，粮食生产则按各机关学校的不同情况，只规定自给七分之一、六分之一与四分之一。体弱的男同志及一切女同志，不要他们参加重劳动，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与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则完全不参加生产，允许雇有经验的农民参加生产并做生产的指导者。此外，由财政厅发五万元给各机关学校作资金，允许各机关学校进行工商业，并发展畜牧生产，喂猪养羊。因此一九四〇年的农业生产，除原耕土地外，没有增加。有的因劳动力不够，采取与老百姓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粮地分给别人，自己着重于种菜、喂猪；又加有些学校已迁往华北；故一九四〇年粮食收获只有细粮三千担，菜蔬九十余万斤，照当时市价估计约值三百万元。

我们的经营商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一九三九年各机关学校就有消费合作社，并有开饮食店的。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有三十个合作社及食堂，资金共约六万余元。其中大的一万元，小的不过数百元，目的在于供给本机关学校的日用品，同时卖给外面谋些微之利，借以改善生活，还未担负借商业解决一般需要的任务。但是它却初步地锻炼了从事商业的干部，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与小量的资金。

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两年中，机关学校还没有一般从事工业生产，只建立了一些为着自己磨面粉的磨坊，还有后勤的交通商店附设了一个打马掌的铁店，可算是机关学校手工业生产的开端。

以上算是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第一时期。以下是第二时期。

一九四〇年冬，由于边区经济被封锁，外援断绝，财政困难达于极点，整个财政供给不能不从半自给急速地转到完全自给，因此机关学校的生产任务也迅速地起了变化。

这时党政军民各机关及各学校的人员（部队在外）既不能全部从事农业，而生产自给的任务又是极端艰巨的，一方面要靠发展生产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给，同时又要积累资金，建立将来自给的基础。

为了渡过这一严重的难关，党与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步骤。首先是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后勤经济建设处，边区一级的财经处，各分区各县亦令其成立生产委员会。其次，从一九四〇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先后由政府支付七十万元，银行借出三百万元作为各部门增加的生产资金，交给各生产自给的领导机关转发下去，加上第一时期各机关自己所积累的资金，于是大家从新布置，纷纷抽调人员，选择业务，决定以工商业为主要经营方向，农业则放在辅助地位。

下面，我们就来将这一时期内各机关学校从事工业、商业及农业的经验加以论述。

各机关学校的工业是从纺织业开始。初因边区有羊毛，一九四〇年冬，各机关学校人员在其工作或学习之余，就有手摇纺毛，一时成了运动，大家纺起来。但因原料不够，纺毛技术又不熟练，毛线不匀，费工太多，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就逐渐停止，而着手于建立手工纺织厂。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各个大的机关学校，均纷纷抽出勤务员通讯员到政府的难民纺织工厂学习纺纱织布，一时如雨后春笋，办了十多个纺织工厂。缺点在没有计划性，到了下半年，这些工厂，或因原料供给与纱布销售无保障，或因流动资金不

够，或因管理不善，有的停工，有的合并，有的时开时歇。例如：中央直属财经处的新中国纺织厂，先与中央组织部的胜利纺织厂合并，后与马列学院的团结纺织厂合并，仍名团结纺织厂，使经营集中起来，更有利些。鲁艺及女大的纺毛厂则实行停工，将资金移作别的事业。中财的团结纺织厂，后勤的交通纺织厂，均因种种困难，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生产力，而时开时歇，直到后来才走上轨道。这样看来，由成千成万人的手摇纺毛到建立手工工厂，由建立十多个很小的纺织厂纺毛厂到最后合并为交通、团结两厂，中间经过不断地摸索研究、改善技术与改善管理方法，这是一个从盲目性到自觉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说明了各机关学校的苦干精神，另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我们对于工业经营的毫无经验。到一九四二年，交通产布三千三百三十六匹，团结产布二千七百三十六匹，成了边区的大工厂，就是这一苦干与摸索过程的宝贵的产物。

纺织厂以外，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又陆续开办了被服厂、制鞋厂、煤炭厂、木工厂、造纸厂、陶瓷厂、磨粉厂、榨油厂、丝织厂及铁器店等许多手工工厂，求达自给目的。这些工厂的资金，或是从商业资金中抽出来的，或是从银行借来的，或是从停闭自己的纺毛厂移来的。并鉴于纺织业的经验，不是那样毫无组织地干了，而是或由几个机关学校合办，或与老百姓合办，或与银行合办的，比较地有了一点秩序。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大都经过开始亏本，继能维持，最后才能获利的曲折过程，才立定了自己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与一九四二年两年中，中财系统共计建立了大小手工工厂二十七个，共有资金四十余万元，员工四百七十七人。其中计有纺织与纺毛厂八个，资金二十一万七千元，员工一百六十一人；煤炭厂三个，资金七万元，员工六十八人；磨坊三个，资金一

万五千元，员工二十一人；被服厂二个，员工四十八人（资金不详）：木厂三个，资金三万五千元，员工七十六人；制鞋厂一个，资金一万元，员工三十八人；造纸厂一个，资金二万元，员工二十九人；此外还有小的机器厂、玻璃厂、酒精厂、陶瓷厂、油灯厂、制毡厂各一个（此六厂资金人员无统计，前三厂附属在自然科学院，是实验性质）。所有上述各厂，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实行第一次精兵简政时，重新作了调整，统归中央管理局直接管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取消，设立中央管理局，隶属于中央办公厅），由二十七厂裁减合并为十九厂。特别是将八个纺织厂并为团结、实验两厂，使经营集中，业务改善，就由八厂分立时或亏本或仅能维持的状态，过渡到了在一九四二年十个月中获利一百六十万元的好现象。

后勤系统下的自给工业，也是和中财系统一样，从一九四〇年冬季开始的。经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的经营，计有纺织厂一个，纸厂二个，炭厂三个，木工厂二个，丝织厂二个，石炭厂、精盐厂、陶瓷厂、被服厂、毛笔厂、铁厂、面粉厂、鞋厂、麻织厂各一个，共十九个。这些工厂的资金员工及产量尚无统计。这些工厂虽赢利不多（一九四二年十个月赢利二十万元），但有其极好的优点，即是：（一）他们是由后勤集中经营的，不是由各机关学校自由分散经营的，因此领导与检查都较深入，缺点改进也快。（二）经营的部门广，不像中财系统在开始时集中注意于纺织工业，建立了纺织厂八个之多，后勤则始终只办一个交通纺织厂，因此有余力多做别事。（三）完全是保证供给的性质，虽不赚钱，却解决了许多必需品的供给。

一九四二年十月，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中管后勤两系统合并

为一，工业亦统一管理，并作新的调整，交通、团结两厂即被服厂拨归财政厅；制药厂、酒精厂、制铁厂、玻璃厂拨归留守处；自然科学院亦随该院一起拨交政府。其余各厂则实行裁减合并，统归中央管理局管理。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计有木工厂三个，纸厂二个，炭厂五个，鞋厂一个，油厂一个，粉厂一个，磨坊三个，大车制造厂一个，制酒厂一个，赶毡作坊三个，共大小手工业工厂作坊二十一个，可以保证中管系统全部石炭、鞋子、面粉的供给，全部木器洋铁器具的制造与修理，保障纸张与食油的一部分，被服则由政府负责供给。这就是中管（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前是中财）后勤两系统两年来在工业生产方面的积极结果。

上述经验指明：在目前条件下，机关学校经营手工业是必要的，其目的不在赚钱，而在保障必需品的供给。但工厂不是任何机关任何学校都可样样去办的，应是有计划地按工业的性质与机关学校的情况分别地择要地去办，减少盲目摸索的毛病。已有工厂须按地区按机关系统，采取裁减合并及转移等步骤，戒免浪费，并使其能够发扬更大的供给作用。

前面说了，我们的同志对于商业，也是同工业一样，没有经验的，只办过一些合作社。现在要转到依靠商业获利来解决一个很大部分的供给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办才好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的过程。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两年中的经营商业，是从要迅速解决困难的目的出发的，因此就不能不以各机关学校所有资金的大部分去做能图速利的生意。

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一年秋这一年中，主要的是经营百货商业。有些机关学校利用他们原有的本小利微的合作社、商店或小货

摊，加以扩大，增加资金，补充人员，加入商会，正式经营商业。例如兵站的交通商店，最初只是在延安七里铺兵站门口附设的一个小纸烟店。一九三九年八月，移到延安新市场，贩卖百货外，还附设了一个中药房，一个马掌店，资金由数百元增至二万元。又如合作商店，是由抗大合作社改变的，一九四〇年六月搬到新市场，并在抗大三分校附设支店，资金由八十元增到一万九千元。后勤的百货商店，开始不过是一个资金三十元的小货摊，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予以扩充，资金增至二万元，除做百货生意外，附设了一个染坊。许多机关学校原来没有商店的，此时亦集资调人，或独立经营，或与人合股，做起生意来了。这时各公营商店的营业主要是从绥德、定边、鄜县贩卖百货，特别是机关学校部队自己需要的布匹、纸张、文具及老百姓需要的火柴、棉花等。这一时期内，延安、绥德、定边一带，我们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共有六十余家之多，军队的还不在内。另有许多不设门面，靠着一二个人带二三个四五个牲口贩运货物，沿途流动出卖，叫做“走水生意”。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后勤商店管理委员会所辖，就有西北商店、西北菜社、兴华、合作、交通、新新、兴民、民兴、百货、军民及贩卖部等大小十四个商店，中管系统则有二十个。

这一年的商业，确实靠了它渡过了严重难关，解决了很大的供给问题。例如中央直属财经处与各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商业中，依靠一百一十三个员工所开共有资金二十九万六千八百元的大小二十个商店，获得了二十五万六千元的利钱，供给了各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百分之四十八。后勤系统以七十万六千元资金在同一时期得了八十一万元的利钱，供给了他们日常经费的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这一时期的商业有一个很大的弊病。这就是由于过分分散，没有集中领导，又差不多都是做的百货生意，急于要解决每一机关学校的经费困难，因而产生出来的弊病：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甚至违反党的政策，影响物价与金融。同时，物价高涨，边钞跌落，外边封锁加紧，经营出入口的百货生意，顿然显出不景气，各机关学校靠此维持经费亦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将机关学校的商业与军队的商业加以改造，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这个改造就已开始。一九四二年春，边区初步地实行了精兵简政，遂决定将商业完全企业化；各系统一方面整理原有商店，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统一对于公营商店的领导，严格地贯彻法令政策；另方面扩大商业范围，进行多样营业，例如盐店、骡马店、过载行、客栈、屠宰等。经营的方式亦有改变，或几个商店合并经营；或向私人商业及合作社投资，而自己不做生意；或向政府的盐业公司、光华商店入股。这样一来，商店林立、互相竞争的弊病既可免除，维持机关学校经费的作用亦可恢复。例如：中管与后勤两系统照此方针整理的结果，从原有商店三十八个，员工一百九十六人，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只存商店二十五个，员工一百零五人。十个月中，两系统以八百万元资金，获得一千六百四十四万元的利钱，占了全部生产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八。又如边区政府各厅处的生产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农商两业的收入为六十万元，其中商业三十五万元，亦占百分之五十八。又如分区及县级机关原是以农业为主的，但至一九四二年商业亦占了重要部分。

一九四三年财政经济的领导实行一元化，对外贸易统一于物资局，各机关学校要彻底实行精简，因此，各机关学校的商业必须在物资局的调节之下，分工经营土产与盐的运输，并以一部分资金与

物资局合作，使公营商业更加合理化。

各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亦有进步。两年中，在粮食、蔬菜、牲畜、木炭及业余劳动等方面都有大的成绩。

在粮食生产方面，一九四一年，各机关学校有些还是完全自营，有些已改为和老百姓伙种，有些则经营了农场（其中亦有自营、伙种两种）。自营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不是全部工作人员上山种地了，而是以杂务人员为基础，配合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作人员组织生产队。例如后勤系统各机关的生产队，一九四一年共种了五千二百亩粮食，中央党校则种了八百亩。和老百姓伙种的，如中组伙种二百四十亩，二八分粮，公二私八，三七分草，公七私三。经营农场的，有边府秘书处的两个农场，是采伙种办法；又有由机关学校抽出杂务人员，配备耕牛耕具，在南泥洼自己建立农场的，计后勤二，中财、中组、青干各一。各分区及各县的机关，则采取了自种、伙种并用的办法。

一九四二年，精简实施，延安许多机关学校实行合并，因此，除菜蔬自给外，粮食只取农场与伙种两法。

伙种虽带剥削性质，但老百姓特别是移民难民十分愿意，因为公家供给了种子、耕牛、农具，租率又不算重。这种办法对于奖励移民，调剂劳动力，是有作用的。举党校为例："党校总务处与四个移民合伙种一百垧地，老百姓四个劳动力都很强，党校出一人负领导检查之责。其办法是由党校供给农具，每人一锄一镢一镰，借牛两头，并给种子。另借食粮，每垧细粮四升，百垧四担，言明秋后归还。收获粮草，规定谷子二八分，公二私八；糜子三七分，公三私七；杂粮四六分，公四私六；草则全归党校。是年党校计收草[illegible]

万零五百斤；谷子八担三斗七升，糜子十担一斗七升，黑豆六斗九升，小麻子四斗二升，老麻子一斗，小豆二斗。共合边钞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五元。四个老百姓则收谷子三十三担四斗八升，糜子二十二担四斗，黑豆七斗五升五，小麻子六斗三，老麻子一斗五，小豆三斗，共合四万六千八百零五元。这是公私兼顾的好办法。”

建立农场亦有新经验。因为机关学校抽出的人员劳动力不强，工作时间有限制，农业技术又不熟练，如专事种地，反而亏本。一九四二年采取下列两法：一是自营，除种粮外，兼营副业，如养牲畜、制木板等，正和三五九旅所采办法相同。一是伙种，将已有基础的农场和老百姓伙种，自己另辟新场。新场第一年无利得，第二年就有了基础，又可和人伙种。举边府秘书处为例。据边府秘书处同志称：“我们有东南两农场，地亩、经营法、收获量都大致相同。一九四二年南场种川地九十六垧，熟山地一百零八垧，新开荒一百三十六垧。共收粗粮二百四十四担，因是豆子玉米居多，折成细粮一百四十六担四斗，每担以一千三百元计，折钞十九万零三百二十元。又收干草一万四千斤，值一万四千元。又收菜二万斤，值二万元。三项共计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原有羊一百二十八只，一九四二年新下羔羊长成八十一只，值一万元。喂猪卖了三千四百八十二元，还有十三个猪，每个以四百元计，值五千二百元。以上各项共计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元。支出方面：我们是采取安伙子办法，所以一切开支，均从收获量分配，连我们派去的四个人的一切开支也包括在内。安伙子十二户，共四十五人，内全劳动力十九，半劳动力十三，无劳动力的小孩十三。共分去粗粮六十八担，折细粮四十担零八斗，每担一千三百元，共五万三千零四十元。又分去草七千斤，计七千元，二项共计六万零四十元。自己五个人（一个是残

废管总，两个做饭、种菜带种庄稼，两个揽羊、打杂），四个牛，一个驴，五个狗，共支食用粮三十担，折细粮十八担，计二万三千四百元。食用油五十斤，每斤二十六元，计一千三百元。此外，农具修理、犁、服装、津贴等计二万元。以上共计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元。南场共收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元，共支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元，两抵余十三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元。加上东场约十一万余元，两场共收约二十五万元。这两个农场，名义上是秘书处与民、财、教、建四厅合办的，实际上只拿出十个人，其中两个是雇工，一个是残废，七个是编余人员。政府有个生产委员会，管理两农场，实际也只有一人经常办事。本年因遇水灾、风灾，少收粮食约一百五十担，值十一万七千元。还有买来的萝卜、白菜种子受了骗，是假的，损失约三万元。二项共计十四万七千元，两场合计损失约二十万元。这就是说，如果不遭天灾，不买假菜种，还可多得二十万元。民、财、教、建、秘五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对于二十五万元收入，平均每人有六百二十五元。若以秘书处一百人来说，则平均每人有二千五百元。农场今年收成虽差，但打下了明年的基础，又解决了十二户移民的生活。同时依靠这个基础，明年准备在南场扩大耕地三百垧，借以安插编余人员。原两农场仍取安伙子办法。”

各县机关粮食生产的方法，也是自种伙种两种。例如延安县一级机关共种地二百一十垧，其中九十余垧招了两户安伙子的，有五个劳动力，县委只拿出二人在农场工作。其余百余垧地，则由犯人耕种。一九四二年除安伙子分出者外，共收粗粮七十五担，合细粮四十五担，值五万八千五百元，加上草值三千元，共计六万一千五百元。

以上各例证明，自营、伙种二法兼用是正确的，一九四三年的

粮食生产任务，应注意此项经验。

农业经营中，极大一项任务是种菜，因为食粮还有公粮可领，菜如不种，则二万余人将处于半饥饿状态；“无菜半年荒”，是确确实实的。

过去两年的菜蔬生产方式，是配备专门种菜人员，再配合机关学校中一部分辅助劳动。过去每年平均自给了三个月到半年的菜蔬。据后勤统计，他们各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一年共种菜地一千八百零一亩，计洋芋地一千零三十亩，白菜豆角萝卜杂菜地七百七十一亩，此七百七十一亩地到秋天又种秋白菜、秋萝卜，全年收获各种菜蔬八十七万九千斤，平均约供给全年菜蔬的三分之一。据中管统计，一九四二年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配备了种菜人员四十名，所种菜地，计有川地三百八十八亩，山地一千九百四十一亩，共收各种菜蔬七十四万五千斤，平均自给了五个月的菜。其中管理局本身自给了九个月，延大及自然科学院均自给了八个月，中央研究院及文抗均自给了七个月。各个机关人员的菜蔬生产，各有不同情况。如关中因气候关系种得很少，平均只能自给菜蔬三个月。警备区因土地缺乏，也只能自给二三个月。有些则因有地，且可和人伙种，如华池、志丹等县，则可做到自给半年以上。全边区机关学校的菜蔬自给，估计当在六百万元左右。

这里的问题是：机关学校在编制之外，另外配备生产人员种菜的办法究竟是否合算呢？根据中央直属各处的经验，证明是合算的。种菜最好是川地，各种青菜均可种，山地只能种洋芋豆角。川地一亩种菜，可供五个人全年食用，即每人只须年种菜地二分。山地却需一亩半，才能供一人一年之用。而一个专门种菜的人，只要施肥时有些辅助劳动，可种川地六亩。这就是说，一个专门种菜的

人，配合一部分辅助劳动，可供三十个人的全年菜蔬。以每人每天需菜十二两计，每年需三百斤，三十人需九千斤，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延安市价每斤三元，共值二万七千元，而一个专门种菜的人年支约六千元，可余二万一千元。加上必要的奖励费，至少可获二万元。因此今后各机关学校在彻底精简后，应注意调剂川地种菜，配备种菜人员，加上辅助劳动，保证自给蔬菜一半以上，乃至完全自给。

农业方面，除粮、菜外，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是很要紧的。

有些人以为喂猪浪费粮食，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不是喂猪浪费粮食，而是不喂猪浪费粮食。一则无猪必抛弃剩饭剩菜，而这项剩饭剩菜，在大的机关及连队里是相当多的。二则吃肉少则吃饭多，吃肉多则吃饭少。故喂猪增加肉食，不但为保持健康所必需，且在经济上亦是合算的。各机关学校过去创造了许多喂猪办法，例如中央党校指定杀猪房每天派专人到厨房来收集淘米水及菜屑喂猪；中央总务处指定专人收集碾米留下来的米屑，收集菜园收菜时抛弃下来的菜叶菜根以供猪食等。据后勤统计，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五万六千八百十四斤，照当时市价值十七万零四百四十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一斤猪肉。加上下半年，全年约值三十五万余元。据中管统计，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一九四二年至十月止，平均每月养猪二百六十五头，十个月共赚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余斤大称的猪肉，合边钞七十万元。又如延安县一级机关，一九四二年十个月喂猪，赚了一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值当在四百万元以上。

喂猪之外，如有牧地，养羊也是有利的。

一九四三年彻底精简后，可酌采三五九旅每四十人配备一个伙夫及节减勤务员的办法，将编余伙夫勤务员配备到生产战线上去

可做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许多事情。办大牧场从事大的畜牧事业，应于一九四三年提到重要地位。

粮、菜、畜三项之外，还有烧炭与业余劳动二项，也是值得注意的经验。例如一九四二年冬用木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中，完全是从本机关本学校抽出人员组织烧炭队上山烧炭来解决的，如用钱买，则所费又是一个很大数目。如中央总务处，九月间即抽勤务、伙夫、马夫四十二人，组成烧炭队，上山伐木烧炭三个月，共烧木炭一百四十五窑，完成了十四万斤木炭的任务，每斤以一元二角计，值十六万八千元。如以全边区机关学校三万人，冬春四个月，平均每日每人烧木炭一斤计，共需木炭三百六十万斤，值三百六十万元，如不自己烧炭，哪里去找这一大笔经费？

还有各大机关学校杂务人员的业余劳动，也很值得注意。例如中央总务处，今年动员杂务人员修理房屋、建造围墙、架桥、修路、割马草等，共替公家节省了十一万余元。中央党校杂务人员的业余劳动，替公家节省了十三万九千余元。三五九旅一切修造都不请工，各机关学校亦应尽可能照办。一切本机关本学校的人能做的，均应动员他们去做。单以杂务人员从事业余劳动一项来说，若全边区机关学校都实行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对一切生产有成绩的人都应给予奖励，对业余劳动者也是如此。

以上就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四个年头边区各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经验的总结。

据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称：中管后勤两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两年中，从事农工商各业的资金由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九百一十七元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元（此数中包括由货币跌值的增加数很大，并非尽由于生产增值）。一九四二年一年的生产盈余共计二千三百八十

一万元，此数除以二百三十三万元扩大一九四三年生产资金外，其余二千一百四十八万元完全用之于弥补各机关学校的伙食费、被服费与办公费。就企业分别说，农业占百分之十七，工业占百分之八，盐业占百分之七，商业占百分之六十八。就机关分别说，后勤直辖各业所得八百四十万元，中管直辖各业所得三百五十一万元，后勤与中管合并后所得八十万元，各机关学校自己生产所得一千一百一十万元。若将生产自给数与人民供给数相比，则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又据边区县级同志称：县级党政经费每月约一万元，自己生产自给约九千元，上级只发约一千元，前者占百分之九十，后者只占百分之十，则是更大的成绩。总之，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根据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的经验，今后机关学校的生产必须加以改进，发扬其成绩，克服其弱点，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完成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一九四三年应采取如下各项方针：

（一）实行以农业为主。

甲、按照各系统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形，采取下列办法，经营农业：（1）无农场基础的，应马上动手置备耕牛、农具，或自种

或与人民伙种，收取粮食与蔬菜。(2) 有农场基础的，除继续农场生产外，应扩大经营范围，安置编余人员，多营副业，如养猪羊、喂鸡鸭、锯木板等。并同老百姓合伙，增辟新的农场。在这种种办法之下，务使一九四三年的粮食生产比之上年又多又好，不得以为农业迂缓采取忽视态度。

乙、一切大小机关学校均应配备必要的专门从事种菜的人员，辅以工作人员及学生的轻劳动，按不同地区，不同气候，自给蔬菜六个月以上，并极力争取完全自给，这是改善生活的重要步骤之一。

(二) 调整与发展各种手工业。按地区，按系统，按精简原则，将各部分已有相同的手工业，改为合股经营。同时根据各地区各系统的需要，建立新的手工作坊，如榨油房、酱园、炭窑等。经营这些手工业的原则：第一必须工场本身能自给；第二必须能获利。

(三) 发展畜牧业。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都应养猪，尽可能做到按三五九旅平均每五人养一个猪的办法，增加肉食，要把增加肉食、改善生活、增进健康看成是极重要的事。此外，各大机关学校，尤其是军队，应抽出资金，在三边、陇东、金盆湾等地，选择不妨碍公民利益的地点，经营牧场，大批地畜养牛羊驴马，准备于抗战胜利边区盐业衰落时以牲畜出口代替之。

(四) 发展运输业。彻底精简后，只留少数牲口保障各机关学校自己所需粮草的运输，一切多余牲口，加上可能置备的牲口，一律组织运输队，从事运盐运货。此项运输业，以能按地区按系统统筹办理，借以减少浪费为最好。

(五) 整理商业。在商业为辅的方针下，按照不违反贸易政策、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按照各系统各单位精简后的情形，实行商店

的合股经营和分散经营，取缔违反政策的商业，关闭无利可图的商店。各系统应从商业资金中抽出必要部分转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与运输业诸方面，着实打下从农工畜运各业解决自给任务的基础，不得犹豫。

（六）应将改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及学生们的生活看作重要的事情，各机关学校负责人为此应想种种办法。应提倡与指导杂务人员、工作人员、有孩子的母亲，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身体条件下，在自愿原则下，进行某些手工及农作的生产劳动，但不得从事商业。此项生产劳作方式，依其自愿，或组织大的生产合作社进行之，或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之，或个别地进行之；公家应酌予贷款作资金，其收获均归参加劳作的人所有。凡对此事办理最好、成绩最优的负责人，均应得到奖励。凡对本机关本学校经理不善，因而使本机关本学校的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学生、母亲、孩子、病员、休养员生活太苦的那些负责人，或虽改善了生活，而其方法不正当，妨碍了工作学习，破坏了政策法令的那些负责人，均应受到批评与责备。

（七）实行统一领导。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赢利，务必免除各自为政、盈亏不一、苦乐不均的弊病。

（八）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实行企业化，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各企业工作人员及雇员的伙食被服薪津由各企业自给，不得再由公家

担负。

（九）一切生产机关（工厂商店等），不论是政府的、军队的或机关学校的，均应实行群众化。除生产任务的分配，生产的管理与检查，生产结果的处理等以外，一切均受地方党政领导，连支部生活在内。一切生产机关的人员，要执行政策，守法纳税，脱掉军衣，穿上便服，参加地方群众活动，做边区的模范公民。

（十）由财经办事处及分区财经委，按各县系统下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给各系统下各机关学校以一九四三年的具体生产任务，审核与检查其生产计划，将所有各系统下各生产单位一切列在计划内责其完成的生产结果，列入财政收支，计划以外的多余生产则归各生产单位所有，作为改善生活之用。对于生产不足的单位上级应予补给。一九四二年有亏空的，应速审查，予以填补。

（十一）本书第八章《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中所指出的四个缺点，均适用于机关学校，一切犯有相同弊病的机关学校，必须注意纠正。

（十二）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种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为着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值私产。凡在公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为他自己个人图谋特殊利得，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行为，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在军队中，应将这点向战士说明。

（十三）一切做经济工作、财政工作、供给工作、总务工作的

人，只要他们是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均应受到尊敬。而一切对于他们的工作采取轻视或鄙视态度的人，应当受到批评与责备。

一〇　关于粮食工作

我们已将我们的经济工作论述完毕了。我们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部门，民营经济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事业与盐业，公营经济包括政府的、军队的、机关学校的三类，所有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没有讲到民营经济的商业方面，这是因为这一方面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材料根据，只好暂时不去讲它。现在要讲的是财政问题。我们也不准备讲有关财政的一切问题，只讲其中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粮食问题；（二）税收问题；（三）节约问题。

我们的财政供给是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的。取之于己这一方面的财政工作，就是三部分公营经济在其生产过程完毕之后转到分配过程时的分配工作即供给工作。我们的公营经济既是我们的财政供给的第一个基础，它在我们整个财政供给方面，依一九四二年的情形看来占着五分之三的地位，那么，我们的第一个财政工作就是对于公营经济生产结果适当地进行分配的工作，这个问题，我们已在论述公营经济时附带地说过许多了，其未详部分，现在也无暇多说，留待将来再研究。现在要讲的是我们财政供给上的第二个基础——取之于民这一方面，这就是粮食与税收。还有一个节约问题，则是关系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的，是关于整个已经取得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如何适当分配与适当使用的

问题，故是一个重要的财政问题。这里讲的粮食问题也不是指全部粮食问题，仅是指的粮食税。它也是税收的一种，因其关系整个军需与公需，关系全边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之间的相互态度，故值得从税收问题中特别提出来，并且首先来讲它。

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地主与商人不到百分之十的数目。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约有一半以上是分过土地的，一半则未分过。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作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愈发展，农民每年收获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数量愈增多，则其交给政府的粮食税的数量在其收获总量上说来就可愈减少。我们提议从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征收公粮十八万担。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个数目上，不仅在目前全边区粮食总产量约一百五十万担时是收这个数目，就是由于生产发展，总产量增至更大的数目时（据许多同志估计，就现有劳动力加以调剂，能使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万担），我们也只收这个数目，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

我们全边区的同志必须学习延安县同志们那样用尽全力替农民谋利益，使农民很快地富足起来。农民愈富足，则其交纳一个固定数目的公粮也就愈觉得不在意下，愈觉得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

府是和他们完全一致，分离不开的，延安县的农民吴满有就是明显的证据。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载了一篇关于延安县农民吴满有的新闻，这篇新闻是这样讲的：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

（本报特讯）在春耕运动中，农村劳动英雄不断出现，他们为着热爱边区、巩固边区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表现着高度的劳动精神。其中尤以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最为一般农民所钦佩。他每年的收获量，要超过其他农民六分之一。全家两个劳动力，种地四十余垧，今年开荒三十五亩，现已为该乡农民公认为模范的劳动英雄。据昨晚最后获悉，边区政府建设厅已决定予以嘉奖。

（本报延安通讯）延安县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农民吴满有，连年春耕积极，庄稼得法，人家平常每垧地打粮平均五斗，他种的地每垧却打粮六斗。今年在政府努力春耕的号召下，他说："我受过革命的好处，我忘不了革命，我真心爱着边区，同时为了自己更过好日子。"因此就加倍努力开荒，并且影响了群众，造成该村热烈的春耕运动。延安县的农民谁都知道，今年种得最好的，就是吴满有的一乡。吴满有今年原计划开荒三十五亩，在没有下雨之前，已经开完十五亩地，雨后更是积极。他说："十天之后，就可垦完，如时间来得及，还可超过。"另外百来亩熟地，有的已经下了种，有的已经翻了地。吴家枣园所有居民以及该村村长，该乡乡长，该区区长，都一致称誉他是"模范春耕英雄"。现该区区政府已呈请上级奖励，边区政府闻亦拟即切实调查，予以适当的嘉奖，以资鼓励。

（本报延安县讯）春耕运动期间，劳动英雄出现了很多；但究竟谁做庄稼最好，记者为明白这个问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至各地农村访问，现在已找到众所公认的标准劳动英雄。这位劳动英雄姓吴，名唤满有，今年四十九岁，生就一个大个子，精强力壮。土地革命前是一佃农，那时吃树叶，吞糠麸，砍柴“受苦”（给人家做工），把赚来的钱，向当地的豪官富绅缴付捐租，自己却常常饿肚皮。土地革命后，就参加革命，分得山地一架，约四十余垧，合一百二十余亩。从此自由种地，连年积极垦荒播种，畜牛哺羊，现在全架山地，都已经变成了熟地；并且还有两条犍牛，三条母牛，一百多只羊。光景越过越好，娶媳嫁女，衣暖食饱。去年已由政府鉴定，家庭成分已从贫农上升到中农了。他常常说：“想想当初，再想想现在，我怎能忘记革命的好处，忘记边区的好处呢？”

（本报延安县讯）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他和一般农民一样种庄稼，为什么收粮比人家要多呢？据他庄子上的农民说：第一，起身比谁都早，睡眠比谁都迟；天还没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已黑了，才从地里回来，真能受苦。第二，冬天没有啥事做的时候，勤于拾粪，自己又会养羊养牛，肥料比人家多，他每垧地平均要上七驮粪。第三，庄稼出了苗的时候，有的农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谷子自然就长得旺。第四，地耕得深。别个农户一般地都是掘土五寸深，他却至少七寸深。第五，打土的时候，一定打得很碎，不马糊。第六，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因为他有这些优点，所以每垧地最高收获量老斗一石二斗（市斗等于一石八斗），最低收获量也有老斗四斗（等于六市斗），平均扯每垧地要打粮老斗六斗（等于九市斗），别个农民每垧地平均只收粮老斗五斗（等于市斗七斗半）。从平均的收获量看来，

他就是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

（本报延安县讯）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不仅是种庄稼的模范，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去年他收小麦十八市担，粗粮二十七市担（合细粮十六担二斗），却缴了公粮十四担三斗，公草一千斤，公债二次一百五十元，公盐代金六百六十五元。庄上的人对他说："老吴哥，你出的太重了，减掉些吧！"他却说："革命时期，八路军保卫咱们的边区，人家在前方流血，我们不过只多流些汗，亏你还好说重？"于是大家就佩服他的见识，踊跃向公家送粮了。今年从上面移了些难民在他庄子上住，他借粮借镢头给他们，帮助他们找得荒地，并且经常在物质上精神上鼓励他们开荒种地。平常在庄子上也是最公正的人士，在老百姓中间的威信很大，大家都相信他。去年五月被选做乡参议员，又被选做乡上的优抗主任。他有一个兄弟在八路军里做战士，他原来也是抗属，但他谢辞了公家的优待。他说："打仗是中国人的责任，没啥稀罕。我有的吃，还要什么优待？"但他对于优待乡上的其他抗属，却做得非常周到。同时，他分配的动员任务又很公平。全乡有抗属十二家，今年代耕土地就分配了二百二十亩，家家都感激他。全乡的人没有一个不说他好。

（本报延安县讯）吴家枣园，一共有十四户农家，十四户家长，讲到吴满有是不是称得起一位模范的劳动英雄的时候，大家一致都跷起了大拇指："老吴哥，还有啥话说的，受苦第一，他不当英雄谁配当英雄？"

六月二日《解放日报》又有一条新闻：

由于劳动英雄吴满有所起的影响，吴家枣园原计划开荒四十九垧，现在已完成七十五垧，吴满有本人又增开了荒地五垧。全乡（柳林区第二乡）在奖励吴满有之后，增开荒地一百八十垧。

十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又有这样的新闻：

今年糜子最算丰稔，吴满有村子上一般每垧约打五斗至六斗，但是他却打到八斗（均四十五斤大斗）。一般农民每担粗粮碾成三斗或四斗，他的粗粮却始终保持对折细粮的记录。吴满有也时常学着宣传的口吻对人说："你们要想庄稼和我的一样好，大家就向我学吧——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

吴满有已是一个富裕农民了，他因为得了过去苏维埃政府与现在边区政府的利益，他已把他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

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称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我们过去粮食工作的经验，并指出一九四三年的方针。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边区所征公粮只负一部分的供给任务。每年不足之数，都靠政府拨款采购。四年当中，除了个别地区，或在某一个时间内，粮食上曾有过困难外，整个粮食供给，还没有感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四年中，确实休养了民力。那时公粮偏重于富农地主的负担，中农很轻，一般贫农则完全无负担。一九四〇年外援断绝，政府已无力购粮，必须转为全部征税。但因当时“量入为出”的原则未变，一九四〇年公粮任务还只提高到九万担，征收政策亦未变，对于下年（一九四一年）的供给则提出了

“加强粮食管理，保证粮食自足”政策。因一九四〇年征粮不多，全部供给实不可能。再加上一九四一年经费自给的关系，各部队机关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都向粮食上打主意。另一方面，又因粮食工作部门的组织机构还不健全，干部质量差，各种制度未很好建立，亦不可能掌握各地粮食收支。当时浮报冒领现象非常严重，人员增减无常，各种临时额外开支过大。一九四〇年征的公粮，供给到一九四一年三月，部分地区已无粮吃。不久，各地粮食普遍发生恐慌，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支持到十一月。如要保证一九四二年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借粮，估计非有二十万担不能渡过难关。此时粮食问题已成为财政上的最严重问题。经过党与政府的再三研究，根据当时已转变的“量出为入为主，量入为出为辅”的新的收支原则，决定征粮二十万担，征草二千六百万斤，以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并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此时在征收政策上，为了保证完成二十万担公粮的任务，并照顾各阶层的利益，扩大了征收面，中农负担提高，贫农亦开始有了负担，纠正了过去偏重少数富有者的现象。供给政策，则因过去各县仓库粮账从未清算，一九四一年买粮借粮手续极为混乱，增加了清算粮账的困难，粮食局深恐因旧粮不清影响新粮，乃确定以“掌握新粮，保证供给”为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方针。根据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虽然我们在执行中还有些不够，但政策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四二年的公粮减为十六万担，公草减为一千六百万斤；征收政策上亦稍减轻了贫农的负担；并准备于一九四三年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代替公粮方式。同时，为了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一九四二年并借给农民一部分公粮公草，帮助他们解决春耕困难。供给上主要是掌握粮草保证供给。

在征收工作方面：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每年只征公粮一

万担，群众负担极轻，均愿踊跃缴纳。一九三九年，公粮任务提高到五万担，政府颁布了新的征粮条例，派工作团下乡进行调查，按条例征收。但在实际上，五万担公粮，群众负担仍是极轻，干部又习惯于民主摊派一法，调查工作极其马糊，所谓按条例征收，仍是一种形式。一九四〇年，仍复如此。一九四一年公粮任务突然提高到二十万担，政府才又慎重修改了条例，财厅派了大批工作团去各县，配合县区政府，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使群众负担合理。此次征粮，强调了“深入调查”与“执行条例”。在一九四一年征粮总结中，完全得到证明。调查工作做得好，执行条例便容易。例如甘泉县对调查工作认真，他们便执行了条例和征收率。曲子县进行了三次调查工作，他们便能使负担公平合理。又如华池县白马区二次分配没有完成任务，后来征粮工作团团长王同志，亲身调查了一个乡作经验，结果全区超过几十担。调查工作不好的，如警备区，便不能按条例执行。一般地说来，各县干部对于调查工作仍很轻视。一九四一年征粮做到深入调查的只少数县份，大部分仍是采取民主摊派的老方式。一九四二年征粮又接受了一九四一年经验，将条例重新加以修改，使它更能切合实际，并以一九四一年的调查材料作根据，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财厅指示征粮干部必须按条例执行，如果有些地方按条例执行确实不能完成任务时，再配合使用民主摊派方法。同时，在此次征粮中，从思想上教育干部，克服了过去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和干部本身要私情、打埋伏等落后行为。根据最近陇东报告，又一次证明深入调查对于执行条例的重要性。庆阳县有一个区经过深入调查，因本年开荒很多，农产增加，按条例执行可超过几百担。

其次，历年征粮，在征收数字上都完成了任务，而且都是超

过。可是入仓工作做得太马糊。许多征粮干部以为只要数目字完成，不问质量，不查尾欠。因此一则质量太差，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谷皮者；二则造成群众拖欠公粮的现象，征收数和入仓数之间有了一个距离。一九四一年征粮，质量虽有所提高，但夹带谷皮之米仍属不少。又提出了“粒米入仓，根草入窑”的口号来克服拖欠现象，但仍是做得不够；再加上一九四一年公粮比过去任何一年为多，增加了入仓阶段的困难；因此一九四一年公粮没有入仓的还有三千九百余担，将近于全部征收数的百分之二。一九四二年征粮时，特别强调了抓紧入仓的问题。根据最近检查，本年入仓工作比上年做得好些，但能否全部入仓，还须等将来总结后才能回答。

再其次，历年征粮，都由财厅派工作团去帮助县区政府工作。这种办法，在县区干部太弱的条件之下，是有很大作用的。缺点是容易养成下级政府的倚赖性。而且每次动员工作，都须上面派人，干部往返，在路途奔跑，亦造成了人力与时间的浪费。一九四二年征粮，因为有一九四一年比较好的工作基础，在派遣工作团方面，财厅采取了少而精的原则，各县少派干部，加重了县区政府的责任。一九四一年派下去一百五十人，调查工作有点基础。一九四二年所派还不到四分之一。准备由此过渡到不再派人，完全交给县区政府去征收。

在供给工作方面：一九四一年的粮食供给，由于没有掌握总的收支，以致两次借粮，一次买粮，动员频繁，近于苛扰，引起群众不满，这是一大缺点。一九四二年已能掌握收支，并有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公粮作保证，本可供给到十二月。但由于精简不彻底，预决算不能严格执行，各种临时支出连同未收齐的公粮尾欠，共达一万八千余担；再加上部队移动，影响到各地供需关系；一九四二

年上半年粮食调剂，又未能完成任务；因此，七月以后，延安、南泥洼、临镇各地，即已陆续缺粮。后来，一面由财厅拨款二百万元补助购买，一面采取夏征的办法来补救，才避免了一九四二年的粮荒，对群众尚无不良影响。其次，一九四一年公粮采取整拨分管的办法，虽然节省了往返运输的麻烦与浪费，但另方面造成了乱卖粮食的现象，这里面浪费很大。还有征收与供给的脱节，亦发生了许多缺点。例如一九四一年分配给各县的公粮公草，偏重了收成情况，忽视了供需情况。三边全年需粮一万多担，一九四一年只征粮一千六百担，有九千担粮要从陇东、安塞、子长、志丹等县转运补充。一年来不但运粮各县群众反映过重，即三边群众亦因转运繁忙，喊出“这样办法还不如向我们多征些好”。现在计算，只陇东运三边的四千担粮，即需脚费七百万元，比在三边买粮花钱还要多。又如延川征的粮，本应供给延安；可是一九四一年延川东阳区的粮，集中到相反方面的靠近黄河的马家畔仓库，使延安运粮要多走三天路。其他各县类似情形，亦不在少。又如一九四一年征收公草，没有周密的研究计划，决定公草普遍随粮征收，没有注意到供需，因而使得地方存草没有用处，任其损耗霉烂，引起群众不满。另方面，需草多的地方，却又异常缺草，只供给到八个月。又如一九四一年关中征粮，不以麦子为本位，硬要小米，群众只好到边区外面粜麦买米交公粮，结果收米太多，部队吃不惯，常起纠纷；入夏以后，小米又易霉烂，更加麻烦。又如一九四一年的正杂折合率，也因不估计各地产粮情形与供需关系，把它一般化，使得有些地方（如警备区）征收杂粮很多，发不出去。有些地方（如延安）需要马料，却又找不到杂粮，各机关不得不降低折合率，用细粮去换，倒转过来造成了粮食的浪费。以上这些缺点，说明了粮食工作

是很具体很细密的实际工作。如离开实际粗枝大叶地去做，不但扰民，而且误公。一九四二年征粮工作交给粮食局主办后，已将征收与供给统一起来。同时根据各地不同的供需情况，酌收公草代金，以资调剂。至于折合率，亦由过去的一般化，转变为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来决定，克服了以往的缺点。

其次，从一九四一年冬天到现在，粮食供给，在建立与健全制度方面，曾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例如在预决算制度上，一九四二年，大部分机关已能按时编造，废除了大部分浮报多领与吃双份粮的陋习，纠正了各县随便批准预算、乱支公粮的现象。特别是把握"决算不超过预算"，一九四二年一年认真核减了各种不合理的开支，共节省粮食一万九千余担。在支粮制度上，一九四二年，绝大多数部队机关已经遵守没有支粮证不能支粮的制度。各县负责同志也已注意这一制度，不乱批借公粮。同时，一九四二年各县已能做到统一地使用公斗，这也减少了许多纠纷。在仓库制度和会计制度上：由于干部条件的限制，仓库制度只能先从加强中心仓库做起，由此逐渐普及到各个仓库。会计制度，则由财厅制定了两种标准账簿（一新式较精细，一中式很简单），由干部根据自己能力采用。一九四二年大部分仓库，好歹都有了账簿，已能逐渐达到仓库粮食收支、存粮数目和种类随时得出统计的目的。在粮票制度上：因为一九四一年发行大批粮票，发生很多流弊，一九四二年废止旧粮票，重新发行三种小型饭票，只供机关人员往来吃饭流通，也是一个进步。

但在粮食供给方面，仍有许多缺点。例如：少数大单位还不能按规定时间编造预决算；各大单位实有人数和所编预算作比，还有不少空额；部分吃双份粮的现象，仍然存在；牲口比额没有明确规

定，其中浪费亦颇大；个别部队因为粮食浪费超支，向仓库强迫借粮的事情，仍不能尽免。又如：仓库制度，大部分还只做到了粮食收支和管理工作，关于督收、保管、报销等责任，还做得很差。又如：小型饭票不能在民间流通，使出差人员吃饭困难，这也是一个缺点。最后，在建立与健全制度中，还有一个大的缺点，便是粮食局只强调了本身制度和困难，还不能更全面地具体地照顾各机关困难问题的解决。

再其次，一九四二年粮食机关在清算仓库旧粮账上，亦获得很大成绩。数年以来，各县粮账向没有清查结算过，使粮局的账据失去效用。如一九四一年冬天按粮局账上算，安塞应存粮二千九百余担，实际则所存不到一百担。再如疗养院向仓库领粮，五年没算账，一九四二年才查出它多领了一百多担粮。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加上一九四一年买粮借粮的混淆，许多县份无账可查。因此粮局分别派遣干部下去算账，并采取各种各样的算账办法，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才将仓库旧账算清。目前粮局已能具体了解仓库存粮，掌握粮食收支。同时过去各县对粮食管理，亦做得很差，鼠咬、虫伤、腐烂等等损耗，不一而足。而且干部犯贪污的现象，亦十分严重。一九四一年征粮中，发现此类案件将近十件之多。甚至于个别特务分子亦混入仓库工作。如鄜县太乐区仓库主任张秉权，便是特务分子，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贪污公粮十几担，逃出边区。这件事说明了粮局过去对于仓库干部考查不严和检查工作的太少。一九四二年，由于清算仓库粮账，并加强县五科对仓库的领导，贪污损耗已减少，并发现了其中亦有不少积极苦干的干部。

在执行征收政策方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两年的征粮条例，规定起征点为一担二斗（即农户全家每人收获量在一担二斗以

下者免征公粮），累进最高额为百分之三十六（即累进至征收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六为止，以上不再增高税率）。其缺点是公粮负担偏重在少数富有者身上。同时，在征收方法上，又是采取民主摊派办法，并未按照条例执行，因而发生“抓大户”“瞅目标”等现象，也是征收政策有些过“左”的影响。一九四一年修改了征粮条例，规定起征点为五斗（例如某家五口全年正粮收获量在二担五斗以下者免征），累进最高额为百分之三十。执行结果，在扩大征收方面，除环县因灾荒影响外，其他各县负担人员数，均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延安县更扩大到百分之九十五。在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方面，除延安、延长、安塞外，其他各县负担额均未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但缺点仍是有的。例如各县公粮总数字的分配，没有做到完全合理。警备区降低起征点为三斗，同时缩短了累进率的中间距离，使得贫农中农吃亏，富裕中农以上太占便宜。又如一九四一年征粮中，我们只注意征粮，不注意与减租减息配合进行；新来移民不应当负担公粮的，有些负担了公粮；抗属应当受优待的，有些被取消了优待；以及棉花不应征粮也算在征收之内等等；这些都是违犯政府政策的。其他如照顾各阶层利益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等政策，也只是做到了一般的号召，具体执行还很不够。有了一九四一年的经验，一九四二年征粮就有了进步。但在植棉政策上，仍注意不够。例如对东三县产棉区域的公粮，也和其他各县一样分配，到了征收阶段，下面发生问题，不征棉田公粮任务不能完成，要征又与政府法令抵触，最后只得依变通办法减半征收，这仍是于政府威信有碍的。

任何工作，于政策之外，就决定于干部的好坏，粮食工作也是如此。粮食工作中最艰苦的是仓库干部，最易犯贪污的亦是仓库干部。因此，在这里特提出几个比较典型的好的与坏的仓库干部来讲

一讲，使每个同志都跟好的去学习，并拿坏的警惕自己。

好的例子：

甲、蟠龙仓库主任何纯高同志，是五十二岁的老汉，不多说话，很细心沉着，积极苦干。从一九三九年就分配在粮食局真武洞仓库工作。一九四〇年调任蟠龙仓库主任，兼负调剂站、运输站的责任，三个人的工作由他一人兼负。他过去当过区委书记，在边区党校受过训练。当初由边校一齐派来做粮食工作的还有贾志才、任生彪等七人，坚持到今天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文化程度在仓库主任里面不算低，能写简单的信，记账也清楚，学习会计上新采用的簿册很认真，学得快。一九四一年给仓库分发“每月报告表”，有些仓库主任费了三天时间还说不清楚，他听过一次之后就能提问题，提意见：“这一格填什么？那一格这样填行不行？”以后他就可以按期填寄“每月报告表”。他在工作上表现出的优点：沉着细心——收公粮时能从容写收据，每晚上结账。支粮时，算盘总打两遍。刻苦负责——对仓库很关心。有一个窑稍为湿些，他就特别注意，经常翻晒，支粮先支这一窑。后来他在窑后掘一道渠，把窑外地面挖得比窑里低，仓库就干了一些。仓库小修工程，或者雇不下工人，他自己动手去背砖、抹泥（在他影响下过斗员也努力帮忙）。兼管运输站，每次运输队来到时，要帮忙锄草、挑水、烧饭。待人和气——支粮时，有些领导机关人员闹脾气，他能忍让委屈地把事办好，从不与人起冲突。送粮时，群众送坏粮，他只劝回去。做调剂工作买粮，也会商量，与群众亲近，却又有主见。有一次下雨，集上粮卖不出去，他就乘机收买，价格较低，群众还高兴。因此何站长在蟠龙街上群众中间，是有威信的。一九四一年收公粮，延川永坪区一个农民向他纳贿，他当时反脸，人赃一起送区政府。生活朴素——

对个人生活很少提出意见，领保健费他都表现心里不安。一九四二年他负责收公粮四千担，大家都关心他年纪大，人少，忙不过来。但他每次给粮局来信，总说他是有办法的。

乙、绥德田庄仓库主任白合明同志，高小毕业，在旧日联保处办过事。他的优点：刻苦负责——收粮时，每晚一定把收据和飞条对照，检查有无错误。他也一定将欠粮户列出清单，督促区乡送粮。收粮之前，为了防湿，他亲自动手在仓窑里铺石板，垫干草，草上再铺席。公粮入了仓，不急开支的仓窑，他都自己动手用砖垒住，用泥抹涂，通风洞上找破席子挡住。待人和气——收粮时对粮食质量认真检查。但对送了坏粮的，他只是劝说："大家看，这样的粮送给军队，心里过得去吗?"从来没有大声嚷过。军队不按手续领粮的，他总是和蔼耐心地向来人解释，一面借给一些粮食，不使缺粮；一面叫他们补办手续。日子久了，绥德的驻军如果到老白仓库支粮，一定要办手续，不然老白作难，他们不好意思。生活刻苦——自己拾柴、挑水。经费伙食，开支不马糊。超支数目，都报五科，不随便拉公粮卖钱补助。现在白合明同志已被升为绥德县政府第五科科长。

坏的例子：

甲、新宁四区仓库主任胡典长。一九四一年冬收粮期间，私卖公粮三担，驮回家一担三斗，又私下借给亲友麦子三担九斗二升。本人与亲友胡典功、胡清荣、刘子孝等三家应出公粮七担，颗粒未交，就扯给公粮收据。收粮时不许群众扫收地下的粮食，却由他扫集，和帮助收粮的人员分用。公粮寄存民家，支完实短粮二斗，却向五科谎报为一担。经五科查出，送裁判所究办，判处徒刑，并追回贪污的粮食。

乙、华池水泛区仓库，一九三九年九月，卖粮之后，公粮短欠十四担七斗。仓库主任王文斌，向上级呈报是老鼠吃了十二担七斗，霉坏了二担。一九四一年征粮工作团去调查，发觉在卖粮期间，王文斌曾到县上开会，由区书毛羽鹏代替将粮卖完。就在卖粮期内，毛羽鹏生活格外阔绰，买了一群羊，两件皮袄，又买布，有很大贪污嫌疑。但县政府当时没有查究。后来毛羽鹏调到别处工作，这件事也就拖下去了。

上面，我们已总结了过去五年粮食工作的经验。下面，我们再来指出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针。

（一）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我们过去采用征收救国公粮这一形式，是一种不完善的税收办法，做得好，只能达到人民负担公平合理的目的，对于农民生产情绪，不能予以有力的刺激。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准备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政策。这一准备工作如何进行呢？（1）在财政厅领导下，设立专门研究组，抽调有政权工作经验，了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好的干部五人至七人，组织研究组，专门搜集、研究、整理有关累进税的材料，并计划推进工作。另由边区政府指定有关机关负责同志，以财政厅长为首，组织筹备委员会，负责掌握政策，解决较大问题，并经常领导研究组的工作。（2）进行调查工作。一九四二年征粮工作的详细总结，应以供给累进税研究组以具体材料为目的。研究组应当首先研究几个情况不同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征粮工作较好的县份，拟定初步的调查计划，先行试验调查。然后修正计划，制定表式，实行普遍调查。根据调查材料，制定条例办法。成绩好完成早的县份，一九四三年就可先行试办。（3）实行土地登记，和调查工作配合进行。（4）加强乡政府组织，健全文书，深入调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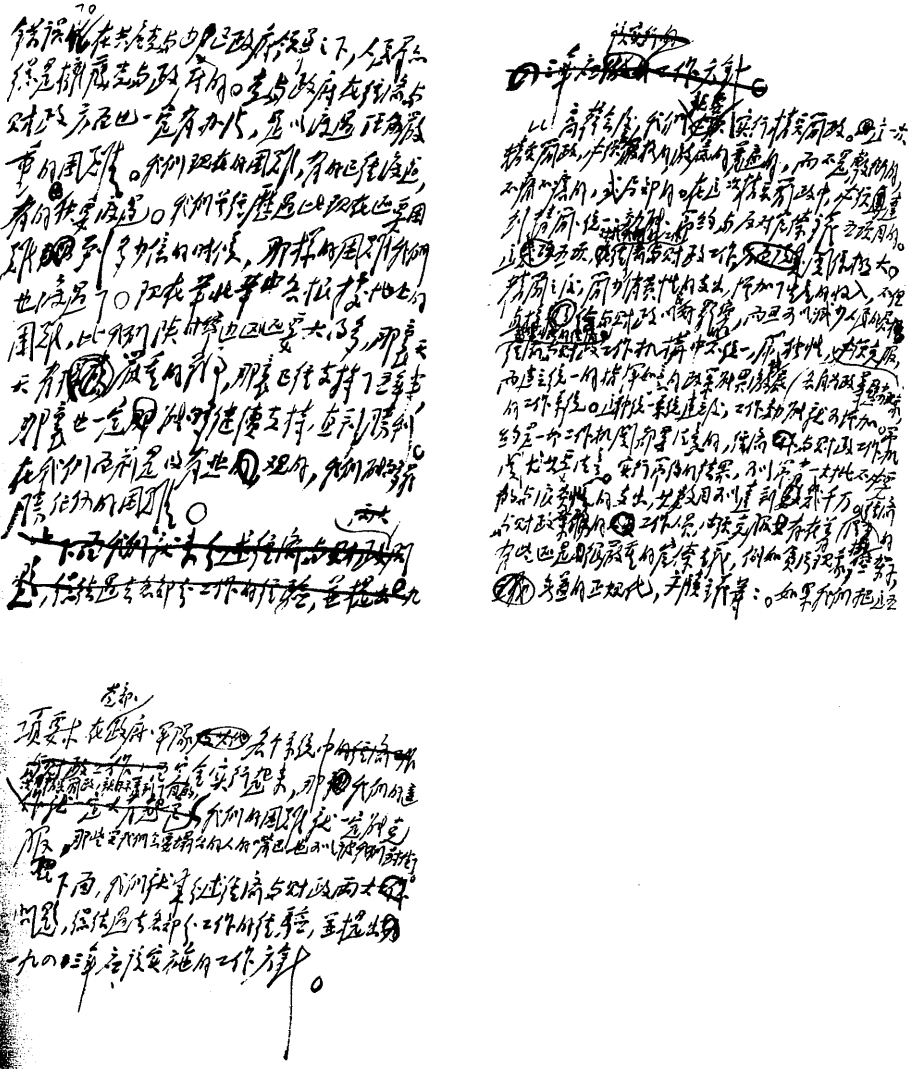
（二）掌握粮草，保障供给。粮草供给是一件复杂细密的工作。粮草分散，掌握不易。如果不能随时注意，适当地调整供需关系，工作就难做好。要能掌握粮草，保障供给，必须做到下列各点：(1) 在掌握粮草上，须先保证十六万担公粮全部入仓，并提高质量到百分之百的米，不许掺糠，同时号召各县消灭尾欠。在管理粮草上，必须健全各种制度，注意仓库的管理和检查，建立中心仓库，逐渐改善设备，防止粮食霉烂损耗及贪污盗窃等现象发生。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彻底废除浮报冒领及吃双份粮的现象。按照各地干部的文化程度，建立粮食会计，不讲形式，但求粮草收支存余，计算分明。其次，支粮制度更加重要，务必坚持执行。但建立制度为的是保障供给，防止贪污浪费；一切不遵守纪律的现象固然应当严格纠正，但不顾及具体事实，只强调制度，那种机械的观点亦须防止。(2) 保证供给，必先解决粮草供需关系。粮草缺乏地区，应以运输、调剂各种办法，筹备补给。一九四三年我们应当组织机关空闲牲口驮运粮草，提高每个运输队的工作效能（我们的牲口现比老百姓的牲口平均每头少驮一斗，老百姓两天走的路我们要走三天），规定一定的运粮任务，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用到生产上去。必须依靠人民运输的粮食，应早计划，利用农暇或空脚牲口运输。非特殊情形，不准在农忙时间运员运输。长距离的运输，也应当尽量避免。粮食可能调剂的地区，由粮食局统筹计划，适当地利用时间，把粮食卖出或买回，补助供给，以节省运输，避免损耗。机关学校过于集中的地区，如延安等地，应当斟酌情形，实行人马疏散，以便调剂粮草。

（三）精兵简政，储粮备荒。边区公粮连年透支，毫无准备，倘遇灾荒，军民食粮必成为极严重问题，大家皆应以此警惕。为此应

当：（1）坚决执行党和政府新的整编计划，贯彻精兵简政。以精简节约的精神，保障一九四三年的粮食收支做到平衡。（2）一九四三年应征公粮十八万担，以便我们有可能节余一部分作为准备粮，以备不虞之需。（3）一九四三年军队与机关学校应以发展农业为第一位，其中种粮应占一个相当数目，使一九四四年余粮更多，有备无患。各部队机关学校决不可因一九四三年准备征粮十八万担，松懈自己的粮食生产。

（四）厉行节约，严禁浪费粮食。我们机关部队在粮食方面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因之号召实行节约运动，应为我们一九四三年的中心工作之一。近来延安有些机关学校检查浪费，实行节约，已经获得很大成绩。例如：留守兵团供给部工训班的管理员，勤俭负责，发米发面，亲自过秤，因而他们的伙食相当好，经常能吃馍吃面；中央党校大灶，近来伙食管理严格，伙夫下米，有人监督，保存剩饭，下顿和起来吃。这样实行以后，他们每天每人只吃小米一斤，不到一月，节余小米五担之多。又如保育院实行集体吃饭。过去保育院在分散吃饭的时候，全院每顿吃面一百五十斤。实行集体吃饭后，每顿只吃面一百斤，省了三分之一。同志们看，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目！又如中央各部委实行集体饭堂制，亦已收得很好的成绩。又如中央党校上半年全校统计养鸡二千只，每天需要小米三百碗，浪费很大。后来大家发起杀鸡，结果只剩六十只，节省粮食不少。此外，养成使用饭票的习惯，也非常必要，可以少领大批粮食。总之，我们要一方面征粮产粮，一方面力求节省，来保证粮食的完全无虞。这是领导同志的工作，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务望大家注意，完成党所给的任务。

本书原计划的税收、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会，没有时间写了，只好暂付阙如。——著者



毛泽东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手稿（部分）。

和张稼夫的谈话[1]

（1942年12月）

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后来发展得很大，现在又缩小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阎锡山暗暗地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会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该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

对于地主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还可以请他们代表人物当参议员；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地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

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

---

[1] 晋绥分局成立以后，中央调张稼夫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和张稼夫有一次长谈，从8点一直谈到12点。这是毛泽东和张稼夫谈话的一部分。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的谈话[1]

（1942年12月）

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

（当毛泽东听他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时）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谈话的一部分。

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1]

（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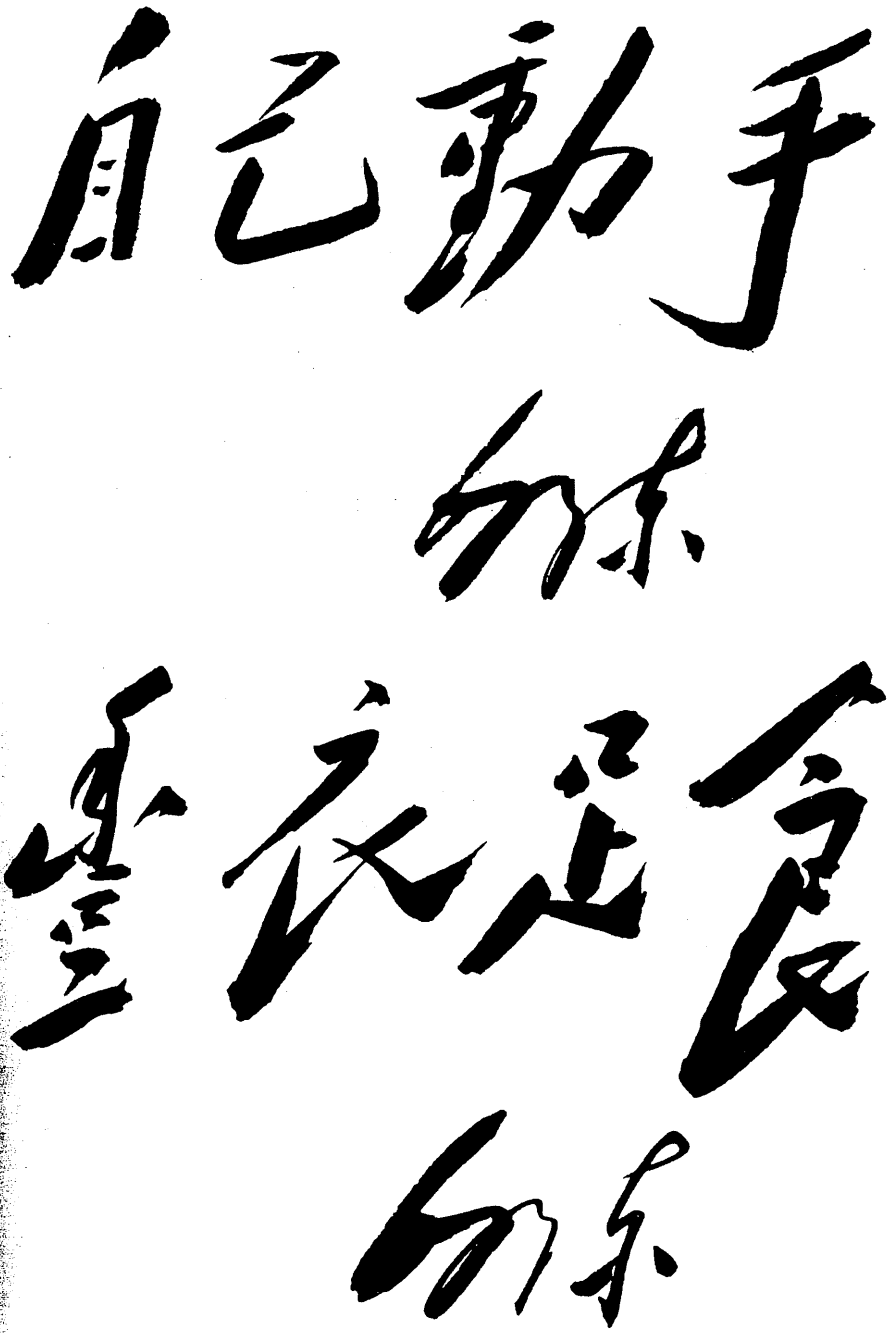
自己动手。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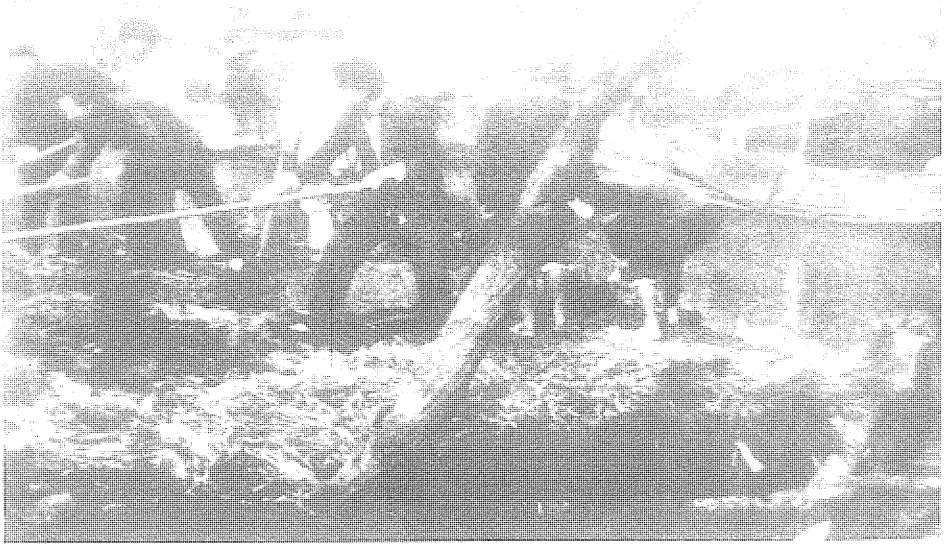
丰衣足食。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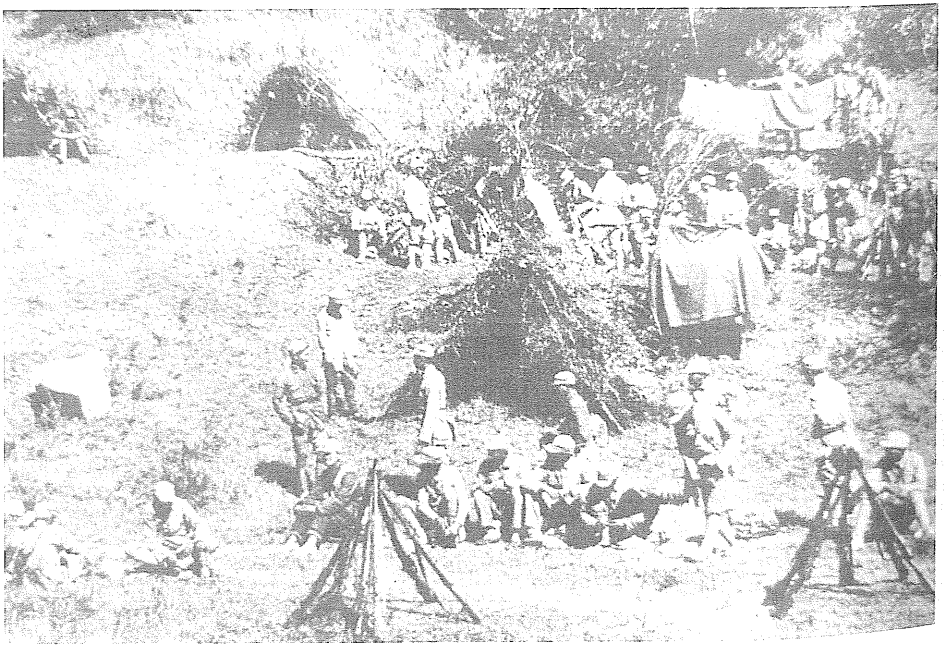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成立于1942年9月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拍摄反映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情况的影片所写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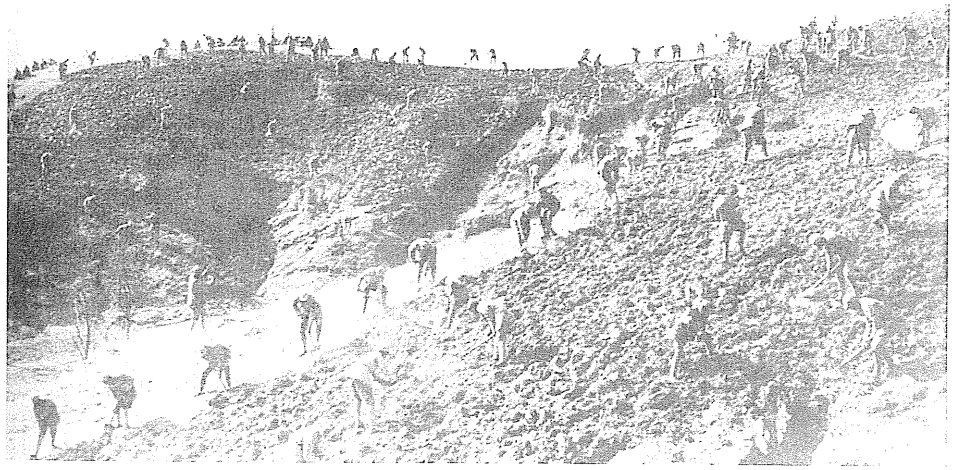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拍摄影片《南泥湾》写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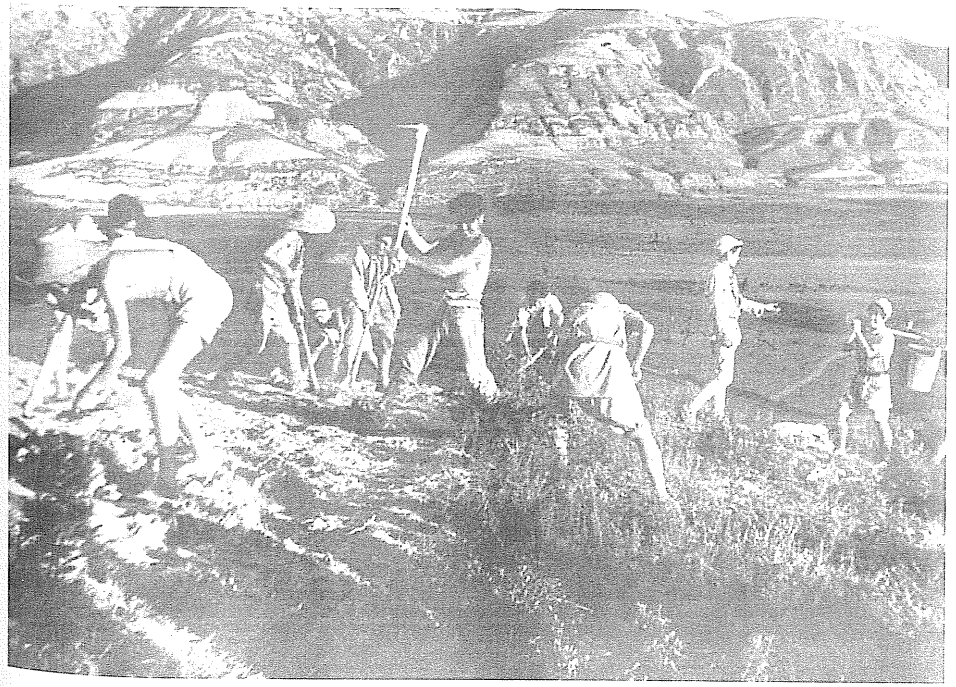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开荒种地。



三五九旅干部和战士在南泥湾开荒。



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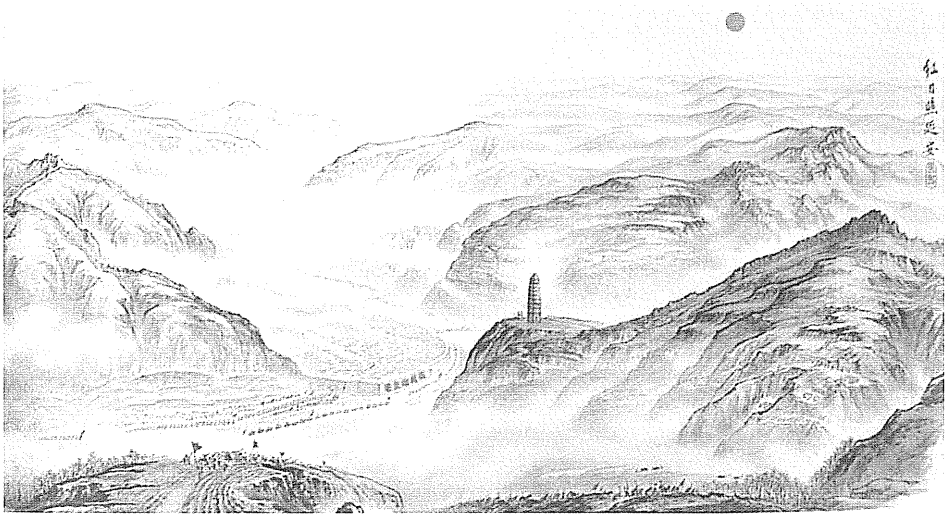
延河开荒。



《毛泽东在大生产中》（中国画）



《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油画）



《红日照延安》（中国画）



《毛泽东在延安》（石版画套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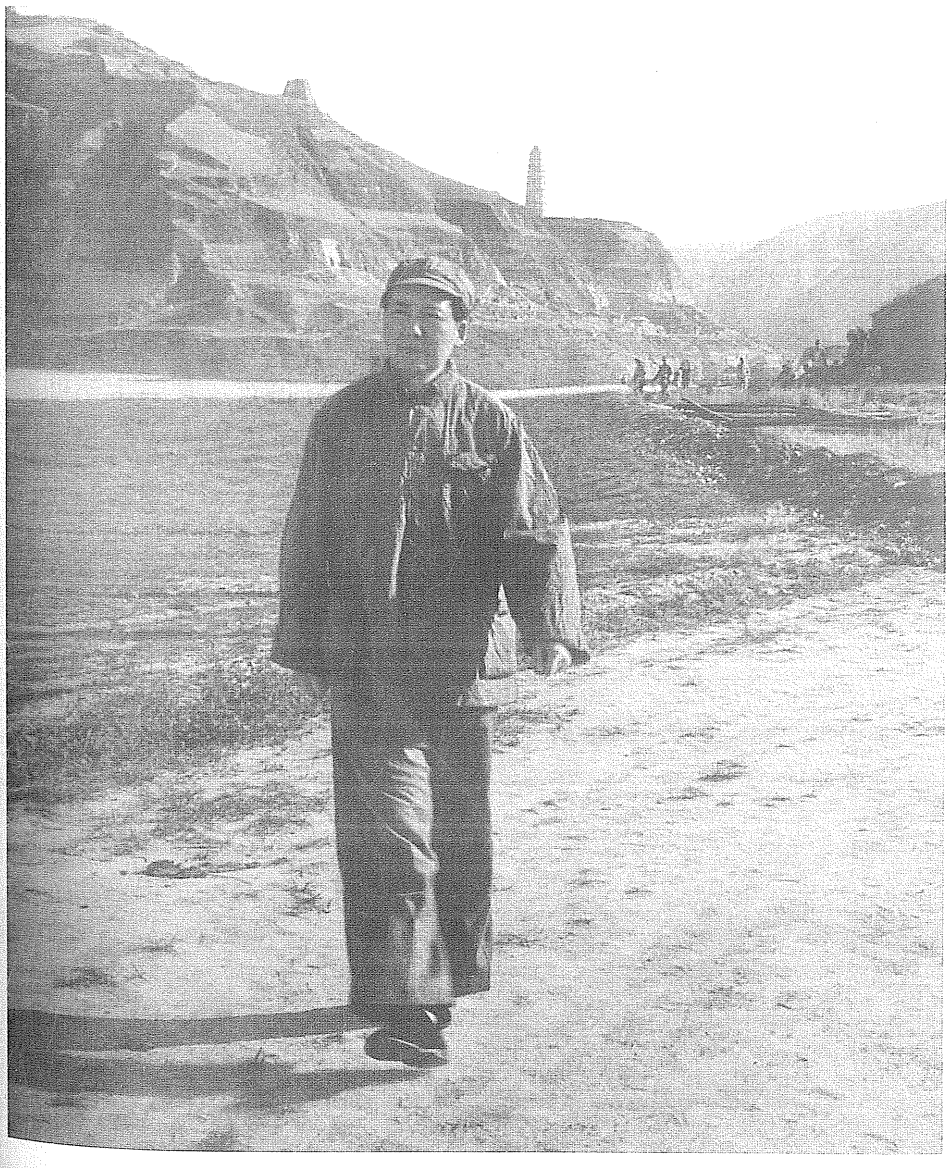


《圣地金秋》（中国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宣传画）

1943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致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1月1日）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我说将来要实行的，现在无条件。他要求我给蒋一信，我答应了。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郑延卓谈话的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工作的总方针

（1943年1月5日）

陈、饶[1]：

来电[2]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3]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

---

[1]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军长和代政治委员。

[2] 指1942年12月23日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和曾山关于对付敌寇“扫荡”华中的方针及部署给毛泽东并报中央的电报。

[3] 远东慕尼黑，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英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1938年英法两国通过与德意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类似，所以叫作“远东慕尼黑”。

北，这是总方针。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1]即击溃德意罗军四十余师，包围德军二十二个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三十一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少奇[2]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一月五日

[1] 斯城战区，指苏联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城区及其以西顿河中游苏军与德军会战的地区。

[2] 少奇，即刘少奇。

致彭德怀等电[1]

（1943年1月6日）

同意北局决定及际春亥马[2]电意见，抗大总校应即结束，除连排级以下学员及陆中[3]编为抗大六分校，徐深吉任校长，袁子钦任政委，归刘、邓领导外，其余营级以上学员，总校在职干部及图书（带重要的）材料，一部基金，应统由际春负责带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并转张际春电的主要内容。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2] 亥马，即12月21日。

[3] 陆中，即抗大总校附设陆军中学，1942年5月在河北省邢台县成立。

给王中[1]的信

（1943年1月10日）

王中同志：

你送来的材料很有用。这是小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我还要整个敌工委[2]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请通知有关同志在十天内外做好交我。做这个总结与计划时，应包括（一）全机关生产，（二）小集体生产，（三）个人生产，当然主要的是全机关生产。其中要指出成绩，又要指出缺点，要有自我批评。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日

你的意见，希望以后对我谈一下。

---

[1] 王中（1906—1981），浙江余姚人，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2] 敌工委，即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对晋察冀分局发布新施政纲领的意见

（1943年1月11日）

晋察冀分局：

（甲）二十九年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乙）你们所提新纲领草案中有些提得不适当的地方，指出如下：

一、目前晋察冀边区形势的特点是边区极大部分地区日益游击化，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日益困难，而严重的困难则还在今后，因此除说明有利形势外，应将此点补充进去。而对基本根据地区与已经变为游击区之地区，我们的政策应有不同的提法。

二、应着重提出调整边区各阶级关系，以巩固边区党政军民及各阶层间的团结。

三、应着重提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便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军民公私必须积极协力发展生产，发展

贸易，以开财源，以裕民生。

四、在冀中冀东等广大的游击区中，不仅汉奸之依照法定手续处理，严格的法制制度之建立，财政税收之严格统一与正规化等，均难实行，即对于敌伪政权，敌伪组织及敌伪之各种设施，必要时亦不得不采取两面政策应付，因此虽应对之分别进行瓦解、分化、争取、打击或相机抵制，却难一律摧毁或坚决反对，在纲领中应同时照顾这些情况。

五、在环境日益困难，游击区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应争取先机，积极缩编，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和训练，并由政府和主力军尽量供给民兵以武器弹药，方能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及游击队打击敌人的蚕食政策与扫荡，以达缩小敌区扩大或保持我区之目的，不必提出实施志愿义务兵役制问题，因实际上今天很困难实行，反可给敌利用来欺骗群众。

六、在目前边区斗争条件下，不仅要教育民众尊敬爱护与帮助军队，更应教育部队爱护尊敬并帮助老百姓，使军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这点在今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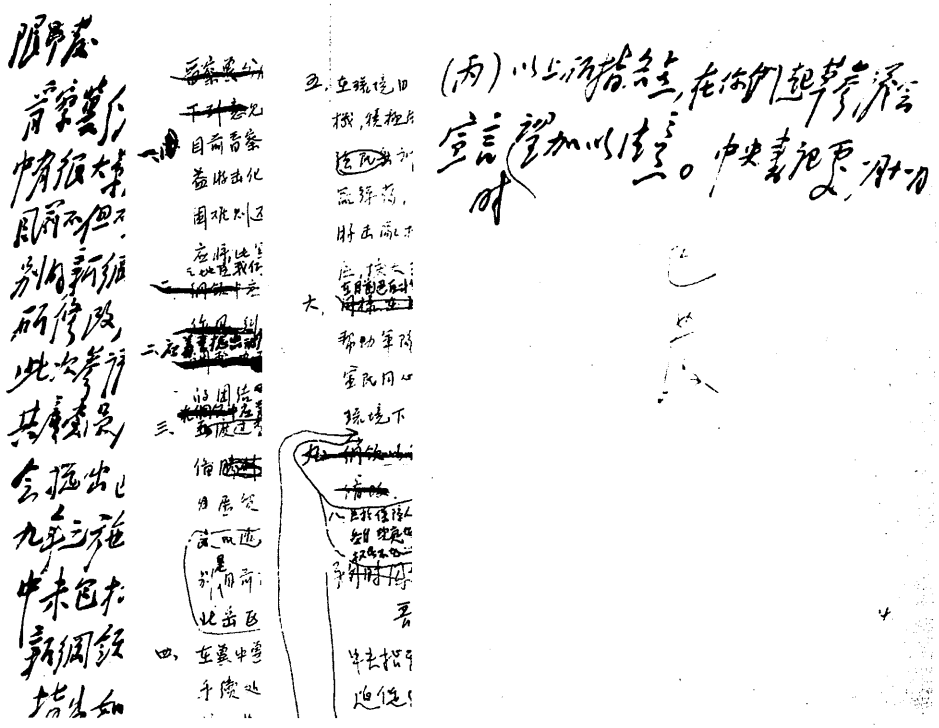
七、有些过高而难实现的办法不应提出，如允许战后实行薪俸制及减轻人民负担等，这在将来是无把握的。

八、关于保障人权中之逮捕拘讯处罚问题，在今天敌后斗争形势下，除第六条所规定者外，应加上在敌人扫荡时及游击区等特殊情形之下，经政府授权者不在此例的意思。

（丙）以上所指各点，在你们起草参议会宣言时望加以注意。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对晋察冀分局发布施政新纲领的意见》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1月12日）

（一）是否答应以何白皓电及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二）是否答应以李先念部调江北作为于学忠部移出山东的交换条件。会议认为调防事实上难以办到，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给周恩来、林彪的复电，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

去年中央工作改变为以全国工作为主，少管延安的日常工作，并开始经过报纸来指导工作，今年中央各部委更要重视利用报纸来指导工作。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为西北局奖励的二十二位生产英雄题词[1]

（1943年1月14日）

有创造精神。（王震，时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

切实朴素，大公无私。（何维忠，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长）

坚决执行屯田政策。（晏福生，时任三五九旅副政委）

以身作则。（罗章，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政委）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黄静波）

善于领导群众。（刘秉温与王丕年）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惠中权，时任靖边县委书记）

合作社的模范。（刘建章）

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世泰）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杨林，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长）

机关生产的模范。（范子文）

无限忠心。（胡起林）

密切联系群众。（马文瑞）

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

---

[1] 这是毛泽东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奖励的22位生产英雄的题词。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王维舟）

面向群众。（李丕福，时任华池县县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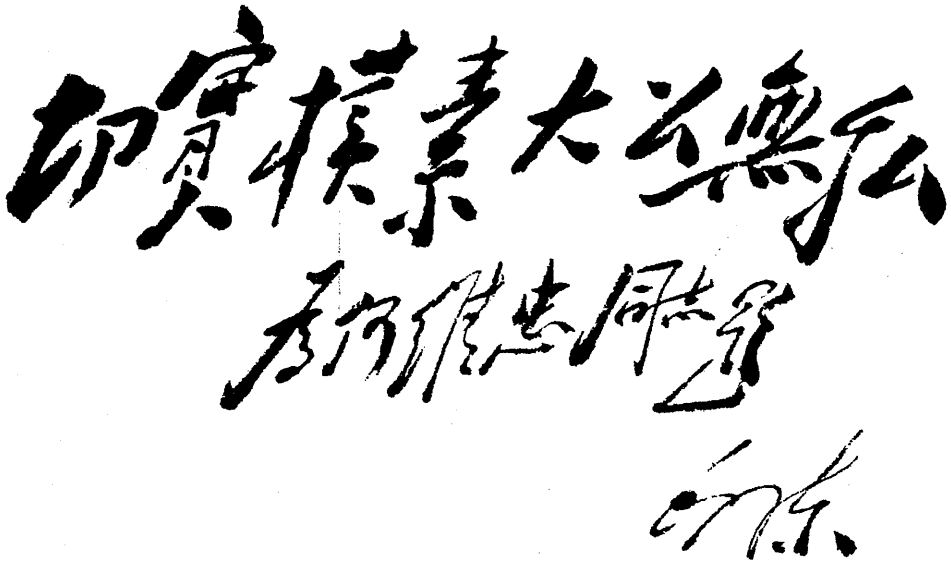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

生产教育，两者兼顾。（文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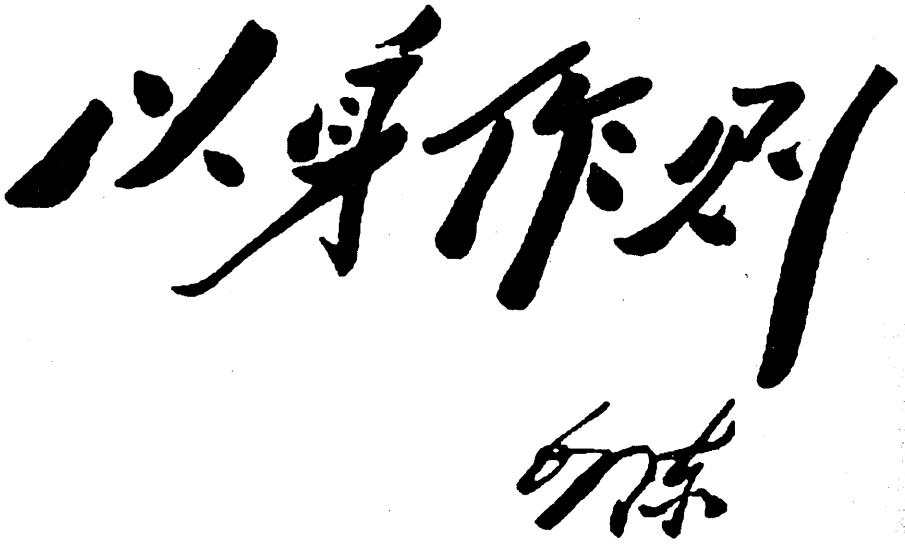
为群众谋福利。（任成玉）

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贺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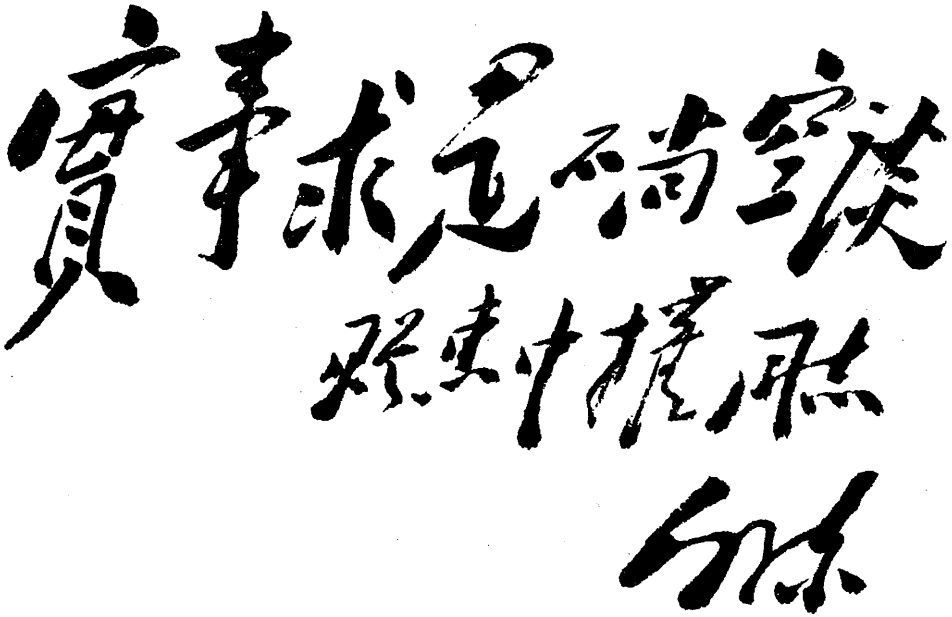
不怕困难。（罗成德，时任“三边”分区专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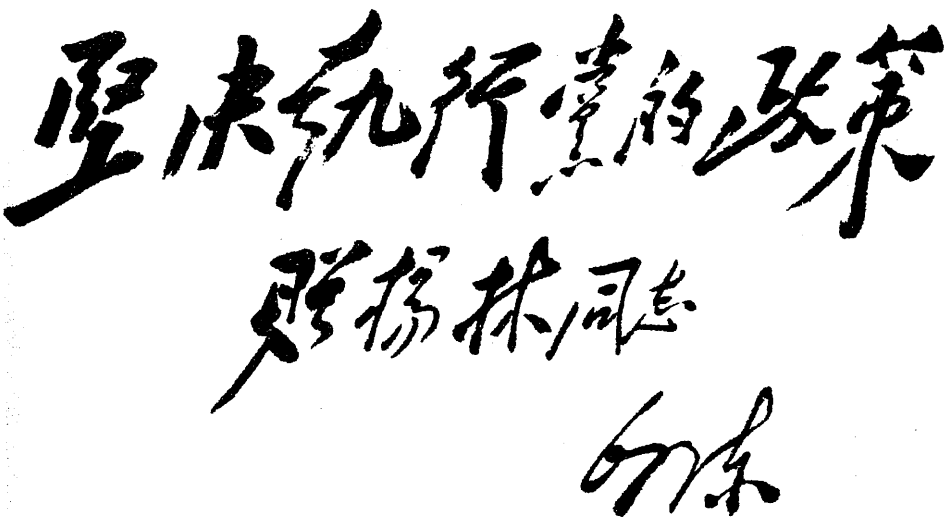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何维忠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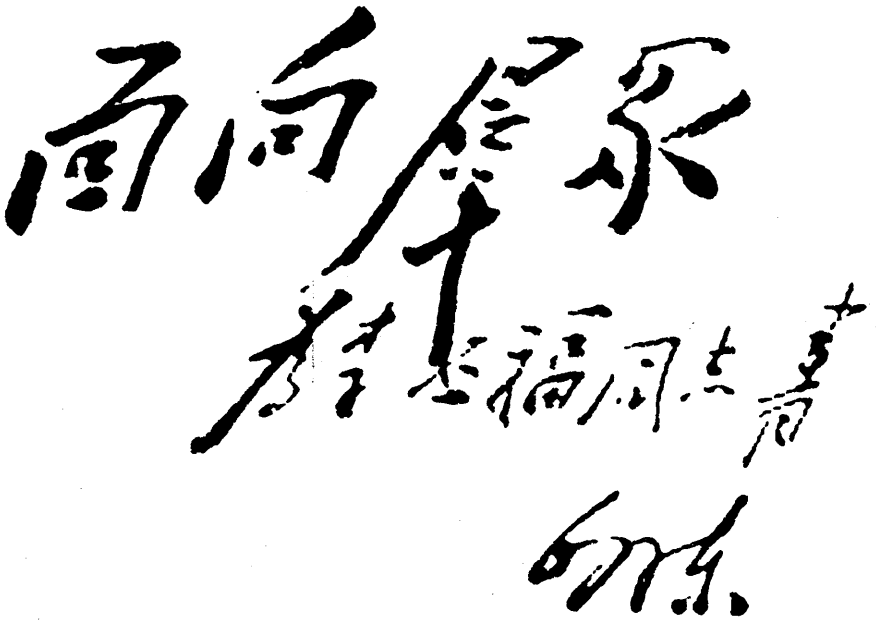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罗章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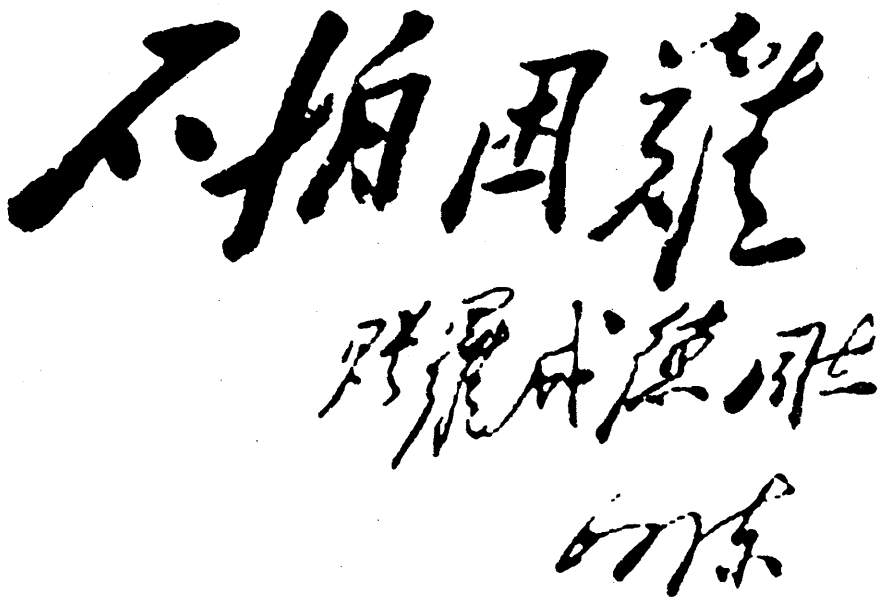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惠中权的题词。



毛泽东为杨林的题词。



毛泽东为李丕福的题词。



毛泽东为罗成德的题词。

复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1月16日）

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事实，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具体解决问题的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再等一下（苏联更胜利，国党抗敌更需要我们）较为有利？

[1] 这是毛泽东根据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提出有关与国民党谈判的几个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复李先念、任质斌电[1]

（1943年1月16日）

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利，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复李先念、任质斌电的主要内容。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给钟敬之的信

（1943年1月23日）

钟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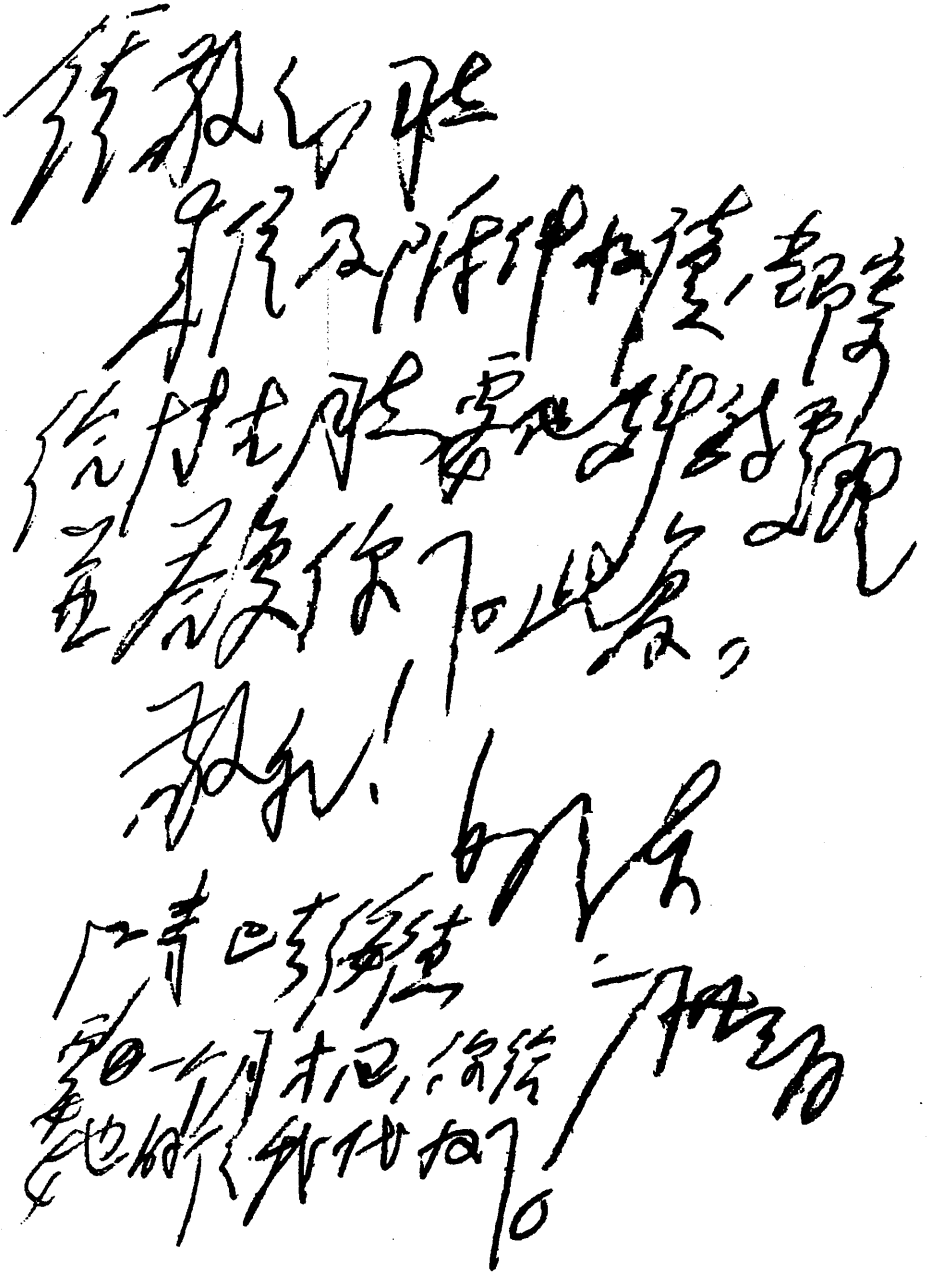
来信及附件收读，当即寄给博古同志要他斟酌处理并答复你了。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江青已去绥德，要一个月才回，你给她的信我代收了。



毛泽东致钟敬之信的手稿。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1943年1月25日）

德怀[1]同志：

你十二月十八日电[2]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3]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4]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5]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

---

[1] 德怀，即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指彭德怀1942年12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3] 蒋，指蒋介石。

[4] 指1942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5]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42年9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赴重庆，1943年7月回到延安。

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四月起学了八个月，今年三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

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1943年1月25日）

生产是目前边区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完成这任务，首先要依靠边区农村中的三十多万个全劳动力和三十多万个半劳动力。这六七十万人，只要组织起来，便是一支雄健的生产大军，便能发生雄厚无比的力量。

可是要把边区农村的几十万劳动力更好地组织起来，必须采取许多有效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劳动互助。

在边区农村中，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式的调剂劳动力的方式，如“变工”和“扎工”，就是流行较广的方式。自发的“变工”和“扎工”，其范围虽然狭小，仅限于亲戚、朋友、邻舍等关系，可是它是适合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因势利导，有计划地组织领导，便可以使它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为了证明这一点，延安县的宝贵经验，是值得称述的。去年延安县共组织“扎工”四百八十七个，另外吸收好劳动力四千九百三十九个参加集体劳动，几乎占总劳动力三分之一，即三个人中有一人参加集体劳动。在开荒的时候，集体劳动就显出很大的力量，去年延安县要在一百天中开荒八万亩，每天要开八百亩，自三月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前，还只开了一万五千亩，只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尚差六万五千亩，但时间已去了三分之二。所以十九日下雨后，采取开荒

突击二十天，在二十天中，竟完成了四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亩，占总任务百分之五十八。假若延安县没有把劳动力及时组织起来，那么便没有办法抓住雨后的绝好时机进行突击，而八万亩的开荒计划也没有办法完成了。

我们知道，做庄稼最要紧的，是“不违农时”。早晚下种，会有不同的结果，迟早收割，也会有不同的收获。要做到“不违农时”，只依靠单独的和分散的劳动，是难乎其难的。假若采取劳动互助，情形就大不同了。把三五户七八家的人力畜力，组织在一起，今天大家一齐帮你耕，明天大家给我种；哪一块地草多，就给哪家先锄；哪家庄稼早熟，就助哪家先收。在“变工”中，不仅有人工换人工，而且三个人工还可以换到一犋牛工，办到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经验证明：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枚劳动。如：一个劳动力一年可以耕种十五垧地，但若三个劳动力一齐干，一年就可以耕种七十垧地，四个劳动力更可以耕种一百垧地。两个人力一犋牛力，三天可以做完的工，如果用三个人力一犋牛力，两天就可以做完。不仅如此，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还可以大大发挥劳动热忱，增强生产效率，因为大家一起工作，生活活泼，情绪紧张，互相鼓励，互相竞赛，谁也不肯落在人后，工作进行的紧张程度，正像群众说的：“工变工，挣断筋！”最后，互助的集体的劳动组织，是真正群众的组织，便于我们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进行教育群众，增进群众团结互助的精神。

正因为这种互助的集体的劳动组织，能使庄稼不违农时，调剂和节省人力畜力，提高生产热忱，增进劳动效率，发挥群众的团结互助精神，所以它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

流行民间的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是“变工”和“扎工”，但是也并不仅仅限于这两种。如像劳动英雄吴满有，既不“扎工”，也很少“变工”，他在平常帮助本庄的移难民，一遇农忙，那些移难民也就自愿地帮他做工。再像“伙牛”、“伙种地”等等，那是带有互助性质的。这些流行民间的劳动互助组织，内容是非常生动、具体和切合实际的，都应当及时倡导和推广。

我们必须学习延安县的模范，对于组织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放弃消极的自流现象，采取积极的领导提倡。不仅仅鼓励组织“扎工”，而且要更多更普遍地组织“变工”；由旧的比较狭小范围内的组织，转到有组织的新的“变工队”。我们首先要在今年春耕中，大大推广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一切具有劳动力的——身体强壮的、老弱的、儿童与妇女等，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劳动互助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我们若果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扎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而且反会降低。

再则，组织劳动互助，是最生动具体的事情，绝不能够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去对待。比如我们今天要努力扩大那种民间劳动互助组织，所组织的“变工”队不应过大，不应以乡或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广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最好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对于那些人口多、更多需要互助的村庄先着

手，不仅只组织一个，而且可以组织几个、几十个，也不仅限制在一村的范围内，还可以超出自然村的范围，实行村与村的互助。

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头领导。我们的乡村干部和党员，要首先参加进去，或者就以党的小组为骨干，组织成“扎工”队，起模范推动作用，并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群众教育、团结群众。我们的农村支部、乡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一定要把组织群众生产看作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某些同志以为“这些事群众自己会搞，用不着咱们担心”，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一定要严格改正。

今天，已是四九将完，人们常说：“春打六九头，犁牛遍地走”，让我们迅速把这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来，掌握春耕，不失农时，完成农业生产的重大任务！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中国画）



《艰难的岁月　伟大的友谊》（油画）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在谢觉哉、贾拓夫的报告上的批示[1]

（1943年2月1日）

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

[1] 这是毛泽东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1月29日召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的主要内容。

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1]

（1943年2月7日）

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毛　朱　王　叶

丑虞

[1]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为主动加强统战工作致各战略区域的指示电。



1943年，毛泽东和王稼祥在延安。

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1]

（1943年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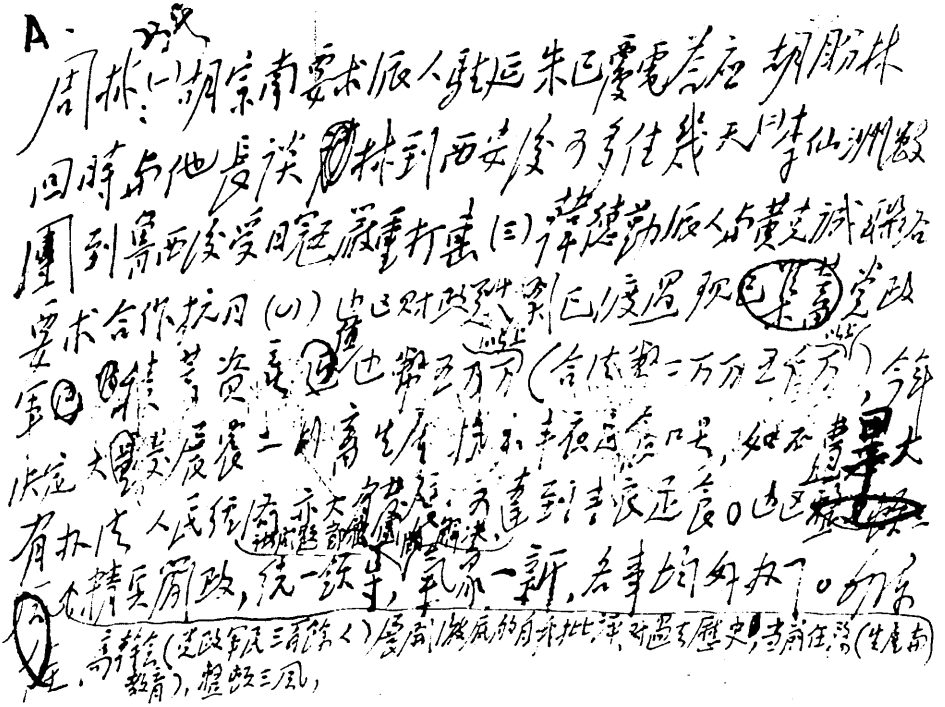
周、林：

（一）胡宗南要求派人驻延，朱已复电答应。胡盼林回时与他长谈，林到西安后可多住几天。（二）李仙洲数团到鲁西后受日寇严重打击。（三）韩德勤派人与黄克诚联络，要求合作抗日。（四）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毛泽东

佳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等问题给周恩来、林彪的电报。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的手稿。

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

（1943年2月10日）

恩来、德怀、小平、荣臻、林枫、朱瑞、荣桓、漱石[1]同志：

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

（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

（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

（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

（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小平，即邓小平，1904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荣桓，即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日

复林彪等电[1]

（1943年2月12日）

谈判方针昨已电告。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目前正在注视日、苏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

[1] 这是毛泽东复林彪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1]的电报

（1943年2月21日）

斯大林同志、联共中央和红军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同志与中国人民热烈地庆祝红军成立的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

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了二十个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奋斗，红军节已经由国际劳动群众的“狂欢节”发展为全人类的“狂欢节”。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在全世界到处都引起欢呼和赞美。全世界到处都在研究着红军胜利的军事和政治教训。红军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从十一月十九日在伏尔加河上的危城[2]发动反攻，三个月后就一跃而至六百多公里以西的第聂伯河附近。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自从红军开始对德战争，世界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由于红军的胜利，新世界的未来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经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

[1] 苏联红军是1918年2月23日建立的。

[2] 指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的民主已经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中国人民欢迎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欢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争取这个新时代的团结和努力。与红军的胜利同时，英、美在北非，美国在太平洋，也都得到了重要的胜利。英、美正在积极准备实践欧陆第二条战线[1]的诺言。对于中国，美、英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新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结自己，准备像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红军和红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万岁！

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万岁！

中、苏、英、美的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1] 欧陆第二条战线，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反法西斯德国的战场。1941年7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正式提出在欧洲大陆的西部或北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后经苏、英、美三国政府多次协商，于1942年6月达成协议，英、美两国同意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后，由于英、美两国的一再拖延，直到1944年6月，英、美军队才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1]

（1943年2月24日）

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习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致彭德怀电[1]

（1943年2月28日）

拟以黎玉为第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林哲的信[1]

（1943年3月15日）

林哲同志：

今天，读了你纪念“三一五”的文章[2]，颇受感动。我对日本革命史不甚清楚，但非常想了解。而且，对于中国党的干部和党员们，也有必要教他们一些日本革命的史实。所以，我建议你多写一点日本革命的史料，在《解放》[3]上发表。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我喜欢看你的所有文章。同时，我也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的态度。在我们当中，能够分析文章的人太少了，到处都泛滥着主观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们现在正在批判这样的由来已久的恶劣作风。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

[1] 这封信是用铅笔写在一种很薄的信笺上的。林哲，是野坂参三刚到延安时所用的化名。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后，野坂参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名为“冈野进”。此信中所说的批判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指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

[2] 指《解放日报》1943年3月19日发表的野坂参三的文章《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

[3] 原文如此。

复彭德怀电[1]

（1943年3月15日）

同意你对今年华北整风学习的计划。对于三月间召开的地委级以上干部会议，应采取从检查实际工作到领会文件精神的方式，在讨论中要注重反对自由主义，深入地开展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一切缺点错误，把问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才能达到上下贯通，干部团结，改造工作。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1943年3月16日）

一　时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1]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2]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3]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4]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

[1] 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2] 皓电，指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皓）发出的给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同年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3] 汪，指汪精卫（1883—1944），浙江绍兴人，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4] 蒋，指蒋介石。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

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

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

研究问题：

（一）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

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

（二）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

（三）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

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1]作哲学史，周扬[2]作文学史）。

中共党史开始研究：二十二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

（四）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

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3]。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

---

[1] 艾思奇，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1]要切实实行。

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

[1] 指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

复彭德怀电[1]

（1943年3月27日）

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鼎文命令庞炳勋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和朱德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3月30日）

一

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

二

无论华北、华中、边区，中央都曾几次下令禁止磨擦，我军亦无任何侵犯友区行动。但彼方进攻之事则屡起，请交涉制止。

---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制止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五律·挽戴安澜[1]将军

（1943年3月）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2]
师称机械化，
勇夺虎罴[3]威。
浴血东瓜[4]守，
驱倭棠吉[5]归。
沙场竟殒命，
壮志也无违。

---

[1]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参加北伐。在抗击日本侵华战争中，战功卓著。1939年任国民党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2年3月，率第二〇〇师出师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同年5月，在率师返国途中，遭日军伏击，不幸牺牲。不久，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198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2] 将军赋采薇，赋，朗诵。采薇，《诗·小雅》中有《采薇》篇，其诗描写戍边抗击外族入侵的兵士久历艰苦，在回乡的路上又饱受饥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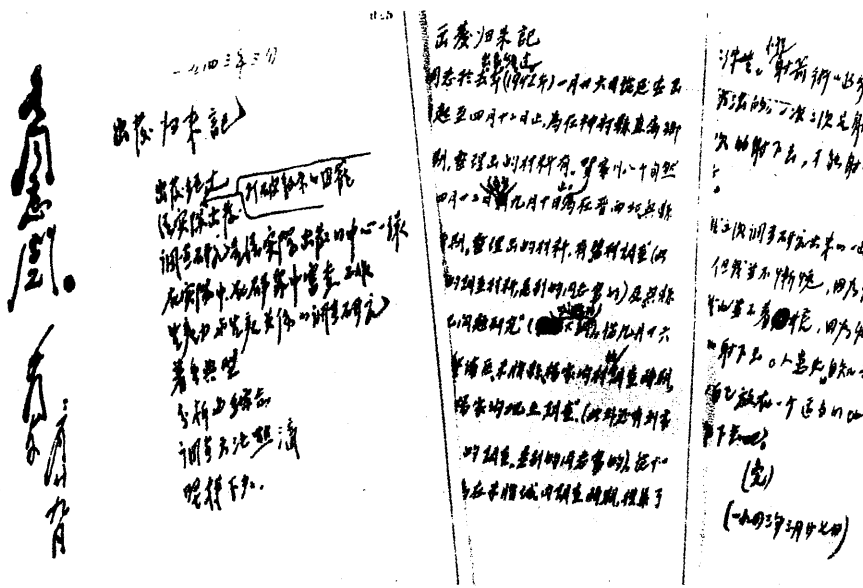
[3] 虎罴，这里比喻凶猛的敌人。

[4] 东瓜，即同古，缅甸南部重镇。

[5] 棠吉，缅甸中部地名。



张闻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1943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张闻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写的《出发归来记》上批示“各同志阅”。

给印度国民大会的信[1]

（1943年4月5日）

印度国民大会诸先生：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医疗队五人中除已先后返印的三人外，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

谨致

热烈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为感谢印度医疗队援华给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复周恩来电[1]

（1943年4月6日）

此间日内即拟具给何应钦复电[2]，你收到后即转交何，但暂不公开发表，俟彼方有进一步反共表示时（例如由中央社发表反共广播），即将此电公开发表。此次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件。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书记处4月5日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给何应钦的复电，答复何应钦关于国共磨擦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4月13日）

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时讲话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给凯丰的信

（1943年4月22日）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致英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电[1]

（1943年4月23日）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庆祝英共第十六次大会的胜利。我们认为这次大会，是英国人民在反法西斯奋斗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并相信它在加强英国工人阶级与英国民族的团结上，在加强英国与苏联、美国、印度、中国的团结上，在促进欧陆第二战场的实行上，都是能够收到成效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1] 这是英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对王若飞来信的批复[1]

（1943年4月25日）

这些党播[2]，都写得很好，又简短，又具体，又生动，请送少奇、弼时、凯丰三人阅后发出。惟延安学习最好的是中直、军直，请你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

---

[1] 这是毛泽东对王若飞22日关于送阅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广播稿的来信批复的主要内容。

[2] 指党务广播稿。

复周恩来等电[1]

（1943年4月27日）

陇南、伊盟两处事件，事前我们毫不知情，事后未有任何一人参与，刘为章所称一切，全是诬词。现闻陇南事变扩大，叛民武装达二万人，伊盟七旗拥护沙王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杀人夺地、夺牛夺马等虐政。太行山战事，我一二九师亦是被“扫荡”者，蒋、庞[2]事前一意对我，现被敌攻，我军决不记前仇乘机图利。至于所谓横山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所谓反共同盟军二百余人装作土匪分股侵入边区，我军只在境内剿匪，绝无一兵一卒跨越边境，刘为章所说完全违反事实。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答复刘斐所提的几个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蒋、庞，指蒋鼎文、庞炳勋。

复周恩来电[1]

（1943年4月30日）

在国际酝酿反苏暗流下，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你处准备答复是必要的，材料已要剑英即办。望向各方先作口头解释，并要求见何见张[2]见蒋，加以解释。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4月28日来电的主要内容。周恩来4月28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根据各方情况和刘斐的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的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2] 何，指何应钦。张，指张治中。

致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电[1]

（1943年4月30日）

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致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